

流泪的淮河

作者：戴厚英

第一部 往事难忘

引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二部 风沙

引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请打开中国地图，我们来认识淮河。

淮河是我国的一条大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东流经河南。安徽，到江苏入洪泽湖。全长约一千公里，流域面积为十八点五七万平方公里。淮河下游原有河道入海，所以淮河两岸曾经美丽富饶，“土风备于南北，人物推于古今”。可是——一九四四年，黄河心血来潮，夺了淮河的河道，从此淮河不能入海，只能流入中国第一大河长江了。淮河失去了往日的神采和威风，便来戕害它两岸的百姓，成为名副其实的害河。

你们知道一条河能作多大的恶吗？我知道。因为我在淮河边长大，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却是淮河的一个女儿。我听说过淮河的咆哮，看见过漂在河面上的人畜的尸体。我知道大水一到就有人流离失所，卖儿卖女，更知道我的乡亲为什么把“水”读“匪”。跟在大水后面的常常是土匪，奸淫烧杀，无所不为。我十岁那年，土匪在大清早进了集，我连忙挟起书包从学校往家里跑。在街上，一个粗大的土匪像抓小鸡似的抓住了我，妈拉巴子，你是干什么的？我趁他翻我书包的时机跑掉了，钻进一个同学的家里。我听见同学的奶奶在挨打，同学的姊姊在痛哭。傍晚，土匪走了，我回到家里，看见爷爷的花园一片狼藉，父亲刚从床底下钻出来，满身的灰。房东蓝二爷从来不怕土匪，站在当街上看热闹，中了流弹，胳膊上掉了一大块肉。伤口用破布包着，布上还渗着血。蓝二爷说，枪子有眼，先穿了一个人的脑袋，再钻进他的胳膊，要不，他的命也没有了。爷爷从此不种花，姊姊从此不出门，父亲从此看见腰间挂着东西像手枪什么的主儿就弯腰。我呢，大大受了一番称赞，都说我会逃。其实，淮河教会我的第一种能耐就是逃。土匪来了，逃。大水来了，逃。日本的汽油划子来了，逃。开始父母抱着我逃，以后我自己长了腿，便跟在父母身后逃。现在，我懂得了自己逃。逃归逃，我也像爷爷、父亲和乡亲一样，没有失去我大汉子民的身分和气度，所以我从来不说“逃”字这样低下的字眼，只说“跑反”。水也好，兵也好，日本人也好，都是理应受我们管辖，听从我们调遣的，不服从，便是“反”，反了你们了，狗东西！我跑只是暂时的，你反，却是千古罪名，总有治你的时候。

果然，新中国一成立，毛泽东主席就发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十万民工调集在小小的润河集，苏联专家也来了。一座雄伟壮观的水闸建起来了。我当时十三岁，和几位同学一起去瞻仰水闸，在它面前，我们显得多么渺小。然而，谁能想到，不过三年，淮河对人们进行反攻例算，轻而易举地从润河集水闸上漫了过去

淮河依然是一条害河。至今，还常常有人被它害得流离失所。为了使它驯服，我们

淮河两岸的人民已经付出了多大代价啊！谁也不知道我们还要付出多少。

四十多年来，我和淮河有时亲近有时疏远，对它有时热爱有时憎恨。面对这河流，我到底应该顶礼膜拜呢，还是吐口水跺脚？也许，我的权利和义务只有一条，做它的忠实的记录员，记录下它的种种功和罪，别的什么也不说。

我且试着这样做。

—
我差不多一从娘肚子里出来就听到顾远山的名字了。以后又常常听到父母和别人谈起他，可是我对他的了解，今天和昨天一样多，明天和前天一样多。

顾远山，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活着。我所以会认识他，因为我和我的孙女玉儿是同学。玉儿常常对我说起她爷爷，语气里怨比爱多。

爷爷不喜欢女孩子读书，玉儿说。为什么呢？不为什么，女孩子根本就不应该读书嘛，只要认识柴米油盐几个大字就行了。而这几个字，玉儿四岁的时候，爷爷就教给她了。爷爷还教了她怎样走，怎样坐：行如风，坐如钟，睡如弓。玉儿也学会了。在县里上中学的时候，我和玉儿同睡一张铺，她睡得就像一张弓，一张又小又软的弓，看了叫人可怜。

我觉得顾远山是个怪老头，便想去看看他，只是有点怕。后来我想，怕什么，他和我爷爷不是一样的老头吗？他开一个杂货铺，我爷爷开一个棉布店，他吃的水是从淮河里挑来的，我爷爷吃的也是淮河的水。

爸妈说，不要，不要到顾远山家里去。这老头古怪着呢！其实，他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大家都是喝一条河里的水长大的，不过他多喝几口下游的水，我们多喝了几口上游的水，我们垮一点，他蛮一点。宁向南挪一千，不向北挪一砖。南方比北方好，这谁都知道。可是我们是从北向南挪，他却是从南向北挪，我们现在比他们强多了。他忘不了他先前的祖先，什么书香世家，高贵门第。可是他的祖先现在在哪里？骨头都生锈了。

骨头也会生锈吗？我问。当然，他的祖坟在河边，早随大水漂到洪泽湖里去了，骨头经水一泡，还有不生锈的！爸说。拾几块来看看就好了，我说。妈打了我一下：净胡说！

我更想去看看这个古怪的老头了。可是玉儿父母早和老头儿分了家，不住一块了，我找不到机会。

我在大街上碰到了玉儿，见她匆匆地小跑，说爷爷叫她去买包子。这不就是卖包子的吗？还往哪里跑？我拉住她。她挣，说爷爷只吃姚哑吧店里的包子，别家的他嫌不干净。姚哑吧死了呢？我问。姚哑吧比爷爷年轻，肯定是爷爷先死。只要爷爷不死，我就得去买姚哑吧的包子。玉儿恨恨地说。

不要听他，就买这家的包子，他能吃出味儿不成？我挑唆玉儿。

好吧！玉儿咬了咬牙。

为了给玉儿撑腰，我跟她一起把包子送到顾远山家里。

想不到顾远山是一个漂亮的老头儿！他长得白白净净，高高大大，眉眼很有神气，穿一身月白竹布裤褂，一尘不染，头发漆黑油亮，齐刷刷地梳向脑后。我们进门时，他正领着老婆孩子（他还有一个小儿子和一个小女儿，都是玉儿现在的祖母生的，玉儿的后祖母还年轻着呢！）坐在一张八仙桌前补破票子。桌子堆满了破票子，顾远山他们仔细地用浆糊和纸片把它们补好。实在拼不全的票子，他们就移花接木，把两张完全一样的半截票子接在一起，数票子的人只从一头数，看不出来。缺了边角的票子，他们用花纸片补上，乍一看，也和真的一样。这不是骗人吗？我说。骗人？顾远山老头不屑地看我一眼，我们顾家会骗人吗？这票子都是买东西的人给我的，又不是我撕破的。不花出去，我不是白白吃亏？再说，他抽出一张两个半截票子拼成的票子给我看，这两半截都是左边的，肯定还有两半截右边的，大家都拼起来，还是那么多钱，又没把一元的当作二元花。大人的事，小孩子懂什么，也要随便说？我们顾家就不会这么没家教。

我爷爷教我不要骗人，我说。

你爷爷？你爷爷大字不识，剃头的出身，我还不知道？剃刀削脚，下三流的行当！

我几乎要哭了。而一哭，就可能骂人。这是我的脾气。我会唱很多骂人的歌。这时，我就想唱：打麻线，吊野鸡，姓李的姑娘不是好惹的。爷剃头，爹削脚，头毛脚皮你下锅。头毛缠住你咽喉，脚皮梗住你心窝。缠得你两眼朝上翻，梗得你一命见阎罗。

但是，玉儿在担心地看着我。我不能伤她的心，我和她太要好了。用妈妈的话说，我们姊妹天生的有缘份。我家三姊妹和她家三姊妹插花地排列在一起，正好是一个比一个大一岁。我大姊叫俊，她大姊叫美，我二姊叫贤，她二姊叫德，我叫翠，她叫玉儿。名字连起来也像亲姊妹。我常常尿床，一尿床，早上就不能起来上学，赖在被窝里装病，直到把被子捂干。每逢这样的时侯，她也装病，和我一起捂被窝。她总系不好裤带，一次上课的时候裤带开了，羞得哭起来，我给她系好了裤带。星期天，我们常常一起挖荠菜。

爷爷，包子都凉了！玉儿要为我解围了。

顾远山老头应了一声，站起来去洗手，用肥皂使劲地搓，盆里的水哗啦哗啦地响。包子是给他一个人吃的，别人都吃家里蒸的馍。他洗手，又仔细地将手指一个个地看过，看洗干净了没有，看完，才捏起一只包子往嘴里送。

玉儿！这是谁家的包子？只吃了一口，老头儿就喊起来了。

玉儿吓得说不出话，我替她说，是姚哑吧店里的。顾远山不理我，叫玉儿说。玉儿吓哭了。

小小年纪，学会骗人了！没家教！都怪你妈没家教，教你这样的孩子。你妈一进顾家门，我就看她像个扫帚星。闹分家，好！分出去了，就这样败坏我的家风。给我拿去换！

顾远山的脸都涨紫了，他的老婆也在一旁帮腔，说他整天吹自己顾家老门老户，教养出来的儿孙就是这份德行。我气不过，便插了一句：别人的包子里包的是毒药吗？

比毒药还坏！功夫不到，火候不到，又不干净。你们家的人当然能吃，可是我们家的人不能吃。孔子曰：食不厌精，你懂不懂？老头子吼道，鼻子里还哼哼地冷笑。

玉儿哭了，拿起包子回去找她妈，要钱给爷爷重买包子。她妈在她额头上点了一下：叫你不要去沾他！但还是给了玉儿钱，把那些包子留给自己吃，玉儿吃了一个，还给了我一个。我们都说味道好。

我发誓，从此以后不再见这个古怪的老头了。

二

整整一个夏天没下雨，河都快干了。大人们都说，秋天要涨水，一定是大水。果然，一到秋天，雨水就不停地下，下，下。我不知厉害，只是心里急，不能出去玩，心里闷得慌。妈妈要生第四个孩子了，家里忙得一团糟。害怕再生一个女孩，奶奶爷爷天天祷告，一天到晚不着家的爸爸也不大出门了。我呆在家里更觉得没意思，天天站在房檐下，用手去接雨水，唱儿歌：老天爷，别下了，沟里的王八长大了。老天爷听不见，照旧下，下，下。

河水漫到街上来了。进了院子。后边一层院子倒塌了。住在后院里的蓝二爷一家搬到前院里来了。我们腾出了两间屋子。其实，他们是房东，没让我们搬家就不错了。蓝二爷一家是干什么的，我也说不清。只知道他们院里整天人来人往，推牌九，打麻将，玩纸牌。夜里也嗷嗷叫。还不时有女人来哭闹着找自己的男人。女人们会骂人，骂自己的男人，也骂蓝二爷。骂得稀奇古怪。一天，来了一个烂眼的女人，要把自己的男人从赌桌上拉回去，男人不走，打了她，她就坐在蓝二爷堂屋里骂起来了。骂得凶啊！蓝二爷也不理睬，只是叫蓝二奶奶劝女人回去。女人急了，就骂蓝二爷卖屁股。我问妈：屁股怎么卖。妈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正想哭，听见后院里打起来了，蓝二爷的小儿子蓝虎抱住了烂眼女人，嘴里叫着“臭婊子，我跟你睡觉！我跟你睡觉！”女人又挣又哭，被人们硬拉开了。女人且哭且退且骂。只骂蓝虎了。小蓝虎啊，你这么坏，叫你不得好死！叫你死在六月里，尸首生蛆。枪冲你，刀劈你。咔嚓砍你的小犊头，叫你的犊头滴溜溜地挂在脖子上，不死不活……蓝虎被她骂得笑了起来，说：只要不死，我扶着快掉下来的脑袋也要去钻你的篱笆子，跟你睡觉。看热闹的人都笑了，倒是烂眼女人的男人跳了出来，一把揪住女人的头发，死拖硬拽地把她拖走了。我跟在他们后面跑了一阵，不小心滑了一跤，一块破瓦戳破了我的下巴颏，从此留下了一个疤。

蓝二爷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蓝龙，在我生下来那一年死了，留下了一个寡妇和一个

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儿子。听妈说，蓝龙死得不明不白。是日本鬼子打进中国的时候，小小的宝塔集竟然也拉起了几支抗战的队伍。只是没见打鬼子，自己倒先拼了起来。蓝龙就是被另一支队伍的头目枪毙的。那是我刚刚生下来七天的时候，半夜里一阵狗咬，院子里闯进一批人。我们家的门也被敲开了。进来几个蒙面大汉，问，蓝龙的枪藏在这里了吗？一个人还去掀我的被子。妈吓得大叫：孩子刚刚七天！蒙面人吐口水，说晦气、晦气。退出去了。第二天，听见蓝龙的老婆哭。蓝龙从此不见了。他的老实巴交的妻子带着儿子在蓝家苦守着，蓝二爷对他们母子很好。蓝龙的儿子叫永继，与我同学。七八岁了，还由妈妈领着睡，头后巴拖了个小辫子。据说，扮成丫头命大。

我已经好几天不见玉儿了。虽说住得不远，但隔了水，不好走，心里好想她。

这天，玉儿忽然蹬着水来了。翠儿，快！到我爷爷家去！爷爷给我换了个哥哥呢，只要两瓢秫秫面。

顾家没孙子。顾远山一共三个儿子，大儿子媳妇不生养，二儿子媳妇只生了玉儿三姊妹。为这，玉儿妈不知哭了多少场了。让玉儿读书，也是她妈的主意，说现在都是民国了，闺女可以当儿子养，将来长大了，也可以当个女掌柜。我劝玉儿不要当掌柜，跟我一起学武术，将来上山拜师，当剑仙侠客，杀富济贫，只要呵一口气就能把坏人的眼吹瞎。玉儿不信。

前年，玉儿妈有病，叫玉儿到伯母那里去住，说是过继，玉儿只去住了八天就回来了，她奶奶不喜欢她。奶奶说，要过继也得是个男孩，要个丫头片子干啥？将来老三娶了亲，还怕生不出三几个小子吗？到时候老大领一个过来就是了。玉儿奶奶今天怎么会同意老大领孩子了呢？我问玉儿，玉儿说奶奶爷爷都说便宜，比捡个小狗还便宜。

我赤着脚和玉儿一起出了门。到了顾远山老头家，只见两个男孩低着头坐在小板凳上。玉儿说，他们是哥儿俩。圆脸的叫大呆，是哥哥，也是玉儿的哥哥了。长脸的叫二呆，是弟弟，现在卖给玉儿的姨奶奶当儿子了。果然看见玉儿的瘪嘴姨奶奶在抹眼泪，说好了，有个儿子了。别小看了这个瘪嘴姨奶奶，是我们这一带的知名人士呢！她会接生，会看病，还会过阴下神。她是玉儿亲奶奶的妹子，因为姊姊死了，又因为家里穷，和玉儿爷爷家不大来往。

顾远山满脸得意，好像买到一匹好骡马。他对大呆说：记住，从今以后你就姓顾，你的名字就叫顾书元，书字辈，是顾家的长子长孙。你的父亲叫顾维尧，二叔叫顾维舜，三叔叫顾维禹。这个二呆，以前是你的弟弟，以后就是你的姨叔了。不可乱了辈分。记住了吗？大呆不声不响地点着头。顾远山不满意，说：跟老的说话，不能光点头，要张口。说，我说的你都记住了没有！大呆像蚊子嗯嗯似的答了一声记住了。说一遍我听听，顾远山又说。大呆只说了一句从今以后我姓顾，便哭了。顾远山不悦地斥责道：哭什么？喜事么！真是乡下孩子。顾远山年轻的老伴在一旁撇嘴，说像拣不着似的！这年头，头脸好看的小孩多得很，换了这么个呆头呆脑的小孩。

玉儿挨上去，站在大呆的身边，问爷爷：大呆哥明天和我一起去上学吧？她爸爸瞪她一眼，说：叫书元哥！

过一会儿，顾远山向玉儿招招手，玉儿走过去，他在玉儿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什么话，玉儿不满地看了他一眼，走到姨奶奶身边，对姨奶奶说：吃饭的时候到了，到俺们家去吧！

是你爷爷叫你来撵我的吗？姨奶奶尖着嗓子问。

玉儿胆怯地摇摇头。

姨奶奶把手一拍：好嘛！多少年也不来一趟，今天是为了这两个孩子才碰上的。哪有大晌午撵客的？

顾远山一转身走进堂屋里，嘴里嘀咕：没有知识，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顾远山，你说啥！谁叫你养了？你忘了当年俺家是怎么对你的了。你十五岁父母双亡，流落到宝塔集，穷得叮当响，是俺爹卖了自己的棺材给你作的生意本。书香门第，书香门第，你的书在哪里，香在哪里？你看来去就是一本破黄历！我是活活给你气死的！我临死的时候，是怎么对你说的？我叫你好好地对待两个儿子，你待他们怎么样啊？你手扪心口想一想啊，顾远山！你手们心口想一想，想一想啊！

姨奶奶发起疯来，说着说着站起来去追顾远山，抓他的衣领，被玉儿的大妈拽住，捺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玉儿大妈叫玉儿他们一起跪下来，说是玉儿先前的奶奶附在姨奶奶身上了。顾远山的脸色发白，看样子他很害怕，乖乖地在姨奶奶对面坐了下来。

这些年不断地叫维舜维尧去给你上坟，你还有什么不称心的呢？顾远山问前妻的灵

魂。

我争的是烟火吗？我要你对我的孩子好。附在姨奶奶身上的灵魂说。

我对他们有什么不好？顾远山说。

叫我的媳妇说！玉儿大妈，你说。姨奶奶声色俱厉。

玉儿大妈哇的一声哭起来了，还连连对姨奶奶磕头，说公婆待她好，是她自己太笨，乡下姑娘，手脚笨。

不要怕，媳妇！你起来！我都看在眼里！儿子给媳妇买件衣服都不许。烧饭的时候，他两口子坐在堂屋里歪着头朝厨房看，多放了一点油，多放了一点盐，啰嗦个没完没了。还给儿媳们吃两样饭……

玉儿大妈哭得更厉害了，玉儿也哭了起来。

顾远山叫自己年轻的老伴：你过来给她磕个头，说过去做得不到的地方，请她包涵，从今以后将功补过。他老伴果然跪下来叫姊姊，请姊姊回去，保证以后待儿孙们好。

要好好地待大呆，不管是不是自己生养，他是维尧的后代，灵魂说。

那当然了，姊姊。玉儿现在的奶奶回答。

你要是不听我的话，将来死得比我还惨！

我怎么敢不听姊姊的话？我听，都听！

姨奶奶伸了一个懒腰，抹了抹脸，问：你们跪着干什么？天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好几里路呢！

顾远山一家都吐了一口气，跪着的都站了起来。玉儿大妈问公婆：做饭吗？顾远山说：死物！你姨要回家还不先送她？

玉儿上去拉姨奶奶：到俺家去吧！

姨奶奶拉起二呆：走，饿死也不吃顾家的饭。

我和玉儿跟着姨奶奶和二呆走出顾远山的门。大呆站在门口望着弟弟，一句话也不敢说。

姨奶奶不肯去玉儿家，说眼珠子都没有了，要眼眶子干什么。姊姊一死，什么情义也断了，以后为了二呆，也不能多与顾家走动了。

姨奶奶走不多远，就和路上碰上的人搭起话来，说：顾远山不认我这个穷亲戚，我没饭吃，不得不偷了他家的一双鞋，谁要这双鞋？给两个秫面粑粑就行了。

玉儿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恨恨地对我说：我讨厌爷爷！唉！我同情玉儿。同玉儿的爷爷相比，我的爷爷真是可爱多了。虽然他曾经是个剃头的。

三

书元（就是大呆，顾远山老头不许人叫他原来的名字）当了大家伙的哥哥，但是他没能跟我们一起上学。顾远山有个习惯，家里每生下一个人，他都要把名字写在一个小折子上，写下生辰八字，据说，那小折子是他们的家谱。他还喜欢给家里每一个人推算八字，预卜他们的未来。比如，他说，在他们顾家人当中，有两个是命硬而运不济的人，一个是他的小儿子维禹，一个便是玉儿。他说这两个人都是有偏才而无正才，将来必然坎坷或夭折。他反对玉儿念书，这也是一个原因。玉儿的成绩越好，他越说这是把她往死路上推。玉儿的父母有时也信他那一套，只是没有儿子，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把女儿当儿子领，玉儿又是几个女儿中最灵慧的。顾远山给书元算了八字，认为这孩子是平庸之辈，成不了大器，念书也白搭。于是书元便成了顾家的小长工。天天出去拾柴，回来便烧火、洗碗，作杂务。玉儿奶奶说他脏，不让他睡在正屋里，给他在厨房搭了一个草铺，白天掀起来，晚上摊开。不让他和家里人一起吃饭，给了他一个小瓦盆，饭和菜装在一起，蹲在灶门口吃，吃完，筷子和盆都另外洗，洗完就放在菜案板底下。书元有一个毛病，尿床。十岁的孩子尿床，该是病了，可是没有人管他，每次尿了床都让他顶着被子在太阳下晒，尿骚味呕得他呕吐。真是活得不如一条狗啊！

但是书元从来不哭，我碰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嘻嘻笑着。我大都是在玉儿家里碰到他的。玉儿妈常常偷偷给他东西吃，叫他回去不要说。有时，我和玉儿也陪他到他爸爸帮工的店里去讨零花钱，他爸爸也是肯给的。要的钱他一个也不花，问他留作干什么，他不说话。星期天，书元拾柴的时候，我和玉儿也跟着去，挖荠菜。我和玉儿喜欢唱挖荠菜歌，什么挖荠菜别过河，过河挖不着。挖荠菜别过沟，过沟只能挖一兜。书元不跟我们唱，说没意思，要教我们“走码儿”。用草梗子（叫码儿），在地上画个棋盘，一走就是好几盘。输的当然是我和玉儿。从走码儿看，书元一点也不笨。

为什么你爸爸要卖你和二呆呢？让你们上学不好吗？我和玉儿常常傻乎乎地问。书元总是咬着嘴唇不回答。慢慢地，我们也就问了。

过河南去挖荠菜，去不去？一个星期天，书元对我和玉儿说。玉儿要问她妈，我说问啥？又不会掉在河里淹死，怕啥？我早就想过河南去玩了。

我们过了河。

书元并不停下来拾柴，也不让我们挖荠菜，那么多的好荠菜。他带着我们走哇走哇，我和玉儿的脚底板都磨破了，他才让我们停下来。那里光秃秃的，没有柴也没有荠菜。

到这里来寻魂啊？我生气了。

就是寻魂。这就是我的家，让大水冲光了，我妈也淹死了。书元说。

你爸呢？我问。

不知道。书元说。

我和玉儿都很难过，想安慰他，又不知该说什么。想了半天，玉儿说：哥，不用怕，我家就是你的家。你现在姓顾了。

不，我姓张。书元说，腮帮子都鼓起来了。

可是姓张的现在没人了呀！我说。

有人，我，还有二呆，还有老家的人。书元说。

你老家在哪里？玉儿问。

北边。爹说，俺家里出过大王呢，后来给满清满门抄斩了，俺们是逃到南边来的。书元说。

大王？土匪吗？我问。

不是，土匪是抢东西的，大王是打天下的。大王和皇帝只差一点点。书元的语气里含着骄傲。

那时候，我和玉儿都不知道张家出过什么大王，只知道我们这一带出过两个大皇帝，曹操和朱元璋。后来读历史才知道，确实出过一个姓张的大王，捻军的首领张乐行。但书元是不是张乐行的后代就无从查考了。至少在现在流行的张氏宗谱中没有他和他爸爸。

那你将来也想作大王吗？我问书元。

哼。书元回答。

我们差不多空着手回到家。太阳已经偏西了。肚子饿得咕噜噜地响，恨不得一步走到厨房里。但因为怕书元空手回去挨打，我和玉儿还是忍住饿，要把书元送回去，就说我们迷了路。可是书元不肯，他一过河就在一个小桥边躺下了，催我们快回家。肚子实在受不了啦，我们也只好把他丢下。

吃过晚饭，我去找玉儿，问书元怎么样，玉儿说去看看吧。哎呀，我们一进门，顾远山老头笑嘻嘻地和我们打招呼，书元在吃白面馍馍了！

玉儿，来！对爷爷说，你们今天到哪里拾柴了？顾远山温和地拉起玉儿的手。

上……玉儿看了我和书元一眼，河南去了。

好。明天还去。河南的柴好拾，看，那么多！顾远山说。我们随着他的目光往院里看，整整齐齐的堆着一堆劈柴。我和玉儿张开的嘴合不起来了，一齐拿眼问书元。

书元眨眨眼。

书元，以后天天到河南去拾柴。专拾这样的劈柴，好烧。玉儿奶奶也眉开眼笑的。

书元的脸长了。哪能天天拾到这样的柴呢？他说。

那这些柴是偷来的吗？玉儿奶奶问。

胡说！顾远山老头斥责自己的老伴，书元会偷人家的东西？我们顾家是书香门第，从来不出盗贼。书元自从进了顾家门，我教过也不知多少遍了。

玉儿奶奶笑了：看你当了真了。我也说，这些柴怎么会是偷的呢？怕他懒了不肯去拾呀！

顾远山老头威严地嗯了一声，又对书元说：书元，我今天再对你说一遍，我们顾家人从来不占人家一点便宜，更不会偷盗。你若是不听，将来学坏了，看我不打断你的腿！吃饱了吗？睡去吧！明天一早还过河南去。

书元到厨房为自己铺床去了。我和玉儿想跟过去问个明白，被顾远山喝住了：还不回家睡觉吗？东跑西颠的，没家教！回家的路上，我对玉儿说，那劈柴定必是偷的。玉儿说，快走吧，我害怕。

我妈妈又生了个女孩。

这女孩应该在涨大水时降生的，可是她迟迟不肯出生。奶奶说，过了月的孩子，一定是个男身，而且一定是个贵人。为了迎接这个贵人的到来，我们一家人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好串门的爸爸保证今后一步也不离开家了，除非带儿子下澡堂洗澡。

却是一个难产的丫头片子！一家人闹翻了天。奶奶怪爷爷从前是个剃头的，没积下好德。爷爷说，你嫌我剃头的孬，当初就别嫁给我，是你自己找上来的。奶奶说，要不是我右手有点残疾，我会嫁给你？爷爷说，自己明白就行了！要不是残废，你还想嫁到天上去呢！奶奶说，对了！我就是想上天，给老天爷当小老婆去！爷爷说，天上少你这样的！去嫁铁拐李吧，正好匹配。

爸爸气得一跺脚跑了出去。

妈妈哭着要溺死小妹妹。我和两个姊姊整天守着妈妈，劝她留下小妹妹。

接连三天，爸爸没回家。奶奶说：别是去嫖去赌了吧？托蓝二爷去找找。蓝二爷说，男人家，让他散散心吧！到时候他自己会回来的。爷爷也这样说，奶奶却不依，叫我和姊姊出去找。

我到哪里去找，只能一家一家地问。问到顾远山家的时候，正碰上热闹。

顾远山家的近邻安玉山吵吵嚷嚷地到顾远山家来了，说顾家出了贼，偷了他家的劈柴。这安玉山也是宝塔集上一个有名的人物，平时足不出户，就躺在家里抽大烟，可是谁都怕他。就是土匪进了集，在他家门口也不敢大声叫喊，更别说去抢他家的东西了。都说土匪每次进集他都事先得了信，在自家门口作了记号，可是我查看了几次，也没看见他门口有什么特别的记号。后来才知道，他是青帮头子。顾远山哪里惹得起他！

杨大杆子都不敢拿我家一针一线！安玉山说。杨大杆子是宝塔集最有名的小偷，会飞檐走壁。宝塔集上有钱人家他偷遍了，确实没听说他偷过安玉山家。

书元！你出来！这些劈柴是从哪里来的？说！顾远山威严地说。但是他的眼睛却不看着书元。

书元慢吞吞地走出来，不说话。

算了吧，顾先生。别吓唬孩子！劈柴还能散在野地里等人拾吗？不是买的，就是偷的。这一点，三岁的孩子也知道。你还会不明白？安玉山说。

他说是拾的。大人哪里知道。顾远山说。

安玉山冷笑一声：怪不得，你就天天让孩子去拾了。我是可怜孩子，偷一回两回就算了。如今天天偷起来了，我不如天天买柴往你家里送了，何必劳累孩子！

我顾某不是那种人。顾远山辩道。

谁知道你是哪种人。安玉山用鼻音说话了，今天我也不是来讨这些劈柴的，送给你算了。我只想对你说，别当我是傻瓜，以后没柴烧时言一声，我给您老送……

啪！顾远山在书无脸上打了一巴掌。

安玉山上前架住顾远山的手：不许打！既然要了人家的孩子，就该养得起。养不起就放生，也不能教人家孩子去偷呀！我安玉山是个混世面的人，不比你书香门第高贵，可是良心还有一点。这孩子，你要是不想养就送给我吧，我当一条小狗养着，一定养得他白白胖胖，不偷不盗。

说完这段话，安玉山就走了。顾远山马上抄起一块劈柴，喝令书元跪下，劈头盖脸地打将下去，一边打还一边骂：我看你一定是天生的贼种，贼性难改，今天非打断你的两条腿不可。

顾远山打，他的老伴在一旁助威，说使劲打，不打他不知道厉害。书元嗷嗷地叫妈，他现在的妈，也就是玉儿的大妈，只能在一旁流泪，恳求公公：饶了他吧！饶了他吧！实在劝不住，她就跪下了。

我在一旁再也忍不住了，就叫书元哥：跑呀！跑去找玉儿妈！玉儿妈不怕他们！

没等到书元回话，我的头发就被人抓住了，回头一看，是奶奶。小祖宗，叫你找你爸，你在这里抱打不平。还不回家去，你妈快把小妹妹闷死了。奶奶说。

我吓得浑身一抖，赶紧跟奶奶回家。家里又闹翻天了。姊姊说，妈把小妹妹丢进马桶里，盖上盖子，自己坐在上面，足有一顿饭的时候，幸亏被奶奶发现了，小妹妹还有一口气。我赶紧去把小妹妹抱在怀里，眼泪哗哗地往下流，我对妈说：从今以后，我领着妹妹睡。奶奶也骂妈：造什么孽？男孩女孩都是一条命，就不怕老天爷雷打你？爷爷说：你还有脸讲？不是你天天呶嗦，让人受不了吗？

爸爸好像也得了信，急急匆匆地回家来了，说何必！何必！我认了，命里没儿子，

想也没有用。将来等闺女长大了，找个好女婿吧！

奶奶说：找好女婿！闺女一个个像丑八怪，到哪里去找好女婿？爷爷又是剃头的。

爷爷说：丑？翠儿丑不丑？翠儿将来就能找到好女婿。对不对，翠儿？

经他们这么一提，我马上又想起书元哥了。哎呀！书元哥跑到玉儿家了吗？我叫着，从家里跑了出去，直奔玉儿家，书元果然已经在那里。

五

玉儿妈长得非常好看。中等个子，小脚，白净肤色。眼睛长得特别好，眼珠黄黄的，眼窝深深的，显得聪明又活泼。她是我妈当闺女时的朋友，听我妈说，一条街上的闺女数她能干，针线、灶上，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可惜命不好，自幼死去父母，在姨母家中长大。这姨母有地又有钱，只是姨父不正干，在城里讨了个小老婆便远走高飞，信也不给家里来一封。好在姨母能干。一个人吃斋念佛，管理田产，把儿女和玉儿妈一起养大，该娶的娶了，该嫁的嫁了。姨母本不想把玉儿妈嫁给玉儿爸，嫌婆婆是后母，又年轻，比玉儿妈大不了几岁。可是她那个不通音信的丈夫时常不声不响地变卖家产，城里的生意垮了，地也差不多卖光了，力不从心，也攀不上更高的枝儿了，只能图顾家一个老门老户，顾氏父子尚知书识礼。

玉儿妈刚嫁过来时倒还能讨公婆欢心，因为心灵手巧，把家务事做得井井有条，连婆婆的头发在她手里也翻出了花儿。公婆把她和乡下来的大媳妇一比，自然满意。然而好景不长，当公婆发现儿子顾维舜完全为媳妇所倾倒的时候，便开始讨厌媳妇了。他们不断地藉故惩罚儿子，警戒媳妇。玉儿妈发现丈夫常常被公婆斥责，甚至罚跪，问丈夫为什么，丈夫什么也不说。后来她大嫂告诉她：完全是为了你。维舜给你买过一副镯子吧？又买过一件褂料吧？还给你戴过花？婆婆的眼睛带钩子，弯弯曲曲的地方都能看到。

大嫂能忍的事，玉儿妈不能忍。她起了分家的心，便和丈夫嘀咕。不料百依百顺的丈夫无论如何也不肯，怕担个不孝的名声。玉儿妈一直忍到第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

顾远山不许媳妇在自己的院子里生养，说坐月子的人脏，身上有血光，会给他带来血光之灾。他叫维舜给玉儿妈在院子外面沟沿上搭一间草棚，让她在里面住一个月，吃喝由大嫂送。维舜只能偶然过来看，不许问长问短，更不许买东西。像坐了一个月的牢，玉儿妈经常在夜间哭得死去活来。姨母来看她，虽说对顾远山不满，也不敢多嘴，怕将来侄女更受苦，只是劝：慢慢熬吧，二十年媳妇熬成婆，别的不看，看在维舜的分上，维舜是个知冷知暖的人。熬到满月，玉儿妈跨进了顾家院门，谁也不理，自顾自地收拾东西，然后把孩子一抱，回了姨家。临走的时候托大嫂给丈夫传话，不分家就不回来了。丈夫拗不过她，答应向父母求情，分家。

分家？好！这家里的一柴一棒你们都别想分，只有你们睡过的一张床，抬去吧！顾远山说。

什么也不要，玉儿妈说。姨母给她找了一间房，买了几样简单的家具，她就搬过去了。她等丈夫来看看新屋，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一直等到天黑，无奈何，她抱着孩子到了公婆家，只见丈夫像木极一样跪在堂屋里听训呢！

顾远山看见玉儿妈来了，但是全当看不见，让她站在院子里，自己训儿子训得更带劲。他问儿子，我讲的你都记下了？

玉儿爸背向门跪着，不知道妻子就站在门外，便大声地回答：儿子不孝，娶了个不贤良的妻子，实在对不起二老。这次分出去，是儿子自己闹的，所以从今以后，决不敢向家里要一分一厘，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我的份。儿子将来混得好了，一定不忘孝敬二老；混得不好，便到别处讨饭去，也不给二老丢人现眼。

哼！玉儿妈气得一跺脚，抱着孩子转身就走。顾远山冷笑一声，向儿子呵道：去吧！

玉儿爸回到家里，少不了被妻子埋怨，挖苦，他也不说话。跪了半天，腿也疼了，腰也酸了，裤子上都是灰，肚子还饿着。玉儿妈坚持，这顿饭你自己烧，这条裤子你自己洗，他也只得依从，把裤子拿到沟里湃湃，自己煮了一碗面条吃。这事儿，成了玉儿妈一辈子的话把。

书元到了二婶家，把自己的作为和家里人的态度一五一十向二婶说了，求二婶保护。玉儿妈看着书元身上被打的伤，心疼得直掉泪，说书元傻，无论如何也不该偷啊！书元说，一家人烧柴全靠我拾，不偷哪里来得及？以前也偷，奶奶爷爷又不是不知道。

玉儿妈说：他们的事儿我懂，又要往家里进财，又要朝脸上擦粉。我看不惯才分出来的。如今怎么办呢？我就是敢收留你，你二叔也不敢。我给你几个钱，留着偷偷地

买点东西吃，明天一早，你还是回去吧！

我不要钱，我也不回去。书元说。

我要书元哥哥。玉儿说。

玉儿妈瞪了玉儿一眼，说你是不知道你爷爷的厉害呀。刚分家的那阵子，你爷爷他三天两头来这里，看俺们吃什么，要是吃好的，就要砸俺的锅。幸亏那时候你爸只是个小帮工的，穷得很，吃不上好的。要不，锅早就给砸了。跑鬼子反那阵，你刚生下来，他们一家人只顾自己跑，没有过来看过一眼。我跟你爸拖大抱小地跑到乡下，想不到在赵老庄碰上他们了。为了向你爷讨好，你爸把一点钱全都花光了，自己还生了重病。你猜怎么着，正在你爸发烧烧得不睁眼的时候，你爷爷领着一家人偷偷地搬走了，口信也没留，还是你大妈偷偷地留下一碗米，救了俺的急。这样不讲情义的老人家，惹他干啥？

死老头子！玉儿骂。

撕你的嘴！她妈骂，不许骂老的！

书元不知什么时候溜了出去，等大家发现的时候，他已经走得没影了。我陪玉儿到她爷爷家去找，也没找到。

顾远山大发脾气：不要造反一样地到处去找，丢人！他一个小孩子，能跑到哪里去？过几天他自己会回来的，那时候才好好治他。玉儿奶奶说：我看是不会回来了。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野种，再喂也不“家”。

你少说话！不是你，这孩子不会跑。顾远山对老伴发脾气。

玉儿奶奶哭起来：怪我？我动他一指头了？

不是你天天嘀咕吗，等老三生儿子，等老三生儿子。你的心只放在老三身上。我对你说吧，老三的命毒得很，命里无子。顾远山说。

玉儿奶奶拍着大腿哭了。她怪她妈不该将她许给人家做填房，怪顾远山当初骗了她，订婚的时候没说清家里还有两个儿子，要不然，她宁可当“家姑老”也不来顾家。

玉儿大伯和爸爸都来了，都不说话。等老爷老奶奶吵够了，他们才慢慢地商量，托人去暗中打听，先到姨奶奶家去看看，二呆在不在家。玉儿大妈一直躲在厨房里，捧着书元吃饭的小盆嘤嘤地哭，喃喃地叫书元，书元。顾维尧劝她：俺们命中无子，也和这孩子无缘，由他去吧！妻子狠狠地在他腿上拧了一把！死驴熊！你哪里还像个男人！他咧咧嘴，说哎，哎。

六

书元从我们眼前消逝了。好像他从来就没有出现过。据说，二呆也不见了。玉儿姨奶奶哭得不行，要和顾远山拼命，被两个外甥劝住了。姨奶奶又过了一次“阴”，说阴朝里没看见大呆和二呆，可见这哥俩还活着。只要好好地去找，一定能找到。可是，谁有心思去找呢，兵荒马乱的。

宝塔集像个贝壳似的附着在淮河北岸上，小得像鞋底儿，不要说全中国、全世界的事，就是淮河的事，它也听不全，看不清。识字识字的人，可以把朝代的更换讲上大概，至于一般的人，便只知道自己遭遇过的事了。

比如，我妈和玉儿妈都知道，有过一次老张打老李，一查，原来是老蒋手下的两个军官在这里干过一仗，今天老张赶走了老李，明天老李又打跑了老张，老百姓跑了一阵子反。

日本鬼子打进中国来，宝塔集人都知道，因为日本的汽油划子开进了宝塔集，还杀了许多人。玉儿妈的姥姥就是被日本人杀死的。鬼子进集的时候，她不跑，说老太太怕什么？鬼子还能不是爹妈养的。还有两个老太太也这样想，结果三个老太太全被杀死了，还被鬼子开了膛，心肝全挖出去吃了。玉儿的姨姥跑回来的时候，拣几根骨头埋了，也没找人验证过，究竟是谁的骨头。

正因为宝塔集人跑反跑怕了，所以日本鬼子投降的时候，宝塔集热闹了一阵子。家家门口挂国旗，放鞭炮，还玩了几天灯。第二天，我和玉儿便上了学。现在又打仗了。识字的人翻到过时的报，知道打仗的双方是八路军和中央军，至于为什么打起来，就谁也说不清了。但是，宝塔集的人都不得不为这场战争出力。出捐出款不算，还要凑钱买枪，组织民团。家里有青年男人的，便要去接受一点训练，像我家和玉儿家，没有青年男人，就要出钱雇人去受训。我爸爸常常唉声叹气，说生意难做，人难做。埋怨没个儿子帮他一把。

常常过兵。今天是中央军，明天又是什么军。不论谁来了，集上人都提心吊胆又笑

嘻嘻地表示欢迎。我家常住兵，我爸招待很殷勤。人家问他什么话，他都回答对，对，或不敢不敢。也不知道他到底站在哪一边。我问过他，他说，谁来就站在谁一边，老百姓嘛，还能有什么主意？

土匪也来凑热闹。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土匪，不是抢劫，就是绑票，差不多天天都有人被绑走，说要多少多少钱去赎，蓝二爷和安玉山经常被人家请去做赎票的中间人。大人们告诫我们：不要随便乱跑啊！有陌生人跟你讲话不要搭腔，更不要跟着人家走啊！晚上，一有鸡叫狗咬，大人们就悉悉索索地爬起来了，先在院子里小声商量，然后让一个人爬到房顶上去观察动静，谁家也不许点灯。每到这时，就听到他们骂政府，要了那么多钱，买了那么多枪，一到土匪来了就不见影了，不是白白地搜刮老百姓吗？他娘！当官都是只知道刮地皮。蓝二爷安慰院里人：放心，有我，这院子的人不会遭殃。

蓝二爷真是一点也不怕，他的被淹倒的院子很快就修好了，赌场开得比以前还红火。听说，他父子又在南头开了个妓院，有几个妓女，叫大先生、二先生的。

在我的记忆中，那一段日子过得最不愉快了。晚上常被大人叫起来躲土匪，白天一有空就想睡觉，没时间玩了。要是有几天不躲土匪，我们就要凑在一起，在院子里玩一会儿。过去我们喜欢玩“点大瓜”，“捉老猫”，现在不喜欢了。现在喜欢玩“练兵马”。

小磨子，一双眼，你的兵马让俺拣。
拣谁个？
拣张飞。
张飞没胡子。
拣那个白胡老头子。

两队人马，排开阵势，对答一番，便开始抓人。抓不住人，就得让人家拣自己的兵马。

我们唱的歌儿也变了。以前我们唱“小板凳，凹凹腰，娶个老婆没多高”和“小巴狗上南墙，娶了老婆忘了娘”。现在则唱：“青布蓝布十八正，大米干饭搅糖稀，有钱的吃个饱，没钱拔腿就要跑。”还唱：“当兵好，当兵好，当兵受罪谁知道。破袜子破鞋破军装，大米干饭豆芽儿汤。”大人们说，世道是该变了，连小孩都唱不安分的歌儿。

娶媳妇嫁闺女的事越来越多。大家说，趁现在赶紧把孩子们的事办了吧，谁知道将来的世道是个什么样？过去一门亲事要说很久，现在三言两语就说成了。所以那一阵子，看新娘子成了我们最大的乐趣。

玉儿在这时候娶了婶子。蓝虎在这时候讨了老婆。

玉儿的三叔顾维禹一直在县城念中学，这时候顾远山怕他到外面胡闯，便叫他回来成亲。时机帮助了顾远山，他给儿子攀上了一门好亲。县里一个大户人家害怕世道变坏，咬着牙将女儿嫁到宝塔集来了。小女儿还念过几天书呢！亲家要陪送几亩地，顾远山不要，说将来有地是祸害。

顾远山在小儿子婚事上表现了少有的开明。他同意儿子媳妇不按照旧习惯行大礼，而是举行“文明结婚”仪式，只对公婆鞠三躬，不磕头了。而且结过婚，新郎新娘就一起回了娘家，一住就是很久很久。为这事，玉儿妈觉得好委屈，不断地在邻居面前倒苦水，说手心手背不一样。我妈劝她：算了，你也熬出头了，将来再生个儿子——玉儿妈又怀孕了——就什么也不用愁了。蓝龙媳妇也劝她：手心吧手背吧，你现在也不用怕公婆了。你们是全全和和的一家人家。像我这样，熬到啥时候是个头？玉儿妈说：可不是，比起你我真算享福的。不过你可以给自己找个好媳妇呀！永继妈说，她想把自己的侄女配给永继，只是那闺女比永继大五岁，长得也不俊。我妈说：啥是俊不俊的，只要和你贴心，我看可以先定下来。将来老二家的上来了，你合得来就住一起，合不来就分开住，总不能受兄弟媳妇的气。

过不多久，永继果然和他表姊订了亲，永继高兴得只是笑。

蓝虎娶亲真够热闹的。蓝二爷的大儿子给害死，心里闷气，要在二儿子办喜事的时候出口气。年头不好也要满请客满受礼。新娘子进家的前一天，他就把院子里的小孩子召集起来，每人发了几嘟噜花炮，还对我们说：去多捡些楝树果子，到闹房的时候砸新娘，问她疼不疼，疼哪儿。你们只管闹，新婚三天无大小。只是千万别砸新娘子脸啊！我们捡了楝树果子，先互相砸起来，问疼不疼，疼哪儿。大人笑我们不知羞。

我妈和我爸都接到吃喜酒的请帖，妈说她拙口笨舌的，不去了，叫我代替她。那天天很冷，我穿了一双新单鞋，绣了花的，脚趾头差不多都冻掉了，但是闹得真痛快。

蓝二爷完全遵老礼，新娘子坐花轿，吹吹打打地抬过了一条街。花轿进院门的时候，给新娘子打了一个“醋炭”，把一盆酸醋浇在一块烧红的犁铧上；弄得满院子醋味。据说，女人爱吃醋，这时候先让她尝够醋味，以后就不吃醋了。新娘子很好看，就是一条腿有点短，我们便马上给她起了个名儿，叫“短一点儿”。先在背后叫，后来就公开叫了。那天晚上闹新房的时候，我们扯起嗓子唱：新娘子，爬房子，爬一屁股麦芒子，新娘子叫了，新郎信笑了。鬼知道这歌是什么意思。

正当我们闹得有劲的时候，忽听得啪啪两声。蓝二爷连忙走到院子里看看，然后向大家作揖，请大家放心，没事儿。又是哪帮兄弟进集办事来了，跟俺们没关系。他们闹他们的，俺们乐俺们的。可是客人们还是不放心，一个个客客气气又慌慌张张地告辞了。蓝二爷满脸不高兴，可是也不好阻拦人家。

我回到家的时候，爸也回来了，喝得满脸酒气。一家人都不敢睡，黑着灯守在奶奶爷爷的房间里。爷爷说，只要不出门，我们院里是不会出事的，蓝二爷今天办喜事，那些人不会不知道。可是爷爷的话刚落音，就听见门外有了动静，踢踢踏踏的一阵脚步声，好像是有人翻墙进来了。没有来敲我们的门，径直朝后院去了。不一会儿就听见有人叫蓝二蓝二，把新娘子弄出来给我们睡睡。我们一家吓得上牙下牙打起了仗。爷爷说：别出气！这是黑吃黑，碰不到我们的。蓝二爷一定得罪了什么人。只听见蓝二爷说：有话好说，弟兄们！走，蓝二跟你们找个地方叙叙，别惊动了邻居。蓝虎也说：请各位弟兄到南头，大先生姊妹，一个个如花似玉，一定会伺候诸位的。一会儿又一个人出来打圆场：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过不去的，包涵包涵，蓝二爷不会亏待大家的。这个声音之后，嘈杂的叫骂声低了下去。不一会儿又爆发出一阵狂浪的笑，笑声渐远，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也归于沉寂。但是新娘子的尖利的哭声又划破寂静，使我们的心头重新紧缩。爷爷说：蓝家吃了亏了。爸说：没事了！睡去吧！明天见了蓝家人，谁也不许问。我与姊姊们回到自己的屋里，我把耳朵贴在枕头上听后院动静，姊姊们悄悄说：新娘子莫不是……我叫她们大声说给我听，她们说我不懂。接着小妹妹（她叫改儿，让妈以后改过自新，不生女儿生儿子的意思。）大声哭闹起来，我心里一烦，眼皮就打架，耳朵不知不觉离开了枕头，什么也听不见了。

第二天，就听说新娘子回门去了。应该是三天回门的。可是谁也不问为啥提前了。倒是永继妈主动出来解释：昨晚有人来传话，新娘子娘家妈身体不好，蓝二爷叫她回家伺候。我奶奶和妈妈都连声说：应该，应该。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至今对我还是一个谜。

蓝二爷家的赌场却依旧热闹。哗啦哗啦的麻将声像一阵阵大雨般泻在人们的耳朵里。

七

听得见炮声了。外面正在进行一场巨大的战役。

已是临近春节的时候，大家一边忙着备年，一边担心：只怕今年的“年”不得安生了。

玉儿妈在这个时候给玉儿生下了个弟弟。玉儿爸说，这时候来！好，就叫个“迎儿”吧！不管将来的日子怎么样，都得迎上去。以毒攻毒，逢凶化吉。玉儿爸小时候读过几年书，因为后娘反对，才没读下去。要是读下去，说不定能成大气候。他人很聪明，说话也有点文绉绉的。顾远山觉得，第一个孙子起这个名字太俗气，还是叫“杲”好。理由是：一，这孩子命里缺木，杲里有木；二，杲是光明的意思，诗云：其雨其雨，杲杲出日。这孩子便是我们家雨后的太阳。玉儿爸不敢不同意，可是玉儿妈说，叫个什么“搞”，难听死了。就叫迎儿。俗？怕俗别吃饭拉屎。后来双方面达成了妥协，小名叫迎儿，大名叫杲。

顾远山给孙子推算了八字以后还不放心，又请了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说，这孩子的命里有点灾星，就在这一二年内，要想办法给他消灾。玉儿的爸妈和许多人商量，想出两个消灾的办法，一是把孩子“舍”给庙里，上些香火，叫和尚起个法名。二是认十二个干老子，多一些保护人。第一条好办，庙里正缺香火钱。小和尚都给战火吓跑了，只剩下两个老和尚。老和尚说，别起什么法名了，不如就叫“舍儿”，舍给了佛，谁还敢要？玉儿妈说好，以后迎儿就变成了舍儿。第二条就有点难了。借大的宝塔集，找十二个可以作干爸爸的男人自然不费事，但找十二个可以保护儿子的男人就伤神了。我爸算

一个。蓝虎算一个。又找了些亲朋好友，最后还是缺两个。顾远山说，兵荒马乱之际，应该找个带枪的，谁呢？只有镇长。提到镇长，自然想到镇长的哥哥，我们的小学校长。

我常常看见镇长，他女儿小群和我也是同学，我有时候去他家里玩。不知道那时候的镇长是怎么当的，每次到家，都看见他和几个男女一起拉拉唱唱，唱二簧。他的小老婆是唱戏的出身，工花旦。小群也跟着学唱几句，唱者生。我也跟着学过一段《梅龙镇》。他愿意不愿意当舍儿的干老子呢？玉儿爸托蓝二爷去说。想不到一说就成了。

蓝二爷说，镇长的老娘正病着，什么先生都请了，什么药都吃了，还是不见好。这年头家里有个病人可怎么好，所以镇长很着急，也想请人消灾呢，镇长说谁能替他请到高明的先生，治好了老太太他有重赏。玉儿妈说，何不叫我们的姨奶奶来试试呢？她老人家通阴知阳的。说不定手到病除。玉儿爸说，笑话！人家镇长念过洋学堂，信什么阴阳！玉儿妈说：啥学堂出来的人也得信阴阳！男就是阳，女就是阴，生就是阳，死就是阴。玉儿插嘴说：那么，女就是死，男就是生了？她爸爸说：玉儿的脑子转得真快，可惜是个女孩子。玉儿妈说：别掏酸腔了，不是有了舍儿？去问问镇长吧！蓝二爷便去问镇长，镇长居然愿意。只是，镇长说，老太太病着，在自己院里请神弄鬼的不方便。蓝二爷说，好办，就在俺院里。既然姨奶奶连阴间都能去，隔几层院子还能看不到病人吗？顺便，也给俺蓝虎家的看看。

我想姨奶奶一辈子也没有那样风光过。蓝二爷用双人小轿把她接到我们后院里，在蓝二爷的堂屋里摆下了香案。镇长已候在那里了。因为是镇长请神，所以看热闹的人特别多。

姨奶奶对镇长不卑不亢，镇长对她倒是毕恭毕敬的。姨奶奶喝完一盅茶，把茶杯一放，说：我先过去看看吧！说罢，扑通一声便直挺挺地睡倒在地上了。蓝二奶奶立即把一面镜子交给她。

镜子在姨奶奶手里抖动，跳舞似的，还有响声。姨奶奶口吐白沫，两眼上翻，并没有去看那镜子，但是口中却念念有词，说看见了，看得一清二楚。镇长问她看见了什么，她说，一个女孩子正在按老太太的头，把老太太的头往火上烤。老太太是头痛吧？

镇长连忙跪倒，说是头痛，可是那女孩子是谁呢？

女孩子十三四岁，漫长脸，俊巴巴的，眼长得很水灵，扎一根大辫子。姨奶奶幽幽地说。

站在院里看热闹的人小声议论起来，我奶奶的声音出众。她说：天啊！那一定是小银子！老太太当年买的丫头，后来受了气，投河死的。

蓝二奶奶接应道：像话，这就叫报应啊！你让我死在水里，我叫你死在火里。

人群中不断有人抽凉气，用各种声调说着同样的话：报应，报应，真有报应啊！

镇长脸上流汗了。他叩了一个头，对姨奶奶说：请告诉小银子姑娘，我母亲对不起她的地方，由我来偿还。要杀就杀我吧！要烧就烧我吧，放了老太太。我永生不忘，永生不忘，即使我给她偿了命，我家里人也要给她烧香磕头。

镇长的声音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味道，像恐怖，又像虔诚。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它叫人感动，也叫人心悸，像一股空气一样在人们的头上和心中盘旋和流动，以至于，院子里的人群中响起了一片混杂着虔诚和恐怖的啧啧之声。夸镇长孝顺，说老一辈子造了孽要下一辈子偿还太可怕了。

蓝二爷这时也显得特别正经了。他的棱角分明的三角脸和清疏的山羊胡子一起抖动，他抱起双拳对院里人说：众位乡亲，蓝二求你们一起帮助镇长求求情。求小银子姑娘放了老太太，我们给她立庙烧香。小银子姑娘已经是神仙了，何必跟凡人记仇呢？说罢，他先跪了下去。

院里人答应着一齐跪了下来，齐声地恳求：饶了她吧，饶了她吧！

我的腿发抖，身不由己地跪了下去。但是我说不出口。好像头上悬着一把剑，随时可能落下来，落到我的脖子上。我恐怖地看着姨奶奶的反应。

姨奶奶的喉咙口直打咕噜，像漱口。半晌，咕噜声止，变成一声长鸣：哦——叫人头毛竖立。

怎么样了？大家都吓了一跳。

那女孩放了老太太，捂着脸跑了。姨奶奶的声音不再是幽幽的了。

啊？好了——众人吐了一口气，然后欢呼。

镇长半信半疑，又给姨奶奶磕个头，站起身，朝院子里的众人作个揖，说要回家看看。有人跟着去看究竟。

姨奶奶伸了个懒腰，要起身。蓝二爷的小媳妇走了出来，要看病，院里也有许多人叫嚷着请姨奶奶慢慢“过来”，多看几个人的病。

姨奶奶果然又躺下，又口吐白沫，又朝上翻眼。可是没等姨奶奶给新娘子看好病，外面又响起一阵炮声，听起来很近很近。新娘子吓得躲进了里屋，姨奶奶一骨碌爬了起来，问大家打到哪里了？

听音，离这里不过几十里地。院子里一个男人回答。

几十里地？要来也快了。又有人说。

来了怎么办呢？

怎么办？照样当老百姓。哪个朝代不要老百姓？

不会像国军说的那样，共产公妻？

不会！人家不是来过，和咱一样，一个鼻子两个眼。那一回一个班住俺家里，班长还盛饭给小孩吃。

是。住俺家的人也这样。一个主儿忘了一双胶鞋在俺家，我给他送过去。他们正在大塔那里排队。他接过胶鞋，说多谢，还在胶鞋上拍两下，说：老伙计，不想要我了？我笑得不行。

也怪有趣。都是那样的人就好了。

大家正议论间，镇长家派来一个人，把一个红纸包塞到姨奶奶手里，说老太太的病果然见轻了。要不是炮声越来越紧，越来越近，人们又要求姨奶奶过阴看病了。现在，大家都没了心思。

八

炮声接连响了几天，消息灵通的人士说，已经打到了县城。

镇长跑了。小群匆匆地和我们告别，问我们跑不跑。我们都说，大人跑就跑，大人不跑就不跑。

镇长的哥哥没跑，小学照样上课。不过我们已经不大愿意上课了。我们喜欢看飞机，跑十几里路去捡炮弹壳。

飞机飞得好低好低，挂断了树梢，挂掉了房顶上的草，不明白为什么飞那么低。一架美国飞机被打落了，栽在离宝塔集不远的一片空地上，摔得粉碎。我们都跑去看，想捡飞机残片，没捡着，只看见别人手里拿着一片片花布片，说是降落伞。开飞机的人呢？死了。尸首呢？埋了。

炮弹壳塞满了我们的口袋，我们一个一个地拿出来当哨子吹，唔唔唔，一阵阵闷闷的铜声。有时，把它们套在指头上，敲别人的脑袋，很疼。玉儿爸说，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我问他，愁啥呀？他说，回家问你爸去。

爸爸把一捆一捆的票子扔给我们：都不能用了，都不能用了，拿去摺飞机玩吧！妈妈说：留着，啥朝代不要钱呢？说不定还能用。爸说：别作梦了。除非是银元，像“大头”，袁世凯死了，还照用。纸印的票子，哪有不变的。我们高兴，崭新的票子摺飞机，摺小船，摺飞标，口袋里装得满满的。

用起铜板来了。奶奶和妈妈到处找，把过去扔在一边的生了锈的铜钱都找出来了。奶奶把我们的毬子都拆了，因为毬子是方孔铜钱作的。现在，我们向大人要钱买糖，大人就给我们一个铜钱，我们高兴地把它噙在口里，大人就骂：寻死啊！死人才要口噙钱呢！

哈哈，一切都变得这么有趣。

九

今年一九四九年，解放大军过江南，江南全体老百姓，天天盼望自己兵。自己兵，自己兵，自己自己自己兵。

我们天天扭，天天唱。大人们也扭，也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能学得和我们一样快。

一切都好像是现成的。叫挂红旗，一下子，家家都挂出了红旗。叫贴领袖像，一下子，家家都贴上了领袖像。叫扭秧歌庆祝，一下子，家家都有了会扭秧歌的人。

最有趣的是我奶奶，天天也跟着唱，跟着扭，人家都叫她老疯子。她说，我从小就喜欢唱戏，那时封建，不许唱。现在时兴了，我就要过过瘾，再不唱，将来上天给老天爷当小老婆，又不能唱了。

集上组织了宣传队，除了扭秧歌，还排戏，蓝虎是队长，主角是镇长的小老婆，大家都叫她小莲花，也不知她姓啥，她没跟镇长一起跑。小莲花长得不好看，脸色黄巴巴的，像个大烟鬼，只有嘴好看，小，有点向里瘪，好像总是笑，又甜。她的嗓子好。听说原来是大地方的戏子，被镇长买回来的。

我们常常去看排戏。那时候他们排《白毛女》。小莲花演喜儿，蓝虎演穆仁智。排到穆仁智糟蹋喜儿的时候，蓝虎真的抱住小莲花要亲嘴，嘻皮涎脸的，其他人还给他叫好。小莲花满脸苍白，恳求蓝虎：别闹了，人家心里乱得像八股叉。蓝虎说：那我就把八股叉给你拿掉吧！说着就动手，别人只是笑着起哄。小莲花的眼泪都掉出来了。蓝虎搂住她说：别难过，镇长跑了，还有我呢！忘了他那个没良心的人吧，丢下你跑了。小莲花索性哭了起来。

这个宣传队很快就被解散了，因为它成分不纯，作风不正。镇长被抓了回来，小莲花自然受到管制。镇长的哥哥、我们的校长也被抓起来了，因为他是地主。

区长召开大会，动员大家斗恶霸地主。区长好年轻啊！听说只有十七岁。矮敦敦的个子，浓眉大眼，有点像书元哥。可是他决不是书元，年纪不对，姓名也不对。他姓周，叫周纯一。开会时大家都得去，全集的人都集中在集北头的小学的操场上，黑压压的一大片。区长的嗓音响，手里又拿个广播喇叭，不是带电的，就是喇叭。他说，为了彻底解放劳动人民，一定要清算一切恶霸地主，向他们讨还血债。对一切反动的家伙，都不能手软，要杀掉他们。果然不久之后就杀了几个人，说是一贯道的头子，煽动反革命的。

镇长当然也是该杀的，因为他是国民党反动派。这一点区长讲得非常清楚。

开宣判大会那天，我们学校作了动员，要求我们积极投入斗争。不要因为他是校长的弟弟就不斗了。校长也要斗嘛！

但是在家里，我的爸爸和妈妈都对我说，不要多说话，人家举手你举手就行了。玉儿告诉我，她爸爸特地把她叫过去，叫她少和别人瞎闹腾。镇长是你兄弟的干爹，也就是你的长辈，镇长的哥哥是你的校长，也是你老师。天地君亲师，不论朝代怎么变，时局怎么走，都不会不敬的。我和玉儿听了大人的话，都不敢积极。学校老师教我们唱批判的歌：“春季到来斗争大会开呀，恶霸杨孝伯《镇长的名》呀，真是胎里坏呀，为作官为发财，老百姓受灾害呀！”还唱：“夏季到来老百姓喜开怀呀，地主杨忠伯（我们校长的名）呀，面善心里坏呀，为剥削为压迫，把我们来毒害呀！”我和玉儿都是只动嘴不出声。

那天来参加会的人真多，不少是杨家在乡下的佃户。我们坐得离主席台很远，听不清佃户们的控诉，只看见一个一个人跳上台，或被别人扶上台，都穿得破破烂烂的，又哭又叫，有的抓住杨孝伯的领子，有的打杨忠伯的耳光，还有人恨得咬他们。我、玉儿、小群坐在一起。我觉得小群直发抖。我和玉儿一边一个挤紧小群，希望她别抖得那么厉害。我小声对她说，看来你爸和你大伯真坏，要不怎么那么多人恨他们？她点点头说：是哩。又喊口号了，我们也喊吧！玉儿激动起来，拉起小群的手往上举，我们三个人一起喊：打倒杨孝伯！打倒杨忠伯！打倒——！打倒——！大人们对我们的交待，我们全抛在脑后了。

尽管我们事先已知道镇长是要被枪毙的，但当听到区长宣布“拉下去枪毙”的时候，还是一阵剧烈的心惊肉跳。老师知道我和玉儿是小群的朋友，又知道玉儿和小群有干亲，所以事先布置我和玉儿好好地帮助小群站稳立场，让我和玉儿一步也不要离开小群身边。可是现在，我觉得自己的立场也站不稳了，腿直打战。我看玉儿，嘴唇直抖。老师带头喊口号我们也听不清了，只知道慌不迭地举手，而小群，连手也举不起来了。

那时候枪毙人，还有些古风，先示众后斩首。被杀者五花大绑地由几个人拖着，在会场上绕一周之后再拉去枪毙。杨孝伯和杨忠伯被人拖着在场上飞跑，看样子，他们连脚步也不会迈了。他们从我们队伍前经过的时候，我好像感觉到杨孝伯朝小群看了一眼。究竟看了没有？我也说不准确。因为那时我的感觉完全错乱了。只感到小群在把我的胳膊拼命朝下坠，玉儿拽住小群的另一支胳膊，拼命朝上提，我们差不多要坐到地上了。不过，这都是几秒钟之间的事，不一会儿，便听见一声枪声，什么都结束了。许多人拥上去看，说怎么只枪毙了一个呢？后来才知道，杨忠伯是陪斩，可是不久他也就死在监狱里了。

记不清我和玉儿是怎样把小群送回家的了。一路上，很多人对小群投来异样的目光，有人还指指戳戳。几个老太太偷偷地问我和玉儿：这孩子刚才也在？我们点点头，她们便“啧啧”地直撮嘴，不知道是赞扬还是惋惜。

送完小群，我和玉儿话也没说就各自回家了。我奶奶和爷爷详细地问我小群的情况，连说可怜，可怜，多好的一个丫头，可别吓坏了。奶奶还说，才十来岁的孩子，何必去看杀人呢？我说，老师要训练我们的立场呀！看我们能不能站稳立场。

啥叫个立场？奶奶问。

立场就是站在哪里。我说。

站在哪里？站在宝塔集呗！我一辈子没离开过宝塔集，这就叫站稳立场吧？奶奶说。

不对，是讲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我说。

啥叫个阶级？奶奶问。

阶级么？阶级还不懂吗？就是说，有的人剥削人，有的人受剥削呗！我说。

噢！你爷爷剃过头，这算不算剥削人？奶奶又问。

哎呀，你瞎扯什么呀？地主才剥削人。我都不耐烦了。

噢，懂了！那我就是剥削阶级。我是老天爷的小老婆，老天爷该是大地主了吧？奶奶说。

爷爷见我给奶奶缠得没办法，就拉过我来，说：翠儿，累了，回屋歇着吧！小孩子家，以后不要去看那种事了，吓破了胆怎么办？我便回屋睡觉去了。作了一夜的噩梦。

玉儿一家更关心小群。玉儿一回到家，就被她妈派去给小群家送粮。玉儿和二姊德儿一起拎了一小袋小麦面，穿过安玉山家的院子到小群家里去。天漆黑，她们撇亮了手电筒。不料手电筒刚刚问了一下，安玉山就在屋里大声喝叫：谁？那声音听起来叫人发怵，玉儿吓得哇啦一声哭了出来，德儿吓得拔腿往回跑。玉儿妈骂道：安玉山一定在偷偷地抽大烟，以为是查烟的人去呢！砍头的！吓唬孩子，迟早不得好死。玉儿爸说：何苦咒人？现在谁心里不害怕？听说还要杀几个呢？玉儿妈说：心里没鬼，怕啥？

这以后，果然又杀了几个人，又有几个人陪斩，我都没去看。杀巨盗大杆子的时候，我出于好奇，去看了。那天用的是炸子，子弹在大杆子的脑袋里开花爆炸，只看见血肉横飞，顷刻间大杆子脖子上只剩下一张头皮，那头皮又像泄气的皮球一样立即收缩，缩得只有拳头大小，贴在脖子上。我吓得捂着脸往家跑，接连几天，茶饭不进。而且从那以后，我看见豆腐花就发晕。

那天陪斩的是个泼妇，吓得当场昏了过去。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泼了，见了谁都笑，就是不说话。有人说她疯了，又有人说她装傻。不到半年，她便死了。

听说有人把大杆子的脑浆从地上刮了起来，用荷叶包了回家去治病了，也不知是真还是假。

十

真没想到我们宝塔集潜藏了那么多反革命。年轻的区长说得对，宝塔集原来是乌龟王八把持的，人民要翻身做主人，非得把这些乌龟王八一网打尽不可。

蓝二爷和蓝虎是同一天被抓去的。罪名是地痞流氓。

安玉山的烟枪给缴了，看他有病，让他在家里接受监督改造。

可是，我们怎么也想不到，连玉儿的姨奶奶也给带走了！说她替反革命的镇长进行迷信宣传，蛊惑人心。

姨奶奶是在玉儿家被抓去的。那天，她来打听二呆的消息。她说，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穷人的孩子能跑到哪里？一定在八路军队伍里。先前隐姓埋名，现在也该露面了。她听说区长像大呆，便要去看看，向他打听二呆的消息。

玉儿爸说：姨，你别多事了。谁不知道镇长是我们舍儿的干爹，镇长出了事，我们撇还撇不清呢！幸亏老三参加了工作，在上面维持着，要不，谁知道会出什么事？再说，你老人家装神弄鬼的，现在正反对封建迷信，你不是自己往枪口上撞吗？

姨奶奶说：放你爹的屁！真是你爹的儿！我装神弄鬼？装得出来吗？谁装给我看看！鬼神看中了我，朝我身上附，我有什么办法？你妈附在我身上的时候，你爹都老老实实地听她说话。我是装的？放屁！镇长是舍儿的干爹，这就吓着你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他是他，你是你。共产党杀富济贫，你是富人？跟你老子一样，硬往富人一边靠，还是老三好，往穷人一边靠。

正说话间，来了两个人，对姨奶奶笑嘻嘻地说：找到你家里，你倒到这里来了。又

来下神吗？

放屁！姨奶奶笑骂道，谁家的小孩子说话这么油？我下个啥神？我那是病！看也看不好。现在不兴宣传迷信了，我天天对鬼神祷告，你们去找别人吧，别再来找我。可是鬼神也——她打了一个呵欠。

来人笑得更厉害：看看，又要上来了。请鬼神先别处转转吧，您老跟我们到区里去。

姨奶奶乐呵呵：正好，我要我区长问问俺二呆的消息呢！

玉儿妈和玉儿爸早吓坏了，忙拿烟敬来人，来人摆手：没事，给她老人家治病。

姨奶奶跟着来人走了。去了就没有回来。到区上一打听，才知送去劳改了。

宝塔集有一个耶稣堂，只有一个传教的牧师，牧师同时是外科医生。我没有看见过这位牧师传教，却做过他的病人。六岁那年，我腿上生过一个疮，拖拖拉拉一个多月都没好，爸爸就把他请来了。他给我注射盘尼西林，一针要很多很多钱，等疮“熟”了，他就给我开刀。没有麻醉剂，我爷爷抱住我的头，我爸爸按住我的脚，牧师干净利索，几下子就把我的疮挖掉了。以后，他又天天来给我换药，一边换药一边安慰我，快好了，快好了！夸我勇敢，能忍住不哭，我慢慢地喜欢上他了。

谁能想到牧师也是反革命呢？他也被抓去劳改了。我好不舒服，去找玉儿说话。我说，玉儿，他的脾气可好了。那天他来给我换药，我捂住脸不敢看伤口，他说，别捂脸，看看吧，快好了。我慢慢地松开了手，从手指缝里往下看，哇！还有很深很深的一个洞呢！我哭起来了。他摸着我的头，说上帝保佑你，别害怕，你只管睁开眼看看，真是快好了。刚开刀时，伤口比现在大得多了。不信问你妈。

玉儿说：他说上帝保佑了？我说，是呀！玉儿说，这就是迷信呀，没有上帝。对了，我说，我明白了，他反对《国际歌》。《国际歌》里唱：不要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玉儿说，对，对！他还反对《东方红》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呼儿咳呀……对不对？他怎么说上帝保信你呢？我说，玉儿，大救星不是和上帝一样了吗？玉儿说，哎呀你好糊涂，大救星是毛主席，毛主席怎么是上帝呢？是领袖！我觉得玉儿的水平比我高。四十岁以后，我才懂得，玉儿的水平也稀松，因为和我一样，她也没发现，《东方红》也反对《国际歌》。

一连串事情的发生，把顾远山老头吓坏了，他召来了三个儿子。

顾远山对三个儿子说：我不想干了。这个店，维尧和维禹接过去吧。

维禹说他工作忙，不肯接，叫老头子还干下去。生意不错，你怕啥？他问老子。老头子说：我怕啥？我怕你！像你这样抛头露面的，总有一天一家人都毁在你手里。我们祖祖辈辈不招惹是非还不得安生，我不得不一个人流落到这穷地方来。现在这一切都要断送在你手里。维禹不服，问老子：我干了啥坏事了？不就是当了个商业代表吗？老头子火了：代表，代表！你能代表谁？你说！维禹也火了：你作主吧，一切由你！

于是顾远山宣布：一个店三一三剩一。维舜早就分出去了，而且有言在先，家里的一切没有他的份。所以，老大一份，老三一份，我们老两口一份，将来我们两老的丧事开支，由你们弟兄三人分摊。

维尧眨巴眨巴眼说，行。维舜搓搓手，说你老怎么说就怎么办吧！只有维禹摆手，说不行。要分，老二也该有一份。还有舍儿呢，凭什么剥夺他们的权利？他妈骂他不知道好歹，胳膊肘朝外弯。他冲着他妈吵：什么是里什么是外？要不是你们硬分里外，二哥二嫂何至于分出去？

顾远山把桌子一拍，指向门外：你给我滚！马上就滚！你公平，你有理，好，今天我就把你的一份给老二家的舍儿。你带着你的老婆远走高飞吧！这个家不容你进门！弟兄三人和老太太都给吓住了。他们知道，老头子只要话一出口，谁也别想让他改过来。老太太骂老三不争气，不懂事！还不快给你老子跪下来，陪个不是！老三一跺脚，跑掉了。老太太放声扯嗓地哭了起来！

维尧眨巴眨巴眼，看过了老子看后母，看过了后母看老二。老二又搓搓手，说：老三不懂事，不去理他，就按老爷说的办吧！噢，你就想吞并老三那一份呢！正在嚎的老太太说，老二也不辩解，只对老头子说话：我去请舅舅（实际上是老三的娘舅）来吧！说罢，赶紧溜回家里。老三正等在他家里。

顾维舜对老三说：干啥事，都不能任着自己的性子。你不能说父亲的担心没道理。化整为零不惹眼，有什么不好呢？

老三说：我为你抱不平。他既不作生意了，要那一份干啥？我们弟兄还不能养活他们？顾维舜说：你还不知道他？他喜欢自由自在地花钱。好了，我马上找舅舅来分家，

你那一份，我接下来，暗中转给你，这样，就保全了父亲的面子。你赶紧找房子搬家去吧！

老三说：不能这样，二哥。那一份还算你的，你先借给我作本钱，我将来还你。要不然对不起二嫂和舍儿。

顾维舜说：不要担心你二嫂，她是个明理的人，说过不要家里的东西，她会掣到底的。你还是去找房子吧！

三天以后，顾远山的杂货店一分为三了。老大在原址开了一爿夫妻老婆店，老三找了另外一个地方也开了一爿店，说是替老二经营的。老头儿把自己的一份完全变卖了，卖得的钱装在一个大布袋里，拴在自己的裤腰带上。

这件事大大伤了玉儿奶奶的心，虽说维禹把二哥的一番好意完全告诉了她，她还是不能原谅老头子的寡情绝义。她病了，而且一病不起，不到两个月就去世了。那时候，我和玉儿正在乡下作宣传演出，回来的时候，玉儿奶奶已经收殓了。玉儿去向她妈要孝衣孝巾，她妈只给了她三尺白布，让她束在腰间，头上戴一顶孝帽。她穿戴之后照照镜子，说不好看，非要孝衣孝巾不可。气得她妈骂：死丫头！要论辈分的呀！等我死了你才穿孝衣吧！你把一正白布裹住自己也没人说你。还不快去灵堂哭奶奶去！

玉儿一看见棺材头前幽暗的灯，腿就软了，跑去找她妈：我怕奶奶从棺材里伸出手来拽我的脚，因为我不喜欢她。她妈笑着拍了她一下：拽脚也轮不上你，先要拽我的。走，我领你去。玉儿又跟妈回到灵堂，与她妈一起跪下，听妈祷告：玉儿因为公事不能来给你送终，求你不要见怪。玉儿知道奶奶不在了，哭得不得了，说再也没有奶奶疼了。说着说着，玉儿妈就哭起来了。玉儿妈一哭，玉儿也哭了。

十一

淮河不顾世道的变化，一九五〇年发了一场大水，再一次淹倒了蓝二爷家的房屋，也把我家和玉儿家由小康冲到了贫困的边缘。

蓝二爷去改造的时候，给家里留下了话，家里的房子一分为二，前院归永继母子，后院归“短一点儿”和老婆婆，老婆婆死后全归“短一点儿”。“短一点儿”当时就问：后院淹倒了呢？蓝二爷说，那你就自己想办法吧！能等蓝虎回来呢，你就等；不能等你就改嫁。小丫头你可以带走，也可以留下。可是蓝虎抱着自己的老婆哇哇地哭，求她等他，就是走，也把女儿留下来。“短一点儿”答应了下来，永继妈也说，她愿意和弟媳一起等他们爷俩儿回来。

如今怎么办呢？

“短一点儿”在蓝虎走不多久就觉得熬不下去了。她想蓝虎想得厉害。人们都不明白，像蓝虎这样的男人还值得想吗？可是“短一点儿”就是想，还怕羞地说出来。永继妈背后说“短一点儿”怕是有点什么病，好像离了男人不能活似的。以前蓝虎在家时，两口子好像亲不够，大白天也搂搂抱抱的，没脸没皮。有时让蓝二爷碰上了，直朝他们吐口水。永继奶奶更不客气地骂“短一点儿”：浪！倒是我奶奶替“短一点儿”说话，说，又不是跟别的男人，在自己男人面前随便怎么“浪”，别人也管不着。所以，蓝虎走了以后，“短一点儿”常常找我奶奶诉苦，我奶奶总是“啧啧”地表示可怜她。

现在，“短一点儿”又来找我奶奶了，说她想走。人也走了，房也塌了，还等啥呀！她说。奶奶说：可不是吗！要说蓝虎呢，确实也不是个正于的人。没多大一点就吃喝嫖赌样样会了。不过这也难怪他，对吧？根不正苗不正，结个葫芦歪着个牌。你那老公公，别看他在世面上像个人样儿，啥坏事干不出来？要不，人家会在你过门的那天来胡闹？“短一点儿”的脸猛然红了，说，过去的事儿，不提了吧！眼前怎么过？想起蓝虎对我的好处，我苦死也不该走。可是想到以后的日子，我是一天也不想留。奶奶说：这得你自己拿主意，别人拿的主意不一定称你的心，合你的意。谁愿意多这个嘴呢？

几天以后，“短一点儿”就走了。她说到劳改队去看蓝虎，把小闺女也带了去。可是她走的第二天就托人传话来，说不要等她了，她不论见到见不到蓝虎都不想回来了。她婆婆整整骂了她三天三夜，说她生成不是好女人，嫁一千个男人也不够。咒她嫁一个死一个，嫁两个死一双，到老都叫她守空房。我奶奶说：积点德吧，你！骂人像吃菜，得着啥好处了？能多长一块肉，还是多增一年的寿？一家人七零八落的，哭也哭不够呢，你还咒。

“短一点儿”真的没有回来。有人说，她嫁到南乡去了。嫁之前是否到劳改队去看过蓝虎呢，谁也不知道。这倒好，蓝家的一点房产便完全是永继的了，永继妈掩饰不住

的高兴，说大水一过就把房子修好，将来给永继两口子住。

永继这时和我们一样，刚刚小学毕业，和表姊结成两口子还早着呢！可是他妈心里急。他妈把与永继订了亲的娘家侄女接来住过一阵，想让永继喜欢她。可是永继一见表姊就不喜欢了。说她不好看。他妈问他谁好看？他说小群。他妈吓了一跳，这孩子心里莫不是开窍了？可不能跟小群“对象”呀，这样的家对那样的家，真是歪瓜对瘪枣了，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的。她对儿子说，不喜欢表姊不要紧，千万也不要喜欢别的女孩子，将来上中学到县城去找，带一个洋学生回来多好！可是永继说：我就把小群带回来吧。这叫他妈真个忧愁起来了，找我，找玉儿，问我们平时是不是和永继一起玩，有没有小群在一起。我们不知轻重，老老实实地说了，我们时常在一起玩，不论玩什么，小群和永继都是“一头”的，有时候一起到野地里去摘野花野果，碰上几个大女孩，还教永继和小群玩拜堂，教他们知道什么是男孩，什么是女孩，有一次还让他们互相看，男孩和女孩有啥不一样……永继妈的脸都黄了，莫不是蓝家的下一代又不成气候？那天，他把儿子打了一顿，说从今以后不准他跟女孩子一起玩，他的小辫子也给剪掉了。

又是我奶奶出来劝：小人家的事，管他们干啥？谁没打小时候过过？小时候，看见啥都觉得新奇，现在我们都老了，知道男女间就差那么一点点儿，没啥稀奇的；可是小时候不也觉得稀奇？不是也想看个明白？奶奶还教训永继妈：你呀！不要因为自己是单人过日子，就把什么都看成不正经。天下事再大，也大不过男人和女人的事。孩子大了，你也管不着了。永继妈被奶奶说得眼泪汪汪的。

大水一下去，我们就到县城念中学了。小群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升学考试，考得很好，可是因为家庭困难不能去。永继妈为此高兴得不得了。

十二

宝塔集离县城六十里，既不通船也不通车，只能靠两条腿。我第一次去学校是爸爸用自行车把我驮去的。这样，我们回家的次数就少了，常常是因为交不上伙食费被停了伙，不得不回家想办法的时候才回去，还有就是寒暑假了。我们都好像成了宝塔集的客人了，对宝塔集上的事知道得越来越少，不过我们这几家人的事儿倒还是知道得非常详细的。

我和玉儿的大姊同时提婆家了，而且提的都是一个对象：区长。区妇联主任见区长年轻能干，还没有对象，很操心，便在集上适龄的姑娘中挑选。我和玉儿的姊姊刚好都和区长同岁，而且在当地，也算得上名门了，妇女主任先到玉儿家说亲，因为玉儿的大姊长得更美。玉儿爸怕得罪区长，有点想答应，可是玉儿妈不肯，说女儿还小，又没离过家，不配区长这样的人。于是区长又到我家。我妈我爸对啥事都无可无不可，只说问问闺女。我大姊见过区长，说她没意见，事情也就定了下来。只有奶奶不乐意，说有女莫嫁官，嫁官相见难。平常人家的闺女嫁给平常人家多好，攀官做什么？爸爸说奶奶的头难剃，自己嫁了剃头的想攀老天爷，孙女嫁给当官的却又说攀高了。奶奶说：罢了！一辈管一辈，我是死得着的人了，你们自己作主吧！

姊姊在春节结婚，我和玉儿正好在家度寒假。玉儿到我家吃喜酒的时候，奶奶问玉儿：你家的喜事啥时候办呀？玉儿说，姊姊的事刚刚提，本集人家，大概快了吧！奶奶说，不是，我问的是你爷啥时候把你的月白奶奶娶过来。玉儿的脸红了。事后，我问奶奶什么意思，奶奶说，玉儿的爷爷暗中和一个女人相好呢。天天晚上趁月亮见面，所以叫月白奶奶。我不信，说奶奶专门会编排人。可是第二天，我便在玉儿家看到了一出戏。

玉儿奶奶死了以后，顾远山兴出新点子，要在三个儿子家里轮着吃，既可以不断地换换胃口，又可以比较三个儿子媳妇，看哪一个更孝顺。三个儿子三个媳妇，一个也不敢怠慢。

这年春节，他正好轮在玉儿家。按我们当地的规矩，男人们年初一出门拜年，年初二等在家里，近亲要来作客。可是年初二一大清早，顾远山就出门去了，来拜年的人要叩头也找不到他。一直到傍晚，拜年的客人都走了，他才回来，一头钻进自己屋里，话也不说。玉儿妈撇着嘴对玉儿说：别出去了，大年下，像个白蹄子猫似的东窜西窜，啥事儿呀？就算你年轻火大，能把房檐上的冰凌柱子烤化吧，也得讲个分寸。有时有常，才成规矩。像你这样，不怕人家用石头砸俺们这书香门弟？玉儿不摸头，便辩解说：啥事儿呀，教训我？不是早给你说过了，要去看看小群，你都答应了，又忘了？玉儿妈朝女儿挤挤眼，又用手朝顾远山屋里指指，说：看小群？谁知道你去看谁？偷偷摸摸的，不嫌寒碜？要送什么东西给人家，跟我讲一声，只管送去，光明正大么！偷！年糕和馒头

头日渐地少……玉儿还不懂，急了，大叫起来：你疯了吗？净乱说呀！她妈不理：乱说？你心里明白！说着站起来，拉拉玉儿的头发，继续说：鬼丫头，死心眼儿！

玉儿这才明白，是说她爷爷呢！她本来就不喜欢爷爷，这时得到妈的鼓励，更长了胆。她拉住正在放炮的弟弟舍儿，对他说：来，姊教你唱歌。张二老妈子，卖给张侉子。张侉子不要，卖给老道。老道家失火，卖给我。

舍儿讲话口齿不清，把卖给我唱成“卖鸡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越笑，舍儿越逞脸，干脆只唱一句：张二老妈子，卖，卖，卖鸡窝。

呕哨！顾远山在屋里摔掉了一只茶杯。玉儿笑得更狠：好了，鸡窝卖了，鸡也飞了，把东西也碰破了，舍儿唱得更响：卖鸡窝，鸡飞了！

玉儿！顾远山在屋里大喝一声。

玉儿忍住笑回应：哎！

去把你老子找来！顾远山说。

我爸爸送客去了，马上就回来。玉儿说。

去找！顾远山叫。

不去！我要找小群玩去，翠儿等着我呢！玉儿说。

正在这时，顾维舜回来了，玉儿妈向他又挤眼又摆手，叫他先到别处躲一会儿，他什么也不明白，像往常一样，先到父亲的房里打招呼：您外出回来了？玉儿妈在门外气得直咬牙：孝子！今天够你受的。果不然，顾维舜要往外退的时候，顾远山喝住了他。

管教管教你的老婆孩子！顾远山一边说，一边把门关上了。我和玉儿本来就要走了，看见这光景，也不想再去小群家，趴在门口从门缝里往里瞧，玉儿妈也搬个小板凳在门口坐下来。

他们惹您老人家生气啦？玉儿爸小心地问。

问问你老婆！自从到你家吃饭，她就没有过好脸色。那天还想用大针卡死我。顾远山说。

玉儿妈忍不住了，她从小板凳上站起来，敲敲门：顾维舜，来审问你老婆吧！谋杀公公，罪该万死了！年纪那么大了，怎么能红口白牙地乱说。自从轮到我家，我和美儿整天伺候你。美儿那天烙油馍不当心，一根草棒掉在油馍上了，你吵翻天，我把美儿打了一顿，又给你重烙馍。这就是要下大针卡死你吗？

你听听，你听听！这还是我们顾家的规矩吗？我不能跟没知识的人吵架，我怕丢人！顾远山说。

丢人？人早就让我丢尽了！去找街坊邻居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丢人现眼啊！玉儿妈在门外说，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让门里的人听得清楚。

啪！顾远山拍桌子了。你管不管？他说，你不管我去告你！告你忤逆！

玉儿爸吓得双膝一软，跪了下去。玉儿妈在门外也被镇住了，不敢再说话。

顾远山又说：你们的母亲去世早，我把你们养大多不容易，没想到你们今天这样对待我。从明天开始，我不到你们弟兄家吃饭了，你们给我单买一处屋，我一个人单住，你们每人每月给我三十元钱就行了，我死了也不用你们管。

玉儿爸跪着说：那何必呢？我们哪点做得不好，您老人家可以说，也可以打骂，我们改过就是了。有三个儿子，又都成了家，让您单过，人家不笑话？再说，我们三家生意都不好，哪有那么多钱拿给你呢？

我管不了那么多！顾远山说，你们是应该给我的。我没有多要，就算我养活你们十八年，十八年的养育费是多少？这笔钱你们该不该还给我？

顾维舜噙动着嘴唇，一时说不出话。玉儿妈在门外又忍不住了：十八年养育费？哪有十八年？顾维尧、顾维舜两兄弟都是十二岁下学去学生意的，自己养活自己，满师之后，挣的钱都给了你。老三在外面念书，更没花着你的钱，是他两个哥哥供他的。

你们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顾远山又拍了一下桌子。

玉儿爸叩了一下头：大年下，您老人家别发火。本来呢，做儿子的不该和老的论长短，不论咋说，总是老的有理，小的无理。可是，凡事也不可太过分，是吧？平心而论，你的三个儿子媳妇，哪个不孝顺？我们弟兄仁，除了老三有时在你面前逞逞脸，谁敢在你面前出口大气？她们妯娌，集上谁个不夸，妯娌之间和和气气，互助互爱，对老的，一个比一个孝顺。就是舍儿妈，不错，脾气倔些，可是在你面前没有亏过心。想当初她进俺们家，过的是啥日子？那时候家里日子不错吧？可是你一定要她们妯娌吃麸皮，她俩说过一句怨言吗？

玉儿妈在门外擦起了眼泪。

顾远山鼻子里哼哼几声。

顾维舜接着说：舍儿妈坐月子，把她一个人扔在沟沿下，我晚上多坐一会儿都不行，她才二十来岁，不害怕吗？……

玉儿妈在门外抽嗒起来。

玉儿爸又说：跑日本反的时候，我们一家几个给害得好惨！多亏舍儿妈，领小孩子拖大人，一日一日地捱过来。照说，那就是恩断义绝了，可是日本反一罢，我们不是照样逢年过节大篮子小篮子往你们那里送？

玉儿也擦起泪来。

我看顾远山，脸白得像张纸，不停地说着：好好！好好！你像斗地主一样斗我了！跟我算账了！好，算账了！

不是算账。玉儿爸好像跪累了，抬起一条腿，变成单腿跪。小的孝顺老的，是天经地义。可是为老的也该为小的着想呀！古人说父慈子孝……

顾远山冷笑一声：我就是不慈！

顾维舜忙说：不是不慈。是为小辈们着想不够。就说张二家的……这女人谁不知道……儿子们都是世面上的人，您老又这么大年纪了，您让儿子们怎么向街坊交代？您老……

顾维舜的声音越来越低，用的差不多全是气声，我和玉儿听起来很费劲，便也不听了。过一会儿，只听顾远山大声说：从今以后，我不再进你们家门，你按月给我送钱去！说罢便开门走掉了，头也不回。舍儿在后面叫：爷爷，你晚上不吃饺子了？

顾维舜拍拍膝盖上的土，叹了一口气。玉儿说：爸，腿疼吧？顾维舜温和地摆摆手：别没大没小的。玉儿妈说：你爸进步多了。跪着说理总比屁也不放好。

十三

顾远山走到了大儿子家，他想从老大这里打开缺口。他了解自己的儿子们，三兄弟的性格极不相同，但感情是极好的。因为老大懦弱，老二和老三就特别尊重老大，鼓励他说出自己的意见。要是老大对父亲的行为默许了，老二和老三自然也会默许的。

其实，顾远山也觉得自己的行为太不光明磊落了。他所相好的那个女人——张二家的，在街坊的眼里确实不是一个好女人。这女人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寡妇，生得相当俊俏。以往与集上的男人们来往也相当多。被人称为“半开门”。当时他也很看不惯她，在妻子面前不断地攻击她的放浪，想不到在许多男人日渐疏远了她的时候，他却被她吸引了过去。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为命。

可不是命吗？他从小生长在一个富裕体面的家庭里，以后虽然家道中落，他还能够坚持“食不厌精”的原则，以至于到了七十岁的年纪，他还毫无衰老的感觉。

可不是命吗？他已经死了两个妻子，第二个妻子比他年轻了二十多岁竟然也先他而逝了。好像他命中注定要娶一个死一个。

可不是命吗？那天他被张二家的笑容引诱，不知不觉跨进了她的门坎，投入了她的怀抱。而且那一天她使他明白，自己以前是怎样误解了她。她是一个可爱的女人。那么多男人围着她，不是因为她放浪，而是因为她可爱。

张二家的无儿无女，如今又生计困难，顾远山不得不补贴她一点钱。这一点，顾远山自己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做到，系在腰间的票子还有厚厚的一叠呢！可是他舍不得轻易去掏自己的钱袋。钱袋里的钱是死的，用完又到哪里去弄？三个儿子是不会给他的。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份孝心，而是因为他们确实越来越穷了。水灾过后，生意凋敝，大儿子正想把小店盘出去，找个地方帮工呢！

他也曾想断了那见不得人的想头。可是，他管得住自己的心，管不住自己的腿呀！现在，张二家的和美食，都是他须臾不可离开的。只能，呢，只能偷偷摸摸了，忍受着儿孙们的鄙视和嘲笑。

相比之下，大儿子大媳妇对他是比较客气的。有时候，他白天去约会，大媳妇除了对他白白眼之外，也无甚恶言恶语。他时常将家中的一些食物装在衣兜里带给张二家的吃，大媳妇也不指桑骂槐，只是想办法将食物藏得更紧一些，让他难找到。比如，把专门为他蒸的白馍用绳子吊在房顶上，他就是找到了，要去拿一个，也非得站在小板凳上不可。他只好拿几个麦面和林面杂和做的花卷让张二家的充饥。对这，大媳妇也默许了。

这样，他想试着走下一步：摆脱儿孙们的监视，租屋另住，和张二家的暗中厮守。他要寻找一个和儿子媳妇说话的时机。这时机还不大好找呢，因为平时他对儿孙辈只有命令，而无交谈的时候。

腹泻给了他时机。春节吃多了油腻，腹泻得厉害，维尧夫妇几乎寸步不离地伺候，更难为维尧妻子，伺奉汤药之外还要端屎端尿。几天之后，他渐渐地好了。这天早上，儿子媳妇又像往常一样，来到他屋里，一个奉药，一个铺床。他和气地叫他们歇一会儿。我看你们也够累的了，他说。你们弟兄三门，只有你们两口是孝顺的，可是也都五十来岁了，有孝心而无孝力了。将来真不知谁还能伺候我。

大媳妇看他一眼，刚日地说：谁？还不是我们这些人？我，玉儿妈，玉儿婶。

顾远山说：别提老二家的和老三家的！

大媳妇说：那就我一个人伺候你。我又没说不同意。

顾远山说：你孝顺，我知道。可是到我撑不起爬不动的时候呢？

大媳妇说：我也伺候。

顾远山说：媳妇到底不是闺女，不方便呀！

大媳妇说：有啥不方便的？你现在讲究，真到快要死的时候

顾维尧连连眨巴眼，对妻子哼哼两声。妻子不理睬，照样说下去……就不会那么讲究了。

顾远山不悦了，他朝大媳妇摆摆手：我死还早呢！你不懂事，出去吧，我有话和维尧说。

大媳妇出去的时候，使劲看了丈夫一眼，丈夫眨巴眨巴眼，装作什么也没看见。

我想离开你们兄弟单住。顾远山说。

那怎么行？刚才你还说要人伺候。顾维尧说。

我想找个人来伺候我。

谁呢？

这你就不用问了。

儿子跪下了。

有话站起来说，现在不兴跪了。

这话不该我说。

不该说就不要说。你去找老二老三，叫他们给我找房子，出钱。每人三十元出不起，二十元总可以吧？

顾维尧不起身也不说话。顾远山等着，等着，顾维尧还是不说话，好像故意和父亲比耐心。顾远山耐不住了：给我滚！顾维尧顺从地站起来，拍拍膝盖。到门外，他交待妻子：不要惹他。妻子白了他一眼：吃饱了没事，惹他？出去时候顺便叫舍儿来玩，我给他留了好吃的。

不一会儿，舍儿便来了。

顾远山一个人关在房子里生闷气，舍儿在门外叫爷爷他也不理。他把右手抄在棉袍的下摆里，来来回回地走动，嘴里不停地叽叽哇哇，不知是骂人，还是自言自语。口干了，便揭开条几上的糖罐，抓一把白糖捂进嘴里，吧嗒吧嗒地品尝每一个糖粒儿的滋味，他发现糖是酸的。

舍儿和大妈在门口叙得亲热。香不香，舍儿？香，大妈。好吃不好吃，孩子？好吃，大妈。舍儿知道不知道这是啥肉？舍儿不知道，这是啥肉呢？狗肉。狗肉？

顾远山听到这里，刚刚压下的怒火又冒出火苗来了，狗肉？这是我们这种人家吃的东西吗？只有下九流的人家才吃狗肉呢！家风全败了！全败了！

舍儿！去把你大伯叫回来！顾远山拉开门对孙子发起了狠。

舍儿嘴里正嚼着一块狗肉，不肯去。顾远山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吓唬孙子：去不去？舍儿吓哭了。哼！顾远山丢下手里的树枝，说：我自己去！

顾远山径直跑到大儿子的店里，不顾旁边有人，就命令儿子：你跟我回家！儿子乖乖地跟他回来了，问出了什么事。

顾远山指指舍儿手里的碗：问问你老婆给小孩子吃什么。

这事呀！你问问不就行了？舍儿，吃的是什么？不要乱吃啊，吃坏了肚子。顾维尧笑眯眯凑近舍儿手里的碗，问。

狗肉！不给你吃。舍儿回答着，把碗从大伯的眼底下闪了过来。

顾维尧埋怨地看了妻子一眼：你又不是不知道家里的规矩！再去哄舍儿：倒了吧，

舍儿，狗肉脏，不能吃。

舍儿不肯，说狗肉不脏，狗肉香。是大妈特地从邻居家给他讨来的。顾维尧无奈地看看父亲，老头子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他只得从口袋里掏出一元钱来，再哄舍儿，说买糖给他吃。狗肉有毒，狗是吃屎的，屎不脏吗？舍儿被他说得倒了胃口，同意倒掉狗肉。顾维尧松了一口气，问父亲：没事了吧？

顾远山不肯罢休，他喝住又要往外走的儿子：你就这样纵容老婆孩子吗？你还有一点男子汉的味道吗？

没见过这样骂儿子的，舍儿大妈嘀咕道。

你听听，你听听！你没聋吧？顾远山冲儿子叫道。

顾维尧不得不训妻子：你不开口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妻子顶撞他：谁惹他了，他自己心里有鬼……

这句话说得太糟糕了。顾远山拾起刚刚丢在地上的树枝，冲着儿子劈头盖脸地打起来。顾维尧左躲右躲，还是不停地被打着。妻子叫：不会跑？他便跑了出去。可是顾远山拎着树枝在后面穷追不舍，嘴里骂着：“不肖子孙！不肖子孙……”顾维尧见朝外跑不是办法，便又折回头往家里跑，跑到自己的卧室里，把门儿一关躲了起来。他的妻子马上赶去拦在卧室门口，对公公说：你进去打吧！使劲地打！打死了也没人心痛！没见过这样没用的人，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让老子撵得没处躲。她嘴里尽管这么说，心里却明白，老头子是决不会进儿子媳妇卧室的。这也是规矩，以前，她已经用这办法多次保护过丈夫了。

顾远山的气没处出，便抓住了舍儿，要打；舍儿抓住爷爷手里的树枝哇哇地哭。这可激怒了舍儿大妈了。没有生养过的她，对老二家的孩子个个疼，尤其是对舍儿，她把他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她顾不了自己的丈夫，也顾不了做媳妇的规矩，冲到舍儿跟前，夺掉了公公手里的树枝，把它扔在地上：你不让我们活我们就不活！走，舍儿！把你送回家去，然后我去投河，我受够了！

舍儿抱住大妈的腿：叫爷爷去投河，大妈不投河。

闹得邻居八家的都知道，过来看热闹。有人去把玉儿妈找来了。玉儿妈听明了原委，也发了脾气，对她大嫂说：投河？傻了？人家越是觉得俺们得眼，俺们越是要活着。俺们可是明媒正娶进门的媳妇，不是偷偷摸摸轧下的姘头。谁该受谁的气？现在解放了！

那我死给你们看！反了，真反了！顾远山咬着牙说。

咯噔一下，儿子、媳妇、孙子都不敢说话了。静了半天的场，舍儿妈拉起了舍儿：走吧，回家，让你爸爸来跪着吧！你爸爸会跪。

这一闹，顾家在宝塔集的声名大受影响。顾家三兄弟都觉得在人面前难做人。幸好，不久以后的一场大水冲去了顾远山的风流，也洗刷了顾家三兄弟的耻辱。

十四

一九五四年年初，顾远山看黄历，说今年要发大水，因为治水的龙太多。大家都笑他，说老黄历不中用了，如今有了水闸。

水闸离宝塔集二十里，宝塔集男女老少凡走得动的都去看过。我奶奶也去了。回来，奶奶拍手打掌地称赞，说龙王老子也给锁起来了，多好！最好哇，把天王老子也锁起来，要他哭就哭，要他笑就笑。我爷爷说她胳膊肘朝外弯，忘记了自己是老天爷的小老婆。她说：我跟老天爷离婚了，我像小莲花一样反封建，给你这个剃头的当大老婆了。

为庆祝水闸的竣工，老师组织我们到工地上去参观，还让我们以水闸为题写一篇文章。老师启发我们说：

我省有什么著名的水利工程？寿县安丰塘。这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人工水库，鼎盛时期，方圆二百多里，可灌良田万顷。可是，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不顾劳动人民的死活，水库受到破坏，现在只剩下残余部分了。安丰塘据说是春秋时楚国名相孙叔敖所修，孙叔敖是历史上有名的好官，《史记·循吏列传》记：孙叔敖拜相时政绩卓著，“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故称“良大夫”。“良大夫”、“良相”，不过就修了一个水塘，我们今天依靠人民的力量却能修建这样雄伟的水闸。所以，这水闸标志着时代的变化，凝聚着党对人民的关怀和普通劳动人民的智慧。

我们几乎把老师的话全部抄进了作文簿。我们每篇作文差不多都写上了这一句：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怕淮河涨水了！

有水闸，谁会相信顾远山的黄历呢？

所以，夏天尽管雨下个不停。河水渐渐地上涨，宝塔集人还是毫不在意。我奶奶还椰榆老天爷：我跟你离婚你就这么伤心？哭了又哭，哭了又哭。谁也不害怕你的眼泪了，你就别哭了，好好地在天上过日子，等我活够了，厌烦这个剃头的老头了，就回去跟你团圆。叫啥？叫复婚。对了，复婚。

可是雨照样下，雨水像覆转了天往下倒似的。淮河汹涌涌地要往外漫。水好像有了弹性，一起一伏，起伏之间就不知不觉地爬上了岸，吞没了一寸土地，又吞没了一寸土地。

河底开始有人哭泣。有人说是鬼，历年淹死的鬼魂都要趁涨水之际寻找替身。一天夜里，有人看见河中央影影绰绰漂过一群幽灵，一个个白衣白裙，状似妇人。有个女人被拖了下去……

人们开始忧虑，盼望着开闸，将河水一口吸进自己肚里。然而，淮河没有给人开闸的机会。它从龙宫借来了三江四海的水，悠悠地从水闸上漫了过去。雄伟的水闸刹那间没入了水底。

淮河没有了边界，随心所欲地吞没着它所遇到的一切。耕牛、家畜、房屋、树木。人挂在树梢上呼救，抱着倒塌下的屋檩沉没……

蓝二爷的后院又一次倒塌，这一回他们再也没有修复的力量了。蓝二奶骂劳改中的丈夫和儿子：都是你们造了孽，让我们三代人这样受罪。你爷俩死在劳改队里算了，死了干净。你们死我也死，一家人都死。永继妈生气地顶撞婆婆：都死？永继呢？你天天除了骂人，还有什么本事？还不是怪你，没材料，管不住他爷们。蓝二奶说：我心里闷，骂骂人顺顺气都不行了吗？怪我没材料？你有材料，男人还不是横死了？婆媳俩又哭又闹。

顾维尧家也上了水，搬到了小五家。不到两天，玉儿院子里也进了水。生意自然作不成了，一家人只能围在一起叹气。能烧的都烧了，能卖的都卖了，水再不退就揭不开锅了。玉儿妈拿出了自己当新娘子时的几件银首饰……

顾远山冷眼旁观着一切，不时地冷言冷语：我早说过了，今年要发大水。谁信我？信水闸，信政府，不信黄历，不信长辈。报应呀，报应！

玉儿妈正没好气，便忍不住还嘴：听你的，又怎么样呢！大水来了，你能顶住？顾家在哪里还有房产田地，把一家人都接过去？

这个家都败在你们手里！顾远山也忘了规矩，直接和媳妇争执起来。

别手不秀怨袄袖！败在俺们手里！打我进顾家门，你们家就是这个样，啥时候发达过？玉儿妈说。

哎呀，别争了，水火无情，听谁的也没用。一家老少能平平安安就不错了。顾维舜说。

玉儿妈猛然想起玉儿来：放假了，怎么还不见人影呢？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玉儿爸说：谁敢说呢？前天还说公路上淹死了几个人，也不知是男是女。

你咋不去打听？你是死人吗？玉儿妈哭起来。

玉儿大伯叹长气：这么大的水，找谁打听去？他妻子白他一眼：你少说话，没用的人！

顾远山冷笑一声：我早就说过，这孩子命硬运气不好。小丫头不可大聪明，你们还送她去上学，上了初中升高中，不是把她往死里送吗？

玉儿妈哭得更厉害了：你咋知道她死了？她死不了。要死，就死张二家的。

玉儿爸对妻子大叫一声：别闹了！咒人家干啥？人家说不定真死了。前天我从那一片房子走过，见她家的房子冲得干干净净了！

顾远山的脸顿时惨白，他马上跑进自己的小屋里，把门一关，再也不出来。可是一天三餐饭还是照样吃的。

这一场大水又一次改变了宝塔集。只剩下街心高处的一些房子了，大人小孩都显得前所未有的疲惫。

玉儿家一蹶不振了。除了顾远山老头还能吃到白面馍馍外，一家人都只能吃菜糊糊。舍儿看着爷爷吃白馍时的那个馋劲儿，谁看了都觉得可怜，可是顾远山还照样吃他的。人们背后骂他毒，克死三个女人了！

十五

宝塔集进入了社会主义。对于被水灾弄得穷愁潦倒，疲惫不堪的人们来说，这自然是一个福音。一个个即将倒闭的小商店合并起来，组成合作商店，店主变成了“店员”，有固定工资，将来还有退休金。真所谓老有所养，少有所教，生老病死，皆有依靠了。

顾氏三兄弟中，不但老三积极，老大老二也积极起来。为了入股，顾维舜把老婆的缝纫机都搬出去卖了。他成了一家合作商店的经理，月薪二十九元五角，虽然只有鸡囊大，他也满足了。这一辈子，他只有一个心愿，开一个像像样样的商店，为自己一家挣个丰衣足食，也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干。他的精明是宝塔集上闻名的，算盘打得滴溜溜转，又懂得重视商业信誉。只可惜以前一直没有给他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不是“匪”就是“水”，他的小店像是波浪上的小船，上下颠簸。

顾远山不相信无亲无故的人们凑在一起能做好生意。他警告儿子们少起劲儿。可是没有一个听他的。三儿子现在是宝塔集工商联会的主任了，动不动就说父亲保守什么的。大儿子、二儿子不和父亲硬顶，只把责任往“上头”推：上头叫合作啦，您老人家有话找上头说去。大家都合作了，俺们本小利微能抗得住吗？走着瞧就是了。

就这么走着走着，也走两年了。没觉得什么不好，习惯了，好像本来就该这么走似的。

社会主义好。

十六

玉儿姨奶奶在劳改队里蹲了三年，鬼神也害怕了，不再来找她，她就给放了出来。回来的时候，人们发现，她反而胖了。为什么呢？有人问她。她说：哎呀，我那病，可折腾人了！上来一次就要耗掉我多少精力，哪有不瘦的？病一好，我吃的东西都归我自己，鬼神不来争份儿了，我自然就胖起来了。大家都觉得有理。回来以后不能靠鬼神赚钱了，便让她到乡下种地。日子过得倒还可以。

可是这几天不大安宁了，乡下干部动员大家骂干部咧，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来找外甥维尧和维舜商量。

维舜和维禹都到县里开会去了，问维尧等于问土墙。他说，只听说要整风，没听说要骂干部。姨奶奶说，没听过你讲的那两个字，队上干部只动员社员骂领导，骂干部。说这是党的号召。

玉儿妈说：我不信，还有号召骂人的？

姨奶奶说：你看看，我这么大岁数了，还会胡说吗？

那人家咋说你咋说，比人家少说几句就是了。玉儿妈说，可不敢胡讲啊！知道杨大傻子的事吗？这孩子从小缺心眼儿，傻傻乎乎的。他爹杨忠怕死了以后，他就天天和一帮半大孩子拾柴禾，不知忧也不知愁。谁能想到他会犯事，给抓了起来呢！这事，我现在想起来还害怕。那天，大傻子正在俺院里跟会儿玩，来了个民兵，说走，走，上区里去。就把他带走了。我也没想到会出事儿。过一会儿，街道通知去开会，也没说啥事。我路上碰上傻子妈和小群妈，傻子妈说，啥会也？俺傻子不是去了吗？非要我去不可？我们几个人一进会场，妈呀，吓死人，大傻子五花大绑地站在一个草台子上，跟他站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半大孩子，也都绑着。傻子妈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起不来，我和小群妈硬把她拉起来的。

听说是反革命，是吧？顾维尧说。

没讲反革命！说是他们三个小孩要组织日月党。小孩子懂个啥？祸就出在嘴上。三个小孩天天在一起拾柴禾，累了，就睡在野地里云天雾地里扯，这个说，咱们天天太阳不出就出来，月亮出了才回去，净跟太阳月亮搭伴了，像个日月党吧？那个说，对，我就是日月党的主席。这个说，我封你当外交部长吧！那个说，那我就当内交部长。就在这大路上讲话，草棵里有人，有人就当真了。三个孩子，一个个判了六年的刑。玉儿妈说。

姨奶奶连连叹息：可怜小孩子家，和二呆年纪差不多吧！我是说，不能乱说。可是俺乡里也有像傻子那样的人，干部一号召，他就上劲了。

谁呀？玉儿妈问。

拐腿子。姨奶奶说，这小子从小生过病，落下个拐腿，三十多岁了，还娶不上老婆。那天队里开会，随便队长怎么动员都没人敢骂领导。咳，他站起来，紧紧裤带，说，俺

来骂两句。队长说，好，你骂吧！他说，俺想跟省长的闺女睡觉。我的妈呀，把大家笑死了！

顾维尧和玉儿妈也笑了起来。玉儿妈一边笑一边说：哎呀，还紧紧裤带！

姨奶奶说：还有一个跟着唱的呢！也是仗着成分好。他说，你们队部里挂那么多人像干什么？一个个胡子拉碴的，俺们都叫不出名字来。干部问他指哪一个，他指指一张像：就是他！胡子把嘴唇都遮住了，咋喝稀饭呢？有人对他说，那是恩格斯，外国人，人家不喝稀饭，吃面包。他还硬争：俺不信，外国人不喝稀饭！他们就那么笨？

玉儿妈说：这个主儿说得也对。敬一个人头像不就够了？敬多了就不灵了。过去堂屋里挂菩萨像，也是只挂一个。

姨奶奶叹了一口气说：唉！我也不知道啥是个对，啥是个错。骂错了不得了，不骂呢，又说你不响应号召。

玉儿妈说：就说你有过错误，跟别人不一样。

说了呀！姨奶奶说，可是人家说，越是这样的人越是要响应党的号召。

顾维尧说：那你就等着老二和老三回来吧！他们去县里开会已经好多天了，也该回来了。

姨奶奶住了下来。

姨奶奶和玉儿妈叙了半夜的话，正要吹灯睡下，听见几声轻轻的敲门声，便问：这么晚谁还来呢？玉儿妈说：你耳朵背了吧？我没听见啥。可是马上，她便听见顾维舜的声音：是我，是我！她吓了一大跳，怎么半夜回来了？

玉儿妈一开门，顾维舜卑狼地站在门口呢！月光下简直像个鬼。等他走进来一看，更吓人啦，头发胡子都长长的，人瘦得走了形，再加上满身的泥，不像人形了。

这是怎么啦？玉儿妈问。

出了大事了！顾维舜上牙打着下牙。

啥大事把你弄成这样？玉儿妈大声地问。

别大声，让人听见了！顾维舜说。

咋哩？作贼啦？玉儿妈问。

比作贼还孬，成了右派分子啦。顾维舜说。

啥？右派分子？是个啥东西？玉儿妈的声音仍然很大。

哎呀，你小声点呀！丢人。我白天不敢回来，在三里庄等到天黑才回来的。顾维舜的嗓子都硬了。

玉儿妈也不耐烦了：啥事，你说么！

顾维舜什么也说不清。只说，没啥好说的，反正，反正从今以后啥都和以前不一样了，我是敌人了。他一边说一边抖，站也站不稳了。

姨奶奶连忙让他坐上床，给他盖上被子：春寒呀，别是冻病了。

顾维舜在被子里还是抖：不，不是病，那天，就是划我右派的那天，我抖了一夜呢，害怕呀……

你倒是说说，啥叫右派呀！玉儿妈还是要问。

右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顾维舜说。

啥？玉儿妈惊奇了。你反党反社会主义？宝塔集上谁不知道，你是大积极分子呀！天天宣传社会主义好，都快变成学话的八哥儿了。

那是假的……顾维舜说。

假的？玉儿妈问。

人家说我是装的。

你就承认了。

不承认怎么办呢？

你呀！现在咋办呢？会把你抓起来吗？

不抓，叫我回来改造。

咋改造？

降职，经理不当了。降薪，拿二十五元五角。

好哇，好！这就是你积极的好处。我说过吧！咱不是那块料，让人家干去。你不听，一定要干，说大家公推你，上头看得起你。公推你，看得起你，就叫你当右派呀！玉儿妈发起火来。

光当右派就好了！顾维舜说，还要查历史呢！哎，舍儿妈，你说，我是不是国民党

员呀？

问我？我咋知道？你入没入国民党，自己不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呀！可是他们说我是的，说一张表上有我的名字。这难道是真的吗？要是真的，我自己咋会不知道？我的支部书记是谁？为啥不叫我过组织生活呢？

玉儿妈跺起脚来：谁这么坑人呀？坑人不能这么坑呀！维禹呢？他没事吧？

维禹也受了牵连，工商联主任撤了，叫他到河口镇供销社当营业员，马上就得走。

玉儿妈哭起来：你们弟兄混得像个啥？

姨奶奶浑身抖动起来，眼睛上翻，没等顾维舜夫妇注意到她，她就扑通睡倒在地了。顾维舜连忙跳下床去拉，叫着姨，姨，不能呀！哪里拉得起？吓得顾维舜一口吹灭灯，轻轻地叫着：要命啊！

我不是你们的姨，我是你们的妈……姨奶奶轻声地唱起来。

顾维舜夫妇连忙跪下，叩头，小声地求告：求你老人家保佑

叫声我儿你听清，你的命里有灾星。姨奶奶继续唱着。

灾星来自哪方？顾维舜问。

南边有个狐狸精，狐狸精便是那灾星……

玉儿妈毛发倒竖了，她连连叩头：几天以前，我是看见一条黄鼠狼从屋里跑出去，可是我没敢动它呀！

姨奶奶又唱道：灾星本是命中定，害怕躲藏都无用。

那咋办呢？顾维舜夫妻问。

心字头上一把刀，凡事你要学会忍……

舍儿不知啥时候也醒了，他赤着脚下了床，站在爸爸妈妈的身后，睁大一双惊恐的眼睛。顾维舜伸出一只手，按按他的头，要他跪下，他也顺从地跪下了！

妈！保佑他吧，你的亲孙子，舍儿……顾维舜又向姨奶奶深深地叩个头，低声哭了起来。

十七

像得了传染病似的，顾维舜划成右派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宝塔集又生出十来个右派来。玉儿妈不再埋怨顾维舜了，她说：我想通了，时局走到这一步，大家都该当右派。右派不为丑，你家有来我家有。少挣几元钱就是了。

可是顾远山不原谅儿子。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当初我就警告过你们，不要当什么干部。全当耳旁风！现在不是证实了我的话？我对你们说吧，这才是开头呢，从今以后别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特别是你，维禹，你这些年大运和流年都不利……

一家人都被他讲得心烦，但又没法反驳他。是的，他说得对。今年一开头他就说过了，维舜今年流年不利，以不说不动为好。也不知他是凭什么算出来的，就凭那一本破黄历？

顾维禹办好了一切交接手续，就要搬往河口镇了。顾维舜心里难过得不行，说，要流放也该流放我，怎么轮上老三呢？搬家的头一天晚上，他跑到维禹家里，向维禹的妻子一连说了好几个对不住，真恨不得要叩头了。维禹说，二哥，我看你还没有明白过来。我现在明白了，老爷说得有道理，咱兄弟在集上太惹眼了。一惹眼就遭人妒，就要闯祸。人家要把我弄到河口镇去，是防止我在宝塔集东山再起。这也好，老爷说我生来短命，说不定这一次搬家就把我的命变过来了。人挪活，树挪死嘛！维禹的妻子舍不得离开宝塔集，说本来从县城到这里，就已觉得小，现在要去的河口镇那就更小了。他对她说：要那么大的地方干什么？地方小，我到哪里去你都能找到，我就不敢在外面找相好。妻子被他逗笑了：相好？看你那长相！

顾维舜的脸上这才有了点笑。

第二天一早，维禹两口子要动身了，一家人都来送，只是不见顾远山和维舜。顾远山自不必说，是不肯送，流放外地，啥光彩的事？还要送！他叫一家人都不要送的。可是维舜呢？玉儿妈说，他这几天就念叨着这一件事，今天天不亮就起来出门了，我只当他到老三家里来了，会到哪里去呢？算了，别等他啦，自从当上右派，就像掉了魂似的，好像连心肝都叫人掏去了。

原来顾维舜在集头上等着。维禹两口子的行李车一到，他就迎上来，接过车把拉着，一双眼红红的，好像哭过了。

玉儿妈没好气：跟谁钻称杆地去了？难分难舍，眼泡都哭红了！

顾维舜说：谁还有心肠跟你说笑话！

玉儿妈说：说笑话？我有心肠说笑话？一家人为你操心，知道你是投河了，还是上吊啦？说着说着，她的眼圈红了。

维禹说：二嫂，二嫂，别说了。二哥，你上哪里去了吗？该跟家里说一声啊！

维舜说：我去给母亲上坟了，求她老人家原谅，我没照顾好你，还连累了你……

维禹两口子的眼圈也红了。

维禹说：二哥！俗话说，长兄如父，长嫂如母。你和大哥虽然与我不是同母所生，可是对我一直没有一点外意。别说受了这么一点连累，就是连累再大，我也不怪你。我母亲对你和大哥不好，我心里明白。她老人家的不是，我替她承担啦，也求你和大哥原谅

咋说这些！玉儿妈哭起来了。

谁也不再说话。一支流泪的队伍，一支沉默的队伍。拉着一架车的家当，在扬着尘土的路上缓缓地走，走，走。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全低着头。怕遇上熟人，怕看见生人。太阳像往常一样从东方升起，照着他们的脊背和脖颈，照着他们拉着的家具杂物，照着他们身后的尘土。尘土在阳光下闪烁，五颜六色，比他们的脸色美丽得多。他们靠着路旁的树荫走。阳光透过稀疏的树叶投射过来，结成一网，将他们罩住。他们走，网也走……

顾维尧和顾维舜一直把兄弟送到河口镇才回头。回到家里已经黑透黑透。

玉儿妈把一封信塞到顾维舜手里，是玉儿来的。玉儿现在已经是上海的大学生了。信上说，暑假在即，她就要来家度假了。

顾维舜只把信瞄了一遍，就和衣躺了下来，任妻子问信上写些啥，他一句话也不说。他想的是，怎么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向大学生女儿交代？

他还是看报的。所以他知道去年春天有一个“鸣放”运动，运动的结果，是揪出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北京有个储安平，叫着要杀共产党，这个人莫不是吃了老虎头、豹子胆？打死他顾维舜，也不敢说这样的话。他连这样的想法也没有哇！他觉得现在比过去好。过去有土匪，现在没有了。过去捐税多，现在捐税少。过去票子不值钱，现在钱能当钱花了。

可是鬼差神使，他参加了县里的整风会，又在会上说了那几句话。他原来是什么也不准备说的。而且已经坚持了两天了。

老顾啊，带个头吧！不要有顾虑。去年我们是诚心诚意整风的，被右派分子破坏了。现在，我们重新进行整风，边整边改，完成我们既定的计划。什么意见都可以提，我们对人民群众的意见一定会虚心听取的。

顾维舜只是笑：对，对，有啥说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是党的领导英明伟大，叫我们无话可说啊！

老顾，还是有顾虑吧？你们兄弟始终是我们依靠的对象，你们一直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这是十分可贵的。可是也正因为这样，才更应该积极帮助党整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嘛！

顾维舜还是笑：过奖过奖。旧社会过来的人，旧思想多，勉力而为吧！有很多缺点，很多缺点，也要整风，也要整风。

哈哈！顾维舜同志！你太客气了！小顾，顾维禹同志，你看老顾是不是有顾虑？

我二哥没顾虑。他确实没有什么意见可提。二哥，要么，你就随便说几句？

好好，考虑考虑，考虑考虑。

别人考虑好了，先说。

一位年纪和身分与顾维舜差不多的人说，现在有些干部的作风不如以前了。

又一位年纪比顾维舜更大的人说，粮食统购统销搞得过头了，把农民的口粮也统购进去了，弄得一部分农民口粮不足。

好好！主持会议的人说，这样谈很好。我们就希望这样，党内外人士肝胆相照，以诚相待嘛！

又有人说，党的干部确实不如以前了，以前平等待人，现在有了架子了。

好好！主持会议的人又说。这样谈很好。大家都应该向他们几位学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又有人说。又有人说了。最后留下了顾氏两兄弟。

二哥，你说吧。

你说吧，老三！

哈哈！你们兄弟真有意思，还是老家规啊，弟弟敬哥哥，哥哥让弟弟。这叫啥，叫啥？有个专门叫法的。主持会议的人说。

孝梯，叫幸梯。封建，封建。顾维舜谦逊地笑着，心里想着该说的话，想到了苏联花布上。

顾维禹的苏联花布衬衫的领子露在外面，红一块蓝一块的，顾维舜觉得刺眼。记得当初提倡男人穿苏联花布的时候，他就不赞成。男女有别呗！中国古代有红男绿女之说。可是男人穿红，是官服吧？苏联花布太土，太俗，太刺眼，男男女女都穿，满眼都是男不男女不女的人，难看。

不妨就拿这做话题？有人说，这是老大哥的一番好意，却之不恭呀！他说，这也是作生意。供销不协调，供过于求，就变成了倾销，老大哥的一番好意也叫人觉得过分了。可不可以供应一点别的？

顾维舜奇怪，一切怎么变得那么快。主持会议的人几天前像弥勒佛，笑口常开，几天后就变成关云长，怒目圆睁了。参加会议的人脸也变了，嘻嘻哈哈变成了问声不响，握手寒暄变成了躲躲闪闪。一部分人成了右派，一部分人急着与右派划清界线。

顾维舜，你攻击的只是苏联花布吗？你攻击的是苏联老大哥，我党的国际主义路线。

不不，是是。

顾维舜，你说，解放前你都干了些什么？

帮工，作生意。

你什么时候参加的国民党？

不不。

名单在这里。

他想看看那名单，人家不给看。

你与反革命分子杨忠伯、杨孝伯是什么关系？

孝伯忠伯都是我儿子的干爹，忠伯还是我女儿的老师。

听，叫得多亲热，忠伯，孝伯。

他诚惶诚恐。他汗流如雨。他浑身打颤。他想从地裂缝里钻下去，逃遁到地狱。维禹满面通红地看着他，一句话也不敢说。散会以后，维禹找他，他避开了。他整整三天，茶饭不进。

从县里回到宝塔集，他已不是原来的顾维舜了。再也没人找他去开会。大哥说，集上工商联也开会呢，号召帮党整风。他告诫大哥，千万千万，啥也不要说。大哥说：我会说啥？可是有人说了，说老区长周纯一乱杀人，让人陪斩也是犯法的，说杨大傻子他们几个小孩太冤枉……

顾维舜真想去告诉那些说话的人，赶紧买张膏药把嘴贴住吧。可是他不敢，人家也不理他。果然，这些说话的人都成右派了。几天前见了他还躲闪甚至嘲笑的人，如今都是一副可怜相，在公共厕所里碰到了，还会给他一个苦笑。唉，人哪！都是这样贱，听人家三句好话，就把自己给卖了。高帽子换成黑帽子，一眨眼的工夫。

顾维舜没有把自己的情况对玉儿说。玉儿是共青团员，学生会的干部，顾家的光荣。爸爸这顶帽子对她会有什么影响，看看小群就知道了。小群现在和妈妈在街上卖针线，永继想跟她定亲，他妈不同意。其实，两个人真匹配。永继中等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在离宝塔集不远的一个小小学里教书，一个月也只挣几十块儿。

玉儿妈见丈夫问睡不起，便在旁边唠唠叨叨。怎么，害怕玉儿知道？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谁叫你管人家穿苏联花布的事呢？谁爱穿谁穿去！你天天积极，抢高帽子戴，像抢孝帽子似的。现在嫌头上的帽子压人了？我对玉儿说，你要不要这个爹，随你的便。集上右派多着呢，没见哪一个丢了老婆儿女的！

你不要逼孩子，她要进步。顾维舜恳求妻子。

进步？你和老三不是要进步还到不了这一步。这话是我说的：家里人从今以后谁也不许进步了。对舍儿，我要管紧他，给我好好地念书！上头讲啥也别信！玉儿妈说。

好了好了，随你怎么说吧。我在外头不得清静，在家里也不得清静吗？顾维舜烦了。都是你自己找来的！起来！脱了衣服洗了脸洗了脚再睡！没见过你这样的男人，一点小事就吓破了胆。

你是不挑担子不吃力呀！顾维舜一边起来洗脸一边说，当了右派分子，这事儿还小？

说你的混帐话！你挑多少斤我挑多少斤，连洗脸洗脚水都送到你跟前，挑得还轻？

啥了不起的事情，右派右派，人家不提，你自己偏挂在嘴上。当个屁放了它！照样吃饭睡觉。东头那个年轻猴儿，当了右派还照样生个胖儿子。右派！没比哪个男人少一点儿。顾维舜终于被妻子骂笑了。

十八

我和玉儿原是报考一所大学的，她学文学，我学历史。但结果我因分数不够被分配到省立师院。我们已经两年不见了。去年暑假，我们约好了一起回乡，但因学校里开展反右斗争，两人都不能回来。今年她又写信约我一起回乡，但由于不想说明的原因，我回避了。我比她早几天回到宝塔集。

玉儿到家的第二天，便到我家里找我，要我和她一起到区里去一次，问问她父亲是什么原因成为右派的。有什么好问的呢？我说。她说，不，我一定要问清楚，因为我认为爸爸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给我写了那么多信，都鼓励我听党的话，好好学习，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问玉儿：你看我会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她说：哎呀，你开什么心啊？我说，好，你去吧，我不去。恐怕区里领导也不想见到我。

不一会儿，玉儿便回来了，坐下来就流泪。我以为他们会对我说实话的，谁知他们那样对待我，好像我是一个奸细。回家问你父亲去，他犯的罪他自己不知道？他们说。你看，我自讨了一场没趣。

别哭了，准备跟你爸爸划清界限吧！我冷冷地说。

怎么划？玉儿问。爸爸也这样说，要是怕影响你的前途，你就跟我脱离父女关系吧！父女关系怎么脱离呀！你知道我爸爸脾气好，从来不打骂我们。那回我把合儿的门牙都摔掉了，他也舍不得动我一指头。

玉儿越哭越厉害，惊动了睡午睡的奶奶，爬起来问：翠儿欺负玉儿了？我说，她哭她爸成了右派，奶奶，你也该为我哭。奶奶说，你自作自受，我才不给你哭呢！

玉儿止住了泪，挣大一双近视眼，问我：真的，你？

我点点头。

你为啥呢？玉儿问。

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抱不平。我说。

说详细一点。玉儿说。

不想说，认罪的时候说够了。我说。

奶奶点点我的额头：你呀，从来就喜欢逞能，给人家打个什么抱不平？你知道人家姓胡的是胖子还是瘦子？又跟他没亲没故。

奶奶，你不懂。我摆脱了奶奶的手。

我发觉，我的脾气变坏了。当了右派，被开除学籍回到家里，家里人还是像往常一样接待了我，没有盘问，也没有埋怨，奶奶甚至说，这正合她意，女孩子读个什么大学。可是我却不能像以前那样和他们相处了。我想着我的前途，我的男友。

真想不到，你也——玉儿说。

我也——你想不到的事情多着呢？玉儿，你回家去吧，我要写封信。

奶奶骂我：翠儿，怎么敢这样啊？

我没回答。玉儿僵坐了一会儿，便告辞了。这一个暑假，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奶奶和父母叫我去找大姊夫周纯一，求他替我找一份工作，到外地去，免得在家门口，让人家背地里议论。我只得去。大姊夫现在是县里的工业局长，手下大大小小的单位，安排个把人应该是不难的。我二姊的工作就是由他安排的，而且不久前又给二姊攀了一门好亲戚。

找我？要我帮助你逃避监督改造？周纯一回答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的。我原来对他的印象还不坏，现在这好印象一丝也没有了。

我说，是家里人要我来找你的。周纯一不管，继续训斥我：当初你向党进攻的时候为什么不来找找我，问问我镇压反革命对不对？你知道不知道宝塔集上的右派分子是怎么进攻我的？叫我小阎王！你还算讲点情面，没跟他们一起向我进攻，对不对？我就等着你来攻击我呢！找我？你有种反党，就该有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改造！

我转身就走了。大姊抹着眼泪追出来，往我手里塞了二十元钱，说大姊夫正在气头上，过一阵子等他消消气你再来。我说，我不会来了。我下乡劳动去。你下去劳动，可是他呢？姓什么？姓高？大姊说。

别提这事！我大叫一声，挣脱姊姊跑了。我不愿任何人跟我提起他，我的男友高凡。

我已经写信告诉他，为了他，也为了我，我要与他断绝关系。我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我像等待判决一样等待着他的回音。

我把大姊夫的态度告诉家里，奶奶把周纯一骂了一顿。她说，不靠他，就不靠他，天无绝人之路，慢慢等吧！找到合适的地方，你就劳动去，找不到呢，就在家里住着，有我活着，就没人敢多嫌你。再过两年找个婆家，就啥事也没有了！

我成了无业游民，一天到晚间在家里，除了洗衣洗菜，不到外面去。一天在河底洗衣，碰到玉儿妈，她说玉儿现在给家里写信更勤了，差不多六七天就要寄一封厚厚的信来，劝她爸爸认罪服罪，好好改造。她爸看了只叹气。

我觉得玉儿单纯得可爱，真想给她写封信，劝她不要把父亲当假想敌了，但终于没写。

在那一段日子里，经常来看我的只有小群了。我发现小群老得很快。买不起新衣服，净穿她妈的旧衣服，大襟衫穿在她身上，很不协调。可是看来小群也习惯了。好像也开朗了许多。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她说得多，我说得少。她说来说去只有一件事，永继，永继。

翠儿，你说，大地方的人也这样，不许跟俺这样的人订亲？永继每次来看我，都是偷偷摸摸的，俺妈也不让我见他。翠儿，你说我该不该见？翠儿，今天永继给我一封信，叫我到他家里去，是不是他妈回心转意了？诸如此类的问题，一大堆，我总是高兴就回答，不高兴就不理。她也不见怪，还是来找我谈。她说，除了我，她没有什么人可以叙叙的。别人都怕连累，只有我，不怕她连累。

一天，奶奶拍着巴掌说：好了，这一下子小群有救了。永继也补成个右派了。

我要问个究竟，便去小群家探听消息。

小群的脸上竟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欢乐。见到我，她像报喜似的对我说：永继也当右派了！

我叫她说仔细。她说她也说不仔细。只听永继说，咱县里右派分子还不够数，有指标呢！所以要补几个。补谁呢？当然永继最适合。他家庭成分不好，爷爷叔叔都是劳改犯，爸爸又死得不明不白。他自己呢，也不要求进步，和我这个不干不净的人恋爱……

这都是谁说的？我问。

永继的领导！小群说。

永继就同意了？我问。

不同意也得同意。他说，这事儿说不定是祸是福，少拿几元钱工资，能和我结婚也是值得的。小群说。

那他妈呢？他妈不会拦他了？我问。

不知道。翠儿，我跟你一起去看看他妈，好吗？

好吧！我答应了。

永继一家三口，自从五四年大水以后一直住在我们院子里一间小屋里，为了多收几元房钱，她们不想住得宽敞些。已经完全是一个穷人的家了。墙壁东歪西倒，被烟熏得黑黑的。没有什么家具，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上铺着几条破旧不堪的被子。两个女人睡大床，小床是永继的。我们进去的时候，永继妈和她婆婆都睡着，一个头痛，一个腰痛，都哼哼唧唧的。

永继妈一见小群就把脸挂下来。说永继不在家。小群不在乎，说：婶，我是来看你和奶奶的。说着就在灶前坐下，引火烧茶水。

茶水端到面前，永继妈才从床上坐起来，也叫我和小群在永继的小床上坐下，然后对我说：翠儿，你说俺永继的命咋这么苦啊？我说，是啊，也真想不到。永继妈不满地瞟了小群一眼：不知他喝了谁的迷魂药了！依我，就不认这个账！小群马上辩解说：婶，我也是这样劝他的呀，可是人家领导不肯。永继妈说：你多啥心？我又没怪你。到了这一步，也只能认命了。小群，明天你到乡下学校里去看看他吧，别把他忧愁坏了。一直对我们不理不睬大声哼哼着的蓝二奶奶这时也一骨碌爬起来，一把抓住小群的手：我儿！我早就说过了，你就是我们的孙子媳妇。歪瓜配瘪枣就歪瓜配瘪枣，只要能生儿育女。等我跟他妈病好了，就给你们办喜事。谁要是敢说句不中听的话，我骂他祖宗十八辈！

小群的脸上放了光，我也舒了一口气。这时候，我觉得小群是幸福的。

十九

与宝塔集相比，河口镇实在太小了。小镇只有一条街，实际上只是一条路。通往县

城的公路两边盖了两排茅草房，开了几间小店铺，店铺的柜台都是土坯垒的，卖些油盐酱醋、大饼油条之类和肥皂草纸，刷把扫帚之类，最大的商店要算顾维禹所在的供销合作社了。全镇几十户人家，站在家门口，可以从东望到西，从西望到东，张家的烟囱口冒烟，李家的两口子打架，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顾维禹夫妇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也过得相当甜蜜，因为顾维禹妻子怀孕了。河口镇真是个好地方，公鸡到这里也会下蛋呢！顾维禹听到妻子怀孕时高兴地叫着，赢得妻子一顿捶打。妻子也高兴，结婚七八年了，没有孩子，她怀疑自己没有生育能力，哭过。维禹那时安慰她，说都怪你的婆婆，就是我的妈，待大哥二哥他们太坏了。老天爷罚我绝后。不关你的事。三门合一子，有个舍儿也不错。她现在才看出来，他以前说的是假话，他也想有个孩子。

两口子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到孩子身上了，一下班，顾维禹就往家里跑，与妻子一起为孩子准备尿布、小衣小裤，他的手比妻子还灵巧，所以他要跟妻子换个位：你当爹我当妈。

这几天下雨，顾维禹更是不到下班时候就想家了，房子不行，他怕妻子应付不了。果然，妻子找到了供销社，对他说，房子漏雨。供销社一共三个人，除他之外都不在，他把门一锁便回家修房子去了。忙完了，他才猛然想起，有一笔现款该解到银行，已经来不及了。店里没有保险柜，他想把它拿到家里来保管，哪知他赶到店里的时候，钱已经不见了。一千多元钱哪！

顾维禹不敢打顿，向供销社领导报告，领导又向县里公安局报案。公安局立即就派人下来要顾维禹详细交代事情发生的经过。经过就是那么多，几句话就讲完了，可是人家不信，把他看了起来。顾维禹觉得来者不善，马上叫妻子到宝塔集，给两个哥哥报个信。

顾维尧和顾维舜都埋怨老三粗心。老三的妻子为丈夫辩护，说房子实在漏得不行，床上也漏湿了。这样的秋风秋雨，不及时把房子修好，淋塌了怎么办呢？

顾维尧和顾维舜看着挺着大肚子的弟媳，便不再埋怨了。维尧说，不是已经报案了吗？等公安局查清楚就是了。维舜说，怕不能光等呀，这种时候，谁知道人家会想到哪里去？要先想办法把这笔钱补上，再慢慢地等破案。可是到哪里去找这笔钱呢？

一家人都愁死了。

维尧的妻子说：去问问老爷？他身上还有多少钱，先借他的。玉儿妈说：问他？他能拿出一分钱，算我说错了！维禹的妻子也说问老爷是白搭，他从来不喜欢老三。维舜说，不管他肯不肯，都得跟他讲一声，虎毒还不吃子呢，他总不能把亲生儿子往死路上推。

当时顾远山正住在玉儿家，一天到晚像新娘子似的把自己关在屋里。吃饭的时候开门，让儿孙们把饭送进去。现在，玉儿家的生活已经相当清苦了。不但吃不起细粮，有时还得掺点红芋叶、芝麻叶。可是顾远山坚持“食不厌精”，非细粮不吃。每天早晚，玉儿妈叫舍儿去给他买两个姚哑吧的馒头，中午则给他蒸一碗米饭。舍儿常常对着爷爷的饭食咬手指头，恨不得嗓子眼儿里伸出一把手，可是爷爷好像从来看不见这情景，从来不问一声：舍儿吃不吃？气得舍儿在爷爷门外唱：尖头鼠，鼠头尖，关起门子吃干饭。蚊子叮吃半粒米，掂起竿子撵十里。不是碗碴子割了脚，再撵十里也不多。

说什么玉儿婶子也不肯去见公公。玉儿妈说，他看见你怀着身子，也许会念起婆婆的旧情。玉儿婶子说，不行，我看见他就发抖。无奈，维舜和玉儿妈一起去了。

不是吃饭的时候，顾远山的门关着，一个人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踱步，嘴里不时地自言自语，语音含糊，谁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顾维舜在门外叫了一声爸，顾远山的脚步停了一下，并不答话。玉儿妈又叫了一声“他爷”，他才把门打开了。

老三出了点事儿。顾维舜说。

顾远山哼了一声，依旧踱步。他这间小屋只有十来个平方米，他那样高大的个子，三步两步就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了。可是看样子他的踱步连十平方米的地方都用不着，只要三步长的直线就够了。他只是从南到北地踱，从门口到窗口，然后转身，再从窗口到门口，然后再转身。脚步大小差不多，脚印和脚印大概可以重叠了。

丢了钱，公款。顾维舜又说。

顾远山这才在门口停下来，朝儿子媳妇看一眼，又哼一声。

数目不小呀！顾维舜又说。

顾远山又从门口踱到窗口，站住，儿子、媳妇赶紧跟着调整了自己的位置，在他的

东侧站定，等他说话，他还是不说话。

玉儿婶子来了，她怀了身孕，我去叫她来见你。玉儿妈说。顾维舜趁机把玉儿婶子说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玉儿婶子来了，没开口便哭起来。

顾远山朝玉儿婶突出的肚子看了一眼，没流露出任何表情，只是问：你们找我干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跟我有什么关系？

怕老三受苦。顾维舜说。

他自作自受！我早就说过了，他的命不好，运也不好，叫他躲，他不听我的。哼，解放了，解放了就可以父不父、子不子了？我原以为到我死了之后你们才会遭报应的，没想到我活着的时候报应就来了。顾远山又踱起步来，像对着墙壁说话。

玉儿婶子放声哭起来了，要跪下来求公公，只是肚子大，跪不下来，便叫喊：爸，帮帮他吧，我给你磕头了！

顾维舜见弟媳这样，便叫玉儿妈把弟媳领出去歇着，由他慢慢地求父亲。玉儿妈在门口恨恨地小声说：你还去跪吧！跪断了腿他也不会给你一分钱的！

顾维舜果然又回到父亲屋里跪下来，求父亲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给老三补漏洞，等以后由他还给父亲。

顾远山不等儿子把话说完就恼了：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出事了，丢钱了！想起有个老子了！哼哼！我知道你们讲的是真是假？你们弟兄是看着我手里有几个钱不舒坦吧？一定要把我挤干净了才甘心。

儿子们什么时候说过谎呢？顾维舜说。

什么时候？还要问我？从来就没人对我说过真话。维禹真的丢了钱包也不关我的事，你们弟兄们帮他回去。顾远山说，背靠着门，眼望着窗。

儿子们现在在难中，为父亲的不能见死不救。顾维舜自个儿站了起来，语气也不那么恭顺了。

你们在难中找我，我在难中找过谁？我留下的是保命钱，看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将来谁能养活我？现在吃你们一点饭，就看不到你们的好脸色，吃饭的时候，故意让孩子看着我，叫我难以下咽。我就是下咽，让你们知道，我不怕你们那一套！不养我老还要找我要钱，你们不觉得羞耻吗？

顾维舜听见父亲说出这样的话来，泪水顺着腮帮往下流。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对父亲产生了怨恨情绪。他不再恳求，一声不响地从父亲房里走出来，重重地碰上了父亲的房门。

玉儿婶子一个劲儿地哭。顾维舜找来了大女婿，让他先把婶子送回河口镇，自己去想办法。他对弟媳说，你叫老三放宽心，我和老大就是摔锅卖铁，倾家荡产，也要给他想办法。别说是骨肉亲情，就是街坊邻居有难，我也不能不帮呀！

玉儿婶子挂牵丈夫，便回去了。

二十

见到书元的时候，我差不多惊呆了。

我在家里实在找不到生活的门路，又不肯总是依靠父母，便做起了小商贩来。贩卖鱼虾蔬菜。宝塔集是产鱼的地方，各种鱼鲜都非常便宜，我便每天天不亮就到河沿，买一些鱼虾到不靠河的集镇上去卖，也能顾得上自己。那天我觉得脚底很有力气，天又好，不觉就走得远了一点，足足走了七十里，出了县了。我毫无顾忌地沿街叫卖：淮河的鲜鱼，淮河的鲜鱼！没人买鱼。我正想往回走，忽听得后面有人叫一声卖鱼的！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粗大的汉子站在我面前，穿一身破烂衣裳，一顶破草帽遮住了他大半个脸。买鱼？我问。他摇摇头，破草帽的边缘被他摇得挂下一缕，他把它揪断，丢在地上。吃不起鱼，他说。那喊我干啥？我挑着担子要回头走，他把我筐子的绳索抓住了：你是不是宝塔集人？叫翠儿？我停住脚，仔细地看着他，他脱下破草帽，我认出他来了：书元哥啊！我高兴得差一点把筐子里的鱼甩出去。

书元见我的鱼还剩下很多，便说，天也不早了，你这些鱼今天也卖不掉了，明天再卖吧。今晚就到我家住下。我家离这不远，十几里地。说罢，不等我回答，他就将自己手里的竹篮交给我，自己替我挑起了鱼。

一路上，书元对我说，那年他与二呆一起逃出了宝塔集，一路讨饭，到了这里。在街上，他们碰见了收破烂换针线的老头，很有趣，他头上还拖个小辫子，像根狗尾巴草，手里拿两根梆子，一路走，一路唱莲花落，若是有人将破烂卖给他，他就放下担子，在

人家门口扭一阵，唱一段。他唱的都是身边的事情，男女的事情，所以大家都爱听。都叫他张疯子。哥俩跟着他的担子走了好几个地方，混熟了，便将自己的身世告诉了他。他便收哥俩当了徒弟。于是，他们兄弟两个都学会了唱莲花落。我叫书元唱一段给我听听，他笑了：不能唱给你姑娘家听呢！我说，那你们在外面唱，就没有姑娘家听吗？他说，咋没有呢！不认识的人，管她呢！就那，我看见大姑娘的时候也挑着唱，要不，人家一听见“葶”的就跑了，有的还骂。

我跟书元到了他们的家——两间茅草屋。五〇年土改的时候，张疯子领他们哥俩在这里落了户。

我想象中的张疯子是一个衣着破烂，形容猥琐的小老头。一见面才知道自己想错了。他长得相当体面，身体硬朗，齿牙齐全，看上去颇有几分仙气。衣服确实破烂得很，只是打补得十分整齐，好像是故意用各种布拼成的百袖衣。他一见我，就“哎哟”一声，问：这是谁家的俊闺女？他的声音我不喜欢，有几分女人气。大概是与女人打交道太多养成的。书元说：是宝塔集上的翠儿。他调皮地在书元脸上看了好一会儿，把书元的脸都看红了，然后又看我，连声地夸：好俊，好俊！看，那是头，那是脸，那是鼻子那是眼，樱桃小口一点点。我的脸也被他唱红了。书元说：疯大爷，别唱了！这是我妹子。他这才停住唱，问：是顾家的？

不是，是李家的。顾家的三姊妹，大的嫁了，老二还在念高中，老三在上海念大学了。书元说。

张疯子说：怎么，老三比老二上学上得高？

我说，老二上学晚，是解放后才开始念书的。

张疯子噢噢几声，又唱起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顾家女儿能念书，两个小子不能容。大呆二呆生得贱，跟我老头收破烂。

真疯。书元说。

你说疯，俺就疯。真疯假疯难分清。

疯大爷哎，别唱了，人家不爱听。书元恳求张疯子。

不爱听也得听，疯子念的是真经。真经本自心里出，投师拜佛学不成。学不成，你别学，跟俺满街收破鞋。一双鞋底换包针，一双破袜换条线，收破烂，卖针线，一担破烂金不换。

我被张疯子唱笑了，问他高寿。八十八了，他说，吓得我伸舌头。不像，你看上去至多七十岁，我说。他笑了起来：废物，阎王爷都看我没用了。阎王想，这个疯老头能干啥？当判官呢，不够格；当小鬼吧，不灵活。多个死鬼多张嘴，留我在阳世受折磨。

老人只顾自己疯，书元无奈，只得自己去烧茶水给我喝。

怎么不见二呆啊？我问。

书元叹了一口气，说：没法说。二呆一次边唱边扭的时候，不小心摔断了一条腿，瘸了。蹲在家里种地使不上力，又流浪惯了，便一个人出去云天雾地里闯荡，说不定啥时候来家看看，现在不知又到哪里去了。

我在书元家住了一晚。他们爷俩连张床都没有，只用土坯围出一块地方，上面铺了点草，当床。一条破被硬得像石头。他们把铺和被都让给了我，自己在灶间又铺了一张铺，胡乱盖些衣服。我睡不着，书元陪我叙了大半夜，疯老头却是倒地就扯呼，呼声像炸雷。我说，疯大爷的心像是很宽的。书元说，是的。不论走到哪里，他都没有睡不着的时候，所以身体好。我说：看起来还是不识字好，一念书心事就多了。书元说：翠儿！这一回你可说错了，你当俺疯大爷不识字？前清的时候他差一点中了秀才呢！

呀！我吃惊，催着书元给我细讲。书元说，他也讲不细，只知道他与捻军有什么关系。我是学历史的，一听到疯老头与捻军有关系，更有兴趣，让书元尽量讲，老头平时向他透露了什么。没等书元想出什么来，疯老头自己开腔了：翠儿，咋喜欢打听这些古事呢？

哎呀，疯大爷，你没睡着？我问。

两只眼睡了，两只耳朵醒着呢！他说。

那你给我讲讲吧。

唉，长远了，都忘了。说罢，他又打起呼噜来。

书元小声说，他不肯讲呢！好像是光绪二十四年的事。那时候，涡阳县连年歉收，农民吃不上饭。可是知县为了升官请赏，不但不向上面报灾情，反而报连年丰收。他叫官吏带着绳子、木枷下乡逼钱要粮，谁个不给，就严刑拷打。老百姓被逼得没办法了，

就起来造反。领头的是捻军的余党刘疙瘩。结果败给官府。疯大爷当时也跟着刘疙瘩的队伍一起混了几天，后来害怕受害，便隐姓埋名逃了出来。疯大爷说，那时候清兵杀人如麻，尸横遍野，惨得很。还说，当时清朝官兵剖开十多个死尸的肚子，看见死人肚里都是杂草，没有一点粮食。你看可怜不可怜？官逼民反哪！

那他为啥至今还留个小辫子呢？我问。

他说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书元说。

这些年就没人管他的辫子？

他疯疯癫癫的，谁管他。

太有意思了！我兴奋得叫起来。

还有意思呢，打了一辈子光棍，没儿没女的。书元说。

谁说我没儿？你不是的？疯大爷又听见了我们的对话，女吗？也就要有了。翠儿，是吧？

是的，大爷，我正找不到地方劳动呢，到你们这里来吧！我说。

书元当我说笑话，我便把自己的状况向他实说了。他叹了一口气，说：想不到你也这么苦。真没地方去，就到俺这里来吧，我把你当亲妹妹。我说得回去给家里商议商议，还要问问你们队上收不收。书元说，这里的事好说，我跟俺队队长不错。

回宝塔集的时候，我真感到前所未有的轻快。

二十一

顾维舜和顾维尧弟兄像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借得的钱还不足三百元。集上有钱的人实在不多，再加上顾维舜现在的身分，到哪里借去？眼看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河口镇带来口信说，顾维禹的两间破屋已经被公安局抄查过了。顾家人真是走投无路啊！这天夜里，顾维舜对妻子说：我一辈子没动过不好的念头，可是现在真想当小偷，去偷老爷腰间的那个钱包。老爷……

顾维舜话没说完，忽听得西屋里老爷发出一声怪叫：钱，我有钱！把他吓了一大跳，也不敢再把话说下去，只有长吁短叹，怪自己无能了。玉儿妈说，实在没办法，只有一条路，借印子钱。知道大杆子家里吗？她男人虽说死了，她手里却留有几个钱，暗中在外头放着，一加一的利。要不她一个女人带个儿子，指望啥吃喝？顾维舜说：这要是给人知道了……玉儿妈用脚踢了他一下：你就这么胆小！谁能知道？人家放债这么多年，瞒上不瞒下。

维舜，维舜，快起来！维禹出事了！是老头子的声音，说话间，他已经到了堂屋门口了。

顾维舜连忙爬起来，开门问出了什么事。顾远山说，他刚才作了一个梦，梦见维禹浑身水淋淋地站在他面前，说：我让你咒死了。你舍得一个儿子，舍不得那几个钱。他连忙把钱包递给维禹，说我有钱，我有钱，可是维禹不要，扑通一声又跳到河里了。他起来卜了一卦，维禹凶多吉少。你快去看看吧！他对维舜说。

顾维舜吓得浑身发抖，接连打了几个喷嚏。玉儿妈赶紧拿了一件棉袄走出来，说刚才她也是一阵心跳，怕是真的出事了。顾维舜更害怕了，连忙点上灯笼去找大哥，要一起往河口镇去看看。

在一家人为他心惊肉跳的时候，顾维禹在关押他的小屋里已经踱完了一万步，熄灭了一百支烟头，下定决心了。小屋外不远处是一条小沟，深不足一人，但只要扑下去不动，还是能淹死的。这一点，他已经反复思量过。而且，走出门，往小沟里一扑，不会有人注意。看管他的人住在隔壁那间屋，知道他每天夜里到沟边解搜。

他在沟边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不该回去和妻子道一声别，或者隔着窗再听听妻子的呼吸，隔壁的眼睛便注意到他站立的时间太久，问：还没好吗？好了。他回答，回到了屋里。等到隔壁又响起鼾声的时候，他又悄悄地走出来，什么也不再想，便扑了下去

过几天就是千家万户团圆的节日：旧历八月十五了。顾维禹没有忘记。桌上的香烟盒上写满了“中秋”“团圆”的字样，一个挨着一个，一个叠着一个。

顾维尧和顾维舜正要上路的时候，河口镇报信的人就到了，是维禹的妻子托来的。顾家人一听维禹走了绝路，先是一愣，接着便一齐放声哭起来了。顾远山呵道：糊涂东西，还不快去！顾维尧和顾维舜马上提着灯笼先走了，嘱咐他们的妻子随后跟去。

维尧、维舜赶到河口镇的时候，对于顾维禹畏罪自杀的现场声讨会已经开始了。尸首在沟边躺着，盖上了一张芦席，维禹的妻子坐在尸首边饮泣，不敢放声大哭，怕扰乱

了声讨会。小镇上的人们似乎都没有经过这样的世面，一个个睁着眼、张着嘴，看着尸首，看着怀孕的寡妇，看着滔滔不绝地宣讲着什么的会议主持者，小声地议论。而维禹的妻子，终因见到亲人的到来而发出了震人心肺的嚎叫。但不一会儿，一切又复归于平静，唯有会议主持者的壮严的宣布在空气中传播着：对这样的畏罪自杀的分（这些年，人们开始习惯，把人叫作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右派分子，自然而然，人们明白，被称为分子的都不是好东西。知识分子的不受欢迎，是不是受这分子意义不明确的株连呢？未有人考证过），不准盛棺造坟，只能就地软埋。顾维禹的家属，听到了没有？维尧维舜哥儿俩一起连声唯唯。

等开会的人都走了，顾家两兄弟便去借锹，准备挖坑了。维禹的妻子在地上哭着打滚：不能就这样埋了呀！不能就这样埋了呀！哥儿俩见此情景，便顾不得顾家的礼教，一人一只胳膊把弟媳拉起来，一步一挨地把她送回家。然后再去借锹、挖坑，把湿淋淋的尸首推进坑里。

顾家人自然不敢挂白作丧事，只能关起门来饮泣。一家人能回来的也都回来了，美儿和她的女婿，上高中三年级的德儿舍儿，都聚在家里，玉几处，发了一封信去，报丧，也说明原委。顾远山破例地和一家人一起坐了一天，安慰玉儿婶子说：命该如此，哭也没用。好在你们已经有了孩子，等孩子生下来，你就好生守着吧！玉儿婶子摸着自己的肚子，想起丈夫的种种好处，哭得更厉害了。

当晚，顾家早早地关门闭户，顾维舜找出了三支卫生香，一张黄裱纸，写上维禹的生辰八字，烧了，让同辈人和小辈人叩了头，然后与维尧拎了一叠黄纸，到母亲的坟地里去偷偷地上了一次坟。

顾远山又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拿出自己珍藏的小折子，研墨执笔，在维禹的名下写下一行小字：二十八岁夭折。

从那以后，玉儿婶子就在玉儿家住下来。他们一家人对谁也不说顾维禹死前的详细情况，直到偷钱的小贼被抓住，证明了维禹一身清白的时候，才略微透露一点，说当时维禹被关押的时候，公安局的人用了各种办法要他承认，钱是他偷的，而且是因为二哥被划为右派而心怀不满，有意破坏。至于用了什么办法要他招供，却仍然不肯细说。

二十一

我下乡赶上了大跃进年代。

队长是一个年轻人，比我大不了几岁，可是在村里辈分很高，疯老头称他兄弟，我和书元就要称他叔了。他没有为难我，只是看见我的时候皱了皱眉头。原来你长得这样！这样能干啥？大炼钢铁？大修水利？要么去食堂吧？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眼睛只看书元。书元说，就去食堂吧！

乡下也要办食堂了吗？我问。我知道，自今年秋天某地办了一个食堂以后，全国都刮起了大办食堂的热风，宝塔集也正准备着呢！奶奶想不通，说女人女人，就要在家里烧锅做饭，不做饭，干啥？吃饱了等饿？扯老婆舌头翻瞎话？来动员的人说：旧脑筋了，老奶奶，现在妇女能顶半边天了，能干的事情很多，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消灭四害！奶奶还是咂嘴，说男人女人不归家，不是一家人却一个锅里挖勺子，早晚要出事的。也不知宝塔集的食堂到底办不办。

队长长着一对精明的小眼睛，看人的时候喜欢将目光往下射，而且总带着几分嘲讽的味道。他只用这种目光扫了我一下，我便脸红了，我觉得他在说：你是天上掉下来的？连这也不知道？但他没有这样说，而是又将目光射向书元，说：都得办。操他妈，啥事？急得不能行，限时刻。农民不种地，去砸锅炼铁；女人不做饭，去吃食堂。要那么多的钢干啥，没有粮食能吃钢吗？他说话的时候不停地吐口水，不知是由于唾液太多，还是感情的表露。

我说，钢铁是工业化的基础。没有钢铁什么也办不成。

熊！我看是瞎折腾。办，办食堂！队长说。

灶呢？家家的灶都要拆？书元问。

不拆能行吗？要来检查的。说灶土肥田，积肥和大办食堂可以互相促进。我们要留几家灶，其余都拆了吧。队长说。

我当上了烧饭师傅，开始在灶下烧火，后来站在篱口打饭。我打饭认碗不认人，不论是干部还是社员，一律公平对待，社员都说我不错。可是不到一个月，我就被从食堂调开了。上头来人视察，知道我是一个右派分子，说太危险了，要是她在饭菜里放毒怎么办？队长太缺乏阶级警惕性了。队长又在背后吐了一口唾沫，骂了一句“熊！”，但还是把我撤了下来。不撤不行，他说，他们还要来查的。要是这件事让他给抓住了辫子，其余的事都要被他们抓住了。多少事上我都把他们哄过去了，比方拆村并村，说是为了反对宗法制，一定要把张庄的人搬几家到李庄，李庄的人搬几家到赵庄。弄得乱七八糟，多少人坐在自己房基上哭，房子硬给扒了！我没干，我对他们说，我们队一共十几人家，已经有三户外来人了，我把书元算成两户，你来了，又是一户。他们知道个屁！

我又被派去放牛，和疯大爷在一起。疯大爷很照顾我，除了叫我帮他铡草，旁的活都不叫我干。所以我凑合着还能干下去。队上人一个个都忙得脚底板不沾地，我和疯大爷算是比较清闲的。有时候，还有说闲话的工夫。我发现，疯大爷肚子里装满了故事，特别是关于捻军的。他叫捻军的头目张乐行为“乐老头”，好像亲得没出五服。我问他书元可不可能是张乐行的后代，他说：扯他的淡！乐老头一家差不多都死绝了，惨哪！同治二年，乐老头率领一千多人马和清朝僧格林沁决战，败了，只领了二十多人跑到老捻子李小四家去避难，谁知道李小四这个孬种已经投降了，跑到朝廷去告密，第二天天不亮，乐老头他们就被抓了，不几天，就被杀了。乐老头被凌迟，凌迟，懂吗？

我点点头。他还要解释：

大卸八块呀！凌迟之前，还用一根铁钩子从乐老头屁眼儿里捅进去，把他的肠子一古脑儿勾出来……惨哪！造反？造反就落得这个下场。

我想起自己看见过的杀人景象，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乐老头只有一个儿子，死了。他的兄弟张敏行有五个儿子，也都死了，只有第三个儿子张琛留下了一条根——他的儿子张本立。这条根留下来也不容易呀。当时，张琛的老婆侯氏被关在亳州监狱，正怀着身孕，朝廷说，要是生个女孩，就只杀侯氏，放婴儿一条生路，要是生个男孩，就和他娘一起处死。亳州有个姓段的大户，和乐老头不错，便去买通看管侯氏的狱吏，对他说，要是侯氏生了男孩，你把他抱给我，我有重谢；要是你报了官，让张氏断了根，看我怎么治你。结果那狱吏帮了忙。听老辈人说，侯氏分娩那天，段大户到狱中去领那男孩，他把血糊流拉的小孩托在手里——他故意不洗，一路走，一路叫，看，女孩，女孩！一来那孩子太脏，没人愿意细看，二来段大户用大拇指按住了孩子的小鸟儿，就混过去了。等到官府害怕上当，想到再查的时候，小孩子已经送走，那段大户也自尽了。他怕官府报复呀！张本立在别人家里养活到十几岁，才知道自己的家世，回归张老家。后来他为自己屈死的先人下葬，多少顶棺材呀，可怜里面全是空的，尸首早烂了！惨呀！造反就落得这个下场！

这样说，书元不可能是张乐行的后代。我说。

那敢情。不过那时姓张的人多，大都跟乐老头造了反，以后七零八落，谁知道谁跑到哪里去了？疯大爷说。

疯大爷的故事，激起了我研究捻军的兴趣。但是现在，当然谈不上什么研究，我唯一的任务是劳动改造。

一天，我刚刚和疯大爷一起清除了牛栏，满腿的牛粪，浑身的草，两个小辫子也散了。找不到头绳，也找不到橡皮筋，我便拾起两根稻草把辫子扎上了。正想到沟边去洗洗手脸，有人在背后叫住了我。天呀，高凡来了！

我把脚往地皮里蹭，手朝身后边背。一个姑娘在这种情况下会见情人，谁能说出是什么滋味？眼泪在我眼圈里转，我拼命忍住，不让它掉下来。

为什么不和我打个招呼就来了？我问他。

打招呼怕你不见我。这些时候，你信里都写些什么呀？我还是那句话，你就是当了右派分子，还是我的好朋友。我毕业了，已经分配，我要求到云南边区去。我想跟你结婚，然后把你带到云南去。他说。

我不知所措。我还没有想到过结婚的可能。只有在夜深人静，睡在那松软的草铺上，听着外间两个男人的鼾声的时候，我才会想到这种事上来，但也只是一闪而过的想法罢了。队长说，可以给我另外盖间屋，我不肯，觉得住在书元家安全。队上有个讨不起老婆的人，常常往人家妇女家里钻，人家的丈夫在家的时候他也去。被人抓住了，便给他一顿打，打得可怜，叫他叫爹便叫爹，叫他装驴叫便装驴叫。可是脸上的青块未消，他的毛病又犯了。队长拉着他的耳朵，笑着骂他：×你奶奶，你还能学成个人样吗？他叫

队长叔，说：叔！你不能这样骂我，骂我妈吧！你不知道没女人的苦，问问书元就知道了。耳朵都快给揪下来了，他还嘻嘻地笑，好像那些拳头是给他抓痒的，那些唾沫是给他洗脸的。书元从来不让他进我们家门。书元像我的一尊保护神。有时，听到书元的鼾声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要是我没有高凡，会不会嫁给这个人？

我决定请几天假和高凡一起回宝塔集。就是结婚，也得从宝塔集打证明才能去登记。因为我户口没有迁到乡下来，我算下放劳动改造，也算集上支援农业大跃进下来的。队长不大情愿放我走，但看见高凡站在我身边，只好摆摆手：去吧，去吧！快去快回。缺劳力呢！马上又要大修水利了。所有的劳力都要去。×他妈，人又不是铁打的。

我到沟边洗洗手脸，就跟高凡走了。我多么想像在学校里那样，亲热地挽起他的手臂。可是不敢，我自惭形秽。他的穿着虽然朴素，但是整整洁洁，一副城市大学生的派头。我离他有两步远，让人家摸不透我俩的关系。他叫我靠近，我说不。他明白了我，便不再叫，默默地自己朝前走。

我忘记和书元、疯大伯告别了。

二十三

我的父母和祖父母一听说我要结婚，一个个喜出望外，好像我是多年卖不出去的货物，突然有了买主。一家人像接天神一样接待了高凡，可惜只能给他以好话和笑脸，拿不出一点好吃的东西。镇上办起了几个公共食堂，每天两顿，完全一样的饭食，又不够吃。晚上，大家都饿得肚子咕咕叫，说话也没劲儿。妈觉得应该给未过门的女婿弄点吃的，可是家里再也没有了米面，能弄出什么来？第二天，妈想出了办法，在街上买几个红芋，煮了一碗红芋汤给他。他连红芋带汤全吃了下去。妈问他好吃不好吃，他说好吃好吃。问他夜里还会不会饿，他说不会不会。谁知睡到二更天的时候，听到他和爸爸在他们睡的屋里造起反来。原来他吃坏了肚子，要泻。我要起来看看，妈说，你装不知道，一个姑娘家，我起来看看就行了。妈起来了。奶奶爷爷也起来了。

院子里没有厕所，要走很远很远的地方，瞎灯灭火的，深秋的夜很凉。妈拿了一只马桶给他，他说不习惯不习惯。爸爸说就蹲在院子里那个池子里吧！妈说不行，要是让人家知道了，要说我们破坏沼气化。奶奶说，怕啥？沼气沼气，家家院里挖个大坑，也没见一家出了沼气。填也不敢填，用也不能用，只能当粪坑，就往里拉屎！高凡已经憋得双脚跳了。我终于忍不住在屋里大叫起来：领他上厕所吧，别拉到裤子里了！一家人都笑起来。父亲拉着他往厕所跑去。

他成了病人了。妈说是饿坏的，要买只野兔子什么的补补。我说算了吧，越补越坏，反正他个子高，饿几天也矮不了。奶奶说，这过的是啥日子！跃进跃进，孙子女婿第一次上门饭也吃不饱！

我们和家人里商定，马上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只是我先不跟他到云南，等他到那里站住脚跟，熟悉了情况再说。

奶奶要陪我去街道开结婚登记介绍信，我不要她陪，自己和高凡一起去。街道的一帮人把我仔仔细细地打量了又打量，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我似的。其实，我一直叫她们婶子大娘的。她们不先问我，而是先问他：你是哪里的？他拿出了身份证明。知道了他是大学毕业生，婶子大娘立即显示出关切：你知道她的身份吗？他点头：知道。我们早就恋爱了。婶子大娘们怀疑地看了他一眼：早到什么时候？她已经给学校开除很久了，你们怎么联络呀？他容忍地笑笑：写信，写信呀！干部们互相望望：不见面也能恋爱？真是大学生，和俺这里的人不一样。我的脸红了，想起以往集上人对别的男女的议论。恋爱总与秽闻联系在一起，我和他的这种恋爱自然应该怀疑。连我自己都怀疑。我们同校不同系，他学的是哲学，又高我两级。偶然在校运动会上相识，接触的时间实在不多，我能够给予他的，也太少太少。然而他说，他喜欢这样的爱。

答应开介绍信。我松了一口气。可是看了那介绍信之后，我的心又凉了。证明是：兹证明我街道右派分子李翠与××大学高凡同志前往××公社进行结婚登记。我把介绍信递给他，他朝婶子大娘们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拍拍我的肩膀：走吧！

我家里人一看介绍信，都拉长了脸。这是为啥，非写明右派分子不可？公社看了这样的介绍信还会给登记吗？奶奶拄起拐棍，说：我去找他们；没有得罪过他们，为啥要这样使坏？右派分子咋的？右派分子就不该结婚了？他们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不知道男的女的要配对？妈说：有理跟他们讲吗？没看他们是啥货。两口子一个澡盆里洗澡，当人不知道？爷爷说：好了好了，你们的嘴就是臭水沟，什么脏话都能说出来，当着小孩

子的面。

脏话？你妈养你脏不脏？嫌脏，不把你妈嘴里蹦出来！奶奶说。

爸爸说：嘿，妈！还是商量商量咋办吧。不如到高凡家里去登记，人家那里开介绍信，只要证明高凡的身份就行了。是不是这样呢？

妈说：要么，叫她大姊夫去打个招呼？

爸爸说：她大姊夫管啥用？隔州隔府的，人家小高是山东人。再说，周纯一现在忙着抓钢铁，哪会管这种事。

奶奶说：算了！不登记就不能结婚了？我们祖祖辈辈结婚不登记，不是也生儿育女、白头偕老了？出什么故事？登记！

爷爷说：我也这么想。小高，就把翠儿带你家去吧，政府给登记呢，就登个记，不给登记她也是你家的人了。

只能这样了。来不及做任何准备。也没有什么力量准备。奶奶和妈妈翻箱倒柜，也找不到多少可以给我陪嫁的东西。奶奶找出了两串玛瑙珠子，说是我小时候戴过的，将来可以传给小的。妈找出了两块布料，给我赶制了一套裤褂。爸爸从店子借了一百元钱给我。自然不通知任何亲友，只抽空到小群家去了一下。小群说她马上也要结婚了。现在，她已经不觉得永继划右派是好事了，说工资减得多呀，只剩下十八元。小群还对我讲了玉儿的一点情况，说玉儿认为她的叔叔自杀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气得她婶子哭了一场。她妈说她书越念人越糊涂了。听说开春要跟她对象一起来家呢！你知道她有对象吗？不知道，我说。其实我知道，只是不想说，我觉得，玉儿对我已经十分陌生了。

高凡家也在农村，并不富裕。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在大跃进。还是先进文明的典型呢！

大跃进的民歌贴满墙。正对村口的路口，竖起了一块块映壁墙，墙上贴着一九五八年×年×月、日报的社论的摘录，用毛笔抄的，工工整整，好像刚刚贴上去不久。一问，果然，过几天上头有人来视察。这么多日月，我已不看报了，几乎不知道自己村子以外发生了什么事。读了这篇社论的摘录才明白：文化革命开始了！

“文化革命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文化翻身运动。在过去，剥削制度硬生生地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割裂开来。剥削阶级剥夺了劳动人民学文化的权利，反过来却鄙视劳动人民，把劳动人民说成‘愚昧无知’。他们故作玄虚，把文化知识神秘化，使人们误认为文化是高不可攀的东西。但是，即使在那种困难的条件下，劳动人民仍然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历代的发明家，大多数出身于知识不高的劳动人民。土。果劳动人民掌握了文化知识，理论和生产实践得到密切结合，那么科学技术和整个文化的发展无疑要迅速多少倍。在文化的堡垒面前，劳动人民的任何自卑心理和迷信观念都是没有根据的。打碎剥削阶级用来吓唬群众的一切泥塑木雕的偶像，是动员群众向文化革命的伟大目标进军的重要前提。”

高凡的父母见我们回来都很高兴，说过几天上面来视察，要家家户户都交五首民歌呢，到时候还要赛歌。他们两口和高凡的弟弟妹妹都是一字不识，哪里会写，正愁着呢！

我和高凡推来推去，都不肯写。我说我是学历史的，高凡说他是学哲学的。高凡的父亲说：学啥的不一样，识字就会写，反正不过是吹哩。唱啥：公社社员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人又不是老虎，吼啥咧。不过是个比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也是比方。我想一亩地打一万斤麦，行吗？还有什么不怕苦，不怕死，不怕冻，不怕饿，只怕红旗褪颜色。也都是吹。

我说，你刚才念的就很好，我给你记下来。

他说：这都是上头的干部教的，给我们作作样子的。我哪会写。

好吧，让我想想。我说。刚上门的媳妇不能不露一手，而且，高凡还隐瞒着我的政治身分呢，只说我也在上大学。我不能露馅。高凡妈说：忙啥，先歇歇。今天是你们的喜期，家里穷，日子又定得急，地里又忙，啥也不准备了，床上的被子和床单都是借的，半新不旧的，凑合着用吧！又特地交待我：乡下闹新房厉害着呢，你可要有耐心，不能

拿大学生的架子。不论人家咋闹，都不许恼。

我说，别闹了，不合适，因为我是……

高凡连忙拉拉我的袖子：你是啥，你是新娘子！要闹就闹吧，乡邻乡亲的，不怕。说完，他又偷偷捏捏我的手，我明白他的意思，便不再说话。但心里有点难受。

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入洞房的时候。新房里贴了几张红纸剪的窗花，点了一盏豆油灯。来了十来个年轻人，有的叫我嫂子，有的叫我婶，也有的叫我侄媳妇。开始，他们对我感到陌生，不敢大闹，只叫我给他们点烟，我刚擦着火柴送到他们跟前，他们就一口气把火吹灭。我再划，他们再吹，总吹灭了十几根。我一直笑嘻嘻的，他们说我好脾气，胆子大了，就不分轻重地开起玩笑来了。我不习惯，想变脸，高凡马上转舵，说我泄露一个秘密，李翠的嗓子非常好，叫她唱个歌好不好？我唱了一段《社会主义好》。

因为明天还要“跃进”，没有闹多久，人们就走散了。高凡的父母和弟弟妹妹也都退了回去，要我们早点吹灯睡觉。高凡果然马上就把灯吹灭了。忽听得门外一阵嗤嗤的笑声，有人大声说：高凡，这么急啊！新娘子看不见脱衣服啊！我正在脱鞋，吓得鞋扣也解不开了。高凡把我揽到怀里，小声说：别怕，这些人没坏心，吓唬吓唬咱们就走了，咱们别说话就是了……

我在高凡家做了三天新娘子，高凡要去报到，我也要回乡下劳动去了。

回到书元和疯大爷那里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变得更好看了。我说，这都是大跃进带来的好处。

二十四

红芋要扒了，黄豆要割了，棉花要摘了。

所有的庄稼都长得非常好，好得使我不得不自认是妖孽，就因为治服了我们这些右派妖孽，才风调雨顺的啊！

然而缺人。我们要办的事情太多，钢铁、粮食、水利化、沼气化、文化革命、民歌运动。谁也说不清为什么一下子要办这么多又这么大的事，只知道共产主义快要到了。

共产主义是天堂地，鼓足干劲朝前闯。男的个个是武二郎哟，女的个个是穆桂英哎！老人要作黄忠将哟，小伙子要学小罗成哟——喂——哟——喂——喂——噢——

这歌儿唱起来确实带劲。连我都一个人偷偷地哼哼，盼望着快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要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我这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自然也要进历史博物馆了。

可是到哪里去学分身法？队长看着满地待收的庄稼，骂人骂得更凶。×他娘！谁没淌过汗谁不心痛。这熟透的庄稼能丢在地里不管去上河工？明年吃啥？不行，连夜收！收！收多少是多少，只要保住明年不挨饿。

我们都豁出性命来了。粮食收了上来，真正是跃进，产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可是等到要交的公粮数一下来，大家的心都凉了。把全部的粮食交上去还不够。为啥？难道我们的产量在全国全省全县全公社全大队算最低的？

×你娘！报产量的时候，一个个都像上战场一样，都想抢头功。亩产一万斤！牛皮吹上天了！不吹还不行。不吹就是右倾，就叫你检讨，插你的白旗。我成了白旗，公社主任差不多要打我耳光了。报了一千斤，还算少？已经是瞎吹，我耳朵根子都发烧。×妈的小郝庄队长，最后一个报产量，抢了头名，亩产两千二百斤，厨也感不出来！还批判我，说我一贯目无领导。好吧，我看你拿啥交公粮！你交一千斤，我交一千斤，你交两千斤，我交两千斤，我不信你挖到了聚宝盆。明天到小郝庄参观，我倒要看是真是假。

从小郝庄参观回来，队长傻了。他到书元家里，和书元、疯大伯说了半天悄悄话。

×他妈哟！他们的粮食+穴子真大，哪来那么多的粮食呀？他们队的地和我们队的地紧挨着，地里的庄稼啥样，我看得一清二白，那样的庄稼能比我们强？

疯大爷摇头：怕是有假。

书元说：这还能作假？粮食就是粮食，还能装上土？

队长把大腿一拍：×他娘！明天我去试试。

疯大爷叫他别惹事。他挤挤眼：我有办法。

第二天，队长和书元到小郝庄去了，书元扛了一根很长很长的铁棍。队长找到小郝庄的队长，说：昨天参观，受到很大教育，今天特地来向你学习。郝队长脸上闪闪发光，批评我们的队长说，你们也太保守了。你没看报上登的，人家的稻长得多好，小孩子可以站在稻秆上要跟头。我们的队长说，是，看见了报上的照片。我们的稻种得不好，本来就不会种么。我们的稻秆子还是像草一样，软的，别说站上小孩子了，癞蛤蟆跳上去

也要摔下来的。书元说，我咋就不信呢？除非稻秧子下面埋了块石头，小孩子站在石头上。我们的队长说：你的脑子比我还保守。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把几亩地的稻秧拔到一块地里，再用铁丝捆在一起，站个小孩也许就掉不下去。郝队长说：你们不相信报纸上的宣传？我们的队长说：我的儿！毛主席都相信的事，我还敢不信吗？毛主席也是农村出身，种庄稼的事比俺懂，他讲行，准行。俺做不到，只能怪俺没能耐。

对了，小郝队的队长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么。

我们的队长说，可不是！我生来胆小。不敢吹牛，怕吹破了不好补。看见郝队长面露不快之色，他马上又说：

老郝，别误会！我们今天诚心诚意向你们学习。我回到队里跟社员夸你们粮食++穴子大，社员都不信，说除非++穴子底下垫上土。我跟他们争，他们还跟我打赌，说让书元代表他们来看看，真有那么多种粮食，他们情愿扎起脖子喝西北风，把粮食全部交公粮。我有啥法？谁讲过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谁讲过的？这你也不知道？上头来人讲的吗！他是这样讲的：你对那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那个问题的发言权。郝队长洋洋得意。

我们的队长用力地拍一下郝队长的肩膀：乖乖！你的记性真好，怪不得成了先进。走，到你们仓库里调查调查去！

你不是已经看过了？郝队长说。

书元说：我没看过。

郝队长被哄得团团转，便把我们的队长和书元带到了仓库里。

书元真被粮食++穴子吓了一大跳，忍不住哎哟地直叫。我们的队长说：书元，爬上去看看，回去对那些死脑瓜讲，你费了多大劲才爬上去的。书元搬了个梯子，就爬了上去，在++穴子顶上像小孩似的来回走动。

来，书元！插进去试试！我们的队长把铁棍递了上去。

郝队长急了：这是干什么？我们的队长笑笑：没事儿！

书元把铁棍用力插进粮食里去又用力拔出来，铁棍上带了土。他索性丢掉铁棍，把手伸进粮食里去，粮食只有尺把厚，下面全是土。

郝队长的脸黄了，抓住我们队长的胳膊：你，你这是干什么？他结巴了。

我们队长摆掉郝队长的手，叫书元下来。书元下来，拍拍手上的灰，又用衣襟擦掉棍上的土，跟着队长往外走。

不能走！郝队长拽住了书元。

我们回队上宣传。我们的队长说。

张，张，张队长，我们往日无仇，近日无冤。郝队长说。

哪里话！我们向你学习。我们的队长说。

你要把我往火坑里推？郝队长说。

放心吧老郝！我不是不顾人家死活的人。这件事，你我心里有数就是了。

郝队长要留书元和他的队长喝酒。我们的队长怎么也不肯，说大跃进的年头，不能耽误时间，拉起书元就回队了。

队长心里有了底，就指挥社员把应交的公粮交出去，其余的粮食分散藏起来。他告诉我们，对外面，大家要异口同声，说队里的粮食全上交了，谁要是走漏了风声，我就扣他的口粮！社员们当然没话说。

队长又来到书元家里，叫书元把两间破屋子翻盖翻盖，他说，多了一个翠儿，应该多间屋。疯大伯说没钱，队长说队上给补助。书元很高兴。队长找了两个人，开夜工为我们盖房，谁也不知道他打的是啥主意。等砌墙的时候，才明白了，他要砌夹墙藏粮食。他说，我活到这么大没做过昧心的事，这是头一回。要不这样干，饿死人谁负责？

我想起书元和疯大伯跟我讲过的满清时的故事，便问队长：为啥不向上反映？清朝末期，为啥有农民起义？就因为官员们不报灾情，谎报丰收，把农民的口粮都刮完了。

队长正色道：我对你说，翠儿！这种话可不是你这种人说得。当上了右派还不学乖吗？

我脸一红，躲到了别处去。

书元说队长：翠儿不过是随便提提过去的故事，没别的意思，怕啥？

队长说：怕啥？我不过是提个醒儿。什么右派左派的，×他妈，谁对老百姓好谁就是好人。翠儿，你别怪我。

我说，我知道你是好心，怪啥？

二十五

这一年寒假，玉儿从上海回了家。她写信给父母，先要到乡下去看看男朋友的家，所以要晚两天回来。她妈对人说：玉儿自己相亲去了！好像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玉儿的男朋友我认识，他们从初中开始就书来信往，闹得满城风雨了。那是一个漂亮的男孩，就坐在我和玉儿后面一排课桌上。一天到晚用一双眼盯着玉儿的后脑勺，玉儿时不时地装作脖子痒痒，把脸转到后面去，对他笑。我心里明白，她的脖子不痒，头皮才痒呢！因为不会料理生活，我们的头上都生了虱子。我常常不顾体面，哪里感到虱子的活动，就把手指伸向哪里，抓住了就在头皮上把它捺死，或者从头发里拿出来把它掐死。玉儿却忍着，忍到回宿舍的时候让我给她捉。

中学生不许恋爱，所以玉儿从来不跟我提起那个小男孩。但是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问我：听说他受了班主任的批评，为啥呀？我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了她。为啥？为着男生们下流，不学好，手淫。玉儿不懂啥叫手淫，我也不懂，但是我知道，有个淫字总不好。那为啥批评他一个人？玉儿又问。为啥？因为他说他想讨老婆，还说要讨你。玉儿哭起来，说要找他算账，但也只是说说罢了，她不但没跟他算过账，上课扭脖子的次数反而更多了。初中毕业的时候，玉儿收到他的一封信，兴奋得不得了，偷偷地告诉了我。到了高中，我们又是同一学校同一班级，玉儿开始变得鬼鬼祟祟。直到大学，他们的关系才公开起来，玉儿沉醉在爱河里。我觉得那个漂亮的男孩不可爱，玉儿说我可能是嫉妒。

玉儿从男友家里回到宝塔集的时候，已经快过年了。她要弟弟舍儿约我和小群到她家里去，想叙叙。我和小群约好了一起去。

你们问问玉儿，到老婆婆家吃了什么好东西？玉儿妈笑着对我们说。

吃了六天的胡萝卜！早上煮胡萝卜丁儿，叫稀饭，中午吃整条胡萝卜，叫干饭，晚上又是胡萝卜汤了。最后一天，他妈到小集子上买了一碗豆腐汤，我不好意思吃，给他爸吃了。玉儿的语气里充满了骄傲。

吃得惯吗？我问。

吃得惯！只是他们问我，这两年我们的庄稼长得不错，粮食都到哪里去了，我就说不清。我想，大概都支援国家，让我们这些大学生吃掉了。前一阵，我们吃饭不要粮票，大家放开肚皮吃，有的同学撑得衣服扣子都崩掉了。早知道这样，我们也不会那么吃了。玉儿说。

玉儿，这么下去会怎么样呢？小群问。

玉儿摇摇头：说不清。不说这些吧！翠儿，我给你带回了很多学习材料，怕你在乡下看不到。

玉儿把一叠小册子交给我，都是社论和经验总结什么的。我漫不经心地翻着，翻到了一篇“除四害”的社论，写得很有趣：

“男女老少齐动员，干部和群众干劲十足，信心百倍，向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大进军，并且决定提前在两年。或者三年、或者四年、或者五年、或者八年内实现‘四无’。”

“我国历史上人们虽然也不断地向自然界进行斗争，却从来没有一次主动地有组织地大规模地向毒害人民的害虫、害兽、害鸟发动进攻，总是处于被动的防御地位。即使在自称为‘文明之邦’的欧美资本主义各国，迄今也没有哪个国家能把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消灭掉。因为除四害是前无古人的壮举……”

我们的粮食大概都让麻雀和老鼠吃掉了。我说。

玉儿说，可能。除四害真有力。我们每天都站在房顶上敲瓷盆撵麻雀，蹲在田地里挖老鼠洞，还到处掏阴沟，消灭蚊蝇孳生地。

上大学就干这个？小群很奇怪地问。

不！我们干的事可多了！前不久，我们进行了教育革命大辩论，知识分子要又红又专，红透专深，必须参加体力劳动，所以我们要求一年四个月下乡劳动。教授们想不通，

我们和他们辩论，直辩到他们同意我们。玉儿说。

啊？我和小群都只有惊异和感叹的份儿。

没想到正在大跃进开始的时候，爸爸成了右派。玉儿说。她把这事向团支部汇报，大家为她感到惋惜，告诉她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个人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

我和小群点着头，你看我，我看你，各自想着自己的选择。

我向党交心，批判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可是叔叔又在这时自杀了！玉儿说。她正在农村参加深耕土地，正在唱着跃进的山歌举着撅头。农业大跃进哎！土地大翻身哎！深耕夺高产哪，粮食翻一番哪！用力拉哇！快深挖哇！中国人民干劲大哇！不怕苦哇，不怕累哇，赶上英国不费力哇！可是，唱着干着，她就走了神，会想到叔叔是就地埋在沟边的，不知埋得深不深……

啼……我和小群陪玉儿红了眼圈。

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太重了，玉儿说。她总忘不了叔叔的种种可爱之处。她上大学时带去的唯一的皮箱就是叔叔送的。叔叔常常跟她一起踢毽子，输了还赖账。他喜欢让侄女们刮他的鼻子，说自己的鼻子太大了，看能不能刮小点。他鼓励侄女好好读书，做社会主义的女秀才。

想不到他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玉儿说，流着泪。

我们也流了泪。

我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太严重了。玉儿擦着眼泪说。团支部又帮助了她，要她相信，人民政府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即使钱不是他偷的，他的自杀也是错误的，是不相信党和政府的表现。

我和小群只是点头或摇头。玉儿妈却插嘴：嚼他娘的舌头。

我们坐在院子里叙话，正对着顾远山老头紧闭着的房门。在我们谈话期间，看见老头儿把门打开了三次，探头看看我们，又把门关上。现在，他又探头往外看，他一手推着门，一手插在棉袍的衣袂里，目光冷冷的，嘴唇动了动，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门又关上了。玉儿小声地对我们说，她越来越讨厌爷爷了，她舍不得多吃饭，说自己的胃口小，吃不下，爷爷却说她在上海油水吃多了，要清清肠子。

二十六

小群和永继在这一年春节结婚。

大跃进的年月，当然不摆喜酒了，而且又拿什么摆？小群和永继商量，叫几个至亲好友，吃一顿圆子就算了。

圆子本应是糯米粉做的，可是现在只能是秫秫面掺红芋叶子捏的了，而且一个人只有一碗。玉儿端起碗看看小群和永继，眼泪汪汪的。永继妈问：在上海蹲惯了，吃不下这东西吧？玉儿摇摇头，索性让眼泪滴到碗里。永继妈说：玉儿，你是为俺们难过吧？别难过，大家都这样，团团圆圆就好了。

永继奶奶的眼已经瞎了，身子倒还硬实。她不肯和我们坐在一起吃饭，说灶门口暖和。听到媳妇说团圆二字，她也插进来说：团圆？真团圆就好了。他爷爷和二叔都不在家，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永继是他爷爷的命根子，要是他在家，说啥也不会让孙子的喜事就这样办了，连闹新房的人都没有，几个毛人儿对一盏油灯闲磕牙，哪有一星儿喜庆的味儿？

永继把饭碗往桌上一顿：还提他们！不是他们我也不会当右派。

永继奶奶说：是你自己要当的，你是为了娶小群。

永继妈妈反驳婆婆：谁想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永继当右派也是没办法。

小群央求道：别说了，奶奶，妈，高高兴兴不好吗？

大家一起静了下来，谁也不说话，只听见筷子碰碗的声音，喝汤的声音。一个个人影子在墙上一晃一晃的。永继妈往灯里兑了点煤油，灯亮了一些，影子也黑了一些。

忽然，听见门外有人叫一声大嫂。我们一起放下筷子，说，讨饭的怎么在晚上来？永继奶奶说：开门，不是讨饭的，是他二叔回来了！永继说：别见鬼了！可是门外又叫了一声大嫂。永继妈说：像他，便把门打开了。

进来一个头发胡子很长的、衣衫褴褛的男人。还没让我们看清脸，就在永继奶奶面前跪下了。

果然是蓝虎。算起来他不过三十出头的年纪，可是看上去却像五十岁的人了。

永继妈把蓝虎拉起来，问他为什么回来了，又这么巧赶上永继的婚事。他说他已刑

满释放，留在青海了，给人补鞋，回来探亲，也来接他妈和老婆孩子。说那里人少，好混事儿。

你老子呢？永继奶奶问。

病死了。蓝虎说。

永继奶奶哭起来：老砍头的！小砍头的！我早说过你们一个个不得好死！吃喝嫖赌，一个胜似一个。死了好，死了干净。你咋不死？你个杀千刀的！你也死了才解我的恨，一家人都叫你们闹散了。要不是还有个永继，蓝家就绝后了。接我？我不去！我不是你娘，也不是你老子的老婆，找你自己的老婆孩子去吧！

蓝虎问嫂子：永继婶子娘儿俩还住后院？

永继妈说：你没见她？她走了几年了。她说要先去看你的。

蓝虎吃惊地看着嫂子，又轮流地把我们看了一遍，眼珠子死鱼似地瞪着，灰蒙蒙的，叫人害怕。看完我们，他把脸一捂，呜呜地哭起来了。

永继奶奶又骂：小砍头的！早知道老婆孩子金贵就好了！

永继说：奶奶！够了！够了！你老人家歇歇吧！二叔才到家，你想骂死他吗？刚才还念叨他，现在怎么这个样子？

瞎奶奶听了孙子的话，又大哭起来，抱住蓝虎一声心肝一声乖乖地叫。

喜事闹得像丧事似的。我和玉儿告辞了。

蓝虎回来的事，第二天就在集上传开了。但是除了我和玉儿，谁也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他当天夜里就走了，找老婆孩子去了。有人说，他是买了一只猴子到南乡去的，一边耍猴戏，一边找老婆孩子；又有人说，他买的是长虫，耍长虫危险，容易招人看，他可以在看热闹的人当中发现自己要找的人。试想，他老婆看见一条长虫缠在他脖子上，还有不心疼的？非哭着和他相认不可。只是，她现在的男人孩子又怎么办呢？

没有确实的消息。反正从那以后许多许多年，蓝虎就没有回来过。他的瞎眼妈妈天天拄着拐棍摸到河沿，等着儿子回来，有时还叫魂似的叫几声虎儿虎儿，也没有结果。

不久，集上出了更重要的事，人们也就把蓝虎忘了。

二十七

干部要下放劳动，“投入体力劳动——共产主义的大熔炉”。宝塔集上有几个可以算得上干部的人？又有几个不参加体力劳动的？可是全国一盘棋，总不能让共产主义的熔炉空着，于是轮上了受干部领导的平民百姓。

顾远山一家在这个小镇上离开体力劳动最远，自然跑不掉。顾维舜是镇子上头号右派，要留在集上接受监督改造；顾维尧夫妻则必须下放了。顾维尧也无话说。还算好，把他们下放到离宝塔集二十里路的二十里铺去，合作商店在那里开设一个“下伸店”，顾维尧便是“下伸店”的唯一店员。

蓝永继一家自然也是在劫难逃，他们是连根拔了。瞎奶奶又哭又闹，用拐棍在地上乱捣，说死也死在宝塔集，可是她离死还有一段路，死之前，她还是应该到熔炉里去。永继被她闹得没办法，要把她送到青海找蓝虎去。瞎奶奶害怕了，蓝虎的尸骨还不知抛在哪里了呢，青海肯定比熔炉更难熬，也便不再闹。

那一次宝塔集究竟往熔炉里投进了多少最宝贵的——人，没有个确切的统计。最近，各地都在编写地方志，宝塔集也编写了一本，我想去查查数字，没有。

我家没有一个下放的（我当然例外），这全靠我的姊夫周纯一。他大办钢铁有功，要升到地区去抓工业了。女婿掌管着那么多熔炉，还能把丈人、丈母往熔炉里推？

顾维尧一家搬家的时候，顾家的亲友们又聚会了一次，姨奶奶也来了，还出人意料地带来了二呆。想不到二呆现在变得如此丑陋，不但腿瘸了，脸也显出一副呆相，见了人就嘻嘻地笑，说起话来流里流气，见了女人更像猫儿闻到了腥味。

玉儿妈说，怪不得现在人倒霉，妖魔鬼怪一个个都从地缝里钻出来了。前些天神魔鬼地来了个蓝虎，这时候又冒出个二呆来！

这些年二呆在哪里转游，像蓝虎眼下的行踪一样，是一个谜。据他自己说，他在南乡安了家，女人如花似玉，不幸生孩子的时候死了。现在又有多少人给他提亲，多少个大闺女小媳妇盯着他，可是他死活不肯了，一来呢，想他妈，虽说不是亲的，待他总不薄；二来呢，那里的女人虽然俊，还是不如家乡的女人好。

玉儿妈说啥也不相信，只吐唾沫：现在真是时兴吹牛了，癞蛤蟆也不怕吹破了肚皮！天下的男人就是死净了，也没有女人会看上你二呆。

二呆用手抹抹脸，还把手凑在鼻子上闻闻，说二嫂子的唾沫是臭的。

玉儿妈似真似假，一个巴掌扇过去，二呆痛得嗷嗷叫。玉儿妈还要打，被姨奶奶挡住了。姨奶奶说：他小，不知道轻重，你就让他。这回带他来，是为了送他大哥大嫂，顾家三兄弟搬出去两家了，宝塔集上只剩下一门姓顾的。可怜俺们也只有你们这门亲。大嫂二嫂三嫂，你们也给二呆操个心，看看有合适的，就给他提一门亲，他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也是往三十岁上数的人了。

玉儿妈说：等街上的大闺女的眼都瞎了再说吧！

二呆说：二嫂子，你看我跟三嫂子合适不合适？

玉儿妈恼了，骂了起来：到底是你娘的野种，不懂得个道理！三嫂子是你欺负得的人吗？寡妇孤儿的，够可怜的了！不是看在姨奶奶的面上，我马上叫你给我滚！

二呆吓得不敢还嘴，悻悻地跑到一边去了。

玉儿妈又说姨奶奶：你也是几辈子没见过儿子！他在外面跑了这么多年，你知道他干了啥？不是混不下去了，他会记得你这个妈？你倒收留了他。这日子一天难似一天，你能养活他？

姨奶奶擦了擦眼角：没爹没娘的孩子，我不疼他谁疼他？再说我也没儿没女，老了又靠谁？

玉儿妈叹口气：这样的孬孩子，哪能靠得住。话又说回来，没儿没女也苦，像老大两口子，出了宝塔集，也没个亲人了。二呆没说书元在哪里？

姨奶奶摇摇头：他说不知道。他说他当年不是和书元一起跑的，他是出去玩的时候迷了路。

玉儿妈又吐唾沫：净说鬼话！

我始终信守对书元所下的保证，不把他的下落告诉顾家。

二十八

“我国的粮食产量，在一九五二年还只有三千零八十八亿斤，到一九五七年增加为三千七百亿斤，到一九五八年更跃进为七千五百亿斤。”

“我们国家物质生产上如此巨大的发展，成为西方资产阶级人士永远解不开的‘中国之谜’”。

一九五八年一家报纸的一篇社论如是说。

二十九

一九五九年的春天像往年的春天一样降临了。淮北人从来不曾为美丽的春色陶醉过，因为在他们的生活里，“春”和“荒”总是联系在一起。春天里青黄不接，闹粮荒，人们或多或少都要经受一点饥饿的考验。而五九年的春天所带来的，就不只是一点点饥荒了，整个淮北大地都生长着、蔓延着饥饿。饥饿长得比庄稼快，比草根快，比树皮快，比观音土快，比一切可以填塞肚子的东西都要快，快得多得多。

五八年的庄稼长得不坏，但是多半没有收到手。劳动力都被调去炼钢铁、修水利去了，不去不行，要拉，要批判，甚至还要打。有几个像我们队长那样精明的人呢？棍棒叫人害怕，乌纱帽令人垂涎。只能让大好的庄稼抛洒在地里，烂在土里。

上级提出了一个应变的办法，指示百姓们：一天两顿，平时吃稀，忙时吃干，瓜菜代。这指示比起同时在报纸上发表的“辉煌成就”和要求人民为更辉煌的成就而继续“苦战”和“紧张”的宏文，自然要实在得多了。但是，一天两顿，稀的干的，也要有米下锅，瓜和菜又到哪里去弄呢？人们想起了去年烂在地里的粮食和红芋，便去捡，去刨，发了霉的，生了芽的，都拿来填肚子，能填饱就好。但是，有少数肚子不饿的人说，这种行为是往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上面抹黑。不许去捡生了芽的粮食，不许去刨发了霉的红芋。

但是人们已经到了不能害怕被抓被打的地步，继续偷偷地去寻求食物，在三面红旗上抹黑，用自己低级的肚子遮挡着吹牛术的光辉。

城镇居民是有定量粮食供应的，应该不至于挨饿。然而像宝塔集这样的小镇，和农民差不了多少。从农村搜刮来的粮食要一级一级往上交，交到某些人能够报功请赏的地方，交到吹牛家们能够向全世界宣扬自己英明伟大的地方，可怜的宝塔集人的粮食定量

算什么必须保证的金科玉律？理所当然地，成人的定量由每月二十五斤减少到十斤，又由打好的大米和面粉变成掺着砂石的稻谷。再体面的人也无法禁止自己肚子的咕噜，再娇嫩的妇女也必须撕破脸皮到地里去捡烂红芋。

玉儿妈、玉儿婶子总是约我妈一起去。三个人除三儿婶子是解放脚外，都是三寸金莲，走起路来一扭一歪。一扭一歪也得走，而且不是走一里二里，也不是三里五里，而是十里八里，或者十五里，或者二十里，或者……总之，权威大报社论的修辞手段在这里成为三寸金莲的实践活动了。

第一次下地的时候，我妈他们想，我们这几个半老妇女，干部们总该照顾一点，挖一点红芋藤、红芋根的，也不犯什么法，所以大模大样，把挖到的东西放进竹筐里。可是正当她们想回家的时候，来了几个男人，夺了她们的筐，把他们筐里的东西重新倒到地里，赶她们快滚回家去。玉儿妈想跟他们说说理，竹筐也被踩扁了。玉儿妈坐在地里呜呜地哭，无论是新社会还是旧社会，也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头，都没有人这样对待过她。我妈害怕，劝玉儿妈快走，说不定那些人又要回来了。玉儿妈不肯。家里老小等着吃啊！公公顾远山是饿不得的；舍儿才十来岁，正是要吃饭长身体的时候；还有老三家的柱儿，还是个断不了奶的孩子，而现在，别说奶了，连稀饭也喝不饱啊！我家里虽然没有小孩，可是奶奶爷爷也是七十多岁的人，经不住饿了。所以，我妈也觉得空手回去不行。于是三个人坐在地里等，等到天黑，估计着没有人来看了，又把被倒掉的东西一点一点摸回筐里。

回到家里已经是半夜了，顾维舜担心她们出事，一直不敢睡。玉儿妈一肚子气都往丈夫身上喷：你坐在家多舒服啊！从明天起，你就不要上班了，去拾红芋！那个店还开着干什么？乡下人都要饿死了，谁还来赶集？顾维舜说：没人赶集店也得开着，要继续跃进啊！玉儿妈说：谁要开店叫谁去开，你跟我下地！顾维舜摇头：都不去商店我也得去，我是右派。

你妈！过的啥日子！跃进跃进，再跃进人也要死光了。玉儿妈骂起人来了。

顾维舜赶快把门关上，说：不能乱讲。现在真的饿死人了。昨天蓝永继上集，说他庄上的人饿死了好几口，他的瞎奶奶只剩下一口气。他想找集上的亲戚借碗米救他奶奶的命呢，上哪借去？现在，除了干部和炊事员，没有一个不挨饿的。人说：一两二两，饿不死小队长；一钱二钱，饿不死炊事员。炊事员给人打饭看人脸，是干部或是自己人，就把勺子往锅底下捞稠的，是一般社员，便只撇上面的稀汤给他们喝……

这事，上头咋不管？玉儿妈说。

顾维舜又是摇头：谁知道。毛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他老人家迟早是要管的吧？

玉儿妈努努嘴：饿得肚子咕咕叫，还要唱高调，你那胆子大概还不如芝麻粒儿大。

顾维舜叹气，说快煮一点红芋给我吃吧！今天一天没吃过东西呢！

玉儿妈马上去点火，只要有吃的，哪管它是半夜还是三更！

接受了第一次的经验教训，我妈她们以后下地再也不带筐了。她们把自己的衣服上缝满了暗口袋，反正也挖不着什么红芋了，都是须须梗梗的，装在暗口袋里也不显眼。再带上一个小瓷盆，当锅，挖多了不好带时，就在地里埋盆作灶，煮熟了填填自己的肚子。就这样，三寸金莲不停地奔波，风里来，雨里去，十里、二十里、三十里，越走越远……

可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给三面红旗抹黑的人们的诡计很快就被三面红旗的保卫者们识破了。派人拦在河沿搜查，或者干脆，在船走到河当中的时候搜查，每到这样的時候，玉儿妈她们就吓得浑身发抖，有的老太婆不怕，当众脱下褂子，还问要不要把裤子也脱下来。红芋藏在你娘的裤裆里，你们来查吧！顾维舜听到这样查法，非常害怕，对玉儿妈说：算了，不要过河去挖了。她婶子年轻，真出了什么事，对不起死去的老三。饿死事小。玉儿妈把眼一瞪：那你就先饿死吧！

“食不厌精”的顾远山也不能不用红芋叶子、红芋藤充饥了。系在腰间的那点钱，在今天实在值不了什么。红芋叶子也要一两元钱一斤，多少钱才够填饱一张肚皮的？他每天都要把钱袋倒出来数一遍，自然是越数越少，到后来，连数也不用数，看一眼就泄气了。几天前，他实在饿得受不住，就把口袋里的钱全部倒出来，叫儿子给他买点肉去，猪肉、牛肉、羊肉、兔肉，都行。

可是儿子手里托回来一块狗肉。

我知道你不吃狗肉，可是这年头有啥吃啥，不饿死就好。儿子抱歉地说。

不会是死狗肉吧？顾远山有气无力地问。现在，他再也不是洁净、漂亮的老头了。

为了节省能量消耗，他减少了洗脸、洗澡的次数，只是头发和指甲仍不断地修剪，而这也是为了减少消耗，头发和指甲也需要营养。

现在的事，都难说。只要能吃的，死狗肉也金贵。儿子说。

顾远山埋怨地看了儿子一眼，他怎么这么不懂事，不要说明是狗肉，更不说明是死狗肉，烧熟了给老子吃了多好！偏偏要如实报告！

会不会是疯狗呢？顾远山又问。他感到恶心。

谁知道。现在的狗什么东西都吃，眼都吃红了，也有吃疯的。儿子说。

顾远山气恼地闭上眼睛，不理睬儿子了。

烧了给你吃了吧？这年头不能讲究……儿子小心地问。

顾远山还是紧闭着眼睛。

舍儿眼巴巴地盯着爸爸的手和爷爷的嘴。他希望爷爷说：我不吃，给台儿和柱儿吃吧！

舍儿瘦得只剩下一张皮和一对大眼了。本来，他应该是这个家庭的重点保护对象，可是现在上有爷爷，下有柱儿，他只能排在第三号。前一阵，爷爷一天吃一个白馒头，偶然掰一口给柱儿，就是没有他的份，只给他红芋吃。这些天，连红芋也不让他吃饱了，眼睁睁地看着妈把一个红芋塞到柱儿手里，他只能咽口水。他不怨柱儿，因为柱儿小，又没有爸爸。现在，妈给他吃糠啦。他不知利害，只管往肚里填，吃得大便解不下来，痛得他嗷嗷叫，妈手指一点一点把他的大便往外挖，他哭，妈也哭。能吃一口肉多好哇，管它是狗肉还是猫肉，管它是死的、活的，还是疯的！

顾远山闭了半天的眼睛终于又睁开了，吩咐儿子：去给我烧好！

舍儿咬了一下手指头，走开了。他吃过一回狗肉，至今还记得它的香味，现在，他不能再闻这香味，怕馋得受不住遭妈妈的责骂。

烧好的狗肉散发出诱人的香味，也完全看不出狗肉的样子了，顾远山不再恶心，用手捏了一小块给媳妇，叫她给舍儿，便狼吞虎咽起来。媳妇说，少吃一点吧，放着明天吃，怕不消化呢！他全不理睬，一个劲儿地吃，把一碗狗肉全部吃了下去。

没想到刚放下碗筷，顾远山便觉得胃里不舒服起来。一定是死狗肉，一定是疯狗肉，一定是吃过死人的狗……各种各样奇怪的念头和想象也一齐翻腾起来，他便呕吐了。接着又泻。只一夜工夫，顾远山就卧床不起，人也脱了形。

玉儿的姨奶奶偏偏在这个时候来了，拄了一根棍，脸和腿都肿着，像水里泡过的一样。姨奶奶坐下来不说别的话，只说她村上谁谁饿死了。谁谁谁一家五口饿死了四口，抬尸首的人都没有了

顾维舜听一句叹一声，玉儿妈和玉儿婶牙巴骨打战，紧紧地搂住自己的孩子，叫姨奶奶别说了，吓死人了！

姨奶奶说：我也活不了几天了，饿死就饿死，我不像你们的老爷，快要死的人了，还和孩子们争嘴，吃一点吐一点，还往肚里塞

玉儿妈说：别说他了，他现在也可怜。

姨奶奶说：外甥，外甥媳妇，现在最要紧的是保小的。你们要保住舍儿和柱儿，我要保住二呆。可怜我的二呆，饿得忍不住去偷食堂的东西，给打得可怜，我真怕他活不了了。

哎呀，姨奶奶，你别说了。玉儿妈说，她觉得舍儿在怀里发抖了。

不说了，外甥媳妇。集上总比乡下好点，救救二呆吧！姨奶奶哀求道。

玉儿妈不说话，领着姨奶奶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让姨奶奶看空着的米瓮和面缸，又把姨奶奶带到厨房，让她看锅底的黑乎乎的野菜。姨奶奶不再说什么，拄起拐棍又走了。

不几天，有人带信来，说姨奶奶死了。为了在食堂多领一个人的饭，二呆没有掩埋养母的尸体，而是用一条被单盖着，说她病了，直到尸首发臭，再也不能不扔出去的时候。

顾远山一家也只叹了一阵子气，谁也没有哭。流泪也要费力气；现在需要节省每一分力气。顾远山说，应该给维尧送个信，是亲姨死了，不能不报丧，顾维舜也只好漫应着。

三十

与周围的村庄相比，我们村真算天堂了。我们不但藏了粮食，还藏了锅灶。大办食

堂的时候，别的地方，家家的铁锅都砸碎了去炼铁，灶扒了去积肥，唯独我们队，留下了几口锅灶，安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食堂里吃不上饱饭，我们就在晚上分成几处偷偷地开小伙。

小郝庄的人就苦了。别说没锅灶，就是有，也没有粮食下锅。那个郝队长真够厉害的，去年冬天为了交“跃进粮”，把村里人都快逼死了。本来粮食就没有收上来，再拼命往多里报，他拿什么往上交？公社开会的时候，主任对他发脾气，扇了他两巴掌，他回到队上，就把巴掌赏给社员。巴掌不起作用了，他更想出绝招，大冬天让社员脱了棉袄，站在冷风里吹着，冻你个半死不活。这一招有点效，有人把藏在老鼠洞里的粮食都交出来了，可是还是不够上头要的数。然而再也榨不出油子了，小郝庄的人只有躺在床上捱饿、等死。

疯大爷天天叹气，可怜小郝庄的人，又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晚上，我们偷着吃饭的时候，疯大爷就不断地提小郝庄，说小郝庄坏就坏在人心不齐。原来都是姓郝的，硬给加了几家外姓人，不像俺们庄，都姓张，没出五服，能抱成一个团，不把庄上的事往外说。我们也都认为疯大爷说得有理。一天，我们说到气闷的时候，疯大爷拍起手，轻轻地唱起来，自然还是唱莲花落，是捻军时留下的歌：

咸丰年，大歉年，
涡河两岸草吃完，
地丁钱粮逼着要，
等死不如来造反。
正月里来正月正，
日子过得叮嚙叮，
穷人跟着老乐干，
专打楼主和亲兵。

队长说：老疯子，吃饱了撑的吧？那就放几个屁，千万别唱这样的歌。疯大爷说：你就当我是放屁吧！队长说，×他娘，吃自己的粮食像做贼一样，这要是在旧社会，老百姓真要起来造反了。疯大爷说，反？反不得！当年乐老头起来造反，落得个什么下场，你们不知道，满门抄斩，惨哪！你们该知道知道。说罢又唱：

看着义门好心伤，
想起老乐泪汪汪，
看看地在人不在，
太阳从此失了光。
看着义门好心伤，
想起老乐泪汪汪，
看看地在人不在，
清清的涡河变浑汤。
看着义门好心伤，
想起老乐泪汪汪，
看看地在人不在，
遍地草木变枯荒。
看着义门好心伤，
想起老乐泪汪汪，
看看地在人不在，
老乐何日能还阳？

书元说，咱张家的后代咋没找满清的皇帝报仇呢？后来不是把清朝推翻了吗？

疯大爷说，孩子，你这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自古以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乐老头兵败如山倒，死的死来逃的逃，命都保不住了，还能报仇？乐老头的族侄小阎王张宗禹跑到河北省更名改姓，教了一辈子私塾，老病而死。二十多年里，他不敢吐露一点真情，一次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呀！至于说到民国，听老辈人说，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曾经叫安徽的总督柏文蔚征召乐老头的后代去效忠，可是张家不敢，也就没去。

谁打的江山谁坐，你不去，也就没你的份儿。

书无泄气地说：要是那阵子跟孙中山去干了，现在不是当了大官了？唉，俺们张家人真混！

队长说：你懂得个屁！要是跟上孙中山，后来不就成了国民党反动派了？还是要打倒。应该跟着共产党干。真的，疯老头，你当年咋不参加共产党呢？

疯大爷摇摇头：没碰上呀！倒是听说乐老头的后代有要去干共的，也被家里人拦住了，又错过了一次好机会。谁打的江山谁坐，从古至今都是这样的。

书元更泄气：唉，张家人真倒霉，夺不到江山的时候去造反，能夺到江山的时候又不造反了。

疯大爷说：命！啥都有个定数。该你坐天下的时候，你造反就成王，不该你坐天下的时候，你造反就杀头。还是老老实实当顺民好。

我说，我在学校里学历史，书上说，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失败的农民起义对历史进步也是有功的。没有无数次农民起义，我们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队长说：书上讲的！×他妈！书上讲的都是骗人的。幸福生活，你幸福吗？

我不敢回答，队长也不打算让我回答。他对书元说：赶紧把灶里火灭了，把锅藏起来，灶盖起来，说不定啥时候有人会冒出来，看见俺们的锅灶，又该往上报了，说农民家里还有粮呀！非把俺们逼死不可。

疯大爷说：要约法三章，不许走漏了风声，要不就害了大家。

队长说，真的，不可大意，我去看看，各处的灶火是不是都灭了，锅是不是都藏起来了。

队长一走，我们就吹灯睡了。虽说队上藏着粮食，谁知道哪一天会被抄走？我们一点也不敢消耗精力。

我们刚刚睡下，队长又来了，叫我们起来把已经藏好的粮食再分散藏起来，万一一处被查到了，还可以保住几处。

书元说：你也太小心了。一人放东西，十人难找，他们哪能找到？

队长说，你是傻熊，不知道现在那些孬种有多精，藏在屁眼儿里的粮食都能给你抠出来。有一个人，把粮食埋在自留地里，上面铺了很厚的土，土上又栽上了菜，还是给查出来了。粮食抄走不算，人还受了罪。要不是跪下来求饶，人也给带走了。

我们不敢怠慢，马上起来，听队长吩咐。

队长说，李翠，你留在这里。今天夜里的事只能让男人们知道，妇女小孩都好好地睡觉，省得帮不上忙反而坏了事。我便又乖乖地躺下，可是哪里睡得着，眼睁睁地等着书元和疯大爷回来。

差不多鸡叫三遍的时候，书元和疯大爷才回来。我问他们粮食都藏到哪里了，书元说，不许问，男人都发过誓了，谁也不许说。不过队长的话倒要跟你传达传达。

队长说了啥？我问。

唉。寒心！书元说，队长说，万一他因为藏粮被抓走了，求俺们大家替他做两件事。

哪两件？我问。

一件，是常给他送点吃的，别让他饿死在牢里。他说年纪轻轻的，我才不想饿死呢！又一件，照顾好他的爹妈和老婆孩子。书元说着在床上躺了下来，头枕着手，两眼怔怔地望着屋顶。

大家都答应了？我问。

废话！会不答应？良心给狗掏吃了？书元没好气地回答我。

疯大爷又小声地唱起来：

咸丰年，大歉年，
涡河两岸草吃完，
地丁钱粮逼着要，
等死不如来造……

最后那个字，轻得连他自己都没听清。

又唱！我也来了脾气，责备起老人家来了。他叹了口气，说：不唱了，不唱了，也躺了下来。我拉起被子蒙住头，躺在被窝里呜呜地哭了起来。书元和疯大爷听见我的哭声也不理我。我哭得更伤心了。

广播里说，国内外的反动派看到我们大跃进的成果，心里不舒服，便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大作文章，这种人在党内有代表，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国外，则自然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

善良无知而又饿得要死的老百姓怎么能弄清发生在上头和外国的事情？即便是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当时也是懵懵懂懂。到现在，也才知道一个大致的脉络。原来，省里有一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副书记，一面听说下面的农民瞒产私分，藏粮抗税，“白天一片黑”——用树皮、草根煮在锅里，哄瞒干部，“夜晚一片红”——家家户户灶火红通通，精米细面地吃得滋润；一面又不断接待故乡前来讨顿饭吃的亲友，说农村已经不得了，农民活不下去了。他心下疑惑，便决定到乡下去看看。他挑了一个自报年产粮食十二亿斤的县。一到县里，他照例先找县委，县委汇报，形势一片大好。于是，他坐上小汽车，到了乡下。一下汽车，他吃惊了。不论男女老少，一个个不是骨瘦如柴，就是肿得透亮，都拄起了木头棍儿。因为他在这里打过游击，所以有人认得他，在他面前跪下来，叫他救命。不用问，他就知道饿死了人，因为死人没有棺木，埋得又浅，不时地散发出腐尸的臭味。他是有点学问的，对古典和准古典的诗词更为熟悉。此刻，他便想起了两句诗，诗云：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他觉得用这两句诗来形容眼前的景象真是最贴切不过了。于是，他立即回到县里，再问县委的干部们，形势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县委的干部们不得不坦白他们虚报了一半的粮食产量。现在，省里正根据这个虚报的数字继续催粮，他们也被逼得没有办法了。这位副书记不忍心让老百姓全部饿死，便指示从现在开始，县里的粮食一粒也不要往上调了，按每人一天八两救济粮发下去，同时，食堂暂时停办，自留地还给社员，被强迫搬迁的农民允许他们回到自己的故居。县里一一照办。解救百姓于水火，这位副书记被称为“青天”。

“青天”回到省里，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如实写了一份汇报，希望得到同僚们的赞同，谁料当时的省委书记Z大人是不喜欢赞同别人的人。Z书记当即派出另一批调查大员，沿着“青天”的脚步重走一遍，写出了与“青天”针锋相对的报告，说“青天”所见所闻皆是虚幻，其缘由皆因动机不纯。

恰好这时有一个庐山会议，庐山会议上又出现了一个彭德怀。彭德怀不知进退，竟敢率先举起反“左”的大旗，哪晓得大旗还来不及举起来，彭德怀自己便被戴上了一顶帽子，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Z书记趁机便将“青天”的作为作了汇报，这汇报证明了这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但中央有，地方上也有，并且怀疑他们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于是乎，彭德怀倒了霉，“青天”也遭了殃。“青天”被革职，被秘密逮捕，被踏为污泥。

于是乎，世界被分成了两半，一半天堂，另一半不晓得该用个什么词儿去概括。

天堂里大奏凯歌，为人们描绘一副歌舞升平、充满信心的景象：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某报发表社论，题为《多歇一口气吧，泰晤士报！》，以嘲笑的口吻揭露《泰晤士报》对中国大跃进的攻击。该报说，“我们可以歇一口气，暂时不必那么担心那条龙在我们身后紧紧追赶了。”我们的社论批驳道：不错，我们进一步核对了去年农业生产的数字，粮食不是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一倍，而是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五，钢铁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中，包括了三百零八万吨土钢，但是，这不同样是伟大的成就吗？《泰晤士报》为什么不看这样的事实呢？是了，他们在进行“自我安慰”。“好吧，游手好闲的伦敦绅士们，你们完全有权利歇一歇，岂止‘一口气’而已。看来，他们从去年以来连一口气也没歇过。这是多么残酷的强迫劳动！我们真应该不是用‘几年’（虽然他们也承认去年我们宣布的本来是十五年），而必须是用十年，赶上他们，即使仅仅为了人道的缘故……”何等地自信，又何等地俏皮，饿着肚子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的。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纪念日，那家自信而俏皮的报纸照样又发表社论，提出十年赶上英国，“这当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完全能够办到的事情。”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七日，这家报纸又发社论，题目是《一鼓作气，完成农产品的收购任务》。社论说，农产品收购任务完不成，是由于有些地方的干部“畏难”，又有一些干部“骄傲”。因此，要“使收购任务在短期内一气呵成，必须要抓政治，抓思想，大张旗鼓地宣传总路线，继续反右倾，鼓干劲，进一步开展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干部的政治觉悟高，干劲大，收购的进展就快，反之，进展就迟缓。”当然了，“在运动中必须认真执行政策，努力把应该收购的都收购起来，而又不买‘过头粮’”。

天堂是光明的，昨天，今天，明天，都光明。

世界的另一半——

饥饿在无情地蔓延，吞食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开始，只是听到某处某处有人饿死，如今，死亡就在自己身边发生了。开始，死者多少还有一点别的疾病，因此还可以说是病死的，如今，饥饿成了死亡的唯一原因。眼看着，生命像一盏盏油灯那样耗尽、熄灭。一个人艰难地走着走着，倒下了，不必去看，他已经死了。一个人只被轻轻地拍了一下肩膀就倒下来，不用去扶，他已经死了。有的一家人死绝，有的一个村的人死去大半。没有人哭，没有人埋。没有人对死亡感到惊奇或畏惧。伦常、道德、人的最起码的羞耻之心，都被饥饿和死亡吞食了。男人们已不会做爱，女人们也没有了月经，什么强奸、通奸都难得一闻，就是名正言顺的夫妻也都不想男女间的事了。男人女人，无须忌讳，如果谁有幸还有屎可拉有尿可撒，随时随地都可以解开裤子，没人骂你，没人笑你，甚至也没有人看你……

然而按既定方针，粮食的征购任务还必须继续下去，一气呵成。

三十二

小郝庄的人一天天地减少，我们队的人却都还活着，脸上还有一点血色，因此还能外出走动，下地干活，这便引起了注意。

你们庄真的没有粮食了？上头有人问队长。

你们庄真的没有粮食了？路上有人问群众。

我们害怕起来，仿佛不饿死也是罪过。为了防备突然搜查，我们的队长把男人们组织起来，轮流在村口守夜，一有鸡叫狗咬，全村人都被叫起来，约法三章，起誓赌咒，商量对策。

队长带着村里的几个干部到处打点，把存数渐少的粮食分出一部分，偷偷地送到一些上司的家里。可是，一天傍晚，搜查的人还是来了。一大队人马，是全公社的干部组成的，郝队长自然也在内，他只是清减了一些，身体还是健康的。郝队长手里拿着钢钎，比书元那次戳他们粮食夫子的那根铁棍还要长还要亮。

我们全呆在自己应该呆的地方不动也不响，由队上的干部们与他们周旋。

队长带着那帮人走进每一户人家，查看每一间房屋，戳开每一个柴草垛。没有发现藏着的粮食。

没有发现我们家的夹墙。

搜查者来到牲口饲养棚，我和疯大爷守在那里。棚里几条瘦驴，一个草料垛。草料居然很多，堆得高高的，顶到房梁上了。郝队长起了怀疑。

有人把粮食装在细布袋里，把布袋捆在房梁上，再盖上茵草，粗看上去，什么也看不见。郝队长说。

疯大爷说：那些人真精。打死俺们也想不出那样的办法。

郝队长笑了：那你们的草料堆那么高干啥？爬到上边去拿草，费劲儿，从下面抽草，还不把垛抽倒了？

疯大爷说：郝队长说得对！俺们堆草的时候只想着少占地方，后来才觉得不方便，也没有力气倒腾倒腾。

搜查队伍的领队人命令郝队长爬到草垛上去看看，房梁上是不是藏有东西？

我们的队长立即搬来了梯子，我发现，他的脸色都变了。疯大爷嗓子里直打呼噜，嘴里却说：对对，查查好，查查好，查查大家都放心了。我意识到草垛中确实有什么秘密，心也发抖了。

李翠，给郝队长扶着梯子！疯大爷叫我。我走过去，扶着。

郝队长顺着梯子朝上爬，我的手抖着，梯子摇摇晃晃的。我们的队长骂我：右派分子，没吃饱是怎么的？看把郝队长捧着。他走过来，也踏上梯子，随郝队长往上爬，两只手紧紧攥住郝队长的两只脚。梯子果然不抖了。到了草垛顶上了，郝队长回头朝我们队长看一下，我们队长说：查吧，老郝！查出粮食来我今晚就跟你们去！队长的话可不是说着玩的，那时候只要查出哪个队藏着粮食，队长就立即给带走了。

郝队长用力往草垛里掏，掏出一把又一把于草往下扔，然后拍手，说：真他妈的都是草，说罢下来了。

搜查完毕，已是掌灯的时候。搜查者扫兴而去，招来一阵狗叫。等他们走远了，队长来到我们家，叫书元从夹墙里弄出一口袋黄豆给郝队长送到家里去。队长说，×他妈，我吓得小腿转了筋。急中生智，我在老郝脚脖子上捏了两把，叫他心里有数。我想，他要不揭我，我就给他一点好处；他要是揭了我，我就把他×穴子里藏上的事揭出来，我不能活他也不好过。这孩子还算心里有点明白，没往房梁上摸。

原来，我们房梁上真的藏了粮食。为了防止再来查抄，我们连夜把它转移了。末了，队长又发布命令：为了不走漏消息，从今以后，凡我村人，一律不许留客吃饭。留了客，说话一多难免漏个一句半句的，要是再留客人吃饭，那就更露馅了，客人们会对外人说，俺庄上人还有饭吃呢！

大家同意。可是客人来了不走咋办？队长果断地说：撵！不能怕得罪人。队长把撵客的任务交给了疯大爷。疯大爷说，好吧，为着全庄人的死活，我就当一回恶人吧！谁家来了客，马上来找我，我就去撵。

三十三

疯大爷克尽职守，不论谁家来了客，也不论来的是什么客，他都去撵，完全铁面无私。队长的丈母娘都叫他撵跑了。老太太临走时哭鼻子抹泪，骂闺女女婿，疯大爷对她说，这年头谁也别抱怨谁，都是为了顾命。俺队长实在也没有粮食了，自己都难养活，哪里还能管上客人吃的？

二呆却偏偏在这个时候来了，给疯大爷出了一个难题。

二呆哪里还像个人样呢？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他那一双眼睛真怕人，直瞪瞪的，好像瞎了，又好像尖得能把生铁刺出个洞。

你们村里的人一个个都还活着？也没有浮肿的？二呆问，口气里带着明显的责备，好像我们不该活着。

我们不回答，他又说：我们村的人死绝了，真死绝了。王八蛋说瞎话，死绝了，真死绝了。

二呆说话的口气也怕人，说那么可怕的事毫无感情，好像说死了一群蚂蚁，一窝老鼠。

二呆嬉皮笑脸的。

书元去捂二呆的嘴：你胡说什么呀？这种话是可以随便乱说的吗？要是人家当了真……

书元放开了手，叫：滚！畜生！你给我滚！二呆就地躺下了，在地上打滚。书元又叫疯大爷：把他撵出去！快！生产队里交给你的任务，你忘了吗？不能留客，谁也不能留。

疯大爷摇摇头，又摆摆手，叫书元别说了。第一次，我看见他老人家眼里有了泪花。我原以为他的眼泪已经干枯了。

给他一碗黄豆，让他去。疯大爷说。

黄豆是队里的，谁也不能动。书元说。

你们还有黄豆呀！给我一点吧！几颗也好！二呆从地上爬起来，抱住书元的脚。

书元又去捂二呆的嘴：你叫什么呀？你想叫俺们庄上的人都死绝吗？一点点黄豆是俺庄百十口人的保命粮，给抄出去就完了。

你们给我吃，我不说。

队里不许留客，你知道不知道？谁也不许留客呀！书元抱住弟弟哭起来。

疯大爷趁书元和二呆说话的时候，挪开夹墙上的一块砖，挖出半碗黄豆，找一块破布包了，塞给二呆。书元说：不行啊，大伯！要是队上的人知道了……疯大爷说：要罚罚我，我偷了黄豆，我是贼，从今以后，我少吃一点。

留下我吧，大伯！二呆又在疯大爷面前跪下了。

疯大爷拉起他，说，不行，孩子，要是我今天留下你，明天就没办法撵别的客人了，全庄人的性命就要断送。

那就再给我一点黄豆吧！二呆说。

书元急了，一把抓住弟弟：你走不走？不走我掐死你。二呆忙说：走，走，走。让我喝口水，好吧？

二呆舀水缸里的凉水往肚里灌。

疯大爷又哼起捻军歌来。咸丰年，大歉年，涡河两边草吃完，地了银粮逼着要，等

死不如来造……。最后那个字，他总是唱得很轻很轻。

二呆说：造反？谁敢造反？干部们饿不死，还是把社员管得紧紧的。说一个不字都不行。翠儿，你姊夫起来造反了，还不是给抓起来了。

我说：二呆，你真的疯了吧？我的哪个姊夫会造反？大姊夫是老革命，二姊夫也是干部。

二呆说：你不知道？我们那一片的人都知道，就是那个周纯一周区长嘛，他造反了。你还乱说！我说。

孛熊乱说。二呆非常认真。

我疑惑起来。已经很久不回家也没有接到家里来信了。想给家里省点口粮，也给自己省点力气。

回去看看吧，翠儿！你那高凡也该来信了，说不定还给你寄点钱呀，粮票呀。疯大爷说。

我点点头。高凡的信，一直寄往宝塔集，等我回去一总地看。这里邮递很不方便，信来得慢，有时干脆不来，放在公社里等你取，弄不好就丢。

书元说，正好和二呆同路，一起走吧。

二呆不肯和我同路，说他要往南边大城市里去讨饭，饭店里残汤剩饭就够他吃的了。我也不想和二呆同路，对他有点怕。

疯大爷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挖出半碗黄豆来，用布包了，交给我，说家里要是有人饿病了，吃点黄豆汤就能救命。我不敢要，书元说，拿着吧，就算你的口粮吧！我收了下來。

我跟二呆一起出了庄，到了十字路口，我问二呆往哪里走，二呆突然改了主意，要跟我一起走。你还是往南走吧，我说。不，跟你一路，他说。我不要跟你一路，我说。不，你一个人走路我不放心。无奈，我只得与他同路。但是我不想靠近他。

路上的行人很少。虽说是初夏时分，人们都照旧穿着棉袄。没有人说话，大路像坟场一样静。也差不多就是坟场了，一路上不断地看见旧坟和新坟，有的连坟都没有，芦席卷着扔在地里，再浅浅地盖上一层土。有的连土也不盖……大白天叫人感到一股阴森森的鬼气，比以前单个儿走夜路还叫人害怕。我尽量走得快，恨不得几步跑到宝塔集，二呆却叫等我。他走不动，我只得与他一起慢慢朝前捱，几十里路，何时能走到？

走了四分之一的路，到了一个岔路口，二呆叫歇歇。我看天已不早，四周又没人，不愿歇。可是二呆坐下来不动了。他说，我不能跟你一起去宝塔集，到那儿只有饿死的份儿。我从这里往东拐，可以搭上到南边去的火车。你有钱买车票？我问。他说：讨饭的有几个买票的？那你叫我等你？耽误了我多少路。我怨他。

翠儿，老妹子！把你的那小包黄豆给我吧！二呆突然向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两个眼直瞪瞪地看着我，然后又看着我装黄豆的口袋。我下意识地用手捂住口袋，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给我吧！他向我伸出手。

你不怕……我说。

我怕啥？他说。

二呆……我说。

你给不给？他朝前爬了一步，抱住了我的脚。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时的感觉，好像突然被魔鬼抓住了，只想如何挣脱。我连忙掏出黄豆摔给他，叫他松开我的脚。我逃命似的往前跑，不敢回头看去。可是我的腿那么软，像噩梦中逃跑一样，脚总踏不到地上。

三十四

我家里除了爸爸和四妹，都躺倒了。一个个肿得怕人。妈说，要不是高凡从云南寄回几斤粮票，奶奶早就没命了。爸说，对不住你啦，翠儿。拆了高凡给你的信。想着信里也许有粮票，就拆了。云南看起来也不好。广播里说，今年有几十年没遇到过的特大灾害呢，也不知云南那里有没有灾。俺们这里风调雨顺还这个样子，有灾的地方不是连人烟也没有了吗？我说，爸，你省点精神吧！有灾没灾一个样，反正是捱饿。

我的可爱的奶奶变样了。我不敢到她跟前去，不忍心看她现在的样子。可是她要我去，坐在她的床前，拉住我的手。她说，你回来了好，咱奶孙俩说不定就见这一面了。老天爷的大老婆死了，要我回去，扶我做正宫娘娘……

爷爷也躺着，像往常一样，奶奶头朝东他头朝西。爷爷看上去精神要好得多，只是肿得厉害。爷爷说，翠儿，你奶奶嫌贫爱富，现在不要我了。

奶奶说：哪能不要你？你愿意，我把你带去，偷偷地藏起来。太阳出来满院子，屋里养个野汉子。老天爷也没办法……

平时，我最爱听奶奶爷爷说笑，可是现在，我不想听了，听了心里难受。而且，我挂念着姊夫的事。

我把二呆的话对家里人说了，问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都像我一样吃惊，不相信。爸说，你二姊夫前几天才来了信，你大姊夫更不是那样的人。奶奶说，共产党员还造反？反谁呢？听他们嚼舌头。妈不放心，说周纯一是个愣头青，说不定会干出什么事，她大姊又是软性子，管不住他。不如去看看。爷爷和爸也说该去看看。

奶奶说：翠儿和你爸去吧！你爸一个人去我不放心，他也是硬撑着，不撑着咋办，一家人全靠他。

我和爸打算第二天早上上路。临走，奶奶又把我们叫到床前，说：慢慢走，身子不行，急不得。我等你们回来，万一等不到那时候，你们也别怪我，我真不想死啊！唉，死了也好。

我要去捂奶奶的嘴，可是等到我到她跟前，她已经闭眼了。我摸摸她的手，凉得像冰。爷爷爬起来看看，摇摇，叫叫，说断气了。

爷爷的眼里立即灰蒙蒙的蒙上一层雾，但是他只张了几张嘴，没有出声地哭。我们也都流着泪，没有大声地哭嚎，因为担心爷爷。他现在的形状很古怪，爬到奶奶这头，和奶奶头并头睡下了，一只胳膊一定要伸进奶奶的头底下。他对奶奶说：你白跟我过了一辈子，我对不起你。当初你跟我从家里跑出来的时候，你妈咒你，说你不得好死。这咒语应验了，你是活活地饿死的。你省着粮食不吃，给我吃，给小孩吃。眼下，我拿什么发送你？只能给你凑合四块薄板……他眼里始终罩着一层灰蒙蒙的雾。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奶奶原来有一段浪漫史，她是和爷爷私奔到宝塔集来的。她的父母嫌弃爷爷是剃头的，不同意这门亲事。她一辈子也没回过娘家。

奶奶的丧事只能从简办了。办完，我和爸爸便到县城看大姊去了。

三十五

大姊夫真的出了事，被抓起来了。谁也想不到他会干出那样的事情：带人抢仓库。

大姊说，那怎能叫抢呢？他根本没到仓库里去。他要保钢铁元帅，可是炼钢工人要吃饭呀！粮食局不能按定量供应口粮，工人成批成批地饿跑了。他急得恨不得把老婆孩子都卖了。他一次又一次地给上头写信，要求按定量供应工人口粮，县里说办不到，还说一天两顿，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瓜菜代，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你们知道他那个脾气，眼看着工人快跑光了，计划完不成了，他哪里还沉得住气？他给省里拍了一份电报，说不论谁说的，工人都必须一天三顿吃饱饭。工业劳动，一天八小时，有什么忙时闲时？这惹火了省里的头目，叫他检讨。他怎么肯检讨？和县里领导顶起来，说省里领导教条主义，唱高调。这样一来，错误就越来越多。

县里的领导还是真心实意地帮助周纯一的，专门为他开了几天的会，让他认识毛主席的那条指示是绝对正确的。可是他说：正确不正确，问问工人的肚子就知道了。人家对他说，你要好好学学马列主义，不能光凭战争时代那股子莽劲儿干事了。他说：马列主义的书写得好是好，可惜我看不懂；倒是工人的肚子咕咕叫，我听得一清二楚，也好懂，就是要吃东西。

要不是有点老资格，县里又有一些熟人和朋友，谁会对一个得罪了上级的人这么耐心呢？可是周纯一似乎一点也不领情。对他的帮助教育还没有结束，他就干下更大的错事了。

工人实在跑得差不多了，炼铁厂的厂长叫苦不迭。完不成计划，他们是逃不了责任的。他们找周纯一想法，周纯一便问他们：县里的仓库是不是真的没有粮食了？能不能去看看？厂长们说可以，便派几个人去看看。可是仓库里铁门紧紧地锁着，哪里看得到里面呢？厂长们又来汇报。周纯一抓抓头皮：哎呀！我们那么多五尺多高的汉子还能让一道铁门给拦住了？工人们哪里能得到他这句话？呼啦一下吆唤了几十口子，男女老少的，拥到了县粮食局的仓库门口。几个人从铁门翻了过去，打开了大门，门外的男男女女也就涌进了院里。没有人动手翻呀抢呀的，只是大声咋呼：饿死人了！开仓卖粮吧！女人孩子还哭哇哇的。

这等事在县城真是史无前例。县里立即报到地区，地区又立即报到省里。又是立即，一级一级地往下传达着指示：叫人们马上撤退，若是有人闹事，便坚决镇压！县里领导亲自来找周纯一，告诉他现在让大家撤出仓库还来得及。只要不动手，事情还可以混过去。可是周纯一还是大大咧咧的，说大惊小怪干什么？我不过叫他们去看看有没有粮食，谁知道他们一下子去了这么多人。好吧，只要你们答应供应粮食，我便叫他们往回撤。县里领导说：先撤人吧，粮食问题再设法解决。县里实在没粮了，正想从外面调呢。

周纯一亲自到了仓库大院里，站在一块石头上，挥着手向他的工人们吆喝：县里答应给大家供粮了！现在仓库里没有粮食，正准备到外地去运。大家回家去吧！粮食一运到，我保证卖给大家！我要是骗了你们，你们往我门上糊屎好了。工人们胡乱地问了几句真的、假的？便回家去了。他们并无闹事的意思。

于是，县里又报到地区，地区又报到省里：工人们撤了，没有人动手抢粮食。可是省里还是下达了指示：周纯一必须停职检查。于是，县委又专门为周纯一开会，对他进行教育和帮助，希望他作一个像样的检查，过关了事。周纯一答应着：检查、检查。可是暗地里，他却指使部下真正地干起“抢”粮食的勾当来了。县里到外地运粮，借了工业局的汽车，周纯一竟然偷偷地告诉自己单位的司机，把一车公粮径直拉到工业局。他打算直接把粮食卖给自己的工人。他说他一点也不犯法，他是按自己手下工人的粮食定量强购那一车粮食的，而且准备马上付钱。但是，没有人会听他的解释了，粮车到了工业局，公安局的手铐也到了。

爸爸听完大姊的话，一个劲地撇嘴，说纯一这孩子胆子也太大，饿死也不能干这样的事啊！这是犯了王法的。

大姊说，谁说不是呢？可是他说，完成炼钢任务，也是王法。

我同情周纯一，认为他是给逼到那条路上的，他不是写了报告了吗？工人真的跑完了，生产任务完不成，他不是也有罪？

爸爸说：你们这些年轻人，都不知道天高地厚。自古以来，不听上头的話有几个有好下场的？过去有皇帝，皇帝是真命天子，他的话不能不听。如今没有皇帝了，可是有领袖，领袖也叫万岁，就跟皇帝一样。不是真命天子，也是天上的一个大星宿。那个歌儿是咋唱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跟太阳一样大的星宿，所以大家都要对着他，唱“呼儿咳呀”。

要不是正碰上心事重重，我真要笑出来了。爸爸的性格和爷爷奶奶正相反，是绝无幽默感的。此刻，他讲得那么认真，向我和大姊探着身子，瞪着眼睛，唯恐我们不听他的话而惹出大祸。不过，眉宇间也偶然流露出一点得意，大概是由于没想到自己还能说出这么多深奥的道理来吧！

我对爸爸含含糊糊地应着，点着头，等他停下来，就问大姊，周纯一此刻可有消息。

大姊哭了。她说，一个人没有错的时候，千好百好；一旦有了一个错，就一千条一万条错误都出来了。

我和爸都劝大姊慢慢地说，看看周纯一都有些什么错。

大姊说，听说罪状有十好几条，有反对三面红旗，煽动工人闹事，对抗党的领导，无组织无纪律，包庇右派，重用坏人，还有乱搞男女关系。说到最后一条时，大姊哭得特别厉害，说别的罪名她都不在乎，只有这一条，她越想越气，觉得和他过下去也没有意思了。

爸爸说，对不对。那么多罪名，只有这一条是轻的。要是只有这一条就好了。年轻人，没有不荒唐一阵的，浪子回头金不换。可不能因为这一点跟他闹气。

大姊说，不行，我饶不了他。

爸爸说，耍什么小孩子脾气。自古以来，男人有几个是规矩的，越是混得好，越是不规矩。皇帝娶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纯一是县级干部，七、八品的官，有个把外遇又算得了什么。俺们都活了大半辈子了，啥样的事没听过，啥样的事没见过，从来没人讲过什么叫乱搞男女关系。

大姊哭：你尽护着他。我可饶不了他。

哎呀！我急起来，责怪爸爸：少说这些不中用的话吧，都什么时代了，还三宫六院的。

爸连忙向我摆手：我可不是这意思，不过是劝你姊。

好了好了，我说，看把你吓的。我是想，现在讲该不该饶了周纯一还太早，还是想想该怎么帮帮周纯一吧！

爸爸说：有什么办法？纯一是党的人，他的事是党的事，老百姓哪里有权过问。俺们只能来看看你大姊。不是我说不沾弦的话，纯一落到今天，也是报应，那两年，他杀人杀得大多了。冤魂怨鬼缠着他往邪路上走，他不愿走也没办法。

大姊说，我也这样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迟早要报的，不如早报应了好。丢了官儿没啥，只要人平安就行了。

我要大姊收拾收拾东西，带着孩子与我们一起回家过一阵。大姊不肯，说没脸见宝塔集人。再说，在县城，多少还能供应一点粮食，回到宝塔集就只有捱饿了。

爸爸说，是这个理。你呢，也别牵挂家。一家老小都活得好好的。虽说粮食缺点，凑合着也能吃饱。

奶奶爷爷都好吗？大姊问。

都好。我和爸爸一起说。

唉！就是想奶奶想得厉害。常常梦见她。一听到人家说有人饿死了，我就想，大家都饿死了，奶奶也不会饿死的，奶奶的欢乐脾气能让她活到一百岁。她那样的脾气，走到哪里都叫人喜欢，跟她在一起，再大的忧愁也能烟消云散。

是啊，是啊。我和爸爸一起说。我怕自己哭出来，故意跑到姊姊卧室里去照照镜子。爸爸喊我：翠儿，我们回家吧！大姊又哭了，留我们过一天，爸说：这年月谁还住亲戚？各人顾好各人吧！

回来的路上，爸爸对我说，回到家里，别对你妈说那么多。就说纯一不过出了点小差错，在外头拼了个女的，写一份检查就过去了。我说，明白。

三十六

不断有死人的消息。永继的瞎奶奶死了。我的一位同学，才二十多岁，也死了。说是出去抓长虫吃，给咬死的。

现在，轮到了顾远山老头。

顾远山自从那天吃过狗肉之后，便一病不起了。呕吐腹泻不止，吃一点，吐一点，泻一点。黄胆水都吐了出来，肛门都泻烂了，烂成了一个可怕的洞。

一切都要儿子媳妇料理，老头子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威风。他竟然破天荒地对儿子媳妇说起感激的话来。一天，玉儿妈刚刚给他擦洗过，正要出去，被他叫住了，而且被抓住了一只手。你从小没有爹妈，你就是我的亲闺女。老头子说。玉儿妈被感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地叫爸，爸。老头子又说：亲闺女也没有你好。你能这样伺候我，说明你良心好，将来一定能得到好报。玉儿妈吧嗒吧嗒掉起了眼泪。事后，她对丈夫说，我看老爷就是脾气坏点，旁的也没啥不好。顾维舜说，人之将死……我看他没有几天好活了。

确实，顾远山越来越多地露出了将死的迹象，对孩子的态度也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他不断地把舍儿和柱儿叫到跟前来，把儿子媳妇给他吃的东西分给小哥儿俩，还问他们饿不饿。哥儿俩一齐说不饿。你们是哄我吧？老头子看着瘦得不成形的孙子说。台儿说：不是哄你，我真不饿。柱儿也学哥哥，还拍起小肚皮，说：你看，饱饱的。一看小肚皮上的肋骨一根一根地突起，老头子流了泪。说：你们哄我。舍儿害怕爷爷责怪，便说真话：是妈叫我哄你的，不要怪我。顾远山立即叫来儿子顾维舜，叫把他的可卖的衣物都拿去卖了，给孩子买点吃的回来。儿子媳妇感动得差点给他跪下来。

临死的前一天晚上，顾远山把儿孙们都叫到跟前，缺了老大两口和玉儿、德儿两姊妹。老大知道了老人病重，但不敢来，怕没吃的。玉儿和德儿都在学校。德儿在县里中学，随时可以回来，玉儿呢，还不知道爷爷病重呢！

都来了？顾远山老头看看儿孙，前所未有的慈祥。

都来了。顾维舜回答，明天去找老大他们。

别找了，来不及了。顾远山说。

要不要叫玉儿和德儿？德儿正赶考试，玉儿还不知道……玉儿妈说。

别叫了，来不及了。她们也不喜欢我。顾远山老头说。

哪能呢？德儿一直要回来伺候爷爷，我怕她拖了课，这孩子上学晚了，不能再耽误。玉儿每一次来信，也都要问爷爷的身体，只是不敢把你的病告诉她。顾维舜说。这话有一半是撒谎。德儿一贯温顺，虽然不喜欢爷爷，从来不流露什么。听说爷爷生病，确实想回来伺候，为妈妈分担一点忧愁。玉儿就是另一回事了。她在信里把家里的人问个遍，也不提爷爷。而且，玉儿压根儿不知道现在家乡的困难情况。她是从报纸了解形势的，

报上说，今年自然灾害大，号召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战胜自然灾害，她也这么说。每次给家里来信，她都把这些话重复一遍，恐怕当了右派的父亲因为不了解国家的形势而口出怨言。她爸爸给她回信，总是顺着她的意思说，报喜不报忧。所以，在玉儿的头脑里，是一幅一家人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克服困难的图画，苦是苦点，精神是叫人感动的。

玉儿不喜欢我，顾远山又说，维禹不喜欢我，你们也都不喜欢我。

哪能呢。哪能呢。哪能呢。玉儿的爸爸，妈妈，婶子，大姊，大姊夫一起说。

顾远山在枕头上摇头：我心里明白，你们不用哄我。舍儿，你喜欢爷爷吗？舍儿看看爸爸妈妈，小声地回答：喜欢。柱儿，你呢？柱儿看着妈妈，不懂得怎样回答，他妈代他说了：柱儿最喜欢爷爷。天天要到爷爷屋里玩，不叫来就哭。舍儿加添说：他说爷爷这里有吃的，他要来讨吃的。玉儿妈向儿子扬起巴掌，舍儿躲到婶子身后去。顾远山说：别吓唬孩子，小孩子说实话。好。我对不起你们，你们不喜欢我，这是应该的。只是看在我就要死了的分上，你们忘了过去的那些事吧！我这一辈子，我这一辈子……

老头子干嚎了两声。玉儿妈先哭起来，玉儿婶子接着哭，舍儿和柱儿看见妈妈哭，也跟着哭。顾远山朝他们摆手：别哭，等一会儿。他叫顾维舜走近一些，把他藏在枕头底下的宗谱折子拿出来，说：等不到维尧来了，你先拿去。那上面记了我们的几代祖宗……

顾维舜不由自主在父亲床前跪下来，说明天老大就来了，等等他吧！

顾远山说：不等了，等不及了。记住，咱们是……从江南……过来的，是江南的……书香世家，只因为……明……明朝……末年农……农民造反……才跑到淮河边……来的。我们这一支……好不容易……在淮南站……站住了脚，成了当地的……望族，谁知家族不和，自己对自己……残杀起来，弄得七零八落。我们这一门就剩……剩下我一个人，跑到了……淮北。我一辈子……争强斗胜，总算熬成了一家人家，有了你们……兄弟三人，又谁知，又谁知

顾远山的目光凝着在柱儿母子身上，大家都明白了他的意思，想起维禹的早逝，禁不住一起哭泣起来。顾远山说：我原以为……维禹会有大出息，光宗耀祖，回到淮南……老家去……

是他自己没命。玉儿婶子哭着说。

都怪我惹了祸，顾维舜说，俺们弟兄们现在是不行了，将来看他们小一班的人了。舍儿、柱儿都聪明伶俐，玉儿姊妹也不错。你老可以放心了。

玉儿，玉儿……顾远山又说，玉儿命硬……叫她，叫她……

无论怎么挣扎，顾远山也说不完这句话了。他带着对玉儿的希望和祝福断了气。

丧事自然从简办理。与现在人的体力相比，几年前打的棺材实在是太重了。幸亏顾维舜的人缘好，要不然，棺材也抬不出去。

丧事办完之后，顾维舜才给玉儿写了一封信，对她说爷爷病死了，临死的时候还念叨她，没有说爷爷生的什么病。

不久，玉儿回了一封信，信中只是顺便提到爷爷的死：

听到爷爷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很突然。很想哭，但是哭不出来。我一个人悄悄地在校园里转了好几圈，被一位同学看见了，问我为什么。我说爷爷死了。她非常同情，说那你该多难过！要哭就哭。巴！我说，不，我不喜欢爷爷。我只是在想，像爷爷这样的人活一辈子，有什么价值。他谁也不爱，因此谁也不爱他。第一次，我向同学详细地说了爷爷的种种坏处，我真是一个不肖子孙了。倘若他老人家有在天之灵，一定要惩罚我的。但是我愿受罚也不肯说假话，我讨厌他。

顾维舜没有把信中的这些内容念给家里人听，只说，玉儿很难过，说她忙，不能赶回来奔丧。现在学校正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顾维舜把玉儿的这封信烧掉了。

顾远山死的第二天，我跟妈妈到玉儿家去看了一下。我奶奶死的时候他们也来过。我们互相安慰说，老人家还是现在死了好，再活下去，死得还要惨。我妈说，你们家的老爷还有点病，我们家的奶奶硬是饿死的。倒是我们家的奶奶到死也干干净净的，一点也不糟蹋人。玉儿妈说，那是她修积下来的阴德，人人都能这样死就好了。说不定你们

家奶奶真上天了呢？我妈说：饿死的也能升天？玉儿妈说：能。饿死又不为舜。她死以后就没回来过？我妈说：没动静。只有那天晚上，我听见碗筷响，像她平时的声音，赶紧跑到厨房里去看，就没声响了。我想，总不是饿死鬼过不了奈何桥，老奶奶回来找吃的吧？玉儿妈说：厨房里没少掉什么吗？我妈说：没有，啥也没少，就是她平时用的筷子少了一只。她活着的时候就少了一只，现在两只都没有了。我妈说，那就是拿去了。双木桥好走，独木桥难行。筷子也要成对成双。我妈说：这样也罢了，让她老人家到天上享福去吧！

玉儿妈说，永继奶奶死了以后很不安宁，经常在堂屋里摔摔掼掼的，有一天把条几上的茶碗摔到地上，也没打破。这老奶奶也难怪，一辈子没过上一天像样的日子，老头子不正干，死在牢里，儿子又没音信。

我妈说：那也不该把气往活人身上喷！冤有头债有主么。

玉儿妈一直不插嘴，这时突然抽抽咯咯地哭起来。她说：人家死了，魂灵都回来看看，维禹咋不回来……

玉儿妈说：他不敢回来！我天天对他说，不许你回来，省得一家人为你牵肠挂肚，也省得吓着孩子。

我妈说，就是，一辈子也没过过这样的日子。戏里说有个包公，喜欢放粮，现在包公在哪里呢？

玉儿妈和玉儿妈说：谁知道是不是真有个包公呢！

三十七

饥饿还没有停歇的意思。宝塔集饿瘫了。听说要下来救济粮，大家都伸长脖子等着，可是等了很久也没等到，一打听，原来是干部们觉得肚子还胀鼓鼓的，用不着救济，便把粮食回交，让人家支援别处去了。这叫做发扬风格。

在干部们这种风格的带动下，淮北人自然也只得大大发扬另一种风格——敢饿、敢死了。我爷爷就发扬了敢死的风格。临死的时候，他要爸给他剃剃头，说一辈子给人家的头剃得光光的，胡子刮得亮亮的，自己能蓬头垢面地“走”吗？何况，翠儿奶奶还在那边等着我去团圆呢！

爷爷把最后一口气用来等待，等待爸爸在他头上剃完最后一刀。他死得安详极了，也许，是因为一丝儿挣扎的气力都没有了才显得那么安详的。

玉儿一家也都不能动弹了。玉儿妈呜呜地哭，怕连累了哥哥嫂子，更怕自己的儿子保不住。好几次，她求哥嫂，放她们母子离开宝塔集，回到河口镇去。她要去找那些当初逼死自己丈夫的人，要他们养活自己的儿子。就是母子饿死了，尸骨也可以和丈夫归在一处。哥哥嫂嫂不肯，说要死大家一起死，孤儿寡妇的，上哪里去？但是有一天早上，玉儿妈发现，这一对母子不见了。顾维舜马上拄起拐杖撵出去。

追到晌午的时分追上了，玉儿妈还没走五里路，正抱着孩子在路边坐着呢。顾维舜叫她回去。她死也不肯：我好不容易挪了这几里，一步一步往前挪，总能挪到。到那里又能怎么样呢？顾维舜说。

我讨饭去！玉儿妈答。

大家自己都没吃的，你上哪里讨？顾维舜说。

总有吃得饱的人，那些干部们！我去找他们讨饭，不给，我就骂，就抢，就推他的桌子摔他的碗！为了柱儿，我准备不要脸也不要皮了。干部吃到哪里，我就要到哪里。干部啥时候吃饭，我就啥时候去要……玉儿妈说，声音恶狠狠的，像吵架。

顾维舜叹了一口气，说：好吧！我送你们去。

玉儿妈不肯，你还能送我？你能平平安安走回去就不错了。我年纪轻，能撑得住。

顾维舜估量估量自己的力气，也觉得送他们只是一句空话，便又拄着拐棍回头走了。他天黑才挪到家，玉儿妈正在家里哭，说对不起老三和死去的老爷老奶奶。

顾维舜劝妻子：算了吧！哭也没有用。说不定他们能逃出一条生路。都死在家里，更对不起老三。老三有灵，也该明白我们的心意。

烧炷香吧？还有两把卫生香，我放的。玉儿妈说。

顾维舜摇摇头：不烧了，心到神知，在心里祷告祷告吧！

安顿了妻子的情绪，顾维舜就回到父亲住过的屋里。自从父亲去世，他就搬到这里住，和妻子过起了分居生活。现在，还谈什么夫妻生活，家庭生活？顾维舜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为家人寻食上了。活到四十六岁的顾维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自己无能和窝

囊。眼看着一家人饿在床上，自己竟然想不出一办法。这几个月来，他所有的主意都动过了，所有的关系都找过了，能做的他都做了，人家能帮忙的也都帮了，终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今，只有一个关系没有用，那就是玉儿。玉儿大学刚毕业，工资四十八元五角。毕业第一个月，她就寄了二十元钱回来，说以后按月寄回。可是，她哪里知道，这二十元钱根本不顶什么用呢？他和妻子商量过，能不能把家乡的情况告诉玉儿，让玉儿在那里想想办法，大城市总比乡下好些。可是妻子心痛闺女，不让他写这样的信。他也就一直忍着，对玉儿继续报喜不报忧。

然而现在，顾维舜不想再听妻子的话了。他觉得这样不但一家人都要饿死，而且会陷心爱的女儿于不义。玉儿信里的那些大道理越来越让他觉得陌生和反感了，他开始怀疑，她还是不是自己的女儿。他从枕头底下拿出玉儿最近的一封信。这封信又一次教育父亲与党同心同德，为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竟然把报纸的社论抄出一大段来。社论说：

“大体看来，今年全国受灾面积达九亿亩之多，占我国全部播种面积的一半左右，是建国以来遭受到最大自然灾害的一年。但是，由于人民公社组织农民群众抗灾的结果，在九亿亩受灾面积中，成灾的面积只占三亿亩，在许多受灾严重的地方也大大减轻了自然灾害为害的程度。这样大的自然灾害，假如发生在解放前，必然是赤地千里；假土。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人民公社，造成的损失也会比现在严重得多。……”

第一遍看这样的信，顾维舜差一点把它撕了。他觉得女儿在对垂死的父母说风凉话。现在再看第二遍，他的火气平了一些，怪自己对女儿没说真话。

他决心给女儿报忧了。

信寄出四五天后，顾维舜便接到玉儿寄来的九十元钱，电汇来的。他立即把钱换成一担干菜。玉儿妈问哪来的钱，他说是借的。玉儿妈不信，他只好说了真话。玉儿妈和他吵起来，说他没出息，养活不了老婆孩子逼女儿。女儿刚刚开始工作，身上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啊！他也和妻子吵：我没出息？现在谁有出息？谁有出息你去找谁！玉儿妈哭起来。

他们两口子还从来没有这样吵闹过。从来只有她对他发脾气，他不曾对她还过嘴。事实上，他还比她小两岁，可是他总让着她，因为她能干、美丽。二十多年来，他打外，她打里，分工明确，互不干预。凡家务事，柴米油盐一类的事，她说干啥，他就办个啥。有一回，她叫他去买些鱼。他马上到鱼行买回一筐鱼来。她嫌鱼小又买得多，发了脾气，叫他自己去洗鱼。他二话没说，把一筐鱼倒进后沟里，又买回两条大鱼来。邻居们都认为他是赌气，其实他没气，笑嘻嘻地向妻子递上两条鱼，问：这样行不行？妻子心疼那倒掉的一筐鱼，又说了他几句。他还是不气，说反正都是小活鱼，让他们再长大一点吧！

真是穷争饿吵！他懊恼地说。闺女是你的，就不是我的？一家人的性命要紧，将来我们补她的情还不行？

拿什么补她的情啊？孩子二十多了，还能不成家？玉儿妈还是哭。但是那一担干菜，她宝贝似的收起来了。

又过几天，玉儿的信到了，读了这一封信，顾维舜也责备起自己来了。

钱是借的，这一点顾维舜早就料到，也不为此感到难受。难受的是女儿对亲人的挂念和担心。女儿说，一想到家里人都饿得起不来，她就忍不住要哭。有时开着开着会就流出了眼泪，使同志们莫名其妙。半夜，她更是一个人哭个不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女儿说，她爱亲人，亲人受苦比自己受苦还让她难受……

顾维舜一边念信一边流泪，自从他划成右派以来，女儿的信就不大让他动情了。现在他觉得，女儿到底是自己的女儿，顾家人的心肠一点也没有变。唉，我实在没出息。念完信，他懊丧地对妻子说。

妻子倒反过来安慰他：这能怪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拿现在的时局没办法。孩子懂事，这是俺们的福气。

从那以后，玉儿差不多每个月都寄三十、五十元来，直到灾荒过去的时候。顾家人因此得了救。顾维舜想到河口镇去把弟媳母子接回来一起过，想不到弟媳母子也挺过来

了。柱儿妈果真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和干部对上干了，天天带着孩子去赶干部们的饭摊子。有时候求，有时候争，有时候骂。不论是求，是争，是骂，她都反反复复地说着一句话：你们逼死了孩子爸，总不能忍心让孩子也饿死吧？有一次，干部们实在不讲理，她就学着别的讨饭的，往干部碗里吐口痰，叫他吃不下去，不得不把饭倒给她……

人到了急处，啥事不能干呢？她说。

三十八

不知道是谁，用什么办法，让中央知道了淮北的情况，终于下来了救济粮，还有对浮肿特别有效的黄豆和白糖。虽然过水湿脚的人不少，发到老百姓手里的时候已经少了，但毕竟是有比无好。老百姓可以喘一口气了。

我们队没有得到救济，我们也没有向上要。还剩下一点粮食，将将就就也可以过去。我们队没有饿死一个人，还有女人生孩子，还有男人能种地，地里长的庄稼也比草高，这还不够高兴的？我们对队长说了许许多多感激的话。疯大爷说，这要是在旧社会，皇上该给队长发个匾，表彰他是一名忠臣、良将。队长说：熊！要匾弄啥？能吃还是能喝？不瞎折腾就行了！

可是，我们想不到，上头突然派人来抓我们的队长了，而且是和小郝庄的队长一根绳子绑了去的。队长看着我们，我们看着队长，都不知他们犯了什么法。书元到处打听，才知道，原来上头要追究饿死人的责任，查“五风”。说，这二年的灾难，全是基层干部搞起来的，他们浮夸吹牛，一平二调、强迫命令，欺上瞒下，应该让他们也尝尝吃糠咽草、忍饥捱饿的滋味。所以，不许给他们送吃的。

书元也骂起人来，说：×他妈，忠奸不分了！疯大爷摇着头，唱起了“想起老乐泪汪汪”。

书元说：唱个熊，人都被抓去了！还不知怎么处置呢！

疯大爷说，要是抓一个两个，我心里害怕，现在听说抓了很多，我就不那么怕了。法不治众，能让那么多人都坐牢？

我们对疯大爷的话半信半疑。可是不到一个月，队长果然给放回来了，郝队长也放回来了。

队长一进村，就大着嗓子喊起来：×他妈哟！这些天可把我饿坏了！家家户户都忙着给他拿吃的，给他什么他吃什么，一直到实在吃不下了，他才住嘴。但是人家给他，他还一点一点地接在手里，说放着慢慢吃，放着慢慢吃。大家都笑，说：真给饿怕了！

×他妈，饿几天也痛快！几个县里干部也跟我们关在一起，一样半饥不饱。也叫他们坦白交代，当时是怎么欺上压下的？他们一个个都乖乖地交代了，说怕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把良心装进了裤裆里，闭着眼睛乱吹。老郝这个熊汉子，哭得像娘儿们！说他庄上死人最多，都恨死他了，他的一个没出五服的叔叔，特地跑到他家门口去死，那天早上他一开门，就看见他叔的尸首，那头正对着他堂屋。还说他现在夜里作梦常见鬼，有的打他，有的咬他，还有的要把他煮吃了。

我们都说：活该。

那现在这笔账咋算呢？有人问。

队长说：咋算？你说能咋算？交代交代就完了（口拜），保证今后不犯就是了。你们不知道，干部也有干部的难处。

我们都说，是的，是的。当干部也不容易，上头一天一个主意。

那你呢？应该受表扬了。有人说。

表扬个熊！队长说。老郝把我也交代出来了，说我瞒产私分。上头说，谎报产量不对，瞒产私分也不对。还有人说，要不是有像我这样的人瞒产私分，上头也不会逼粮逼得那么紧。果真有人瞒产，上头才要搜查的么。×他妈，说来说去，我的罪名反而比他们更大了，连我自己都糊涂了。

我忍不住说：这不是把是非颠倒了？

队长说：管它弄熊！颠倒过来也好，颠倒过去也好，肚子吃饱就行。乖乖，就怕肚子空空的，还给头朝下提溜着。

有人骂郝队长不是人，说迟早要找他算账。

队长说：别跟他算账了，不给他擦屁股就不错了。小郝庄死了那么多人，地都抛荒了，弄不好要划一部分来给我们种。

大家说：那不行。不能发扬这个风格。累死累活的，能落个啥？要是土地归自己，

累死也情愿。

队长说，话先说在头里，上头要真的把任务派下来了，俺们还真得要。你能忍心让大好的地荒着？

大家说，真是上头派下来，谁能有什么办法？种就种(口拜)。不过话得说清，谁种谁收。除了交公粮，都得归队里，要不，不是白卖力气？

想不到这一回果然被队长说中了。不两天，上头就下了指示，不能抛荒一块地。我们队从小郝庄整整划过一百多亩地来！别提我们有多忙了。

三十九

我没有想到二呆还会来见我，而且又来得不是时候，赶上我们大忙的当儿。

自从那一次分别，我再也没有见过二呆，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也不想去打听他。他夺了我的黄豆的事，我对谁也没说，但我在心里暗自希望，从今以后，再也不要见到他。

他是在夜里来的，像个贼。天还没有冷，他却抖抖索索的。书元问他，是不是天狗把太阳吃掉了，白天不能来，要等黑夜，他说他是来避难的。

胡说！书元火了。现在可以好好劳动了，你有什么难好避？

抓人，又要抓人了。二呆结结巴巴地说。

抓干部，跟你有啥关系？书元说。

抓像我这样的人。二呆说。

像你这样的人？我们都吃惊了，一起问。我想，他们说我说其他地方有吃人的事，总不至于抓残废人吧？

是抓我。二呆说。他们说我说其他地方有吃人的事。

我们都一时之间不知该说什么好。我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

书元抱着头坐在床上，好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你自作自受，自己去投案。

我害怕。有人关进去就饿死了。二呆说。他的眼睛像偷油的老鼠似的看着我们，坐也不敢坐。我给了他一个小板凳，他的腿一挪，把小板凳也绊倒了，又忙着去扶。这样子怪叫人可怜的。

你也知道害怕？书元说，既然这样为啥当时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

二呆急了，他扑向书元，抓住书元的床沿，唾沫四溅地为自己辩解：你以为我天生的喜欢那样做吗？

饿死了也不能干那种事！书元厌恶地扭过头，不看二呆。

饿死？饿死不就活不成了吗？我想活。我才二十多岁，为啥轮上我饿死？再说，再说.....

你别说了！书元拍着床，他都要哭了。

疯大爷一直缩在自己的被窝里，把头捧在拱起的膝头上，这时下了床，把二呆从书元的床边拉过来，说：不要说了。啥光彩的事，说得那么细？

二呆抱住疯大爷哭起来，说大爷大爷，你劝劝哥。我是想给张家留条根呀！我想到爹，他忍心卖俺们，不也是为了留条根？好不容易活到这么大.....

书元也哭起来，他说：你做下了那种事，犯了法来找我，我有什么办法。上头要抓，也只好让他们抓。

二呆说：我在你们这里藏一阵不行吗？这里的人又不知道我的事，只要你们不说。说到这里，他又转过来对着我，说翠儿，妹子，你不会恨我吧？你不会把我的事往外说吧？

我不理他，把头扭过一边去。不料，他又往地上一跪，抱住我的双脚：你不能说！连我要你黄豆的事也不能说！

书元从床上跳下来，问：你要了翠儿的黄豆？什么时候？哪一天？

抱着我的脚的手松开了，我回头看看，二呆满脸流着汗。我趁机走开，钻到自己房里，说：我什么也不说。可是书元还问黄豆的事，二呆只好自己说了。不过，他没说他怎么威胁了我。就这，书元也忍不住打了他，打了又踢。我和疯大爷不能不在当中拉。疯大爷一边为二呆招架书元的拳脚，一边对二呆说：你真不像人了，真不像人了！书元打不着二呆，气得自己一屁股坐在地上哭起来。二呆又跪下，抱住疯大爷的脚。

我对书元说：书元哥，他也是不得已的，就留他住几天吧！

书元把脸捂在手里直摇：不行不行，弄得不好，要连累了你和大爷。这种事，说到

哪里都丢人。我宁可不要这个弟弟了……

离天亮还早，外面又是鸡叫又是狗咬的，疯大爷警觉地吹灭了豆油灯，拉起二呆，对他说：孩子，起来吧！自己造了孽，自己去受罪吧！求谁也没用。不要东躲西藏了，躲也躲不了，躲得了人也躲不了天呀！去求政府宽大吧！你就老实对政府说，你是被逼得没办法……

连劝带赶，我们把二呆弄走了。书元给他弄了一小口袋粮食，一直把他送到村外的大路上。送完回来，他先是愣愣地坐着，一会儿忽然嚎啕大哭起来了。

疯大爷小声地叱责道：你哭啥？你怕人家不知道吗？幸亏俺们住得僻静些，要不然人都给丢尽了。生死由命。他能逃出一条生路呢，就活下去；逃不出去呢，就叫他死去。你权当没这个弟弟。

书元说：我权当没这个弟弟！我怎么能够权当没这个弟弟呢？当年俺爹卖俺俩的时候，叮咛又叮咛，叫我管好他，我没管好，对不起爹呀！

我和疯大爷劝：这能怪你吗？

书元还是哭：不怪我怪谁呢？我比他大几岁。那年我从顾家逃出来，一心一意带上他。他走不动，我赤着脚背了他十几里。领着他要饭的时候，我从来不敢叫他饿着，自己没有吃饱过。好不容易在这里安了家，谁想到会走到这一步！

我和疯大爷再也说不出别的话。

这以后很久很久，我们得不到二呆的消息。八成是给抓起来了。但是我们三个人谁也不愿提起他。

四十

人是最贱的。饿得七倒八歪的人，一碗米汤就能让他活过来。接到了一点救济粮，淮北大地又慢慢有了生气。走得动爬得起的人，又都下地了，把抛荒的土地刨开，撒下了麦种，期待着麦种破土、发芽，给土地披上一层绿衣，给自己增添一点血色。

这就叫休养生息。

然而，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点点起码的变化，竟然变成某些人的功劳了。他们救灾有功，显示了三面红旗的巨大威力，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他们，他们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所以，上头派人来视察。来的是一员大官，大得不得了的大官。

省里和地区的领导对这一次视察非常重视，在视察大员下来之前就作了周密详尽的布置。人们一点也没有怀疑，前一阵反“五风”的时候，怎么没有反到吹牛吹得最厉害的省委第一书记Z先生呢？地委第一书记R先生为什么也能安然无恙呢？同样也没有人问，当初那位为民请命的“青天”书记和地区、县里那几位因“右倾”而被罢了官的专员、县长们，如今又在哪里呢？好像这一切都很正常，当年兴风作浪的人，理所当然地要成为今天收篷转舵的人。

地委R书记，我自然没有见面的幸运。然而他的才能，我却有幸领教过，真叫人终身难忘啊！

在准备迎接大员视察的时候，我们不断地听到对R书记的指示的传达。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召集在一起，听干部像教小学生念书似的教我们说几句最容易说的话。要是有人问你们吃得饱不饱，你们就说吃饱了。记得了？记得了。我们中国人天生爱面子，但凡肚里有几粒粮食，谁愿意说自己饿肚子呢？特别是在大官面前。

不过，还有问题。刚刚领到一点救济粮的农民仍然掩饰不了脸上的菜色和浮肿。怎么办呢？R书记拿主意，来个“两集中”。把重病浮肿的人集中起来，关进两眼早已废弃不用的砖窑里，派人看管，不许他们乱跑乱窜，以免丢人现眼。而那些看起来还算健康的人们，也被集中了起来，甚至还被临时搭配成家庭，分布在公路两旁的村落里，供视察者观赏。自然了，还要派出足够数量的民兵和积极分子沿途站岗放哨，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保卫首长的人身安全。

我和书元都被派定了角色。我虽然身体尚好，但属于“五类分子”，自然不能享有接受视察的恩典。但念我乃一女流，不可能有什么破坏性的行动，就派我去看管一座关押病人的砖窑。这个任务十分重要。书元呢，美了，给他配了一个老婆。这女人是小郝庄的食堂炊事员，丈夫饿死了。有人说这是个谜，哪有炊事员的丈夫给饿死的？其实没有说不清的道理。是郝队长看着她漂亮，不忍心让她饿死才叫她当炊事员的。她的丈夫不在郝队长的照顾之列。好在中国的男人们一向温文尔雅，不像西方的男人们那般粗野。

狭隘，会为一个女人而决斗。炊事员的男人明明知道老郝队长的企图，不但没有找郝队长算账，反而对老婆寄托着希望，希望老婆能给一点残汤剩饭，保住他一条性命。结果落了空。那年头不用谋杀，只要郝队长管得紧，不许那女人将一粒饭食往家里偷，那男人也就活不成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这可不是唱着玩的。

叫我跟这样的女人装成夫妻？我不是倒了八辈子霉？书元说。能不能给我换个好点的？

哎呀，只一会儿时间，又不是真的。小郝庄的寡妇倒是还有好几个，不过年纪都比你大得多。队长劝书元。

疯大爷也说：书元，别拿糖了。配就配吧，说不定还能假戏真做呢！你年纪也到号了，该讨个女人了。送上门的还能不要？

书元说：疯大爷，你再疯也不该疯到这步田地呀！这样的女人哪能要？俺不能拣到筐里都当菜。

疯大爷说：算了算了，别跟我犟嘴，孩子。你心里想的啥，我还能不知道？到时候别来求我作媒就算你有种了。

我跟书元开玩笑，说电影里常常有这样的事，为革命而装作夫妻，装着装着就成真的了。书无脸都叫我说红了。

队长说：我×他妈哟！这事儿真稀奇古怪，古怪稀奇。过去干革命做假夫妻是为了哄国民党，如今是自己哄自己。

书元不再犟。那个和他配对的女人我见过，长相还不错。

视察的日子到了。我去执行自己的任务。砖窑年久不用，黑麻麻的，好闷人。为了防止人们外出，窑上装了一扇门，门上还安了一把锁。我就守在门口。

砖窑离公路很远很远，视察的人们自然不会走到这里来。他们只会远远地看见，噢，那里是一座砖窑。对了，一座砖窑。还烧砖吗？噢，烧，烧。不过现在空着，就这样。如此而已。谁会想到里面装着人呢？

因为不知道视察的人们什么时候才来，所以病人们一早便被集中起来了。原来哄他们只关一会儿工夫，哪晓得一关关到了下午。病人们要拉屎撒尿，我都尽可能给予方便了。可是看见远远的公路上开来一串小轿车吉普车的时候，我再也不敢放人出来了。我站在砖窑门口，翘首望着公路，视察的队伍真大啊！浩浩荡荡的汽车差不多摆了里把路。旁边还跟着许多步行的。我自然分不出谁是谁，一来离得太远，二来我也没有现在年轻人精明，能认清各种车子的牌子，又能分辨车主的等级。而且，我也不想知道谁是谁。即使我认出了那位首长的车子又有什么意思呢？我没有拦车告状的勇气。而且，有那勇气又有什么用呢？只要有人指出我的右派分子身份，我的每一句真话便都会变成别有用心谎言了。有谁相信我？

我只是看热闹，同时不由自主地想象着首长问些什么，Z书记和R书记又如何回答。没有浮肿病人了吧？没有。很好。没有荒地了吧？没有。很好。没有人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吧？没有。很好。没有阶级敌人的破坏吧？没有。嗯？没有？他们会那么老实吗？不，要提高警惕。敌人最喜欢利用我们的缺点了。是，是。我们一定提高警惕。这个公社就有一个女右派。就住在这个生产队？……想着想着，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被发现了，便不由自主地蹲下身子，倚在窑门上轻轻地出气。

门被晃荡了几下，里面有人要撒尿。我求他忍着。不一会儿，又有人晃门，说窑顶上往下掉砖头和泥块，这窑说不定要塌了。

我哀求他们：叔叔大爷、婶子大娘们，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不是我不愿意开门，是不敢开呀。再忍一会儿吧，他们就要过去了。

窑真的要塌了。有人说。

我立即绕着窑转一圈，什么迹象也看不出来。我断定他们是哄我的，要出去告状，便继续求他们再忍一会儿，再忍一会儿。

公路上视察的人们正兴致勃勃地指点江山，我希望他们快点走。

我×你祖奶奶噢！俺们没饿死你不高兴是吧？想把俺砸死在里面。

你李翠还有没有良心？要是你爹妈关在里面呢？

他娘的右派，五类分子，都不是好东西。

我面红耳赤，眼泪直滚，也不敢打开窑门。

一个好心大爷提醒我：李翠，你不懂，去找干部来看看这窑。真是要塌了。

我决定去找干部。但是我害怕里面的人忍不住把门给砸了，那门不结实，锁也不牢

靠。我求他们：等我回来，你们千万等我回来啊！

我到哪里去找干部？干部们都被叫去汇报了。也许就在公路上，可是现在他们都上了汽车或骑自行车飞跑了，我不敢追也追不上。我从小路上跑着回村去找疯大爷。疯大爷说，那窑，也实在不行了，我陪你去看看，不要真的出了事。

晚了，来不及了，窑已经塌了。我吓得瘫倒在地上。疯大伯一把拽起我：找人去！喊救命！我发疯似的跑起来，一路跑，一路叫：救命，救命，窑塌了……

劳动的人们哭着叫着朝窑这里跑。病人们已经给砸死、压死。吓死很多了。那扇临时装上的门却完好，锁也没有坏。噢，叔叔大爷、婶于大娘们，你们是不是为了我这个右派分子才这样规矩的？你们为什么不……

视察的人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他们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看到，淮北平原的形势一片大好，一片大好！我×他妈哟！我学着队长在心里骂着。

可是，晚上回来的书元却笑嘻嘻的。我问他笑啥，他说不赖。啥不赖呀？她。

疯大爷摇摇头，说：迷上了。这么快就迷上了。

书元不好意思地咧着嘴笑。我怎么也摆脱不了恐惧和荒唐的感觉。天哪，我们过的是怎样的日子？！

四十一

淮河边最悲惨的一幕就这样结束了。舞台上没留下多少血迹。而不流血的死亡是很容易被人忘记的。偶然，有人在刨地的时候，挖井的时候，发现了当时埋藏得不深的饿殍，便又把它们用土盖起来，换一个地方去挖去刨。中国啊，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众多的人口自然应该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丰润自己的土地，使大地生生不息。

不到一年，淮河人便又像割了头的韭菜似的兴旺起来，我也生下了我的儿子：喜潮。而玉儿，也打算来家结婚了。我们的下一代将很快地成长起来，我们失去的仅仅是迟早要离开我们的爷爷奶奶，何况他们也不是个个可爱的。玉儿兄弟姊妹很快就把顾远山老头忘记了。我们一家人也因为没有了这个古怪的老头而和顾家人日益亲近起来。顾维舜成了我爸爸最好的朋友。这是不是坏事变好事，因祸得了福？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初稿于上海
一九八七年三月定稿于汕头大学

常言道，三十年风水轮流转。可是如今的风水轮流用不着三十年。风水的车轮掌握在一只巨大的手掌里，要它什么时候转就什么时候转，要它转到哪里就转到哪里。

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淮河的风水不知转了多少转了。宝塔集的风水自然也跟着转。官场上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我说不清楚，也不敢说清楚。平民百姓的状况倒是可以叙叙的，然而又是说来话长。反正，我们也都像戏台上的演员那样，不断地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一会儿是“敌”，一会儿是“我”，一会又为“友”。每个人变换角色的时间、地点、原因、形式，都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却一模一样，那就是当事人对自己变换角色的前因后果都莫名其妙。只觉得从天外刮来一阵又一阵旋风，把我们从地上挟走，让我们在半空中翻几个跟斗，又把我们随意地抛掷下来。抛到哪里就是哪里，谁也别想爬到别的地方去。

五七年反右派，五八年大跃进，五九年反右倾，六〇年自然灾害，六一年抓调整，六二年抓斗争，六三年整党风，六四年搞“四清”……一出戏一出戏地连轴转，谁个是编剧，谁个是导演，谁个敲鼓谁个唱，至今也没有人能列出一个像样的节目单来。

什么事都要习惯，习惯成自然。我们确实已经习惯了。阶级斗争的风云变幻，平民百姓的荣辱祸福，就像淮河的水涨水落，就像季节的春夏秋冬，就像人们的生老病死，该来的总要来，该去的总要去，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春天不是盼来的，冬天也不是赶走的。

所以，当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来临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问一声为什么。跟着走就是。至于落到自己身上的是雨点还是蜜糖，只能等它落下来再说。

我们宝塔集人和全中国人一样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了，又一次扮演了我们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扮演的角色。宝塔集的历史又增添了一页。

现在，描写、介绍、分析文化大革命的著作已可以车载船装，有的人已经认为这样的书籍太多了，要大家不要再写了。可是我翻了不少这样的著作，却没有看见宝塔集人的故事。没有人为宝塔集而控诉，没有人为宝塔集人而流泪。我心中不服。宝塔集虽小，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可分割；宝塔集人虽然是按蚁之民，也是那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的承受者、参与者和见证人，没有他们的故事，任何伟大的著作家都写不出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历史。所以，我要写这本书，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博物馆里为我的卑微的故乡和乡亲争取一个小小的角落。

—
当宝塔集人奉命推倒在集北头站立了几百年的宝塔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造反派。

宝塔集上有一座塔。宝塔集的名字便是由它而来的。围绕着宝塔的种种传说和现实，便是宝塔集的文化。世代代的宝塔集人，无不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中长大。

据说，这塔的下面埋着一位高僧，他坐在一口大缸里圆寂，那口大缸便成了这座塔的塔基。小小的宝塔集怎么会出一位高僧呢？原来他与朱元璋皇帝有过一点关系。当朱元璋还是一个穷措大的时候，曾经到过宝塔集上的开元寺，不要以为这座寺庙有多大的气魄，只不过是几间瓦房而已。但是朱元璋要在这里出家，名为皈依佛门，实际上是想混口饭吃。可是寺庙里的那位老和尚却不肯收下这位徒弟，他向朱元璋大声呵叱：去！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你应该去当皇帝。朱元璋一听这话，便收起了出家的念头，与和尚一拜而别，打天下去了。以后他果然当了皇帝。不知是这位皇帝老爷不忘旧情，记起了那位给自己指点迷津的和尚呢，还是这位和尚为了炫耀自己而把这段情节宣扬了出去，这和尚就成了高僧了。于是有了塔。于是宝塔集成了宝塔集。灰色的砖塔十三层，坐落在集北头的一片空地上，成为集上的最高建筑。宝塔集人以此为光荣，将那和尚的功德世代地传扬，使宝塔集人一坐下来就感到佛光笼罩，比别处人高出一肩半头。老人们在塔前说古论今，孩子们绕着塔游戏唱歌，出门归来的人们只要一看见塔尖心里就感到踏实，到家了！

没有人敢对宝塔说长道短。淮河年年涨水，淹倒了集上的无数房屋，可是一到塔前便退下了。集上人认为那宝塔可以驱邪镇妖。所以逢年过节，塔前便香烟缭绕。喜欢爬高上低的孩子，从一懂事起就被大人告知，那塔不能爬，爬了要遭灾的。孩子们都听话，没人敢爬。只有一次，镇长的侄儿大傻子爬上去，还站在塔顶上撒了一泡尿。镇长和他的哥哥虽然把这孩子狠狠地捧了一顿，还在塔前烧了香放了炮，到底也没能消除这不敬行为所带来的恶果。解放以后，镇长被枪毙了，大傻子的爸爸也死在监狱里，过了几年大傻自己也成了反革命分子进了大牢，关了六年才放出来，找不到职业，只能在街上卖油条。“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听见他这样的叫声，再看他那一身油渍麻花的打扮，谁还能想象他的父辈们曾经在宝塔集上风光过？

解放以后，宝塔所受的香火大大地减少了，因为反对迷信。可是无论如何，宝塔集人对宝塔仍然怀着敬畏之情。这些年，宝塔明显地倾斜，向西南方向倾斜，老人们却暗自嘀咕，莫非它要倒了？如果它真的倒了，宝塔集人会不会遭灾遇祸啊？

谁会料到，宝塔在一九六六年的冬天真的倒了，还是宝塔集人自己推倒的！鬼使神差似的，大家都去了，去采取那一次空前绝后的革命行动，把宝塔推倒！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朱元璋这个皇帝老儿给宝塔带来了光荣，也是朱元璋这个皇帝老儿给它带来了被推倒的厄运的。

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人们刚刚丢下饭碗就听到了公社文革领导小组的召唤：到宝塔前集合！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宝塔周围的那一片宽地便成了群众集会的场所。宝塔集人在塔前听到了各种各样关于文革的消息，知道外边有人造反了，造反的原因是刘少奇反对毛主席。造反派忠于毛主席。宝塔集人不知道这件事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当然，他们早已从报纸上知道刘少奇是什么人了。刘少奇常常在毛主席身边站着，为什么会反对毛主席呢？宝塔集人无法理解。两年多以前，宝塔集人又知道了刘少奇的夫人叫王光美。她领导的“四清”工作队进驻了一个叫桃园的地方，把桃园的干部整得好苦。她创

造了“桃园经验”，宝塔集人也尝到了那经验的滋味。许许多多合作商店的店员因为多分了一点利润被判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勒令“破产还款”；许许多多的个体小商贩被判为投机倒把，勒令立即补税。那时候，宝塔集到处都是廉价拍卖的市场，为了还款，人们卖掉了自己的家具、衣物和女人们的首饰。顾维舜把他和玉儿妈结婚时的大床也抬到街上卖了，红漆的雕花大床啊，只卖了十元钱。玉儿妈为此哭了好几天。她埋怨丈夫当初不该从商店支取那么多钱，不够花就不够花吧，勒紧裤带喝稀饭，也比现在卖床强。可是顾维舜哪里预料到会有这一天呢？商店是大家凑起的资金开办的，他们拿的是自己挣下的钱，不是国家发给的工资，为什么这也不允许？没有人敢问工作队，也没有人敢问王光美。可是如今王光美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了，怎不叫宝塔集人感到稀奇？稀奇归稀奇，宝塔集人从来不喜欢刨根问底，随便是谁个打倒谁，只要不搞到自己头上，他们就不吭气。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几个月了，除了中学的孩子们闹着斗老师的外，宝塔集人没有采取任何革命行动。他们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召集到塔前，听宣传，喊口号，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支歌。没有人想到今天要他们采取行动了。

六六年的冬天，在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已经是造反派的天下了，可是宝塔集的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还在公社领导的手里掌握着。统领全局的还是公社党委艾书记。艾书记不是个寻常人物，他当过县长呢，因为反对“三面红旗”才降了职，六一年曾一度官复原职，六四年“四清”时又把他降下来了。宝塔集人只知道他几起几落，对他的起落的原因却不甚了了。

那天的天气真好！艾书记迎着太阳站着，不大漂亮的脸子突然变得漂亮了。他站在用桌子搭成的讲台上，向噼噼喳喳的群众挥动着手，和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上接见红卫兵的样子差不了多少。他说话的嗓子也尽量提高了——

革命的同志们！今天我们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是要干一件我们宝塔集人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情，拆塔！

噼噼喳喳的人们立即安静下来，看着艾书记，也看着艾书记身后的塔。他们都浸在温煦的阳光里。那塔原是灰色的，如今却闪着光亮，身子向西南歪着，好像在端详着艾书记的背影和艾书记面对的人们。

艾书记说，宝塔集这地方，封建主义的阴魂不散，解放十几年了，这座塔还在这里。这塔是纪念朱元璋和老和尚的。一个是封建皇帝，一个是封建迷信，都是文化大革命要横扫的。国际歌里唱不靠神仙皇帝，我们为啥还要这塔呢？

艾书记说，他知道，宝塔集人对这塔是有感情的。天天看惯了，突然扒掉了，会觉得少了什么。这不要紧，慢慢会习惯的。朱元璋的老家人对朱元璋的感情该比我们深吧？可是凤阳城的古城墙都扒了。是在省里直接领导下扒的。省里成立了拆墙委员会，县里成立了拆墙领导小组。毛主席说，不破不立，大破大立。我们先要敢破啊！

宝塔集人只听不说，看着艾书记，也看着他身后的塔。他们都在金灿灿的阳光里。那塔简直成了金色的。它的身子好像更向西南方向倾斜了，好像要从艾书记的影子里逃出去。哎呀，谁敢拆这座塔？

艾书记一遍又一遍地吆喝着：动手吧！没有人响应。那些中学的红卫兵是有所准备的，有的人手里拿了工具，但是也不动。

我来！我来怎么样？一个人一边叫着一边朝宝塔跟前跑，不是别人，竟是小时候站在塔顶上撒过尿的杨大傻子。人群中响起了一阵嗡嗡之声，这孩子哪来的胆啊？吃的苦头还不够吗？

杨大傻脸色庄重地看着宝塔集的老少爷们。宝塔集的人都知道，大傻子并不傻。论相貌，他是一表人材，皮肤白皙，四肢匀称，是集上数得着的一名英俊男儿；论心眼儿，也算得上聪明。四岁时在他父亲开办的小学里念书，成绩优秀。这样的人倒了霉，除了怪命和运，还要怪他不安分。父亲死在大牢里之后，他只得拾柴为生。拾柴就拾柴好了，他偏偏要胡言乱语，说自己日出而出，月升而归，像个“日月党”。于是便成了反革命分子，当时他才不过十六岁。现在是什么身分？反革命分子的亲属，刑满释放分子，卖油条的汉子。拆塔的革命行动哪里数得着你？

我来！我来怎么样？

杨大傻子把目光转向艾书记。艾书记把目光从大傻子的头顶上迈过去，看着大家：大家看行不行？

让他上去吧！老少爷们几乎是异口同声。他们都不曾分析过自己为什么会持这样的态度，会不会包藏着祸心？必然带来灾害的事就让这个倒霉蛋去干吧，反正他已经够倒

霉的了。自己难免也要参与其事，但神仙从来不降罪无可奈何的胁从者，也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

好吧，给你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艾书记点了头。

大傻子猴子似的爬上了塔顶，还站直了身子扬起双臂大声吼叫了一声，然后用力气扳动一块砖，高叫着“闪开”，把砖扔在塔底下，砖碎了！

红卫兵这时候才一哄而起，纷纷向塔上爬去。顾维舜的唯一的儿子，十七岁的舍儿冲在前头。顾维舜忍不住叫了一声“舍儿！”舍儿却头也不回。

不一会儿，几百年的一座宝塔变成了一堆碎砖了。红卫兵们唱起了歌谣：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

艾书记止住了大家，要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来结束这一次革命行动。于是大家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最后，大家又在艾书记的率领下高呼了文化大革命的口号，耳边绕着口号的余音纷纷散去。

从此以后，宝塔集人过起了没有宝塔的生活。宝塔集被改名为“红星集”。可是“红星集”只存在各种文件里，在人们的口头上，宝塔集还是宝塔集。

二

宝塔倒了以后不久，艾书记也倒了。不是宝塔集人把他推倒的，是县里的造反派把他揪出来了。县里有一个造反司令部，叫“心向东”，先把大字报贴到宝塔集上来，说艾书记是不折不扣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字报列举了艾书记的几大罪状，每一条都能吓死人。

第一条，是大跃进的时候主张瞒产私分，反对三面红旗。在省里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头目所谓青天书记开仓放粮的时候，他拍手叫好，说“青天书记”是为民请命的青天大人。所以庐山会议以后，他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降职使用，来到宝塔公社任书记。

第二条，是一九六一年趁党进行政策调整之时大刮右倾翻案风。那时候，省里来人给艾书记翻了案，平了反，艾书记官复原职了。可是他不但感谢党对他的宽大处理，反而对过去的事耿耿于怀，他到处作报告，发泄对党中央的不满情绪，甚至丧心病狂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艾书记在一次报告里提倡“讲理”，讲理就是实事求是，这并没有错。可是艾书记话里藏刀，他举了朱元璋画像的例子把矛头直指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说朱元璋长得实在不好看，脸上还有七十二颗大麻子，奔儿头，翘下巴，整个脸成了马鞍形。画师照他的真实面貌画了，他硬说把他画丑了，把画师一个一个地杀了。后来有一位聪明的画师看出了苗头，便把朱元璋画成一个美男子，朱元璋一看大为欢喜，便重赏了那位画家。可是后来的人谁相信那是朱元璋呢？朱元璋没有给人留下美好的形象反而留下了话把儿。我们是共产党，不要学朱元璋。脸上有麻子，不要叫人家说是玫瑰花。

这些罪状看得宝塔集人只咂嘴，都说原来艾书记还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却没有人起来把他“拉下马”。还是“心向东”司令部派来了红卫兵和造反派，把艾书记抓起来，先在宝塔集游了街，然后带到了县里去。说是要和县里的其他走资派关在一起。

推倒了宝塔又失去了艾书记，宝塔集失去了定盘星。宝塔集人的心活了，乱了，各种各样的造反派便应运而生。老辈人说，日本鬼子打进中国的那阵子，宝塔集也是这样的，张三拉一支队伍，李四弄几条枪，都说是为了打日本，结果却是自己打自己。蓝永继的父亲蓝龙就是为这事被别人杀了的。不晓得是不是一辈传一辈，蓝龙的儿子蓝永继现在又举旗造了反，成立了“杀回集造反大队”。为什么叫“杀回集”呢？因为他们被从集上下放到农村去，当了农民了。

蓝永继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候下放的。在乡下吃了不少苦，一九五九年，奶奶也

饿死了。六一年政策放宽的时候，蓝永继自己回到集上，跑起了小生意，赚了一点钱，正想把妻子杨小群和母亲从乡下接回集的时候，政策又紧了，跑生意变成了搞资本主义。税务局说他偷税，罚他交一大笔钱，他交不出来，只好把集上仅存的几间房子卖了。从此曾经在集上声名卓著的蓝家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蓝永继只好再次回到乡下务农了。可是他务不好农。一家人只得饱一顿饥一顿地活着。现在他又要杀回宝塔集来了。可是他的造反派实在不景气，七零八落地没有多少人。与他一起下放的宝塔集人并不少，可是人家都怕闹不出名堂来，所以不肯跟着造反，而要看一看再说。蓝永继也实在没有多少办法，说是“杀”回集，没刀没枪地怎么个“杀”法？即使回来了，又住在哪里，吃在哪里？所以，也只是贴贴大字报，叫叫口号罢了。大字报上说把他们下放到农村是走资派的诡计，还叙述他们在农村的种种困苦，有不少叫人心酸掉泪之处，可是也仅此而已。

隔三拉四地，蓝永继把自己的队伍带到集上来，把公社的干部拉出来游街，骂一顿，打一顿，再高呼几句：不回宝塔集，死也不闭眼！集上人也只是看看热闹。有一些好心人还暗暗为他担心，这样闹会有好果子吃吗？可是也没有人敢去劝阻他，因为眼下时兴造反呀，毛主席号召的事还有人敢拦吗？

这一天，蓝永继又把他的造反派拉到集上来了。走在队伍里的居然多了几个人，他那个劳改以后留在青海劳改农场的叔叔蓝虎带着老婆孩子“杀”回来了。这一回，宝塔集人更有热闹好看了。那蓝虎虽然是一个吃喝嫖赌的流氓，他的经历却富有传奇色彩。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被抓去劳改，家里丢下了他的结婚不久的爱妻“短一点儿”和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可是等他刑满释放回来的时候，他的妻子和女儿却早已离开了宝塔集，谁也不知道她们去了哪里。蓝虎在母亲和侄儿面前大哭一场，连夜就离开了宝塔集，说是去找妻子和女儿。从那以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如今又突然冒了出来，还带着老婆子，怎么不叫人大感兴趣？

人们站在街道两旁，看着蓝虎，叫着，和他亲热地打着招呼，同时饶有趣味地盯着他的老婆。那女人可真是丑得很。高大的个子像山神，脸上的线条像男人，还瞎了一只眼。记得“短一点儿”的人都说，这女人和那女人简直没法比。“短一点儿”就是有一点点瘸，脸蛋身段可都是美女。蓝虎一定是没有别的办法才讨下这个女人的吧！

蓝虎好像看出了大家的心思，他便离开队伍站出来大声地对街边的人说：老少爷们！我蓝虎一个人离开宝塔集，回来的时候是六个了！一个老婆加四个儿子！这五个人可都是我赚的！这是我老婆，大家觉得丑，是不是？是丑，可是心好！不像“短一点儿”，丢下我跑了！我到南乡玩长虫去找她，人没有找着，命差一点儿也送了！我被长虫咬了一口！妈的，这样的女人！还是我这个丑老婆好！不但对我好，还会生孩子。两年给我生一个儿子，生到五十岁还能生四个！八个儿子够一个班了！她能给我赚多少？老少爷们！人生在世，图个什么？还不是一个“赚”字？能赚人就赚人，能赚钱就赚钱，有赚就好！

有人为蓝虎叫好。蓝虎的丑女人只会对大家傻笑。倒是他们的四个儿子惹人喜爱，一个个虎头虎脑的。有人问蓝虎是不是打算回到宝塔集来住，蓝虎摇头说：不回来了，不回来了！我不过是趁这机会回来看看，告诉乡亲们我蓝虎还活着。不是大家造了反，我哪有这样的机会？

谁也说不清，蓝虎叔侄们所搞的是不是文化大革命，但是大家都觉得眼下和从前确实有点不一样了。

因为蓝虎是舍儿的干老子，游行结束的时候蓝家叔侄便到了舍儿家，顾维舜一家人自然是热情接待，留他们吃饭，叙话。

自从蓝虎走后，顾维舜一家的变化也很大。顾家的老太爷，古怪的老头顾远山在大跃进年月连病带饿去世了。顾维舜的大哥顾维尧被迁出了宝塔集，老三顾维禹蒙冤自杀了。顾维舜本人的情况也不妙，五八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六一年才搞了帽子。如今一家人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缩在宝塔集，过着饿不死撑不着的日子。可是顾维舜不愿意对这位不安本分的干亲家诉苦，他不想造反，不想惹是生非。他只拣好事说：儿女们都大了。三女玉儿大学毕业留在上海工作，嫁了个丈夫也是大学生。二女德儿读书晚，没有能进大学，可是当上了农村中学的“耕读教师”，就是亲事还没着落。耽误了。唯一的儿子舍儿也进了高中了，如果世道平安，明年就能上大学。他说，人生在世图什么？蓝虎兄弟说图个“赚”字，可是我不想赚，我只图平安二字。蓝虎兄弟，永继侄儿，我的话也许不中听，可是我还要说，你们别闹了。谁知道上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那些

干部我们能斗倒？风头一过还不是我们老百姓倒霉！

蓝虎说：二哥，你说的也在理。可是我心里就是不服气。不错，我们蓝家爷们在宝塔集上干的事不光彩，开赌馆、办妓院、吸大烟，可是我们没有害过街坊邻居啊！我们就有那么大的罪？老头子死在劳改队里，我又弄得妻离子散。大哥留下永继这一条根，年纪轻轻的该没罪吧？可是也给划了右派，下放农村，摘了帽子也不让回来。他好歹也是师范毕业生，凭啥不给安排个教师的职位？姓蓝的一辈孬就辈辈孬了不成？

顾维舜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冤家宜解不宜结，能忍的还是忍了吧！

蓝永继说：二叔，不是我驳你。要说忍，你该忍得不少吧？你得到了啥好处？给你摘了右派的帽子，为啥不让你再当商店的经理？为啥不恢复你原来的工资级别？

顾维舜连连摇头：我不想当经理！无官一身轻，我吃得饱，睡得着。

一直在一旁和蓝虎的丑女人叙话的玉儿妈这时忍不住白了丈夫一眼：别说瞎话了！这些天你吃得饱是真的，睡得着是假的。天天天不亮就满街溜着看大字报，也不知你想找啥！

蓝永继笑着说：二叔一定是当一回右派吓破了胆，怕人家再贴自己的大字报吧？放心吧，这一回搞不到你我爷们头上了，大地方人有学问，有三家村四家店的，咱们这里只外走资派。

顾维舜摇摇头：我看不是这样的。

只读过几年私塾的顾维舜对于政治实在是一窍不通。他从来不懂得啥叫时代的脉搏。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运气。自从反右斗争以后，他个人和家庭连遭厄运，使他懂得了自己的运气和政治有一种说不明白的关系。所以他也不得不关心一下政治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顾维舜就不忘天天读报，想了解这一场革命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可是研究来研究去，也没能找出个答案来。

斗争的对象是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都跟自己不沾边儿。报纸上当然不断敲打“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自己当过右派分子，当然有关系，可是他觉得自己已经改造好了。他牢牢记住了给他摘帽子的时候领导的叮嘱：从今以后要夹着尾巴做人。他确实把尾巴夹紧了。他的处世原则是：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做。上头叫他干啥就干啥，决不多走半步路。上头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他就马上买来了《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恭恭敬敬地供在条几上。上头号召破“四旧”，他马上在家里翻箱倒柜，把所有可能与“四旧”有关的东西都“破”了，该丢的就丢，该摔的就摔，该烧的就烧。玉儿妈从娘家带来一个腌菜缸，是清代的陶瓷，六楞，二尺多高，青绿色的底釉上飞舞着六条黄龙，玉儿妈爱得不行，他也用石头给砸了，害得玉儿妈和他大闹了一场。最后只留下了两样东西，他一时舍不得“破”：儿子小时候穿过的黄缎子道袍和父亲留下的家谱。前者是儿子的十二个干老子的馈赠，关系着儿子的命运，后者是父亲的遗物，父亲曾嘱他将来发达之后回故乡去认宗续谱。可是在宝塔集被拆的那天晚上，他也咬着牙把它们送进了锅灶，只不过烧了之后又点上几支卫生香（现在没有敬神的香了！），对祖宗和神明作了一番祷告，祈求他们的宽恕。

顾维舜从来不参加对什么人的批判斗争，除非上头叫他去。只有一次例外，就是县里统战部长被拉到宝塔集批判的时候，他自己悄悄地走进了会场，而且还靠近了主席台。但是他并没有说话，他只是想去看看，这位把自己划成右派又给自己摘了帽子的大人物今天是什么模样。那位部长往日的威风哪里去了？穿得窝窝囊囊，稀里巴脏，眼泡也肿了，老鼠见了猫似的看着批判他的人。顾维舜碰上了他的目光，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因为他觉得那部长在对他笑，可怜巴巴的，像讨好。顾维舜说不清心里是害怕还是欢喜，他怀疑这一切都不是真的。难道天下真的要变了？到了斗人的捱斗，捱斗的翻身的时候，他不相信。他只觉得一切都乱了套。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平安无事呢？他不知道。再加上儿子舍儿不听话，参加了红卫兵，整天在外面风风火火，这些都叫他睡不着。

但是顾维舜不愿意对任何人叙说自己的这般苦恼。他认为这也可能会招惹是非。可是玉儿妈偏偏要对别人说这个。他不敢和玉儿妈顶嘴，又不愿和蓝氏叔侄谈下去，便问玉儿妈：是不是该做饭了？

玉儿妈一撇嘴：哟！啥时候叫你为吃饭的事操心了？做一顿饭在我手里费啥事？

顾维舜连忙赔笑：我当然知道你的手艺高。不过今天来的是远客，又是稀客，希望你做几样拿手的菜。

玉儿妈看看太阳，真到了该动烟火的时候，便下了厨房，蓝虎叫他的丑女人去帮忙，女人乖乖地去了。

蓝永继伸头往厨房看看，又凑近顾维舜的耳朵，小声地说：刚才二婶在这里我不敢说，怕她说我嚼舌头。我听说周纯一回来造反了。周纯一还提出了个口号，要从六〇年算起！你说这世道是不是真要变了？

顾维舜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这是真的？这下子我们县就热闹了。这个人闹起来可没个准儿，上头能由着他这样的人去闹？

三

周纯一确实起来造反了。连我和高凡都感到意外。

周纯一是我大姊夫，可是已经是多年没有走动了。开始是因为他这个老革命看不起我这个小派，后来我摘了帽子，当了民办小学教师，他又因为自己成了反革命不愿意见我。岂止是我，连我的父母、宝塔集人他都不肯见了。他是宝塔集的解放者，第一任长官，曾经在宝塔集斗地主、分田地、镇压反革命。那时候他在宝塔集何等威风，无论男女老少，见了他都满脸堆笑，恭恭敬敬地叫“区长”。现在他是什么？反革命分子，坐了三年牢，刑满释放，把工作也给丢了。他回宝塔集干什么？但是周纯一并没有认错。他认为自己六〇年抢粮分给工人是对的。共产党打天下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老百姓？老百姓快饿死了，他能见死不救吗？

他从监牢里出来之后就一家人带到了他的老家山区去了。那里是老解放区，他是在那里长大从那里参加革命的。他的爹妈都为革命牺牲了，是老乡们把他养大，所以他说自己是“革命的孩子”。他不怕在乡亲们面前出丑。果然，家乡人并没有因为他坐过牢而轻视他，相反，还有人夸奖他，说他是英雄。有人对他说，那里也曾经发动过“饥民暴动”，但是结果很惨，不是死于枪弹，就是在饥寒中毙命。乡亲们劝他好生种地，等待着重新出头。他们不相信那些坏事都是毛主席叫下面的人干的。只要毛主席知道了事实真相，非惩治那些孬种不可。

可是周纯一哪里会安心种地呢？他心里憋着一肚子气，一有机会就要发泄。他不肯和大家一起种地，偏偏要自己开荒种药材，结果被当做资本主义整了一顿，他骂了一顿娘。他还写信给当了大官的家乡人，骂他们忘了本。说老区人民养活了你们这么多年，你们一进城就忘了他们。你们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是冒牌货，老子才是真的，却被开除了。幸亏中国人有点乡土观念，看在他爹娘的分上，没有人和他计较，只说他受到过刺激，精神不大正常了。所以他有了一个绰号“周大傻”。他也很乐意有这样的绰号，更加装疯卖傻大吵大闹起来。有一次，他闹得过了火，对“深挖洞，广积粮”攻击起来了。他看到有人说要准备打仗，在深山老林里建起了楼堂馆所，便到那些建筑工地上大喊大叫，他说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能打仗吗？厕所比老百姓家的堂屋还要好，坐在里面屎尿也拉不出来了，还打个什么仗？人家对他说，这是为大人指挥打仗用的，他竟然骂起粗话来了：屁！我看是穷烧！这样闹下去当然不行，当地政府只好把他关了几天，教育教育。可是一放出来，他就跑了，跑到了北京，找到了公安局敞大门硬要往里闯，要人家把他抓起来，说自己是反革命。人家和他的老家政府联系，老家人又为他遮掩，说他精神有毛病，又派人把他领回来了。那之后，我大姊和乡亲们就看着他，不让他再跑到外面去，你真疯也罢，假疯也罢，就在这山沟里疯吧，可别疯到外面去。他倒安稳了一阵。

我大姊跟着他可真吃尽了苦。她给家里写的每一封信都滴满了泪水。父母把这些信拿给我们看，叫我们写信安慰她。我们都以为周纯一真正疯了。

可是他却起来造反了！

他起来造反的消息也是大姊写信来说的。她说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周纯一再也不安分了，整天住外跑，谁也劝不住。他说这是毛主席发动的第二次革命，要把那些变了质的共产党员清除出去。像他这样的好干部，出头的日子到了。他找到省城，说要找当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青天书记”，要和他联合起来把全省的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他找到“青天书记”了没有，谁也不知道，反正他打那以后就没有回过家。大姊要我们帮她寻找，我们到哪里去找呢？

我和高凡对文化大革命都不感兴趣。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怕这一次又和五七年鸣放一样是“引蛇出洞”。那时候毛主席不也是这样号召吗？叫我们给党提意见，揭露阴暗面，结果是谁听了他的话谁倒霉。大概这一回不大会有人上当了吧，所以他老人家首先发动不懂事的青年学生“红卫兵”。高凡在北京的同学来信也证明了我的怀疑。北京一些大学里又打了不少“黑帮”了。一个人一辈子上一次大当就够了，哪能再第二

次上当？高凡的想法和我差不多。别看高凡其貌不扬，瘦瘦高高的个子像葵花籽子一样，头顶上还生着一小撮白毛。他可是个学哲学的料子，有一个哲学家的头脑。他的聪明大概都藏在他那一小撮白毛里。打从“文革”一开始，他就警告我：不要头脑发热。他已经调到县城一中教书，学校里学生们揪老师出来批斗，也没有揪到他，因为他刚调来不久，“罪行”还没有暴露。有人推举他出来领导“文革”，他也谢绝了，谢绝的理由无可辩驳：他老婆当过右派。

但是我们也不是对文革毫不关心。我们从“文革”一开始就注意收集各种各样的材料，小报啦，传单啦，“两报一刊”的重要文章啦，一堆又一堆，高凡都分门别类地加以处理。高凡说，这些都是无价之宝。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大概只有在这样时期的小报上才能获得一点真实的知识。过去被封锁的种种情况，现在由于斗争的需要曝光了；过去只知道把别人扒光了衣服出丑的人，今天自己的衣服也被扒光了，这种人大概只有这时才会明白他和别人是一样的人；现在是所有人头上的光环都黯然失色，只有一轮红太阳了。不知道高凡怎么会想出这样的怪论，和报上宣传的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完全不同。但我又说不出他错在哪里。我只能说：好哇，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合作写一部文革史吧！

要不是周纯一突然出现在我们家里，鼓动我们去造反，我们会一直这样逍遥下去的。可是周纯一来来了，改变了我们的一切。

那是一个星期天，高凡和我们的儿子喜潮都在家里。又恰是高凡的三十岁生日，我张罗着做一点好吃的。喜潮已经七岁，乡下的孩子没得吃，饿得不行，嚷嚷着要包肉饺子。过生日要吃面条，我做几样菜吧！我对他说。他便叫着杀鸡。杀鸡就杀鸡。我捉了一只小花母鸡杀了，捺在开水里。正当我和喜潮一起蹲在地上一边拔鸡毛、一边嘻嘻地说笑的时候，一双穿着劳保棉鞋的脚伸到了我们的洗鸡盆边。我沿着这双脚往上看，便看到了周纯一的充满嘲笑的眼睛。真把我吓了一跳，我慌慌张张地站起来，把盆也踢翻了，鸡倒在地上，水洒了一地。

你这个人真坏！你来干什么？滚！喜潮愤怒地推着周纯一。我连忙拉住他：别，他是你的大姨夫。

我大姨夫疯了！喜潮叫道。

我吓得捂住了喜潮的嘴。

周纯一仍然不动地站在那里，眼里的嘲笑不见了，有了一点亲切。他完全像个庄稼汉了。五短身材更加粗壮，眉毛更浓，眼也更亮了。他像红卫兵似的穿起了旧军装，当然那是他自己的。他穿上军装很神气，看起来当年叫他脱掉军装去当地方官是错误的。

这是喜潮吧？走，进屋去。周纯一倒像主人了。

我叫喜潮到自留地里去把他爸爸叫回来，高凡在浇菜地。我把周纯一让进屋里。我叫他坐，他不坐，东屋西屋地观察着。我们一共三间草屋，都被他看遍了。回到堂屋，他眼里又有了嘲笑的意味。好啊，李翠，到底是知识分子，到哪里都讲个艺术性儿，你们的家比我家强多了。

我们家里有什么？不过干净一点罢了。我说。

有什么？有一点也不破的被，有帐子，还有箱子。你到我们老区去看看，有什么？有的是破烂，破烂，还是破烂！他妈的打天下不如坐天下的……

我很不高兴，忍不住顶他一句：别忘了我当过右派，不是坐天下的！幸亏你不在台上了，要不然我这样的人大概该活不成了。

不，只要不乱说乱动，我就叫你们活得更好。不过，我要让农民活得比你们还要好，要让老区的群众活得最好。这才叫公平。现在不公平，没有公平叫什么社会主义？屁！他不论在谁面前都敢说粗话。

我冷冷地问：这该不是我的罪过吧？

他说：这当然不怪你。都怪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他们变成修正主义，忘了本了。所以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

高凡回来了。他在门口放下水桶，问我：为什么还让大姊夫站着？我像得救似的从屋里走了出来，故意大声对高凡说：我看他是来找你的，你出身贫农啊！和我有什么好谈的？我褪鸡去了！我得重新烧水，鸡毛还没有拔尽，还要给他们泡茶。

周纯一果然是来找高凡的。他说自己是学刘备三顾茅庐来了。他如今已是淮北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的总指挥，可惜文化不高，所以来请高凡做他的军师。

我能干什么？高凡说。

用得着秀才啊！周纯一热切地说。我们正在准备一次统一行动，把大跃进时饿死人的内幕彻底揭露出来。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首先要造成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我要你去给我造革命的舆论。

高凡问：你打算怎么干呢？

周纯一很有气度地把手一挥：这不用你问！我是打仗的出身，指挥打仗不在话下。我对你说吧！我已经串连好了。所有的贫下中农和因为反对大跃进而捱整的干部都站在我们这一边。我已经把艾书记抢到手里……

怎么抢啊？高凡问。

周纯一调皮地眨眨眼睛：这还不容易？找一支贫下中农造反派，到心向东司令部去要人就是了。就说是要批斗他，他们敢不放人？不放就是包庇走资派。艾书记就是我们的材料袋。大跃进中谁个表现好，谁个吹牛说谎他都一清二楚。可惜我没有见到青天书记。

高凡！周纯一说得兴奋起来，把棉军衣的扣子都解开了，他大声地叫高凡，好像指挥官要向下级下达命令了。高凡却慢条斯理地把头转向他，问他要干什么。

我叫你去掌握造反报的大权。第一件事是出一期从六〇年算起的特刊。从六〇年算起，这是我们的战略口号。这个口号在我们淮北是最能动员群众的。但是我们也不是光喊口号，我们要搞材料，一个县一个县、一个村一个村去细查，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灾害的惨状都收集起来，在报纸上揭露出去。别这样看着我！我现在手里还没报，但马上就有了，我们就要夺权了，要把心向东这个保皇派撇开，夺县里的权，夺报社的权。这些活动都不让你参加，你就给我准备这一期专号，还要写一篇社论，叫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此时的周纯一真有点大将风度。他说得连自己都着了迷，两眼痴痴地看着前方，好像已经胜利在望了。我和高凡都怔怔地看着他，不知该说什么好。直到他问我们为什么不说话的时候，我才看了高凡一眼，犹犹疑疑地说：这怕不行吧？从报纸上宣传的精神看，心向东的方向是对的，三面红旗不可动摇……

你说什么，李翠？你忘记了你的爷爷奶奶是怎么饿死的了？我问你，叫老百姓成千上万地挨饿的路线是什么红旗？别说三面红旗，八面红旗我也要把它拔了！我要让淮北的人看看，我周纯一是不是反革命！他一面说一边把手伸向我，好像要抓我的衣领，可是手伸到我的前胸又缩回去了，大概是意识到不该那么做吧，他把自己胸前的一粒扣子揪掉了。我和高凡看着他，都不说话。

给我一根针，李翠。周纯一问声闷气地说。我找了一根针递给他。他钉起扣子来了。才不过三十多岁，他的眼好像已经花了。他拿针的样子倒很灵巧。扣子钉好，他又用手揪揪，看着牢不牢，他用力过猛，扣子被他揪脱了，还从他手里掉了下来。我把扣子拾给他，说，我给你钉吧！他不吭气，还是自己钉，一针一针，钉了许多针，直到扣眼里再穿不过线的时候。扣子总算钉牢了。他将针还给我，把衣扣扣好，站了起来，说要走了。

走？还没吃饭呢！我和高凡一齐说。

我不是来吃饭的！高凡，你干不干？干，就跟我走！不干也行，只是不要出卖我们，不要把我们要夺权的消息通给心向东。他说。

你看我是那样的人？高凡说。

知人知面不知心。周纯一好像生了气。

高凡笑了，他问周纯一：你一顾茅庐就忍不住气，哪里做得成刘备，倒像张飞。

我是干革命，不是来求你的。我说了半天，你为啥一句话不说？周纯一的语调缓和了一点。

闹不出好结果的，老周，你知道三面红旗是谁提的，彭德怀又为什么被打倒的？高凡认真起来了。

毛主席受了走资派的蒙蔽！周纯一听不进去。

高凡摇摇头：我看不是这。你这样干说不定要倒大霉……

周纯一又被激怒了！倒霉也干！出一口气也好！饿死也不许造反，天底下哪有这个理？我要是抓住当年那个吹牛说谎害百姓的Z书记，非把他毙了不可！

可是小报上说，Z书记上北京去了，有人认为他功大于过。我一边说一边去翻小报。

你不用翻，李翠！我知道。功大于过？屁！他有多大功，能抵上几百万人的忍饥挨饿？周纯一的嗓子都哑了。

你说什么？几百万人？高凡吃惊地问。

几百万人！全省几百万人还少吗！周纯一说。

把材料拿出来我看！这可由不得你乱说。高凡也提高了嗓门。

周纯一在自己草绿色的军用书包里翻起来，翻出一本褐色封面的小书伸到高凡的眼皮下，我看到上面印有“绝密”二字。高凡一把把书夺了过来，我和高凡一起翻阅起来。

这是一本统计资料，记录了本省从五〇到六二年的各种统计数字。凭学历史的人的直觉，我感到它非常重要。我翻到了人口统计那一页。高凡叫我拿纸笔来。

这里，把这几个数字抄下来。高凡命令我。

我抄下来，并且看懂了那些数字。从五八年到六〇年，全地区人口逐年大幅度减少。而这以前，人口是递增的。一点不错，三年的“跃进”把几百万人民送进了苦难的深渊……

高凡的脸色惨白，合上了小书，泪水从眼角里渗了出来。我却干脆哭了起来，因为我想起了奶奶爷爷和许许多多非正常死亡的熟人，想起了二呆，……啊！我恨不得嚎叫，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些数字！

你们哭什么？真是孬熊。不要哭，不要气，要向走资派讨还血债！周纯一说着把自己系在书包上的毛巾扔给我，然后又翻开高凡丢开的那本小书，叫我们看：说什么三年自然灾害，你们看吧！这三年哪有什么灾害呢？人祸，完全是人祸！

我听出了周纯一声音中的眼泪，突然之间，我感到这位姊夫非常可爱。我忍不住赞他：难得你还保留这一份为民之心。

周纯一不让我赞他；好了好了，别婆婆妈妈，李翠。说吧，要不要高凡跟我干？我看看高凡，高凡向我点头，说：我跟他去吧！

看得出高凡是动情了。他是很少感情用事的，除非到了那感情实在不能压制的时候。在几百万人民的生命面前动情是可以理解的，不然不成了冷血动物？我对他也点点头。

周纯一终于笑了，他孩子般地拍着手：李翠，把鸡汤面端出来吧！

我们快快乐乐地为高凡祝了“寿”，他们就走了。从这以后，我们的生活又一次剧烈动荡起来。而且这动荡延续了很久很久……

四

小小的宝塔集沸腾着。真是今日之天下不知是谁家的天下了。

周纯一果然夺了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权，到处张贴着他们的夺权公告，不知是谁的手笔，口气很大，可是没有一句是属于自己的创造，都是从报纸上或别处的大字报上抄来的：

××县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联合了全县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于×年×月×日夺了县委、县政府的一切领导权，并罢了原县委县政府领导人×××、×××、×××的官，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要大反党内的走资派，大反持反，一反到底！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革命造反派！一切革命的、要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了捍卫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献出我们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每一张夺权公告的旁边，都贴着“心向东造反司令部”反对这一次夺权的通告。

“心向东”宣布周纯一的夺权是非法的，是右派翻天的典型事件，是反革命性质的。“心向东”要求周纯一立即从县委的大院里撤出来，交出一切篡夺的权利，向“心向东”司令部投案自首。否则，一切后果都要由周纯一们负责。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豫。

周纯一对“心向东”的警告充耳不闻。宝塔集公社贫下中农造反派不断传达着他以“总指挥”的名义发布的一号通令，二号通令……每一条通令都杀气腾腾，让人想起解放初期他在宝塔集镇镇压反革命时的情景。不同的只是斗争的对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时斗的杀的多是“国”字号的人物，现在的“敌人”却多姓“共”。宝塔集人居然不问青红皂白地执行着周纯一的命令。他们发疯似的“揪斗”“大大小小的中国的赫鲁晓夫”。

红袖章满街，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震耳，游街示众的事不绝。连小小的街长都成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斗争还会有个完？几十年的老账都给翻出来，还愁没有斗争的“炮弹”？在和“敌人”斗争方面，宝塔集人有着惊人的想象力，一点也不比当年的周纯一逊色。戴高帽子游街，拳打脚踢，捆绑吊打这些常见的手段自然一一用过；他们还用了一些别处不常见的手段，把民间艺术与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使残酷斗争变成了娱乐。比如，把斗争对象化成戏台上的奸臣丑角；把他们比喻成各种各样令人讨厌的动物，并且用纸扎乌龟壳、狗尾巴、狼皮披挂在这些人身。有一次他们玩了一场“大出棺”的把戏，抬一口空棺材代表冤死的人们，让“走资派”披麻戴孝当孝子，哭娘叫爹。

蓝永继换了袖章，也成了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的战士了。他把当年逼他卖房补税的工商和税务方面的干部集中在一起游了一次街。好不扬眉吐气！我偷税漏税了吗？他问那些人。没有，没有，那些人回答。为啥逼我卖房？他问。这是我们的错误。人家回答。把房子还给我！他要求。你去要回来吧！人家说。他真的去要那房子，可是哪里要得回？房子已经换了主人了，也是“造反派的战士”叫“假老婆”。“假老婆”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因为生得细皮白肉，说话行动又像女人，所以赢得了这样的雅号。“假老婆”与税务所的干部有点亲戚，所以在蓝永继被逼卖房时占了便宜，只花了三百元钱就把几间门面房子买下了。贵买贱买总是买，卖出去的东西还能要回来？为这事蓝永继和“假老婆”结下了冤仇。

杨大傻子现在宣布他是宝塔集最早的造反派，因为他第一个爬上宝塔把塔拆了的。那时宝塔集都还怕神怕鬼，只有他不怕。有趣的是他没有加入任何造反司令部，他给自己缝了一个袖章，上面写的是独立大队。他也不参加什么批斗会。有人问为什么不把当年害他坐牢的几个人拉出来批判，他说大丈夫不报私仇。他照样每天挎个油条筐，拉长了声音叫“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有人夸他心好，也有人笑他傻。

我不知该怎么描绘此时的宝塔集。更不知该为她高兴还是为她担忧。我只有一条明确的原则：只看不说，不搅和到任何事件里面去，以免给高凡增加麻烦。集上人都不大知道高凡在周纯一的手下当“军师”，高凡从不出头露面，我也不对别人说。有人问我，我只说他回老家看爹娘去了。

可是舍儿知道高凡在干什么。因为舍儿是高凡手下的一个兵。他跟着高凡作了不少调查，宝塔公社的调查报告就是舍儿写的。可别小看舍儿啊，他已经长大了。集上人都说，舍儿和顾维舜这爷儿俩很怪，不论是谁，一看到这两张十分相似的脸都会说：你们一定是爷儿俩！太像了！一样的高挑个儿，一样的大眼、阔嘴。隆鼻、一样的淡黄肤色。可是一旦你与这爷儿俩接触一天，你就怎么也不敢相信舍儿有顾维舜这样的爸爸！太不像了！爸爸精明能干，性格却内向温和，而且胆小怕事，处处让人；儿子呢，聪明外露，性急如火，还有一副和父亲一点也不像的大嗓门。这脾气也许来自他的母亲。舍儿自从“文革”开始就在外面东颠西跑了，不知哪一个同学送了他一件旧军装，长得盖住了屁股。那时候他说不上为啥那么起劲，只觉得有趣。平常的日子里，爹妈把他管得很严，只教他好好念书，别的啥事也不让他管。他活得舒服，但是没趣。相比之下，闹革命却有趣得多。“破四旧”那阵子，他和同学们在外面“破”够了，就“破”到家里来，爸爸妈妈找出来的“四旧”，都由他亲手破坏。那几只釉着八仙的青瓷花碗，他一只一只地摔，而且故意拿到石头上摔，响声悦耳。每一本书上的刘少奇的画像都由他撕下来，所有“黑帮”的名字，都由他打上“×”。妈妈结婚时陪嫁的两条百褶裙，他要一条一条地剪开，是妈妈硬从他手中夺下了剪子，把裙子改成了小孩子衣服，送给他大姊了。他爹妈没有告诉他就把他的道袍和爷爷留下的家谱烧了，他可惜了很久：让我看看多好！我穿上道袍、拿着家谱去游街，让人家看看封建迷信多可笑。爹妈说他着了魔，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又说他像一条小疯狗，看见人就咬，也不问好人坏人了。可是爹妈的教训

对他再也不起作用了，他有了“红司令”！

可是自从跟着周纯一造反、跟着高凡搞调查，舍儿发生了变化。他说他真正懂得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了。为什么你们当时都不起来造反？饿死也不造反，这多傻！他不断地用这样的问题去问他的调查对象。所有的人都回答：噢！没有上头的命令，哪敢！于是他就宣传，现在毛主席号召了，起来造反吧！打倒那些不顾人民死活的走资派！便有人夸他，你这个半大撅子（这里人这样叫小伙子）不赖！

顾维舜知道儿子在干什么的时候吓得发抖。这样的材料怎么能搜集？六〇年那一场灾难之后，顾维舜偶然也在挑食的儿子面前说：最好再叫你过一次六〇年！可是对于他所看到的更多更广的惨剧，他却很少提起。他是右派，这种事不是他可以说的。可是现在儿子天天搜集这种材料，回到家里还找他问这问那，问张三是不是饿死的，李四是不是病死的，问他心里直发麻。他自知自己在儿子面前没权威，所以叫玉儿妈劝儿子可别干了，可是玉儿妈和儿子站在一起，她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老人窝囊一辈子，不能让儿子再窝囊了。再说，当初那些干部也实在太恶，让他们尝尝苦头也是应该的。

顾维舜没办法治儿子就来找我，要我叫高凡把舍儿赶回家，“就说他不够格吧！”可是我到哪里去找高凡啊！我和高凡联系还要通过舍儿呢！因为有“心向东”这样的反对派，他们的行踪是半秘密的。

五

看报！看报！看报！

最新出版的造反报！

有重要消息！对走资派的血泪控诉！从六〇年算起！从六〇年算起！

天刚放亮，舍儿和他的战友就在街上响起了高音喇叭。我马上披衣坐起，意识到高凡的声音来了。

翠儿姊，报纸塞在门里了！舍儿在门口叫了一声就跑走了。看报！看报！看报！

“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新出版的造反报有重要消息喽——”杨大傻子也吆喝起来了。

真是造反了，真是造反了！我的父母一边扣着衣扣，一边不满地嘟囔着，对于文化大革命，他们是一个个不顺眼，可是他的两个女婿偏偏都卷了进去，我爸说，这是他命里遭劫。

我不理他们，也顾不上洗脸梳头，就坐在门口读起报来。

全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派讨还血债！

一九六〇年的悲剧空前绝后，惨绝人寰！

这两句口号贯通了四版，而已套红印的，叫人看着心惊肉跳。整整三个版，登载着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和翔实材料，基本上没有任何评述。可是那真正是血和泪的控诉啊！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任何文学都显得苍白无力。我亲身经历过的那件事也揭露出来了。那是六〇年底春天中央大员来视察的时候，地区和县里的干部为了隐瞒真相，把一些严重的浮肿病人集中起来关在一座破砖窑里，让我看守着。结果窑塌了……一个个被破窑砸死的人的名字被登了出来，我看得浑身发抖，当时的情景又历历在目，我仿佛觉得对这桩血案应该负责的不是别人，而是我……我真想哭，但是我没哭，眼泪在这样的悲剧面前实在是太淡太淡了。

我们都干了什么啊！我不由得自言自语。

你也疯了不成，没听见你儿子叫你给他找袜子？母亲对我说。

找什么袜子？自己不会找？多大了还叫别人侍候？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我对着里屋的儿子叫嚷着。我不管他，继续看自己的报纸。社论写得非常简短，题目是：《淮河，别擦干你的泪水……》为什么没用周纯一的题目呢？为了更感情一些？可是本文却写得相当理智而锋利，开头一句话就是：

“到了向老百姓揭露事实的时候了，那一幕惨剧的酿成，不是由于天灾，而是由于人祸。那些走资派当然知道，在他们吹牛说谎，换取上峰的笑脸和赞扬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民默默地倒下了，来不及发一声叹息，更来不

及问一个为什么……”

高凡的手笔。可爱的高凡，没想到你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这样的。

妈，我找不到袜子……儿子在里屋哭了起来，我不得不放下报纸进去帮他找到袜子再扇他一个耳光。出来的时候报纸已经被父亲拿去了，他正戴着老花镜吃力地读着。我只好去梳洗、烧饭。

吃饭的时候，父亲满脸怒气。我一放下饭碗。他就叫我到县城去：去把周纯一和高凡给我找回来！不准他们胡闹。

怎么是胡闹呢？我说。

管自己不该管的事，不要命了？父亲抓起刚才看过的那张报，哗啦啦地抖着。

你知道，都是真事啊！我说。

真事？真事也要让人家去说！轮不上咱们出风头，咱们是什么人？你爷爷是个剃头的，我做个小买卖，国家的事从来就不沾边儿。解放前，叫我交税就交税，解放后，叫我开会我就去。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我都只管摊在我头上的那一份。你们倒好，管起上面的事来了。他们谁个当官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可是，这是毛主席号召的呀！我说。

毛主席点名道姓号召周纯一、高凡了？别人咋不像他们？反正，他俩要想做李家的女婿，就得赶快给我滚回来！

母亲劝道：叫她到哪里找？外头乱糟糟的。等几天他们自己说不定会回来的。

父亲只朝母亲看了一眼，就气哼哼地上班去了。

我的心被父亲说得七上八下的，催促着儿子快点把饭吃完，我匆匆忙忙洗了锅碗，便到街上去了，我要听听别人怎么说。

街上像过节一样热闹。不过是刚刚吃过午饭，人们就集中到街上来了。每个人都要描绘一遍自己被“看报！看报！”的喊声从熟睡中惊醒的情景，以为又有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了呢，原来是出了造反报！还有学杨大傻子叫喊的：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新出的造反报有重要消息——大傻子这个小砍头的叫得多欢啊！他家可没有在那年月饿死的，这就是他说的不报私仇吧？

“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杨大傻子吃喝着过来了，可是他的筐里已经没有了油条。

傻子，油果儿卖完了还吆喝什么啊？傻劲使的？玉儿妈和他开玩笑。

嗨，二婶，你家舍儿的嗓门比我还响，我是傻劲使的，他呢？大傻子嘻嘻笑着。

他么？是疯劲。这年头我看大小的人人都疯了，也难怪，那些干部作下的太恶。玉儿妈说。

在一旁眯着眼站着的顾维舜忍不住拉了拉妻子的衣角，先小声说一句“别胡说”，然后又大声对大家说：也怪不了那些干部，时局走到那里，他们也没办法。

去，我不听你撰文，时局时局，啥叫时局？玉儿妈轻轻地推了丈夫一把。

眼前的情况就叫时局呀！毛主席英明伟大，发动文化大革命，革命群众响应毛主席号召，把问题揭露出来了。揭露问题是为了教育干部，只要他们知错能改，我们就欢迎他们，仍然让他们当领导。这就叫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顾维舜对报纸研究得透彻，所以说起来一套一套的，而且结构严密，滴水不漏。可是玉儿妈却要找他的茬儿：刚才还在家里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定要报。现在又来这宣传政策了。我看你也是个两面派！

听的哄然大笑，有人说：老头改造好了，将来可以当左派了。

弄得顾维舜满脸通红。他正要向大家解释什么，一支游行队伍开过来了。

看起来一切都是周纯一事先策划好了的，特刊发行的当天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大造革命声势，把“心向东”的反对的声音压下去。

全公社的造反派都出动了。领头的是舍儿他们的红卫兵，他们把报纸上的通栏标题制成标语牌扛在肩上，这一群十七八岁的孩子今天的脸色特别严峻，有的还闪着晶莹的泪花。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这一首毛主席语录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每天都要唱上无数遍的，都唱油了，可是今天

唱的人和听的人都在歌声里注入了新鲜的感情，那已经不是歌声，而是愤怒的吼叫，还夹杂着厮杀声。

蓝永继的造反派紧跟在红卫兵的后头，他们把那篇社论的标题制成标语牌举在手里：“淮河，别擦干你的泪水！”

一阵阵的口号都像是从喉咙里喷射出来的：

“向走资派讨还血债！”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造反派万岁！造反报万岁！向周纯一同志学习！”

周纯一成了英雄了。我跟着游行的队伍走了一段，一路上听到很多人说他的好话。

“假老婆”刚说了一句：“他解放初期杀人太多”，就被许多人围攻了很久，有人说：“假老婆”是假造反，身在曹营心在汉，因为他在大跃进时当公社食堂炊事员，所以没有捱过饿，还把食堂的饭菜往家里带，那年头，大家都瘦了，只有他一家人养得白白胖胖，“假老婆”只得求大家原谅。要不，他就要捱揍了。

不知是谁想起了放鞭炮。一会儿，满街都是鞭炮声了。游行队伍受到鞭炮声的鼓舞，口号喊得更响，语录歌也唱得更响了。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

毛主席的这几句话一会儿当口号喊，一会儿当歌唱。我的头脑都给震昏了。从这节日般的气氛中我好像感觉到一种不祥的预兆，这是毛主席所要的文化大革命吗？它会不会是一股“逆流”啊？我再也没有兴趣看热闹了，当游行队伍路过我家门口时，我便蹓了进去。

六

这一张造反派所引起的震动比周纯一夺权引起的还要大。没有人说得清这两份报纸发行了多少份，只知道它确实是家喻户晓。以后几期的造反派上登满了各地造反派对它的支持和对“走资派”声讨的文稿，“革命的声势”的确是够大了。

但是它没能压住另一种声音，“心向东”的声音。“心向东”的反击也异常激烈，他们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告诉人们，周纯一的大方向错了，错定了！周纯一在反革命的路上越走越远，已经丧心病狂地把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了！因为三面红旗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庐山会议是毛主席主持的，彭德怀是毛主席打倒的，“青天书记”是毛主席点名的。

为了回击“心向东”，周纯一“总指挥”又一次发出“通令”，要在县城召开全县造反派誓师大会，向走资派讨还血债。他要求各公社造反派尽可能多地组织群众去参加大会，并争取邻县造反派的声援和支持。

蓝永继和舍儿都忙于动员组织队伍去参加大会。

我觉得有必要去找高凡了。我几乎已经断定，这样闹下去不会有好结果。我希望把高凡拉回自己身边，如果拉不回来，我就和他站在一起，看着他干什么，知道他想什么，我的心里才踏实啊！

就在誓师大会召开的那天早晨，我把儿子托付给父母准备动身。疯大爷却出乎意料地来了。这么年纪的人，不在乡下养息，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做了一场恶梦，梦见张乐行拖着自已的肠子满街跑。梦一醒，我就想到来找你。书元和张队长他们说要去参加周纯一召开的誓师大会，他们叫我来看看你。疯大爷说。

哎呀，书元和队长凑什么热闹？又不是一个县！我们已经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了，不能再连累他们。我说。

疯大爷说：翠儿，一家别说两家话。自打你到咱的村里来落户，就没人把你当外人，书元把你当妹子，我把你当闺女，怎么说连累？眼前这事儿，谁说得出个是非？对你说吧，翠儿，造反派上关于塌窑砸死人的那一节正是我写的。我当时也在场，对不对？

唉，大爷！我感动地说。

我没事儿，我只是为高凡担心哪。当年张乐行领着穷人打清兵，杀者财，落了个什

么下场啊！疯大爷说。

这可不能乱比，大爷。时代不同啊！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哪有清兵和老财？高凡他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揭露走资派。我也搬起条文来了。翠儿，别教训你大爷了，你大爷活了九十多岁，只懂得朝代，不懂得时代。一个朝代有一个朝代的故事，故事虽然不同，角儿却总是那几个。

我不想再与这位前清的准秀才多说，我被他说得心烦意乱了。我劝他回到乡下去，别再出来乱跑，被人家碰坏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他不肯回去，他要陪我上县城，把高凡找回来。

我只得和他同行。几十里路，又没有汽车，我怕他走不动，可是他走得比我还快。一路走，他一路唠叨。

现在叫大字报，以前叫揭帖。他说，我不搭碴儿。

周纯一有一点像当年的张乐行，就是乐老头，都是为穷人出气。可是乐老头死得惨啊！凌迟，还用铁钩子从他的肛门里捅进去，把肠子都钩出来了……

这事他已经说过无数遍了，今天听起来都叫人身上发毛。我制止他，别说了，大爷。好，好，不说了，不说了，说了叫人心难难过。唉，就像那歌谣里唱的：

看看义门好心伤，
想起老乐泪汪汪，
看看地在人不在，
太阳从此失了光。

他竟然小声地唱起莲花落来，而且唱出我的眼泪！

大爷啊！我在恳求他了。他这才真的闭上口。

我们不再说话，不停歇地朝前走，太阳正中的时候，县城到了。我在县城读过几年中学。可是如今的县城叫我迷路。鼓楼一类的古代建筑拆除了，好像大海里撤掉了航标。到处都是大字报，贴在墙上的，挂在楼上的，铺在地上的。结果每条街都变得一模一样。

我无心细看那些大字报，可是疯大爷却不住地东张西望。

看啊，看啊，那上面写的是啥？疯大爷突然惊慌地拉住我，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朝前看，看到了一幅巨大无比的标语，从一座三层楼的楼顶直垂挂到楼底，拖到地上。那标语是：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打倒周纯一，揪出他的黑后台艾××！标语下围了很多人，因为那楼的墙面上还贴了许许多多大字报。我一句话没说，就推着疯大爷朝那标语走去，想看看有什么新的消息。

“艾××的狐狸尾巴被我们抓住了！”

原来是艾书记给周纯一的一封密信落到了“心向东”的手里。艾书记被周纯一夺到手以后，为了不被“心向东”再夺回去，他们便把他藏在远离县城的一个村庄里。周纯一和他联系就通过“信使”。为了保密，除了周纯一和“信使”之外，没有别人知道他住在哪里。可是“信使”出了问题，他向“心向东”投诚了。

艾书记的信被全文公布还加了批语：

纯一同志：

来信收悉。知道你们已顺利地夺了权，非常兴奋，热烈地祝贺你们！（批：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人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走资派艾××为周纯一的夺权鼓掌叫好，周纯一的夺权性质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可惜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我同意你对以后战斗的部署。今后的任务确实是千方百计巩固已经夺到的权利，利用这个权利把对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深入开展下去。我会给你准备有关材料的。（批：艾××会准备什么材料？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的炮弹吧？）为了我们的共同目标（?!），我提出几点建议供你参考：

（一）更加放手发动群众。可以动员广大贫下中农进城示威游行，让城里人知道我们是贫下中农的真正代表。

我们党夺取政权靠群众，今天巩固政权也要靠群众，这个法宝很灵啊！（批：这一条不但暴露了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恶毒用心，还直接违背了中央文革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

（二）立即着手解放干部的工作。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依靠他们，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会更深入地发展下去。与走资派斗争的最有力的炮弹在他们手里。这一条切切注意，别让“心向东”占了先啊！（批：他们是要解放干部吗？不，他们是要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三）对“心向东”要进行分化瓦解。应该承认，虽然他们与我们观点不同，但也是造反派，而且是我县最早的造反派组织，对他们完全否定，不利于我们团结群众。当然，此事应看准时机，操之过急倒可能弄巧成拙。（老狐狸艾××，我们不会上你的当！“心向东”坚如磐石，任何人也不能动摇！）

致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你的战友艾××

真是太糟了！这种时候出现这封信对周纯一他们无疑是致命的一击。现在，哪一个造反派组织敢对走资派表示同情和亲近呢？何况是“战友”关系！现在的“走资派”就是抗战中的日本鬼，解放战争中的国民党反动派！我无心细看其它的大字报，我要马上找到高凡，问他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要拉起他就跑，跑到宝塔集或者我们的生产队，然后永远不再让他出来。我后悔不该让他出来，周纯一想干就让周纯一去干好了，天下是他们的，不是我们的。也许周纯一只是嘴上说得好听，心里却是想夺回自己失去的权利。

好不容易，我找到了周纯一和高凡工作的地方，可是找不到他们，问谁谁都不知道他们人到哪里去了。大会是下午三时才开，他们不会这么早就到会场去了吧？我问一个男人，他不回答我，却鬼鬼祟祟地打量我，问我是他们的什么人，我讲了自己的身份，他向我冷笑着说：快回家抱床被来吧，准备送他们进监狱！你是谁？我问，他又冷笑一声，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我断定他是“心向东”的奸细。

这个造反指挥部比牛马行市还要乱，到处是人，到处是大叫大嚷的声音，你怎么也无法弄清他们在干什么和说什么。我决定不再找人了。

这时我才发觉，我把疯大爷丢了。他一定还在那里看大字报。我便沿着来路去找。可是我走不到那里了。一支又一支的游行队伍阻挡了我。看旗号既有周纯一的队伍，也有“心向东”的队伍。我只好拣了一支周纯一的队伍跟过去。

从来没见过这么整齐的群众游行队伍。简直像接受检阅似的。人们臂膀挽着臂膀，有节奏地喊着口号：“头可断，血可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可丢！”“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周纯一，好样的，我们坚决支持你！”遇到“心向东”的队伍时，他们的口号喊得更响。双方用毛主席语录和口号交战，还好没有动手。

我跟着他们来到原来的鼓楼所在地，如今叫人民广场了。就在当初鼓楼的地方搭起了一座高台，式样很像天安门的主席台，只不过是灰色的。这时我才明白，为了对付“心向东”的破坏，誓师大会提前召开了。我站的地方离主席台很远，只能看见台上有许多人，都看不清人脸，我猜想周纯一和高凡都在上面。

《东方红》的音乐刚刚放完，高音喇叭里就响起了周纯一的声音，“把走资派××、××、×××……押上台来！”我怀疑我是听错了，那一串人名中有艾书记。

台下有人叫喊：把艾××推到前面来，让我们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周纯一的声音：艾××，你自己说，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是艾××……是艾书记的声音，听得出他在发抖。

这是怎么回事？是周瑜打黄盖？是丢卒保帅？抑或是可耻的出卖？我糊涂了。

一阵惊天动地的口号声几乎震聋了我的耳朵，我觉得眼睛也模糊了。只听见一阵阵

骚动的吆喝声：跪下！叫艾××跪下！揍他！狠狠地揍他！要文斗不要武斗！揍！揍！不要打人！不要打

台下的有争着往台上挤，台上扭打成一团，都带着红袖章，也不知是谁打谁。我的脑子里模模糊糊的，好像时光倒退了几十年，退到了当年斗争恶霸地主的时候，多么相像啊！

什么人推了我一下：还不快跑！打死人了！

谁？打死了谁？我懵懵懂懂地问。

管他是谁！

大家都在跑，有的往里跑，有的往外跑，我不知道自己该向哪里跑。

同志们！战友们！不要乱跑！有反革命破坏！有反革命破坏！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高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周纯一用话筒喊话，声嘶力竭也压不住阵脚，人们还是要跑。

我被一群奔跑的人挟出了会场，挟到了一个小巷子里，我只有找一个墙角暂时躲着。

怎么样，怎么样了呢？我问任何一个从身边走过的人。

不知道。不知道。所有的人都这样回答我。

疯大爷呢？我又问。

谁是疯大爷？你这人是不是病了？人家以为我被吓疯了。

七

一九六七年的春天在别处也许温暖妩媚，在宝塔集却是阴冷阴冷的，也许是一冬没有下雨的缘故，过了春节便阴雨连绵。宝塔集的心情也和天气一样，阴沉沉的。

整天不得安宁。周纯一召开的誓师大会出了乱子，使两派的斗争更为炽烈，双方都宣称要为自己的信念“血战到底”，双方都指责对方实行武斗，打死了原来的县委副书记。

宝塔集人只能凭感情和利害在二者之间选择。凭感情，大部分人向着周纯一，但是要他们为了周纯一去和“心向东”“血战到底”，大部分人又是非常害怕的。中年以上的宝塔集人是经过几场血战的。与日本鬼子打仗不算，中国人打中国人就有好几回。一会儿是老张打老李，一会儿是阎王揍小鬼，打来打去，都是老百姓倒在血泊里。

只有舍儿他们那一批中学生不知厉害，觉得血战到底十分带劲。他们整天和省里、地区和县里来煽风点火的红卫兵、造反派一起闹腾，大人们挡也无用，劝也无用。从外来者们那里，他们知道了，自己的战斗不是孤立的，全省都围绕着该不该批判大跃进的问题上分成两大派，而站在这两大派背后的正是大跃进年代互相较量过的Z书记和“青天书记”，他们觉得有趣的是，在全省其他县市夺了权的造反派“好派”几乎都认为应该反对“青天书记”，而反对夺权派的“屁派”倒和他们站在一起。这就是说，在本县，他们是“好派”，出了县，他们就是“屁派”了。所以他们天天在街上喊的口号也很有趣，除了“周纯一夺权好得很！”之外，还有“×××夺权好个屁！”前一个口号是地域性的，后一个口号是“国际主义”的。

顾维舜差不多要给儿子跪下来了。他越来越觉得事情不妙。为什么自己县的情况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呢？肯定是自己县里有问题，周纯一不是毛主席所支持的造反派。他对儿子说，中国那么大，宝塔集这么小，我们在宝塔集怎么能看清全中国的问题？即使原来你们的方向是正确的，如今周纯一打死了一个人，有理也变成了没理，还争什么是非呢？舍儿不听，说他坚信周纯一不会打死人。还说毛主席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毛主席会保护少数的。顾维舜告诉儿子，周纯一是会杀人的，在土改中，镇反中就杀过不少人。舍儿一听就火，说这是诬蔑，即使杀了人，杀恶霸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也杀得对，好得很！

顾维舜不敢和儿子议论是非，他知道这年月是父不父、子不子的，儿子一恼火给自己的话汇报上去，自己就要倒霉。运动搞到现在，他还平安无事，真该谢天谢地了。能这样安安稳稳地熬到运动结束就好了。他只能求菩萨保佑儿子别闯大祸。

我和别人一样，只能从传说和大字报中得到高凡他们的消息。双方的大字报都说周纯一不在县城。“心向东”说是“流窜在外”，进行反革命的串连活动；周纯一的人则说，“总指挥”受到兄弟单位造反派的邀请，去交流战斗经验去了。到底在哪里，谁也

不知道，连舍儿也打听不到消息。

我愁得茶饭难咽。挂念高凡的安全不说，还要考虑我们母子的生活。我得回家种地去。我不拿国家工资，靠生产队补贴工分，一家人的口粮还要靠田里劳动解决。生产队分给的口粮不够吃的，就得种好自留地。有人说自留地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掉，可是对我们，特别是对普通农民，它可是“社会主义的肚皮”寄托地。弄得好，自留地可以解决一半的口粮呢！我总在娘家住着怎么行？一冬无雨，小麦的苗出得不好，不回去调理调理，怕收不到几颗小麦了。当然，书元哥两口子会帮我调理的，疯大爷（这老头，他与我县城失散之后自己回家了！）也会帮我弄的，可我不能总依靠别人呀！但是在没得到高凡他们的消息之前我不能离开宝塔集，焦虑成疾的父母也需要我照顾呀！

每天晚上，我和父母都要坐到很晚很晚才睡。我们等待，等待他们的突然归来，或者别人送个信来。那是一个凄风苦雨的夜里，终于有人来敲我们的门了。开门一看，却是舍儿和他的父亲。我邀他们进来，舍儿进来了，顾维舜却退到一个阴影里。他说要在外面望风。舍儿说，是他爸自己要跟来当保镖的。他能保护我？还不够人家一指头戳的！舍儿太看轻自己的父亲了。

是有什么消息了吗？我和父母一齐问舍儿。

周大哥派人送了一封信来。舍儿兴奋地说。

信呢？我问。

口信，让我传达。怕再出送信人叛变那种事。舍儿说。

我和父母都叹了一口气。父亲还埋怨：这是啥年月，又是啥事啊？神神鬼鬼的！

舍儿说，周纯一到外面串连已经回来，高凡一直坚守在县报社。现在情势紧迫，双方都在向中央文革告状，寻求支持，“心向东”首先要和我们争夺报社，听说正在组织人力。所以我们要趁中央文革表态之前，再一次采取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去保卫我们的报社。人越多越好，最好能动员几十万人到县城去！

这不是发疯吗？我吃惊地说。我不能想象，几十万人到县城保卫报社会是个什么局面。这不等于是一次民众暴动？不行，不能让他们这么干！我大声说。

嘘！翠儿姊，你小声点儿。你害怕了是不是？现在的斗争是你死我活，不挤命不行了。舍儿说。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我知道说也没用了。不知道这主意是不是高凡想出来的，如果是他，那就该骂。舍儿见我不说话，便说，好了，你们睡吧，我还要到别人家里去送信，我们要力争后天就把队伍拉出去。

舍儿正要出门，我父亲大喝一声：你给我回来！

父亲是舍儿的十二个干老子之一，平时对舍儿非常慈爱，突然这么严厉，把舍儿镇住了，他站在父亲面前一动不动，问干爹有什么嘱咐。

不许你再到处送信了！你就这样让你爹风里雨里、深更半夜陪你跑？他白养了你了！你知道你是怎么长这么大的吗？你爹妈一连生了几个闺女，四十岁上才生下你，一家人高兴得不行，怕你命不长，给你认下十二个干爹，我也算一个，都把你当宝贝，尽你吃，尽你喝，不舍得打不舍得骂，手里捧着你了这么大，如今好了，你长了翅膀了，可以不听大人的话了，半夜三更往外跑，让老子拿把伞跟在后面为你站岗放哨，你有脸吗？要不要脸啊！这还不说，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叫你爹妈怎么过？

父亲一口气说得这么多，把我和舍儿都说得掉眼泪，舍儿嗫嚅着说：我不叫他来，是他自己要来的。

父亲“哼”了一声，走到门外，把顾维舜拉了进来，说：我早就说过，对孩子不能大百依百顺了。我找了两个不争气的女婿，把舍儿带坏了，我对不起你。现在你把舍儿领回家，关上门狠狠地打，打断他的腿，把他锁起来，再不许他出门！

顾维舜喏喏连声，拉着儿子说：回家吧，舍儿，你干爹说得对。舍儿口里应着好，却趁他爸不注意，挣脱了爸爸的手，跑掉了。我父亲夺过顾维舜手里的雨伞要去撵，我说让我去吧。

幸亏舍儿出门不远就滑了一跤，我不费力气就追上了他，他已是浑身湿透了。不一会儿顾维舜和我父亲也跟了过来，我们三个人推的推，拉的拉把舍儿弄回了家。

我和父母商量，我自己到县城去一次，把高凡他们劝回来，父母都同意，父亲还教我高凡说：不回来就离婚了！不料还没等我动身，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周纯一又派人送来一封“鸡毛信”，十万火急！造反报报社被“心向东”的人马团团围住了！我去又顶什么用？根本进不了报社。高凡他们要么缴械投降，交出报社，要么真要血战到底了！

我急得差点昏了过去。

八

真说不清那几天是怎么过的，度日如年的形容分量也嫌轻了。时时都有一种生离死别即将来临头的感觉，又不知该到哪里去打听一点真实的消息。县里两派都有宣传车到宝塔集来，弄不清他们的宣传中哪是真的，哪是假的。

“心向东”的宣传称，他们只是派了几百人去接管造反报，不让这份报纸再充当反革命的喉舌。他们坚持说服为主，和平解决，他们的战士严守纪律，只在门外用喇叭与报社的人对话，没有一个进入报社。他们还给报社的人送去了吃的用的。只是，他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周纯一这边的人则说，“心向东”有上万人包围了报社，为首的一批人是道道地地的法西斯暴徒，一天数次推门破窗而入，对报社的工作人员进行谩骂殴打，只是迫于报社人员的凛然正气和越来越多贫下中农赶到报社对“心向东”形成了反包围，他们才没敢大打出手。现在报社的十几位工作人员，个个视死如归，准备为保卫自己的报社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觉得我的高凡已经迷失了，倒在血泊里了，不再属于我了…

我在家里一刻也呆不下去，几次要马上上路到县城去，都被我的父母劝住了。

我到舍儿家去找舍儿，舍儿真的被他妈锁在屋里不得出来。我站在门口叫了他一声，他就里面又哭又叫：翠儿姊，把我救出去！我不能在这紧要关头离开我的战友，我要去保卫报社！我怎么敢放他？顾维舜夫妇投向我的目光就叫我受不了，是可怜的祈求啊！好像他们儿子的生命都操纵在我手里。

我到乡下去找蓝永继，蓝永继已经带着队伍到县城去了。蓝虎也跟了上去。小群和蓝虎的妻儿们在家，也是提心吊胆的。永继妈不断地埋怨小群，连自己的男人都管不住。我倒要反过来劝慰他们。说不会出什么大事的，人家家里都有妻儿老小，谁愿意真的动刀动枪的？

情急中我想到杨大傻子，他光棍一条，早上卖完油条就到处乱跑，也许能得到一点真消息。可是杨大傻子这两天连油条也不卖了，他的破屋门敞着，人却不在。

我只能等待。

在报社被包围到第五天的时候，情况有了变化，周纯一那一派的宣传车不见了，“心向东”宣传车也迟到下午才开进宝塔集，但气势非凡，兴高采烈。车壁上挂着红布横幅，写着：坚决拥护解放军接管报社！我们胜利了！他们的喇叭大声地宣布，中央文革已经决定对我省实行军管，报社也不例外。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英明决定，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保障。“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已经撤出报社，如果他们要什么花招，只有自取灭亡，对抗人民解放军决无好下场！

说也奇怪，听了这样的宣传，我的绷紧了的神经突然松弛下来，我忍不住大叫一声：好了！没事了！我的父母也高兴，说不管谁胜谁负，不打架就好。我的儿子喜潮对大人们的情绪变化莫名其妙，叫我讲这些日子爸爸干什么去了，我不理他，拉起他的手就往外跑，说：走，看看舍儿舅舅放出来了没有！

舍儿的门锁已经打开，但是舍儿却蒙着头睡在床上不起来。他爹妈说：你来得正好，去劝劝他吧，不知他为啥那么伤心。

我去拉舍儿的被子，舍儿不让拉，把头蒙得更紧，嘴里叫着：滚，滚，都滚！我谁也不想见！喜潮从他脚下揭开了被子，把手伸进去抓他的脚心，他把脚缩进去，整个人缩成了一团。那样子非常滑稽，我忍不住笑了，喜潮更拍着手说舍儿舅舅像个大乌龟。

忽地一下，舍儿把整条被子掀到地下，自己坐起来，怒冲冲地对我们看着，我的心一下子紧缩了，这个小孩子，眼泡都哭肿了！

我连忙给他重新盖上被子，扶着他的肩膀坐下，柔声地劝他，别为那些事操心了，有解放军来管不好吗？省了咱们的力气，咱们是老百姓，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他却哇啦一声大哭起来了。喜潮忙不迭地伸出小手给他擦眼泪，可是越擦眼泪越多，喜潮自己也哭起来了。舍儿一把抱起喜潮，大声叫道：失败了！失败了！我们失败了！

顾维舜夫妇吓得在一边不敢说话。玉儿妈留我和他们一起吃晚饭，陪陪舍儿，我也答应了。我照着舍儿穿好衣服，洗了脸，坐下来慢慢地叙话。此刻我心里也有了失败的感觉，和舍儿真有一种“战友”的感情了。

我们没错，我们没错。舍儿说。

没错，是没错。谁说你们有错了呢？六〇年的事谁不知道！别说是你，就是我想起那时的日子也恨得牙根痒啊！恨不得咬干部几口。玉儿妈安慰着儿子。

可是军管就是对我们夺权的否定，更不该叫我们交出报社。舍儿说。

是全省实行军管呢，舍儿。那些跟我们观点不一致的组织夺权不也是给否定了吗？所以恐怕你想的不一定对。我说。

舍儿不说话。顾维舜小心地说：也许，是中央文革认为群众根本不应该夺权吧？党的权，政府的权怎么好随便夺呢？

这是你说的！上海的一月革命不是毛主席肯定的？舍儿没好气地对父亲说。

我劝舍儿：二叔的话也许有理。上海的夺权是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掌握的，咱们这里的夺权都是自发的。

啊！说到这里，我的脑子好像突然开了窍。老百姓多傻啊！

第二天早上，我又听见了“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的叫卖声，杨大傻子从哪里窜了一圈回来了？我认定他会给我带来什么消息，便赶忙跑出去叫住了他：买油果儿！

杨大傻子应着声走进我家，没等我问就说：放心，高凡没事儿，说不定今天就回来了。说着掏出了一张纸条给我，是高凡写来的，只有一句话：“别急，我会平安回来的。”我的泪水忍不住吧嗒吧嗒地掉下来。

你怎么能见到他呢？我问大傻子。

我上县城去了，昨天夜里刚回来。我挎着油果儿筐，趁乱的时候混进去的，我给他们送了一筐油果儿去。要不他们真饿坏了

大傻子说，他说不清有多少人包围了报社，里三层外三层的，两派人都有，插花地围在一起，所以说谁也不敢动手打，一打准流血。只是那么多人围上几天几夜，又下着雨，吃的喝的都成问题，所以病了不少。可是直到最后，双方的口号和语录战都没有停过，都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

高凡他们在干什么？我急切地问。

还能干什么？他们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商量对策。高凡说还是撤出好，这样闹不会有好结果，可是几个年轻人不肯，说高凡是软蛋。高凡真是好样的，他一点也不生气，他说，他是为大家考虑，不是为自己。他保证与大家一起战斗到底，要是撤，他也是最后一个离开……

后来呢？我又问。

后来解放军进去了。他们抱头痛哭，抱头痛哭呀！

高凡也哭了？我问。

也哭了……

大傻子讲得两眼泪汪汪，我更是止不住涕泪交流，为什么我没想起像大傻子那样到高凡身边去呢？

果然，当天晚上高凡就回到了宝塔集，人瘦毛长，浑身稀脏，像从监狱里放出来的。我们没有问他几句话，他就不耐烦了，说：让我睡觉好不好？我困死了！他一直睡到第二天晚上才起来。

九

高凡回家以后就告诉我，别高兴得太早，麻烦事可能还在后面。果然，不多久，军管会就下达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要在造反派当中“揪黑手”，说我省各地造反派组织中都有“黑手”，而且是两大派中都有，虽然没有点名，大家心里都有数，“青天书记”这一次成为主要的“黑手”了，那位Z书记只是配角。军管会要求，双方组织都要立即清查混进本组织里的坏人，包括“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会道门中的小道首和职业布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管制、被关押、外逃的反革命分子家属。查出来要立即遣送原地，犯罪者要依法惩处。

同时，两家全国性的最权威的报刊也发出警告：

“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

说：“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正好趁此机会来一个大扫除，‘扫除一切害人虫’。”“对于这些反革命家伙，我们要坚决地实行专政。”

种种迹象表明，造反派肆无忌惮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要收一收骨头了。

真没想到还有这一手，这样一来，周纯一在劫难逃，宝塔集上的人也有很多要倒霉了，舍儿、蓝永继、杨大傻子，都能挂上号。高凡说：别忘了，还有你和我。

我们赶紧离开宝塔集。我和高凡商量说。

李翠，我看你越来越幼稚了。高凡批评我。

我哪里是幼稚？不过是存着侥幸心理罢了。周纯一在实行军管之后就不知去向，有人说他进京告状去了；又有人说他回家去了，准备在山里拉队伍打游击。大姊处来信还在问他的去向，可见没有回老家，八成告状去了。前几天，“心向东”曾张贴了一张对他的“通缉令”，给他加了种种罪在不赦的罪名，由于军管会的干预，通缉令才取消了。军管会说，中央文革小组指示，不要随便通缉什么人，但是一切犯罪分子必须受到惩处，这一条坚定不移。军管会鼓励周纯一所在的造反派组织自觉地起来揭发周纯一，并且把周纯一和其他的坏头头交出来。周纯一能跑到哪里去？高凡又岂能脱掉干系？但我还是希望能够像俗语所说的那样，跑了跑了，一跑就“了”。

宝塔集人人自危。

蓝永继的造反派悄悄地解散了。蓝虎一家人打点着自青海去。临走，他故意带着老婆孩子在集上走一圈，向大家告别，解释自己这一次回来就是看看亲人，没有其他目的。自己是在农场告了几个月的假来的，如今假期满了，该走了。离集的时候，又到顾维舜家去吃了一顿饭，说他一点也不害怕，只是住在乡下太没意思了，还是回到青海好，一家人在一起安安心宁的。“二哥，我下一次回宝塔集，一定要带一个班回来，我这老婆生孩子真行。我蓝虎别的都输光了，只要一样输不了就行。人，人不能输！”这是他对顾维舜说的最后一句话。蓝虎到底是蓝虎，什么时候也改不了这种腔调。

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近乎于瘫痪，家长们都管住自己的孩子，不准他们再出去活动，孩子们也听话了，因为他们开始懂得“怕”字。连舍儿也不再犟头倔脑地顶撞爹妈而乖乖地呆在家里了。

只有杨大傻子还带着“独立大队”的红袖章，每天早上走街串巷地叫喊“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并且不时地向人们传送一点新消息。比如，他来告诉我和高凡，宝塔集的“心向东”战斗队就要成立了，叫“舍得刚战斗队”，队长就是“假老婆”。果然，第二天早上，“假老婆”和一帮人打出了新旗号，叫：“舍得刚”，说是要“舍得一身刚，敢把周纯一拉下马。”大傻子说他们是孬种，周纯一已经下马了，还用他们拉？但是因为顺乎潮流，这个小小的战斗队活跃得很，成了宝塔集上最有权威的造反组织了。

“舍得刚”一成立，就把眼睛盯着我们的家。“假老婆”时不时地到我们门口张望张望，有时还问长问短，一双眼睛直望着高凡，好像不认识似的。蓝永继把房子卖给了他，他就是我们的房东了。我们住前院，他们住后院。因为不大愿意与他们来往，我们把通到后院的门堵起来了。他上街要转个弯。但这并不影响他的“视察”。有一回，他把父亲惹火了，跟他吵了一架，这是父亲这一辈子第一次和别人吵架。

按说，我们家和“假老婆”过去的关系不错。“假老婆”的父亲死得早，靠他母亲把几个儿子拉扯大，所以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那时候我爷爷奶奶对他们母子非常同情，时不时地接济他们。解放后，“假老婆”一家定为“城市贫民”，属于无产阶级，弟兄四个有三个参加了工作，当上了干部，只有“假老婆”一个人留在宝塔集，日子过得也不错。那时还向我大姊求过亲呢，只因为大姊不喜欢他“假老婆色调”，没有成功。公社化时，“假老婆”进入了公社机关，当了炊事员，是个肥差，又认识公社领导，所以在集上假门假势的，颇为神气，可是对我家却还不大耍威风，我家人甚至还得到过他的一次接济，是公社食堂里吃剩的一些锅巴。周纯一下台以后，他不再对我们家讨好，却也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见了面仍然客客气气。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假老婆”维护公社干部，被称为“保皇派”，可是不久也造了反，投在周纯一的旗下。如今却大变了。那天我们一家人正在吃晚饭，他像影子一样地推门进来了。父亲请他坐，给他拿烟倒茶，他连个谢谢也不说，好像受之无愧。我们不知他的来意，便只顾自己吃饭，不与他说话。他呷了一口茶，吸了一口烟，突然阴阳怪气地对我们笑起来，说：你们家真怪，吃饭的时候都不说话。父亲说，这是我们家的规矩。他说，我记得你们家的规矩原来不是这样的，有一回周纯一来这里，你们吃饭的时候就又说又笑的。

父亲说：别提周纯一，他已经死了。

是吗？我没听说。你看，我刚才在街上还看见一张通缉令，怎么没把它撕下来呢？是我把它撕下来的。说着，他真的拿出一张通缉令摊到我们面前，还指着上面周纯一的照片问：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真像。怎么会落在“心向东”的手里？是不是你们交出去的？

我们没人回答。只有喜潮接过那张“通缉令”，对着照片叫“大姨父”。

这照片上的周纯一好威风！和他在这里当区长的时候一模一样，那时候他真是杀人眨眼哪！他又说，还眯起眼来端详周纯一的相片，像女人端详心爱的人。我们仍然不说话。

抓住他会不会枪毙？

枪毙的时候会不会要人“陪斩”呢？要谁呢？除了艾书记，他们是难兄难弟……

我们被他说得一起放下饭碗，喜潮指着他的鼻子说：枪毙你！枪毙你！叭！叭！叭！我把喜潮拉过来打了一巴掌，喜潮哭了，他又阴阳怪气地说：别哭，还不到哭的时候。

父亲终于忍耐不住，大叫一声：你给我滚出去！周纯一犯了死罪你就枪毙了他！若要陪斩的，我去！到时候你来报个信就是，现在少啰嗦！

我们吓了一跳，“假老婆”也吓了一跳。冷场了很久，“假老婆”才站起来拍拍屁股朝外走，一边走一边说：别威风了！周纯一迟早要给抓住的。

他刚跨出门，父亲就把门用力碰上了，还上了栓，连声叫着：报应，报应，都是周纯一应得的报应，现在却落在我们身上。父亲想拿烟抽，发现刚刚开口的一包烟让“假老婆”带走了，便骂：什么东西！

我问父亲：看他那样子，好像对周纯一恨得厉害，周纯一是不是得罪过他？

父亲把腿一拍，说：对了！枪毙小偷大杆子的时候，周纯一拉上一个泼妇去陪斩，把那女人吓疯了，不久就死了，那女人就是“假老婆”的亲姨。

母亲叹口气说：也难怪他恨纯一，那时做得太缺德了。其实那女人就是爱和邻居吵架。死的时候好可怜，自己倒在厕所里，屎尿糊了一身。

父亲颓然地坐在椅子上，又一迭连声地说：报应呀！报应呀！

喜潮问我：妈，大姨父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没好气地说：小孩子别乱问。

为了不再有人上门啰嗦，我们家一反小镇上的风俗，大白天也关起门来了。晚上，除了关门，还要加栓上锁。灯也少点，一家人在黑暗中坐着，小声地猜测周纯一在哪里，会不会被抓到。总是念叨之后是抱怨，抱怨之后又念叨。

那天，睡到半夜时分，我听见我的房里窗帘沙沙啦啦地响，便立即推醒高凡，坐起来仔细听。我们以为是有人来抓周纯一，便不吱声，听下面的动静。谁知这时喜潮要撒尿。这孩子好吃怔，我把他抱起来，他又睡着了，刚一放下，他又叫着要尿，把我父母也惊动了，问我们为什么睡得那么死，孩子要尿尿都听不到。说话间，妈便端着灯走进我的房门口。我吓得立即过去吹灭了妈手里的灯，小声地说：“窗外有人。”妈却没听清，说小孩起夜，当然不由人。高凡说：算了，点上灯，窗外是人是鬼，由他去吧！

我只得点上灯，把孩子拉下床，让他尿在痰盂里。

孩子尿尿的当儿，窗外接连亮了三下，像手电。好像打招呼。我不由得问了一声：谁？没有回答，手电又亮了三下。高凡问：是来找谁的？找周纯一吗？他不在家。不信你进来看看吧！妈吓得发抖说：求你别吓着孩子呀！喜潮尿完尿又倒在床上睡得呼呼的了。爸这时也走进来，说：怕是周纯一那边的人吧？

唔。窗外应了一声，很低很低。

你是谁？爸摆手叫高凡不要作声，自己问。

门缝里有信，门口有东西。我走了。窗外人回答。

我觉得那人声音像周纯一，便凑近窗户问：是不是大姊夫？可是那人已经走了，没有人再答话。

高凡和父亲马上到堂屋门口，果然门底的缝隙里插进来半只信封。高凡慢慢地将信封抽出，确实是周纯一的歪歪扭扭的笔迹。信上写：我来向你们告别。我到北京告状。包里的东西留给孩子。我对不起他们娘们，也对不起你们。下面还有一段毛主席语录：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我们轻轻地拉开了门，门口果然包着一个包袱，打开来一看，是周纯一的几样东西，一件军大衣，一只手表，几件旧衣服。

妈哭了。父亲说：别哭！会不会有人看见啊？这大月亮地里他怎么能跑掉？我们赶紧熄了灯。

一阵狗咬吓得我们胆战心惊。接着便听见“假老婆”的声音：死狗！瞎了吗？见人就咬！狗哼哼着沉寂下去。

那一夜我们再也没有睡。父亲说，高凡，明天一早你就回老家去吧。隔着一个省，总好一些。现在的事是一阵一阵的，说不定过几个月就没事了，光棍不吃眼前亏。

第二天，高凡走了。我没有跟去。我丢不下父母，也想留下来打听一点消息。我没有卷入那件事里去，即使把我抓去，也榨不出什么油水。

十

周纯一在火车站被抓住了。据说是他的“战友”出卖了他，不知道是真是假。他被抓住的当天，消息就传到了宝塔集，立刻，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好消息”——“杀人魔王”周纯一落网了。还很快就有了“落网记”，把周纯一被抓住的情形描绘得像一出戏。说周纯一以为出了县界，便大模大样地在候车室里候车，还不停地与坐在身边的人说话，说军管会偏向“老保”，煽起几个人的反军情绪。这时，他的一个“战友”来告诉他，外面有人找，有重要消息。他跟着“战友”走出候车室，走到一间办公室里，就被等在那里的几位觉悟了的“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的成员抓住了，用汽车载回来，交到了军管会。军管会对这几位同志的表现非常满意。希望更多的“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的成员学习他们这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精神，亲不亲，线上分，革命造反派都是一家人。

“好消息”贴到了我们家的大门上，自然是“假老婆”贴的。他还怕“好消息”被风刮掉了，所以贴得特别牢，而且一口气贴了好几张，把门上的春联都盖严了。

我们一家人此时的心情很古怪，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似喜还忧，似忧犹喜。喜，因为周纯一到现在还活着，而且到了军管会手里，总不会轻易送命的；忧，等待已久的灾难终于降临了。以后少不了要眼看着周纯一被批被外，还要被人逼迫着揭发他的问题。

因为宝塔集是周纯一的“老窝”，所以“舍得刚战斗队”要求把周纯一带到宝塔集上游街示众，发动群众对他进行揭发和斗争。军管会答应了，而且答应把艾书记也带来。

承蒙“假老婆”关照，他把事情事先通知了我，要我去“参加”。还说考虑到我的父母年纪已大，就不要他们去了吧。不论他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我都真诚地感谢了他。周纯一游街的头一天晚上，我就去舍儿家，向顾维舜夫妇求救了。希望他们明天找个借口把我们的父母和喜潮接到他家来玩一天，他们住后院，街上的声音不大听得到。顾维舜夫妇自然愿意，因为他们也想把舍儿圈在家里。玉儿妈想到了借口，明天不是二丫头德儿三十岁的生日吗？就说给她过生日。顾维舜说，从来都没给孩子过过生日，德儿孩子脾气又古怪，在乡下学校里你知道她肯不肯回来？人家教师都不教书了，只有她还认真真的。玉儿妈说，不回来正好，叫舍儿下乡去看她，不就大家都躲过了这一天吗？我和顾维舜都觉得好。

第二天吃过早饭，顾维舜就把我父母和喜潮接了过去，说给孩子过生日是假，干亲家很久不在一起叙叙了，想叙叙家常，我父母也很乐意，他们心里大问了，也想排解排解。舍儿也高高兴兴地下乡接他三姊去了。我则说去看一位老同学，去找了“假老婆”。我问他我应该怎样“参加”这一次行动，是陪着游街呢，还是跟着举手喊“打倒”？他笑笑，说：你以为我们也像顾维舜那么狠？叫你暗斗？你又没造党的反！以前的事也过去了。我们只是让你来看看，接受接受教育，回去之后作你的父母的思想工作。你不知道周纯一多么坏，他走红的时候你还小。可是我知道。他杀人不眨眼啊！宝塔集哪有那么多反革命！他不问青红皂白地杀，记得杨小群的事吧？枪毙她父亲的时候叫她看着，她才十来岁啊！我从那时候就觉得这周纯一这个人太毒了。李翠，你爹妈怎么会选他当女婿呢？

“假老婆”这段话说得真心实意。弄得我一时不知所措。热情感谢吧，觉得有失身分；冷淡对待吧，又觉得他对周纯一的怨恨可以理解。结果我只“嗯嗯”了两声，说到时候我一定来，就回家等着去了。我的家临街，街上一敲锣我就听到了。这里人游街都敲锣，也是古代传下来的。

周纯一和艾书记都被捆粽子似的捆着，两只手臂被弯到背后高高吊起，两只手快挨着后脑勺了。他们的衣服和两手都被涂满了红漆——红色象征鲜血，说明他们是杀人的刽子手。两个人都瘦得厉害，周纯一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他那件军装棉袄，原来紧绷绷的，如今觉得宽松了，所以绳子捆绑处出现了很大的皱褶。他的头被两个人的两双手按

着，按得很低很低，可是他的眼睛却还能一闪一闪地向别人刺去。我感觉到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往后退，退到他目光达不到的地方。相比之下，艾书记的待遇要好一些，他的头上没有手，是他自己低下来的。

“假老婆”今天有了一点男人气，他用喇叭不停地叫喊，要大家毫不留情地揭发批判这两个坏人。不用我们动员，宝塔集人早就对这两个人恨之入骨了！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的？居然有很多人回答：是的！我在举手的人群中看到了蓝永继，他是被叫来的，还是自己来的？

我跟着这支队伍走，踩着慢吞吞的锣声，哐！哐！哐！哐！我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只有哐！哐！哐！哐！

周纯一很像落难的英雄，不时地想抬起自己的头，但每一次都被即时按了下去，按到比原来更低。看到这样无声的争斗，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看看这个当初不可一世的人物如何对付眼前的处境也很有意思。但我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残酷的念头，他毕竟是我的姊夫。所以我又低下头，不看他，只听锣声，哐！哐！哐！哐！

因为是游街示众，所以没有人作什么像样的揭发批判发言，只有简短的问答和口号，这中间，“假老婆”的嗓子最引人注目。

周纯一，你交代，你是什么东西？

我是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的总指挥，响当当的造反派。

艾××，你说，周纯一是什么东西？

是混进造反队伍中的坏人，和我一样是反革命的黑手，我有罪！

打倒周纯一！打倒艾××！

哐！哐！哐！哐！

周纯一，你交代，你为什么破坏文化大革命？

我没有破坏，我拥护文化大革命。

艾××，你交代，你和周纯一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什么？

我们狼狈为奸，为自己翻案，挑动群众斗群众，反对三面红旗。我有罪！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决无好下场！

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万岁！万岁！万万岁！

哐！哐！哐！哐！

周纯一，你是怎么打死走资派××的？是不是杀人灭口？

我们没打他，是“心向东”的人打的。

艾××，你说，是不是周纯一打死了××？你当时在台上。

我，我，我低着头跪在地上，没看见……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周纯一，你的同伙还有谁？

我没有同伙，只有战友。我不知道我的战友在哪里。

艾××，你交代！

我，我不知道，我和周纯一单线联系

我听到了周纯一的冷笑，心里一阵恐怖，他为什么还笑？

果然，周纯一的态度激怒了他的批判者，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了一桶猪血，没头没脸地朝周纯一泼去。周纯一变成一个血人了。我看见他猛地挣脱头上的手，对那泼猪血的人大骂：我×你奶奶！一条皮鞭从空中落下来，抽在周纯一的脸上。肯定流了血，但是我分不出哪是猪血哪是人血……

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听见“假老婆”颤抖的喊叫，忍不住抬头看他，只见他脸色苍白，颈项的青筋暴突，嘴唇发抖。他也害怕？或者是怜悯？可是那扬鞭子的年轻人不是宝塔集人，根本不听“假老婆”的，“假老婆”把手里的喇叭交给了别人，从人群中悄悄退了出去……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队伍还在向前走，已经混乱不堪了。我的眼睛被血色耀花，头也晕眩了，有一种要呕吐的感觉。为了不吐在街上，我也悄悄地退下来，到了顾维舜的家里。

顾家人正乱成一团，原来舍儿从乡下德儿处回来，正碰上游行的队伍，看到那可怖的场面，一进家门就昏倒在地上了。我们却没有想到德儿会同意跟他一起回来，所以他

提前回到了宝塔集。他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场面啊！

十一

周纯一在县里各公社被游斗了一圈，对他的斗争算暂时告一段落了。他和艾书记都被带回县里，交军管会看管，由专案组处理。

下面该轮上我们与周纯一有关系的群众了。宝塔集人都战战兢兢地等待着。

军管会所宣传的政策非常明确：

（一）混进造反派队伍内的坏人要一个不漏地予以清除，但是决不冤枉一个好人；

（二）周纯一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干扰了斗争大方向，破坏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罪在不赦。但是对跟着他犯了错误的广大群众，则必须区别对待。党的一贯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反戈一击有功。

（三）“贫下中农造反司令部”中出现了“坏头头”和“黑手”，但不能说这个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应该把它当做一般的群众组织对待，只要他们的成员和坏头头划清界线，诚心诚意地向毛主席请罪，我们就欢迎他们重新回到革命路线上来。

不大有政治头脑的宝塔集人都在头脑里掂量着这些政策的每一条。结果是又明确又模糊。明确的是条文，模糊的是不知道哪一条条文适合于自己，好像都适合，又好像都不适合。而且这些“杠杠”又该由谁来划呢？

如今“假老婆”是宝塔集的新权威人士了，许多人都跑去问他该怎么办。“假老婆”知道该怎么办呢？他也不知道。跑到县里去问军管会，军管会回答的还是那三条。

一天，“假老婆”好像想到办法了，他叫人敲锣通知全集人集合，到原来宝塔站立的地方去。大家自然都去。如今没有了政府，当权的造反派就是政府了。

“假老婆”像去年率领大家拆塔时的艾书记那样站在一个大桌子搭起的主席台上，手里拿着扩音喇叭。初升的太阳照在他的脸上，使他那苍白的脸色有了光彩，比平时又漂亮了许多。

今天召集大家在一起，是为了向毛主席请罪。他说。

听众们一下子没有明白过来，都无声地望着他。

我们宝塔集人大部分都跟着周纯一犯下错误了，我们对毛主席犯了罪，对文化大革命犯了罪，所以我们应该请罪。只要请了罪，就既往不咎了。他又说。

听众们明白一点了。

大家说好不好？“假老婆”问大家。

没有人说不好。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请罪。中国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过不少创造，比如对领袖“早请示”、“晚汇报”，一早一晚像教徒似的站在领袖像前手举小红书，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山呼万岁，宝塔集人都学会了。只是“请罪”还没学过。

好，现在我们请罪。“假老婆”说。

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该怎么做。

“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大傻子挎着油果儿筐，吆喝着过来了。看他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大家不由得笑起来。

别笑！“假老婆”叫道。大家止住笑。

大傻子！“假老婆”叫。

到！假——大叔！大傻子立正应了一声，想叫“假老婆”，一想不妥，便改叫大叔了。大家又一阵窃笑。

我们在向毛主席请罪，你也该来！“假老婆”说。

是！大傻子放下油果儿筐，答应一声，扑通向东跪下了，磕了一个头，大声说：向毛主席请罪。然后站起来问“假老婆”：是这样吗？

“假老婆”的眼睛一亮，说：对！就这样。现在你站到群众中去。全体向后转，面朝东，听我的口令！

大家都转向东，太阳有点耀眼了，都不由得眯起了眼睛。

全体跪下！“假老婆”拖长了声音，像喜庆大典上的司仪。

哗啦一声，大家都跪下了。我回头看看，“假老婆”也跪了下来。

磕头！“假老婆”说。

我们都把头砸到了地上。

大家跟我说：敬爱的毛主席——

敬爱的毛主席。
我们上了周纯一的当——
我们上了周纯一的当。
我们向您请罪——
我们向您请罪。
敬祝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您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我跪着，喊着，心里仿佛又升起了一座塔。这塔不再是灰色的，而是红色的，红得耀眼、刺目，所以再也不会再有孩子在它身边玩耍，更不会有人站在它顶上撒尿了。我们只能顶礼膜拜，山呼万岁。可心里却是滑稽的感觉。

起来吧！“假老婆”率先站了起来，人们也跟着起来了。可是顾维舜却还跪着，舍儿在用手拉着他。我走过去说：二叔，起来了。他抬头看看我，天啊，他哭了！他的脸色如死灰，两眼盈着泪，鼻涕也流出来了。我无法知道他此刻心里想到什么，但是我似乎理解了，泪水也止不住流了出来，舍儿见我流泪，也哭起来。大傻子过来劝舍儿：舍儿兄弟，别哭，可是他也淌起了眼泪。

这是怎么啦？我们这是怎么啦？像得了什么古怪的传染病似的，一时之间竟是一片哭泣。

不要哭了。“假老婆”的声音也是哽咽的。毛主席说，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改了就好。毛主席会原谅我们的。现在，请罪活动结束了。说罢，他还特地走到顾维舜身边，温和地说：顾维舜起来吧！顾维舜起来了。

人们纷纷离去，我和合儿扶着顾维舜一步一步回到家里。到家一见玉儿妈，顾维舜的眼泪又流出来了。玉儿妈问出了什么事，我们也不知该怎么回答。玉儿妈说：五十多岁的人了，有啥事慢慢说，哭个啥？三岁不成驴，到老还是个驴驹子，你爹妈咋教你的！顾维舜这才止住泪，要了一杯热茶，慢慢地呷了两口，缓过劲来。

我问：二叔，你到底是怎么了？

他摇摇头，说：不知为啥，只觉得心里害怕，一说请罪，心里就发抖，好像自己真的犯下了大罪，老天爷要抓我下地狱一样……

玉儿妈骂道：没出息！我就见不得你这样！怕啥？心里又没鬼。

顾维舜无力地摇摇手：别吵了！让我睡一觉，睡一觉就会好的。

当我们宝塔集人在宝塔倒下的地方朝东跪下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是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创造。可是第二天出版的造反报告告诉他们了，“这种形式好”！报纸说，用向毛主席请罪的形式进行自我教育，表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决心，是宝塔集群众的一个创造。其他地方的群众也可以这样做。

这样一来，请罪便在全县以至全地区推广了。人们可以为着各种各样的事在领袖像前下跪，像以前跪拜神灵。那一段时期，到处都可以发现跪着的人群，甚至在公路上……

十二

“请罪”活动之后，顾维舜整天神不守舍，恍恍惚惚的。他一次又一次地对玉儿妈说：我去找找“假老婆”吧？玉儿妈总是不同意：找他干啥？也去“舍得刚”？你身上有几斤肉？够他们刷的？

还有心思说笑话？我对了那几条政策，觉得我应该去挂挂号，我当过右派……顾维舜说。

你造反了？玉儿妈问。

我没造反，可是舍儿……

舍儿是舍儿，你是你！

顾维舜拗不过妻子，他说，你净打岔，等人家找到头上就被动了。

玉儿妈笑了，说：被动？被动是两口子拽的！

顾维舜得不到玉儿妈的同意，就没有去找“假老婆”。但他天天说：我心惊肉跳，肯定要倒霉了，肯定的。他每天比以前起得更早了，为的是到处看新贴出来的大字报，看看有没有揭发自己的。

今天，他又像往日一样，天还没亮透就到了电影院门口，贴着墙去瞅那些新贴的大字报。一个题目首先跳入他的眼睑，把他吓了一跳，他定定神，再看，不错，他没有看

错：

《请看顾维舜这个老右派在周纯一的反革命活动里扮演了什么角色？》

顾维舜飞快地将目光移到大字报落款的地方，想看看是什么人写的，那两个名字更叫他吃惊：杨小群、蓝永继！

为什么？为什么？顾维舜对着大字报问起来。我扮演了什么角色？什么角色呢？和周纯一的反革命活动，我有什么关系呢？

他盯着那张大字报看了很久，一个字也没看清楚，只看见大字报还湿漉漉的，看上去刚刚贴上去只有一小会儿。那么，永继两口子还在这不远的地方，找他们问阿，行不行呢？他围着电影院转了一圈，没有看见一个人，便又回到大字报前，看它究竟写的是什么。

顾维舜从小在私塾养成的习惯，看书看报要念出声音，还要微微地摇头晃脑。现在看“炮打”自己的大字报，这习惯也改不了。只是他越念声音越轻，渐渐地变成了嘀咕，最后连嘀咕的声音也没有了，只剩下嘴唇的开合，而且开合的幅度越来越小。终于读完了最后一句，但是他仍然不明白，他和周纯一的反革命事件有什么关系。他只记得两句话，一句是说他是伪乡长，国民党的骨干分子；一句是说他的二女儿德儿是公社走资派培植的“黑标兵”。

顾维舜不明白，为什么永继两口子要这样写。你攻击我还罢了，为什么要攻击德儿？德儿是个不惹人的姑娘啊！德儿已经够苦的了。

在顾维舜的女儿中，德儿和她的大姊一样，是个极为普通的姑娘。按说，她的聪明不在玉儿之下，可是她的过于内向的性格把她的聪明掩盖了。从小到大，她都不吭不噤，在哪里都很难被人注意。若论相貌，她应该是三姊妹中最漂亮的，因为她像妈妈。肤色白皙，眼窝深，眼珠黑，透明透亮。身材也好。就因为不爱说话，顾维舜夫妇没有让她早早上学读书，怕她受人欺负。她是解放后才读书的，那时她的妹妹已经快小学毕业了。误了一趟车，便站站赶不上了。读到高中毕业，她已经二十五岁了。正是灾荒年头。家庭状况不佳，她便放弃升学，在本地找工作挣钱帮助家庭。正好当时招收民办教师，她便去了。谁也想不到，她的工作竟然非常出色，一个人吃尽辛苦创办了一所农业中学，这是很多男人也办不到的。她因此成了民办教育的“标兵”，青年积极分子，省报上登载了她的事迹，要不是父亲是右派，她就入党了。但公社党委鼓励她继续努力，只要与父亲划清界线，入党还是有希望的。可是她对入党并不感兴趣，所以也没与父亲划清过界线。她对“文革”一直冷眼旁观，不是万不得已，从来不去参加什么会议。有人说她因为年纪大了，想嫁人，所以才这么古怪，她也不响，照样每天躲在乡下学校里，周末才回到集上来。

永继两口子为什么要伤害这样的姊妹呢？还说她是顾维舜安插在革命队伍里的一颗钉子，放出的一条“美女蛇”。这，从何说起！

顾维舜再定睛看了看那些刺人的字句，好像一条条毒蛇向自己窜过来，他忍不住伸出手去推挡那些毒蛇，结果大字报被他撕破了一只角，在风中哗哗地响起来。这使他的头脑清醒了过来，说不定正有人盯着自己，撕大字报是反革命行为啊，何况那大字报是揭发自己的！于是他重新伸出手来，去按住那张破了的大字报的角，把破缝一点一点对好，直到下一个看大字报的人来到，他才放手，说去找浆糊补大字报，一边走一边嘀咕：为什么不贴紧呢？风一吹就掉了，不用手扯就掉了，我要把他贴好……那人说：算了吧老顾！管你什么事？可是一看大字报的标题，他明白了，便又对顾维舜说：还不快走？我帮你贴好。

顾维舜这才突然醒悟急匆匆地跑回家去了。

一家人都没有起床呢！

还睡还睡，太阳都一竿子高了！死到临头了，还睡！顾维舜一面埋怨着妻儿，一面在屋里东找西摸，找到了妻子的针线篮子，像野鸡刨食似的乱掏，把鞋样、花样撒了一地。妻子问他找什么，他也不说。

他是找一张照片，那张照片记录了他那一段不敢见人的、极为短暂的历史。

如果不是那一段历史，顾维舜这一辈子真算是清白的。读完六年私塾，父亲便送他到一家商店里当学徒。从那以后，他就没有离开过一个“商”字。由学徒而店员，由店员而管账，而经理，直到最后自己开了一爿店，带学徒，雇帮工，变成了集上商界颇有名气的“顾先生”。虽然根据阶级分析方法，他应被划为小资产阶级，可是与政治总没有什么关系。

问题出在抗日战争初期。日本鬼子还没打到宝塔集，集上人先自己干起来，蓝永继的父亲蓝龙被人抓去枪毙了，这使得顾远山老头子看不过去。他认定那些招兵买马的人都是土匪恶棍，绝对不能与他们有任何牵扯。他说我们顾家是有根有叶的书香世家，岂能与这般小人有些许瓜葛？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老实，没人看得上眼，小儿子还小，只有二儿子顾维舜叫人放心不下，因为有人见他聪明能干，想拉他。为了躲开这种拉扯，顾远山叫二儿子到外面住一阵子再说。他给儿子介绍到豫皖交界线上的一个小镇上，他的一位朋友在那里当镇长。那朋友把顾维舜吸收到镇公所，当了一名“师爷”，即办事员、干事、秘书之类。顾维舜也干得如鱼得水。不过因为顾远山老头坚持乱世不从政的主张，两个月后又把儿子召了回来。这段经历留下了一张照片，是为了在镇公所入册而拍的“标准照”，光着头，穿一身整齐的中山装。因为这一辈子仅有这一次“吃公粮、穿制服”的经历，照片又拍得不错，所以顾维舜一直舍不得丢掉那张照片，让玉儿妈替他保管着，玉儿妈把它和自己的宝贝鞋样放在一起。集上人都不知道这件事，顾远山老头不让说。

现在，顾维舜怀疑这张照片被永继夫妇看到了。但他不敢马上就和妻子说这事，要等儿子出去了以后才能说。

儿子总算吃完晚饭出去了。顾维舜连忙说明原委，问妻子那张照片的下落。玉儿妈也找了一阵，照片确实不见了。

会不会是舍儿拿了照片去检举的呢？要不蓝永继怎么会知道？顾维舜说。

你啥事都朝自己孩子头上栽！他疯了傻了？就是去检举，他也要先问问我。永继的大字报里提到照片的事了吗？玉儿妈说。

没有。那你说他们根据什么？顾维舜问妻子。

玉儿妈火了：问我？我咋知道？我又不识字，不能去看大字报。你下乡找永继两口子问问去！别说我们和蓝、杨二家都是干亲家，就是无亲无故，也不能疯狗似的乱咬人！

那怎么行？那是打击报复行为，罪加一等了！顾维舜说。

那你就坐在家别出去，等着他们降罪下来吧！玉儿妈没好气地说。

不行，我得上班去。要不会说我是抗拒大字报。顾维舜说着，抓起自己那头破绒帽戴在头上出去了。

街上已经有很多人看过了那张大字报。顾维舜感受到人们那与往常不同的眼光了。好像每一双眼睛都在对他说：

好你个老顾啊，原来还当过反动派的官儿！

你还拿闺女当美女蛇？

你想撕掉那张大字报，是吧？你的黑手被人民群众抓住了！

为了把这些声音从头脑里赶出去，顾维舜低下了头，加快了脚步。可是他低下的眼睛没有看路，步子也走得太快了。小巷子出口处的那条路很窄很窄，右边是“月河”，左边是“东沟”，他掉到了月河里。

当过路的人把他捞上来送回家，玉儿妈让他换了干衣服睡在被窝里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这下好了，今天不用上班了！你去店里替我请个假吧，我病了……

舍儿到吃中饭的时候才回到家里，一到家就气呼呼的，看见父亲睡在床上，更气。他把脚一跺，对父亲说：怪不得那天请罪的时候你吓得直哭，心里有鬼啊！顾维舜不敢回话。

你倒是说话呀！我找过蓝永继和杨小群了，他们一口咬定都是真事。是真是假你说句话，要是没有这档子事儿，我非找永继算账不可，什么干哥哥干姊妹，他无情别怪我无义，舍儿说。

顾维舜不得不从被子里坐起来，把自己的那一段历史对儿子说了。

你为啥不早说？合儿对着父亲咆哮。

看着儿子那双喷火的大眼，顾维舜差不多要哭了。他向儿子赔罪，说：我对不起你们。我原来是害怕连累你们才隐瞒的，没想到还是连累了你们。现在我就去交代……

说着，顾维舜就要下床穿鞋。

玉儿妈一脚把顾维舜的鞋子踢了过去：不去交代！没干过坏事交代什么？我看蓝永继两口子是鬼迷心窍，要立功赎罪，叫他们去立功吧！

倒是那张照片真的在他们手里……顾维舜可怜巴巴地望着妻子。

在他们手里又怎么样？借人家衣服拍的照！该不该杀头坐牢？杀头坐牢我替你去！玉儿妈说得斩钉截铁，顾维舜又躺了下去。

这不是家务事，你不要管。舍儿对他妈说。

你老子的事不是家务事，啥叫家务事？玉儿妈问儿子。

什么老子的事儿……舍儿咕嘟了一句。

啪！一记耳光打在舍儿脸上，是他妈打的，打完了还骂：六亲不认了，这还得了！他就是你老子，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吸大烟，四不搞腐化，哪一点给你丢了人？

舍儿捂着脸抹起了眼泪，说：你看吧，这一下舍得刚有文章作了，我也逃不了！

顾维舜又坐起来对儿子说：你放心，我决不连累你。真到了躲不掉的时候，你就宣布和我脱离关系。

他敢！玉儿妈说，脱离关系？怎么脱离？改名换姓？说他是我跟人家生的？你就不能有点出息？在外面你怕官，在家里你连儿女都怕，你还算个什么人？当有派的时候，你叫玉儿和你脱离关系，现在又要舍儿跟你脱离关系，再来两次运动，你不成了绝户头了？

顾维舜被妻子说得直叹气，他说：真要是绝户头，我也就不怕了。人生在世，还不是为儿为女？我这一辈子没能给儿女置下产业，还要连累他们跟我一起受罪，我于心不忍呀……

舍儿听了父亲的话呜呜哭起来，玉儿妈也抹起了眼泪，说：苦了德儿了！舍儿咬着牙骂道：姓蓝的，姓杨的，你们不是人，老子总有一天要找你们算账！

顾维舜害怕地朝门口望望，叫玉儿妈：快把门关上！

十三

我本该早点去看望舍儿他们的。这两天他们一家人成为宝塔集的新闻人物了，对顾维舜的传说倒还罢了，只是苦了德儿。她真的被人们叫成“美女蛇”，而且编造了许多故事，说她到现在还不结婚，想等着攀高枝。可是再也不会有人要她了。我知道德儿的婚事为什么被耽误了，只因为她总比她的同班同学大得多，不可能在同学中找到朋友，而又不肯接受别人的介绍。不是想攀高，而是不习惯和陌生的男人见面。小集子上文化相当的人本来就不多，一来二去就给耽误了。她自己够烦恼的了，再这样说她不是往她心口上插刀子？

可是我的父母病了，我一刻也离不开家。我后悔那天不该不让他们上街去看周纯一游街的情况，免得他们听别人的添油加醋的描绘，再加上他们的想象，事情就变得比原来的样子可怕得多。他们断定周纯一这一回不死也要落个残废，然后又设想周纯一死了之后我大姊和孩子们的状况，越想越害怕，越想越伤心，睡不安，吃不好，便一起病倒了。

我一刻不离地照顾着父母，还惦念着高凡。高凡已经回到乡下家里去了，说要照顾家里的庄稼。他不断来信诉说着思念和寂寞，希望和我和孩子在一起。我何尝不希望一家人厮守在一起呢？可是我不能离开父母，也不想离开宝塔集。我担心啊！怕高凡什么时候也被“揪”出来。我也像顾维舜一样天天去看大字报，寻找一个个被点到的名字，看看有没有高凡。我没有找到高凡的名字，是人们把高凡忘了，还是葫芦里装着别的药？我写信问过高凡，高凡说不用分析，现在的事情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像天要下雨，你盼它的时候它不来，你不需要的时候它却来了。

永继小群的大字报叫我紧张了一阵，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周纯一的部下在压力下互相厮打的信号，我更不明白这种厮打首先在两家干亲中开始。如果永继和小群能够向顾家开炮，他们向我家“开炮”日子大概也不会太远了。我家和他们的关系还要疏一些。我本该找永继和小群问个明白，但是也走不开。

今天好了，父母可以下床走动了，我把顾家的情况告诉他们，他们叫我赶紧去看看。想不到玉儿和她的女儿迎波回来了。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回来探亲？不年不节的。我问玉儿，玉儿说，遇着难题了。她怀孕了，可是在这样的时间怀孕真是一件苦事，一个人在上海，还领着孩子，丈夫又在外地，被武斗搅得不知死活，失去了联系，她只得自作主张流了产，来家乡休息一阵。玉儿瘦了，瘦了很多很多。几年前她回来结婚的时候多么好看啊！虽然皮肤黝黑，但清秀丰润，充满生气。现在却不但消瘦而且暗淡了，充满了疲倦的神色。

玉儿，很忙吧？你们那里的人也造了反？我试探着问，猜想着她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我觉得她很可能是“保皇派”。她是那么相信书上报纸上所说的一切。

出乎我的意料，玉儿说她是她那个单位里最早的造反派之一。

怎么会呢？我说。

怎么会呢？我虽然不是党员，可是对党的号召我从来都是响应的。开始也不大理解毛主席的意图，可是运动越深入下去，我就越觉得这场革命确实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真没想到，那些党的干部原来是那样的。我原以为他们一个个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呢！真的“修”了！玉儿说。

但是我不赞成周纯一这样干法。怎么能不听中央文革的指挥？我又认为他有个人野心，造反是不应该有个人野心的。为个人夺权就是篡党了。玉儿又说。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历史告诉我，所有的开国之君都是篡权者。不篡，就没有权力和朝代的更迭。同样，不论哪一朝的国君，一旦夺到了政权，便不许别人再篡了。他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由自己自由支配，大权独揽，小权分散——赐给各等臣仆。于是，所有利用人民夺取的政权最后都与人民分离，久而久之，又一次篡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有一天，能够保证权力的公平分配……这一切，玉儿是不会同意的，还是不说为好。

玉儿见我不说话，便解释说：翠儿，我看过他们的那张造反报，我也觉得很惨，那些干部太可恶，不可原谅，我是永远地不会原谅他们的。但是要顾全大局……

我不想与玉儿谈这些！我觉得造反派和造反派的心隔得很远很远，何止十万八千里！我把话岔开，问为什么见不到德儿，她现在的情况怎样了，二叔的情况又如何。

玉儿激动起来，眼圈也红了，说：我不能理解，不能原谅永继和小群他们，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呢？我父亲历史上有一点问题，就揭发他好了，为什么要攻击德儿？我听说是因为德儿找工作的时候，永继也在找工作，他认为是德儿占了他的位置。

不会是那样吧？我疑疑惑惑地说，会不会受到什么压力？

不论怎么说，都不该无中生有！这是不道德！玉儿说。

激动中的玉儿总是可爱的。脸上的倦容不见了，还红润起来。

德儿还在教书？我问。

不教书了。学生也叫她“美女蛇”，怎么教？可是她不肯来家，要求在学校里打钟。以前周末还回集上来，现在星期天也不回来了。所以今天一早爸妈和舍儿都去陪她了。我去看过她，她一句不说，只是流泪……

玉儿说着也抹起了眼泪。

二叔没事吗？我问。

他去找过“假老婆”了，“假老婆”态度还好，叫他老实实在家里等待审查。玉儿说。

奇怪，我们两个人都一齐停顿下来，停顿了很久很久，我望着她，她望着我，好像再也没有什么话题了。我感到难为情，不管怎么说，玉儿是远离乡土的小姊姊，轻易不回乡，应该热情对她。

还是她打破了沉默：你和高凡感情很好？

是。我这一生大概就只有这一点值得骄傲了。我说，可是他现在也因为和周纯一的关系处境不佳，叫我整天为他担惊受怕。

玉儿的眼睛朝我忽闪了一下，又转向了别处，细声地说：我有时候想，对一个女性来说，究竟什么才是幸福？我羡慕你们这样的患难夫妻。对永继和小群，我以前也是羡慕的，即使是现在，他们也是夫唱妇随……

为什么不想办法和丈夫调在一起？夫妻长期分居两地是要影响感情的。我说。

玉儿叹了一口气：一言难尽啊，翠儿！谁说我没有努力调在一起呢？可是我的单位不放我，我又没有本事把他调到上海。找领导吧，领导总说，我还年轻。还说当年红军长征的时候，很多夫妻都长期分离，生了孩子只好养在老乡家里……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

玉儿不想多说，我也不便多问了。这一次见面，玉儿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模糊的。她心里好像装了很多东西，又好像空空如也；她好像很有头脑，又好像幼稚得近乎孩童。只有一点印象是明确的，那就是她的精神脆弱，她总是希望在一个虚构的理想世界中生活，想把互相矛盾和对立的各种事物用一个模子装起来。如果她的理想稍稍受损，她就受不了了，五十斤重的担子，她挑起来比一百斤还重。是书斋里关得太久的缘故吗？

我起身告辞的时候，玉儿把我的手拉得紧紧的，好像唯恐我离去似的。我说：过几天我再来看你，再和你一起下乡去看德儿，好吗？她摇摇头，说：不，不要过几天，你明天就来好吗？翠儿，你没尝过流产的滋味吧？我尝过，躺在手术床上的时候，我只有

一个想法，再也不做女人了！再也不要孩子了！我甚至想到小时候爷爷给我算的命，他说我要早死，我想大概活不长了……

说着说着，她哭起来。我觉得她心里有事闷着，便重新坐下来，想听她叙叙，可是她却让我走，说一定要明天再叙。可是第二天我就回生产队去了，是书元哥带着高凡的信来把我接走的。村里出了大事，张队长下了台，疯大爷也失踪了。我失去了和玉儿深谈的机会。

十四

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现在，我们的张庄生产队一直是安稳的。大家都感谢我们的张队长。要不是他在大跃进的年月里斗着胆子抗上藏粮，我们还不知要饿死多少人呢。所以，不论外面的人怎么斗争自己的干部，我们还是把这位队长当作“青天”敬着、爱着。也依旧像从前一样忍受着他的粗话和吵骂。邻村的小郝庄生产队就和我们不一样了，他们的郝队长在那几年作恶太多，冤魂债主一起找他算帐了。他以前对社员们做过什么，如今社员们都如数奉还。打、骂、饿，这是最常见、最轻微的惩罚了，跪在石子上，大冷天剥光了上衣站在寒风里，滋味就不大好受。虽说社员与他都是同族的叔伯兄弟，但是打起骂起他来却既不心疼也不手软。他的屁股给打烂了，西装裤不能穿，只好穿老式的大裆裤，走路时还要捂着屁股。

小郝庄的社员们来找过我们的队长，要我们生产队与小郝庄生产队的贫下中农联合起来，把大队和公社的那些欺压过百姓的干部都给揭下来。我们的队长不同意。张队长说，鸭子吃稻，一还一报，报应来报应去还是老百姓吃亏。算了，你们心里有气，对老郝要打就打几下，要骂就骂几句，叫他知道厉害，下次不敢再干就行了。千万别朝要紧的地方打哟，出了人命是要吃官司的。咱要揍死人家一个都跑不了。当家作主！哼！你们要是记住了我说的这个理儿，就不会吃大亏。不要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

小郝庄的人听了我们队长的话，所以郝队长还活着，烂了的屁股也结了疤。

可是想不到如今周纯一的事情影响到我们生产队，是非又颠了个个儿，郝队长又神气起来了。屁股虽然烂了，头脑还好好，所以周围发生的什么事他都知道。他知道周纯一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全省都有一股邪气，要反对三面红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为彭德怀翻案。他甚至于说得清《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彭德怀的关系：彭德怀根枯叶烂心不死，所以叫一个姓吴的写了这出戏，为自己叫屈。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好惹的，毛主席定下的案子谁也翻不了。他当然还知道周纯一和我的关系，他说他看见过周纯一几次到我家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张队长还和他一起吃过一顿饭呢。周纯一被捉住的消息一传到我们那里，他就到了书元家，问我和高凡的下落。书元告诉我们到高凡老家去了，他不信，说八成和周纯一一起被抓了。书元嫂子是小郝庄人，“大跃进”时曾经为了吃饭做过郝队长的相好，自从嫁给书元哥就再也没有瓜葛了。可是现在他却当着书元的面，叫书元嫂子为他点烟，书元嫂子划着一根火柴，他给吹灭，又划着一根又被他吹灭。书元嫂子气得又哭又骂，书元哥更抓住郝队长的衣领把他推出门去，对他说：你再不滚远点，我用拔猪毛的镊子拔掉你的眉毛。这话正好被刚进门来的张队长听到了，他笑着说，他那眉毛不能拔，那是贵人眉，将来还要升大官呢！郝队长果然得意地持了捋他那长达一寸、乱如荒山野草、浓若乌鸦翅膀的眉毛，说：你老弟说对了！可是他冷不防被张队长按住了头，说：我就拔一根，让我沾沾你的贵人气！张队长果然把左眼上最长的一根眉毛拔了下来，用嘴一吹，说滚吧！要不我把全村人叫来，说你调戏良家妇女，看不把你揍扁了！他灰溜溜地跑了，临走说了一句文绉绉的话：后会有期！

从那以后，郝队长没有再上我们队里来，但是常常骑着自行车一趟一趟地往外跑，到公社，上县城，找造反队和军管会揭发张队长的罪状，还搬来一些不了解情况的红卫兵到我们村里来吵吵闹闹，七哄八闹的，我们的队长真的给哄倒了，成了“反对三面红旗的急先锋、反革命复辟的黑干将”了，高凡也在村里呆不下去，便天天到学校里上班，说是接受审查了。幸好他的学校乱糟糟的没有头绪，所以还没有受什么大委屈。

我们村的人还是不肯去斗自己的队长，他们一再向外来人诉说张队长的种种好处，

哪知越说越糟，不但张队长所有的好处都成了罪证，连我们生产队也陷进了重围，我们成了全县闻名的文化大革命的“死角”。“贫下中农没有发动起来”啦，“阶级斗争的盖子被一小撮坏人捂住了”诸如此类的帽子一顶一顶往我们生产队头上戴。公社的造反指挥部要给我们送“东风”，郝队长便又拖着结满了伤疤的屁股来了，来帮助我们“发动群众”。

我们队的群众太难发动了，郝队长说破了嘴皮也没人听，大家心里透亮，你是个什么东西！他说我们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我们也不理他。但是对外面的压力也不能不考虑，所以书元他们出来组织造反队，对张队长明批暗保。当公社、大队或县里有人来批斗我们的队长时，书元和几个精壮的小伙子就以本村造反派的身份保护在队长的左右。要是有人要把我们队长拉到外面去斗，书元他们就跟着，疯大爷也跟着，好报个信什么的。不过，就这也够烦的，常常耽误了地里的活。好在张队长生性豁达，每一次捱完了批斗，仍旧有说有笑，有叫有骂。仍旧是张队长指挥着全队的耕种和收获，书元只是挂名元帅，专给外面人做样子的，这情景很像抗日战争中应付日本鬼子的“白皮红心”政权。

没想到疯大爷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出问题。

疯大爷的事也与我和高凡有关系。我们收集小报和传单的习惯影响了他，我们不在家时，他便替我们收集起来。没事的时候，他便翻看那些小报，向村里人传达一些消息。他是前清时代的读书人，要不是家境贫穷，他说不定能考取秀才。如今，他是我们村“文化人”之一，大家都叫他“张庄报社”。

一天，疯大爷在省里一个大学的造反报上读到一篇文章，叫《捻军的首领张乐行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文章说，解放以来，史学界受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把历史上叛徒也当作英雄加以吹捧，张乐行就是一个例证。张乐行何许人也？原来是一个欺压乡里、贩卖私盐的豪绅，后来窃据了农民起义的领导权，把农民起义领上了失败的道路。最后他自己受了招安，和刘少奇一样成为可耻的叛徒。现在，大叛徒刘少奇已经被我们当作垃圾从现实中清除了出去，那么，我们还不该把张乐行这样的叛徒，这样的混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当作垃圾从历史中清除出去吗？是时候了！

张庄的人都知道，疯大爷那里，什么东西都可以由人拿去，只有一样东西是一丝一毫也动不得的，那就是张乐行在他心中的神圣地位。村上的人没有几个读过历史的，但是对张乐行这个历史人物却非常熟悉，都是疯大爷说的。疯大爷把自己所知道的张乐行的故事都讲了，只是闭口不提他和张乐行起义的关系。我因为是学历史的，所以多次缠着疯大爷给我讲一讲他的经历，他也摇头，说到我死的时候才告诉你。我只能从他一次偶然的酒后失言中知道，他可能参与了捻军的后期活动。作为一个读书人，这种行为在当时已经大逆不道了，所以疯大爷是清朝时候的“造反派”。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许许多多，清朝倒了之后又换了几个朝代，疯大爷为什么对张乐行还怀着那样的感情呢？实在叫人不能理解。而且，既然如此热爱张乐行，又一直拖着一根小辫子不肯剪，更使人感到乖张古怪。我和高凡私下议论，这老人心里一定藏着什么叫他一生都不能释然的“情结”。

疯大爷不能容忍那一张小报，他用一支红笔，在那张小报上写下了许多“胡说！”，然后逢人便说这张小报如何造谣，张乐行如何好。他不但在私下里说，还要赶到各种各样人多的场合去说，甚至赶到公社的、大队的会场上去说。只要听说哪里要开会，他就赶去了，带上那张小报。人家那边散会，他这边就指手划脚地说开了。他说：

大家看到这篇文章了吧？一派胡言啊！这个写文章的人懂个屁！要知道乐老头是什么人，只有找我！我知道他，因为我跟他造过反，是他手下的造反派！我那时年纪小，没赶上看见他，可是我爷爷、爹爹见过他！张乐行，乐老头，是一条硬汉子啊！他老人家虽然家境富足，却能够杀富济贫，对抗官府，现在到哪里找这样的好汉去？说乐老头受了招安？嚼蛆！满嘴嚼蛆！我知道，我啥都知道。那是咸丰四年的事儿，满清朝廷和宿州知府郭士亨见打不过张乐行，就来了个劝降的诡计。郭士亨先派人去劝乐老头，乐老头不理，他就亲自出马了。郭士亨对乐老头说，只要你肯投降，朝廷保证高官任你做，骏马任你骑，还给你的军队发饷。你们猜乐老头说啥？嘿嘿！乐老头说，行啊！我提出三条，你们若依了，我就降，不依，咱们就打下去！你们猜乐老头提出了三条什么！嘿！嘿！不要急听我说。第一条，开仓放粮，救济百姓；第二条，我的队伍只听点不听调；第三条，我的人马不梳辫子。大家看，这是投降的条件吗？郭士亨都不敢答应啊！从此就再也不提招安的事了。乐老头最后被清兵活捉，他老人家死得好惨，是一块一块地刮

死的，可是他没有说一句孬话！乐老头是叛徒？写这篇文章的小子是什么东西？给乐老头倒尿壶都嫌他骚！

这样长篇大论地说完还不过瘾，疯大爷又像以前一样打起了呱哒板，又是扭又是唱的了：

咸丰年，大歉年，
涡河两岸草吃完，
地丁钱粮逼着要，
等死不如去造反。

人们听得津津有味，没有多少人听说过张乐行，所以有人问疯大爷：你唱的张乐行就是周纯一吧？疯大爷便用唱来回答：

你说像谁就像谁，
为民请命不是罪。
不是罪，你乱批，
九九归一你倒霉。

大家都认为，这一次疯大爷真的疯了。疯子应该有胡言乱语的权利，所以听他这样说唱，也都一笑了事，既不相信也不追究。可是几天前，他在公社说唱的时候，碰上一个路线斗争觉悟很高的中学教师，从他的说唱中听出了弦外之音，那就是为周纯一鸣冤叫屈，为“青天书记”和彭德怀翻案。这位教师写了一篇稿子，把自己的发现在省里的大报上披露了。这位教师呼吁大家注意农村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说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限制，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时也相应地采取了通俗的、能为农民所接受的形式，比如唱莲花落，装疯卖傻。

这一下疯大爷可出名了。那年头，大家都有一种爱好，看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不一定都是幸灾乐祸，主要的是好奇。一般人很难想象，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怎么敢和党中央、毛主席对抗，这种人不是天生有反骨，就是有三头六臂，有非凡的力量。所以，每当他们发现那些形形色色的斗争对象不过是和自己一样的男女时，总多少有点失望。疯大爷的事迹更能刺激人们的好奇心了，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头竟有这么大的胆量，这么猖狂的劲头！莫不是真有魔法和功夫？有人甚至认为是哪一路的神仙下凡，故意考验凡人的。所以，来张庄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一来，就将疯大爷团团围住，要他说，要他唱，说了唱了，就叫他回答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接着就是哄笑，批判，间或还有推搡和殴打。

村里人都想保护疯大爷，不断地对人们说他是真疯了，几十年就是这个样子。可是这样的解释哪里能抵挡住那些如痴如狂的“革命小将”？他们把疯大爷当猴子一样的耍弄。

每天晚上，书元两口子都要为疯大爷清洗被人泼脏了的衣服，梳理被人扯乱了头发，劝他把那脑袋后巴上的细细的小辫子剪掉，他都不理不睬，只用疯疯癫癫的说唱回答，说什么“我装疯，我卖魔，装疯卖魔无奈何”，“我吃苦，我受罪，罪有应得不怨谁”，“不低头，不装孬，死到临头伸直腰”……

眼看着疯大爷越来越疯，村里人一筹莫展。这几天他索性脸也不洗，头也不梳，没日没夜地扭唱起来了。后脑勺上的小辫子被“小将”们揪来扯去，只剩几根毛了，老鼠尾巴似的在脑后巴拖着。

管不了他，也只好由他去了。大家觉得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别人也许不会对他下毒手，就让他疯到底，疯到死吧！

可是疯大爷却突然失踪了。已经是两天一夜不归村，是自己跑出去的，还是被人家抓去了，谁也说不清。

十五

书元已经到周围的村庄都找过了，找不到才到宝塔集来，以为疯大爷会到宝塔集。疯大爷没有亲人，我和书元就是他的亲人了。书元自从养父顾维尧家跑出来之后，几十年来一直和疯大爷生活在一起，和疯大爷的感情比亲父子还要好。我呢，自从下放到张

庄来劳动改造，疯大爷一直父亲般地照顾着我，我还把他当老师，从他那里学到了历史教科书上学不到的东西，我在他那里读完了我的大学历史系。我一直希望他长命百岁，活到我能够平静地坐下来研究历史的时候，我要把他对我讲的捻军的故事写出来，并由此开始对中国农民革命的系统研究。农民起义被说成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对此我心里一直模模糊糊、犹犹豫豫，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胜者为三败者为寇的农民革命，是不是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

可是如今疯大爷却不知去向，也许他和我一样想寻找一个答案，得不到回应才疯的吧？

我们一个个心急如焚。乡亲们和我们一样焦急，像宝塔集失去了宝塔，失去了疯大爷，张庄人也觉得丢失了自己独有的宝贝，心里都慌慌的，空空的，没有个落实处。张队长更像掉了魂一样。他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们：你们知道不知道，从土改到如今，疯大爷一直是我们村干部的诸葛亮啊？那时候村上没有识字的人，写写算算的事都得找他，连村上人的书信都是他一个人包下的。是他对我们干部说“民为贵”，“载舟之水也能覆舟”，要不然我一个泥腿子懂个啥？你们不知道这些！

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呢，我们知道的。我们说。

不，你们不知道。你们不会知道的。张队长显得十分固执。是被斗的缘故吧，他瘦多了，胡子拉碴的。

把高凡叫回来，李翠！你们一起去找！×他妈，怕熊！大不了吃官司，天塌下来我顶着。

书元去县城把高凡叫了回来，高凡头顶上的那一撮白毛扩大了。我来不及对他表示怜惜，就一起讨论起疯大爷的事来。我们分析疯大爷可能去的地方：

县城。这是他以前去过的地方。高凡这几天在县城听人说过有个疯老头到处唱唱，因为没想到是疯大爷，所以没去打听。

省城。疯大爷说过，他要找那写文章的小子算账。

张乐行的老家“张老家”。疯大爷很久以前说过，他死以前一定到“张老家”去看看，看看乐老头的后代们怎样了。

我们决定分头去找。我和高凡走南闯北惯了，所以去远处，高凡进省城，我去张老家，书元去县城。书元嫂在家照管两家的孩子。

我们村离张老家一百多里路，但不通车船，张队长把他那辆破自行车借给了我。我骑车的技术不高，加上心急，刚走了十几里路就闯了祸。我和一辆拖拉机迎面碰上了。拖拉机后面还拖了一个卡车厢。我没想到路是那么窄，所以没有下车，等发现路窄时已经来不及了，心一慌，龙头就朝拖拉机那边歪过去。幸好拖拉机驾驶员机灵，避开了。可是拖拉机歪进了路边的麦田里，轮子陷进埋在田里的粪缸里，粪缸破了。

我自然被司机当场抓住，大加训斥，问我年纪轻轻为什么活够了。我对他说因为大伯发病失踪，急着去找大伯才闯了祸，他就原谅了我。但是，粪缸应该由你赔偿。他说当然了，多少钱呢？我问。他说他不能作主，粪缸是生产队的，要去找生产队的干部。我只好与他一起进村去，找到了生产队长。可是队长说，他也不能作主，要和队委会的其他人一起研究。拖拉机司机不愿等，他把我交给队长，自己开车走了，留下我一个人急得冒火。

求你了，队长同志！我不是想赖账，实在有急事，我大爷疯了，不见了，我得赶紧去找他，回来的时候，我一定来赔钱。我试着和队长打通关节。

是张庄的疯老头吗？队长问。

是的，我和他一个队。我说。

他想了会儿说：好吧，等我们研究好了，我通知你们队长，叫他来交钱就是了，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我干谢万谢，看看表，已经耽误了一个半钟头。我又骑上破车飞跑，到张老家的时候已经天黑了。要不是有月亮，我真要迷路了。

张老家和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灰暗破旧的茅草房掩盖在标语、大字报中。我进村打听疯大爷的消息，都说是有一个疯老头来过，在张乐行的老宅门前哭一阵笑一阵闹了半天，没人理他，他又自己走了。

走了多久？我问。

一顿饭的工夫吧！天没黑的时候还在这里。

到哪里去了？我问。

谁知道。

都怪我骑车闯了祸，要不然我不是正好赶上了？我顾不上懊恼，便问张家老坟还在不在。

是在在，不过已经平了。有人对我说。

可以领我去看看吗？我恳求一位年轻人。

这么晚了。那年轻人犹豫着。

可是几个小孩愿意领我去，说路不远，又有月亮，怕什么？这样一来，那青年也愿意跟我去。

疯大爷果然睡在坟地里。他像条狗似的蜷成一团，身上包着破棉袄。我把他的棉袄揭开，叫他，他嘻嘻笑着叫我走开：你这闺女真胡来，谁是你的疯大爷？

我拉他，摇他，求他跟我一起回家，他挣开我的手，说：我回家了，我的家就在这里。接着又唱：

我的大名张乐行，
听我对你诉冤情。
我为百姓闹翻天，
为啥说我受招安？

小孩子们拍手，哄叫，觉得有趣，我的心里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疯大爷确实疯了。他目光呆滞，浑身衣服都撕成一条一片，脑后的辫子已经松散，还沾上了干草。我请那位年轻人帮助我，把疯大爷绑在车于上，我推他回家，可是疯大爷死也不肯就范，在地上转着圈子跑，还唱：

你别拉，你别撩，
有理你就慢慢讲。
你打俺骂俺俺不恼，
说俺投降俺就火。

我拽住他的破棉袄不放，他跟我拽了两下，没拽过我，就突然松手放掉了，我给门在地上坐着。他一边跑一边唱：我的大名张乐行，张乐行才是我的名。

我从地上爬起来追他，那青年和孩子们也跟着一起追，可是他跑得飞快，我们追不上他。

突然，几个孩子一起惊叫起来：沟哇！那是沟哇！我的头脑还没有来得及作出反应，就听到了他落水的声音。

因为离村庄比较远，这条沟水又深又清，月光下青光闪闪，疯大爷的身体却没有给它留下多少波纹。

我的血液好像突然凝结，两脚再也站立不住，一屁股跌坐在沟坎上。

十六

疯大爷的死，使我病了一场，我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荒唐的感觉。有一段日子，我常做恶梦，在梦中疯大爷、周纯一、张乐行、高凡和我，颠来倒去地变化着，有一回还梦见我剪去了高凡的辫子，把它安在喜潮头上，高凡大哭大闹，说不留辫子要杀头的，而且我果然看见一把明晃晃的刀向高凡头上砍去。

高凡劝我，不要胡思乱想了，世界上荒唐的事很多，哪能每一件都想得清楚呢？不学会在荒唐中苟活，就只好去自杀了。也许，荒唐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

高凡说得对，世界上荒唐的事实在太多了。就在疯大爷死后不久，全国性的权威报刊上几乎同时发表了谴责早已倒台的彭德怀的长篇社论，一篇叫《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一篇叫《宜将剩勇追穷寇》。两篇社论都特别提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那场斗争——彭德怀在那个会议上攻击了“三面红旗”和红太阳，所以倒了大霉。社论告诉我们：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这一类斗争还得继续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斗到阶级完全消灭的时候。

我心里顿时明白了很多。原来这才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图，为什么不早点说明呢？早点说明，宝塔集人就不会跟着周纯一造反了。

可怜的宝塔集人，如今成了网中之鱼了，时刻等着人家来捉去杀了送上餐桌。虽然“假老婆”说，只要向毛主席请过罪就没事了，可是顾维舜的遭遇告诉他们，“假老婆”说的不算数，“假老婆”人物太小了，没有权力决定他们的命运。由谁来决定呢？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能像捐过门槛的祥林嫂还要问灵魂到底有没有一样，整天在心里嘀咕着：事情是不是过去了呢？

事情没有过去。不久就有人来回答他们了。宝塔集进驻了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清查宝塔集人自己不能清查的问题。

这当然又是毛主席在全国范围内的伟大战略部署。

两年文化大革命实践证明，红卫兵小将不是容易驯服的小兵，知识分子当然更不行，城镇市民呢，还用问吗？小资产阶级。他们对革命都是三心二意，不但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有时还起破坏作用，弄得不好，他们就怀疑一切，反对一切，最后反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头上来。多次提醒那些革命小将了：现在到了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不听我们的话你们要犯错误的。可是收效甚微。毛孩子们的翅膀都长硬了，造反派的翅膀也硬了，他们自己会互相串连、煽风点火。为了不让这些红卫兵和造反派继续胡作非为，毛泽东断然地下达了指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在城市，所有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都派出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领导那里的斗（争）、批（判）、改（革），清理那里的阶级队伍；在农村包围中的小集镇，则派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是毛泽东领导的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的壮举。

“乡下人”一下子在宝塔集人的眼里改变了形象，领导阶级了。过去乡下人常说集上人是“半边脸”，他们总是一半脸对乡下人笑脸相迎，另一半脸则紧紧盯着乡下人的钱袋和一双手，要把乡下人的钱袋掏空，又不让乡下人多拿他们一粒纽扣。现在好了，不论宝塔集人心里怎么想，也得把那半边脸也挂上了笑容了。

不过，叫宝塔集人吃惊的是，为什么宝塔集“贫宣队”的领导不是一位老贫农，而是刚刚被“解放”了的艾书记呢？

对于艾书记的又一次到来，宝塔集人是喜忧参半的。喜的是这位曾经替老百姓说话的好人“解放”了，他支持周纯一，也了解宝塔集。然而忧的也是这一点啊！艾书记为什么会获得“解放”呢？会不会已经“彻底悔改”？人们想起那天艾书记和周纯一游街时的不同表现，感到这位老干部不像周纯一那么靠得住。如果他已经“彻底悔改”，宝塔集人就要遭殃了。

艾书记和他的贫宣队一到宝塔集就要召开动员大会，要动员宝塔集人立即行动起来，把宝塔集的阶级斗争盖子彻底揭开，把周纯一的罪行彻底揭发出来。

为了弄清艾书记会怎么干，宝塔集一听见“假老婆”的招呼就去了，会场还在那里——宝塔倒下去的地方。

人们一眼就发现，艾书记像以前一样和气。再看看他带来的那些贫宣队员，一个个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这样一群人会在宝塔集作恶吗？宝塔集的人心掉进了肚里。

可是一听艾书记的报告，宝塔集人的心又提上来了，觉得艾书记此行有一点来者不善的味道。他把宝塔集比做百宝箱，说什么宝贝都集中在这只箱子里。鱼鳖虾蟹，青菜萝卜，要啥有啥，一抓就是一大把。这是不是意味着，艾书记要在宝塔集大把抓人呢？不过，艾书记说这话的时候面容还是和善的，时不时地露出牙来笑，牙是又整齐又洁白的，所以也许这位艾书记是刀子嘴、豆腐心，说归说、做归做，不会对宝塔集人大动干戈。

贫宣队进驻的第三天，德儿做了一件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她把一位贫宣队员带到家里来，而且向父母兄弟宣布，这就是她的未婚夫。

事先一点口风也没透！顾维舜惊讶得只张嘴不说话，玉儿妈却怀着敌意打量着这位从天而降的未来女婿。一副道道地地的乡下人模样，粗手粗脚又破破烂烂的！个子又矮，眼睛又小，叫句大伯大妈都叫不清楚，舌头在嘴里好像转不过弯来。这样的人要做顾家的女婿？要把德儿这朵鲜花插在牛屎堆上？玉儿妈头脑一下子就炸开了，她对那人指指自己的家门：你给我出去！我不认识你！顾维舜被妻子的行为吓出了汗，连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走，我上街买菜！可是玉儿妈不答应，逼着德儿把他带走了。

德儿送走了客，一家人都埋怨她。

这是啥时候的事啊？妈妈审问她。

就是几天前的事，学校里的一位同事介绍，我就答应了。德儿不动声色地回答。

你就嫁给这样的人？大字不识几个，人没人、货没货的，走起路来像麻雀子，一步

三蹦的，没个正样，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只要我活着，你别想叫他再跨进我家门！

德儿说：已经定了。

舍儿也批评姊姊：不要拿自己的幸福当儿戏。

德儿望着弟弟，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说：我这一辈子不想幸福，只求安宁了。没个家，我没法在乡下住下去。

两条腿的男人少？她妈厉声地吵嚷道。

两条腿的男人不少，可是现在谁要我？这个人虽然长得丑，可是成分好，又上无老下无小，不会亏待我。德儿说。

不行！我不同意！她妈态度十分强硬。

德儿的回答还是那句话：已经定了。

顾维舜见德儿态度坚决，便劝妻子：小孩的事就让小孩自己作主吧！现在讲的是成分，那人出身贫农，这一条就占了天时了；住在德儿学校附近，又占去了地利；德儿自己情愿，这就是人和。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还有啥不中意的？

玉儿妈拍起桌子来了：别跟我讲这一套！我听够了！我知道你是害怕，怕贫宣队！你为了自己就不怕把闺女往火坑里推！我不怕！结婚还能讲成分？成分再好，人不像个样子，还能天天净想着他的代代红祖宗？

顾维舜不敢再多嘴，德儿却还是那句话：已经定了。

玉儿妈气得几天不和德儿说话，德儿也不先和她说话，自顾自地下乡去了。玉儿妈终于拗不过女儿，眼泪汪汪地和丈夫说：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反成仇。算了，随她去吧，有福她享，有难她当。

顾维舜得到妻子这句话，马上叫舍儿下乡去把德儿接来，要请未过门的女婿吃顿饭。玉儿妈也只好认了。

吃饭的时候，玉儿妈还是满心的不如意，没个笑脸。顾维舜觉得太委屈了客人，就没话找话，问客人贫宣队将来要干什么，是不是要把过去跟周纯一造过反的都拉出来斗争，谁知客人是一问摇头三不知，只顾吃菜喝酒，大不了只说一句话：“谁知道呢？叫俺来俺就来了。”玉儿妈没好气地敲着碗沿说：你啥都不知道，知道不知道俺家的成分不好！知道，客人胆怯地看了她一眼，回答说。那你就怕连累？玉儿妈又问。俺有啥好连累的？啥时候都是种地。客人说。艾书记同意你这门亲事？玉儿妈又问。不同意俺就退出贫宣队，又不是俺自己要来的。客人说。

德儿见她妈这样逼着问，便接上来插话，说：妈，啥也别问了。我自己愿意的，好的坏的也不怪你们。

玉儿妈把饭碗一放，说：好吧！你明天就给我从家里搬出去，我没有你这个闺女。

没想到德儿竟不急不慢地回答了一声“好”，当即放下饭碗去收拾自己的东西了。

玉儿妈气得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德儿就这样嫁了。而且也不知道是被开除了，还是自己不愿意干了，德儿女婿马上就离开了贫宣队。

十七

艾书记走出了出奇制胜的第一招，拿高凡开刀。把所有关于高凡的材料转到了高凡的学校里。高凡是不属于艾书记管辖的，先拿他开刀，不知是不是君子远庖厨的缘故。

那时我已回到生产队教书，高凡的学校也“复课闹革命”了。突然有一天，高凡被他们学校的工宣队押解来家，要搜查有关周纯一的造反材料。高凡用眼睛向我示意，叫我不要说话，由他们搜查。家里所有的，都是我们收集的各种小报、传单，与周纯一有关的文件，早就叫高凡转移了，藏在他父母家里。我们舍不得烧，总认为它们是很有用的。工宣队把那些小报和传单统统拿去了。他们问我们：收集这些干什么？我说那些东西都与高凡无关，是我收集的，想将来写文化大革命史。你？他们当中一位三十多岁的男人鄙夷地看着我，带着浓重的鼻音对我说，一个摘了帽子的右派分子想写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怎么写？写你们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变天账吧？

我没有回答他。他又说：你们这种人，没有一个是安分的，时时刻刻梦想着变天，我告诉你们吧，天是变不了的！现在，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派我们进驻上层建筑，深入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认真地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打击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

坏、右分子，把隐藏在阴暗角落里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像你这样的摘帽右派，我们还要给予出路。只要你老老实实地揭发周纯一和高凡，和他们划清界线，你就还有光明的前途，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他把报纸上的那些条文背得很熟，我只有听着，偶然和高凡交换一下眼色。高凡的眼色告诉我：不要说话，什么也不要说。

好了，给高凡收拾一下东西吧！那男人换了一种比较温和的口气对我说。

什么？我觉得自己的腿一下子发抖了，难道就这样把高凡逮捕了？高凡看见了我的惊慌，安慰我说：我要隔离审查了，要在学校里住一阵子，你给我收拾几件冬衣吧！

现在才秋天啊！我说。

多带几件衣服没错，你收拾吧！高凡说。

我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打开箱子，找出高凡的棉衣，用一条被单包好，交到工宣队手里。

再见，李翠，临走的时候，高凡突然向我伸出了手，我连忙抓住他的手不放，感到高凡把一张纸条放在我手里了。我急着看那纸条，就没有在高凡面前伤心落泪的工夫了。我们像平时那样告别了。

翠儿，一放寒假，你就带着孩子回宝塔集去。免得家里的父母挂念。不要为我担心，我既不会硬着头皮往枪口上撞，也不会出卖自己和朋友。

高凡的纸条上就写了这么几句话，可是这几句话就够我哭上一天了。张队长和书元夫妇都来看了我，劝我不要害怕，不要着急，说高凡迟早是要回来的。张队长还和我开了一句玩笑，说：你当右派，对高凡是个考验，现在轮到高凡考验你了。要经得住考验啊！

我没等到放寒假就回到宝塔集。学校的同事们照顾我，叫我早走了。

这就叫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父亲说。他们已经知道高凡的情况了，艾书记已经把消息在宝塔集宣布过了，还号召大家对高凡做进一步的揭发。艾书记把高凡叫做“周纯一的狗头军帅”，为了彻底清查周纯一和高凡的问题，艾书记把宝塔公社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骨干分子都集中起来办起了“学习班”，蓝永继和舍儿都算“知情人”，进了另一种学习班，不许回家吃住。

我很想了解学习班的情况，但父亲说不清楚。舍儿他们的学习班办在离集几里路的中学，一般人不能去。我想去舍儿家问问，父亲也说使不得，正在风头上，顾维舜连走路都避着人，更不敢跟人说一句话。德儿嫁给了贫农，没人再说她是“美女蛇”了，可是又有人说她“饥不择食”，“捡到篮子里都是菜”，顾维舜两口子又气又悔，只是德儿不后悔，认命。

我偷偷地溜进了杨小群的家。

自从永继和小群下放农村，我还不曾到他们家里去过。其实，她家离开宝塔集只有十来里地，走路，个半小时就到了。我只是不想去。我比他们还要早就到农村去了，农村的生活我熟悉，不会有浪漫主义的情怀去寻觅田园乐趣。叙家常吗？又有多少可叙的？

我一进村，就看见了永继妈，她在公路边摆了个小摊，卖大碗清茶，还有几包劣质香烟。她本来生得高大，背有点驼，如今却成了弯腰婆婆，其实她才不过五十多岁。腰弯得厉害呀，差不多九十度了，所以走动起来两只手都在背后摇摆。我走到她的茶摊前，她正在把脸盆里的茶往玻璃杯里兑，没有认出我。她的眼看起来有些问题，眼圈红红的，像害眼，又像流泪，眼泡肿肿的把大半个眼珠都遮住了。我一连叫了她两声，她才认出我来，两只手一齐伸出抓我的手，她的手干硬干硬，都长了寿斑了……

是翠儿，孩子，我没想到会是你。我天天坐在这里朝集上那条路上望，看可有熟人来，好问问永继的消息。没有，鬼也不见。想不到你来了。走，快回家叙说。她一边不停地说，一边去收拾茶摊。一大盆刚刚泡好的茶，她也不卖了，把热水瓶的开水倒在地上，再把茶水倒进热水瓶里，说留着给我喝。我帮她拎着水瓶和脸盆，跟她回了家。

他们的家是乡间常见的几间茅草房，不过比别家更矮、更破。墙上的泥巴已经脱落，露出了秫秸杆子扎成的篱笆。看起来这房子撑不长就要倒了，那南墙像大肚子似的朝外挺着。不知道为什么，蓝家的房子总是倒。不是被大水淹倒，就是被大风刮倒。从我记事到现在，他们家的房子倒了盖，盖了倒，不知多少次了。终于到了倒了再也盖不起的时候，在宝塔集上再也没有一间房子了。而今这房子，应是下放那年盖的，才几年的光景，怎么又要倒了呢？

我忍不住在墙头的裂缝上用手抚了抚，永继妈说：漏，一下雨就漏，四面八方都漏，

叫修，总不修，两口子没一个是用心过日子的人，当初我不同意他们结婚，歪瓜配瘪枣，有什么好？他们一定要结，说“歪好，歪好”，看看！现在就是歪好了！我看这个家，迟早要败在他们手里。

小群出工去了，小孩子也都不在家，所以没人去理永继妈的唠叨。我也不想打断老人的话，她要说就让她说吧，说了她心里会舒服一点。我一间屋一间屋里看着，老太太一间屋一间屋地跟着我唠叨：看吧，我领一窝孩子住这屋，老小五个人，只有这一张床。晚上两个大丫头在这床头边安个草铺。冬天呢，就齐大老小地往一张床上挤，被不够，挤着暖和。看看！这是他们两口子住的屋，也是一堆破烂，小群又不会收拾，像狗窝！小群，讲起来是过去镇长的闺女，可是啥东西放啥地方都不知道，就知道在屋里拴绳，啥都往绳子挂……

小群的房里确实拴了几根绳，每一根绳上都挂满了东西，换下来的衣服，新做的布鞋，纳鞋底的麻线，还有些叮叮当当说不出名堂的东西。可是不挂又该往哪里放呢？屋里没有一样家具，连个木头箱子都没有。我知道他们的日子过得艰难，四个孩子，一个老人，再加上他们两口，一家七日靠挣工分是难以养活的，只是我没想到他们艰难到这步田地。

翠儿，你坐一会儿，我看看猪在不在圈里。永继妈说。

猪？你们回教也喂猪？我惊讶地说。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和永继磨牙（淮北俗话，即双方发生争执）的时候，就往他家门上抹猪油，爹妈不知教训过我们多少回，说不兴这样的！回教人见了猪就恶心，未见他们连茶也不随便喝我们的？

不喂猪油盐钱打哪儿出？为了顾嘴，也就管不了那么许多了。“主”要是降罪，就降到我身上吧，我巴不得现在就眼一闭、腿一伸落个干净。死了受罪总比活着受罪好。一个家，活生生败在他们两口子手里……

我回到堂屋里在一张小板凳上坐下来，劝永继妈别再埋怨了。永继和小群也不是不想把日子过好，是没有办法呀！

没办法？谁说没办法？只怪他们不肯听我的。永继要去造反，我拦不住，小群也拦不住？她不拦！女人的话比当妈的话管用，我的话他只当耳边风！我说不能造反，他老子当年不就是这样死的。我劝过他老子，当官带兵打鬼子，都是官家的事儿，俺们不要管，他不听，他听他老子的，他老子想在宝塔集称王，结果把儿子的命赔了进去。我不糊涂呀，我知道不该造反呀，可是又碰上了这么个媳妇！我的命苦呀！靠山山崩，靠水水流，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儿子，眼看就坏在小群手里……

啥？啥坏在我手里？小群回来了，没进屋先接腔，不知在地上摔了啥，我听到眶当一声。

我连忙迎出来招呼小群，小群见了我，只是咧了咧嘴，一点也没有高兴的样子，继续冲她婆婆发火：你见人就败坏我，我是扫帚星，败家精，你叫你儿子把我休了吧，我也活够了，过够了！

我觉得小群和永继妈的脾气都变坏了。她们原来都是温和的女人，现在却不停地互相撕咬。

我上前拉住小群，劝她进屋叙话，我说我是专程来看她的。她不冷不热地说：看吧，杨小群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人不人，鬼不鬼的。

小群的相貌的确变多了。由于出身优越，父母的相貌又不错，小群算得上是宝塔集上的一大美人。长得清丽细腻，玲珑剔透。大家都叫她“瓷娃娃”。可是眼前的小群像个乡下老太婆，皮肤粗黑，皱纹稠密，皱纹又过分密集于小小的鼻洼处，所以总像皱着眉，露出不讨人喜欢的神色。不知为什么，上边的门牙也掉了两颗。穿着打扮更不用说，大概都是她妈留下的衣服，又灰又旧，又没款没式不合身材。……

不认识了？小群见我打量她，低下了头，问我的语气也平和了许多。

小群，过得很苦吧？我抱住她的肩膀轻轻地抚了一下，可是她粗鲁地把我的手摆脱了，并下意识地拢拢头发。

只是苦吗？小群说，声音很大。一家老小都不叫你安生啊！她妈天天抱怨我害了他们一家人，从来不说自己的儿子不成器。

他不成器，你还要嫁他？永继妈说。

是嫁了，怪我瞎了眼。不问什么事，你就知道帮儿子……小群回答。

我就是帮儿子！儿子是我领大的，我不帮他谁帮他？永继妈吵起来。

那你别给你儿娶媳妇，叫她跟你过一辈子！小群也不相让。

杨小群(口欧)——这话是你说的呀——永继妈大叫起来，并且一蹦一蹦地要去拽小群。我把小群拉了过来，说：小群，你不能少说几句？永继不在家，你们这样吵吵闹闹不怕人家笑话，永继在学习班也不安心啊！

小群不再接腔，拉个小板凳坐了下来。永继妈也不再吵，回到自己房里哭起来，口口声声叫着永继的名字：我的可怜的儿呀！我的从小没有爹的儿呀！你咋不给妈争口气呀！不叫你出去你偏要出去呀……

小群的眼泪也一颗一颗往下掉，不停地扯起自己的衣襟擦着，小声地对我说：翠儿，早知道结婚这么苦，不如一辈子不结婚。她说，永继自从到了乡下，心情一天比一天坏，不肯好好地干活，还想喝杯酒。家里田里的活差不多都落在她身上了。穷，少生几个孩子不好吗？老太太不肯，吵着闹着不许避孕，说蓝家人丁本来不旺，再避孕不是更要受人欺负了吗？永继只想当孝子，听他妈的，所以气得她都不肯和永继同房了，夫妻的感情越来越坏。他要造反，她拦过，可是他说，与其像猪狗一样活着，不如去造反，死了也痛快！她也就不拦了。

你看看我老成啥样子？一嘴牙都活动，两颗门牙只碰一下就掉了。集上一般大的姊妹们，哪个像我……小群抽噎起来，我不知怎么安慰她才好。我只能劝她忍着，忍到孩子们长大的时候。等她止住了哭，我才问她永继在学习班有没有消息。

她从枕头下拉出一件衣服，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说是永继夹在换洗衣服里带回来的。

纸条上写着潦草的两行字：艾书记逼得不紧，放心。这事儿千万别对别人说，千万千万！

我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能回家过年就好了。我说。

兴许，贫宣队能不回家过年吗？小群说。

去过舍儿家吗？他现在怎么样呢？我问。

小群顺下了眼睛：哪有脸见他家人。

我忍不住问：小群，真的，为什么……

小群摇摇头：我自己也说不清。那一阵子，总是提心吊胆，心惊肉跳的，“假老婆”又不断地来敲打，叫永继立功赎罪，你知道，“假老婆”跟我们有仇。想来想去，只有顾维舜可以揭发，揭实事又没有，只好瞎骗了，原以为假的总是假的，过一阵子就会明白的，没想到害了他们。德儿结婚的时候，我和永继都想去看看，又不敢。德儿为什么要嫁到乡下啊……

唉！我叹了一口气。

后来贫宣队派人来调查过了，我和永继都一口咬定，我们写那张大字报没有根据，只是怀疑……小群又说。

我又叹了一口气，并且起身告辞。小群要留我吃饭，我怎么吃得下去？我把身上带的五元钱往小群手里一塞，跑掉了。

十八

腊月二十二，舍儿他们的学习班统统结束了。贫宣队员们都要回家过“祭灶节”。虽然破过“四旧”了，祭灶节还是要过的。这里的祭灶节是二十三、二十四两天，是二十三还是二十四由每家自己决定，据说跟每家祖宗的出身有关，所谓“君祭三、民祭四，王八祭五、鳖祭六”。宝塔集上绝大多数都在二十三祭灶，说明他们的祖宗都是当过“君”的，可是历史书记载下来的君王却没有这么多。

我趁天黑的时候去看了舍儿。顾维舜不等我坐下就关上了家门，而且插上了栓。

舍儿不是以前的舍儿，留起了胡子，好像突然长了好几岁。以前，舍儿说话的时候，喜欢忽闪着—双大眼，充满稚气，如今却不忽闪了，喜欢直瞪瞪地看着人家。头发很长很脏，结成团团了，但是他不肯下堂子洗澡，怕碰见熟人。我现在谁都不想见。他说。

可是对我，舍儿还是亲热和信任的。他把我拉到自己的小屋里，不让父母跟过去，说要跟我单独叙叙话儿。他的父母也只得依他，给我泡了茶就退了回去。舍儿放下门帘，劈头向我提了一个问题：翠儿姊，你说，人是什么东西？

我吃惊地看着他，这个小弟弟心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了？我小心翼翼地问：舍儿，别问这样抽象问题，先说说你在学习班里碰到了什么问题，不要闷在心里，闷出病来，你父母会担心的。

舍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两手抱住乱蓬蓬的脑袋，仰巴巴地朝床上一躺，咬牙切齿地说：我觉得人都不是东西，包括我！平时一个个都讲得好听，一到危险的关头都变了，拉稀屎、尿裤裆了。

说完，他在自己的头上连连抓了两把，抓掉了一些头发，拿在手里看看，又咬在嘴里。

是受的压力太大的缘故吧？老百姓都经不住压力。我说。

不是！其实艾书记对我们逼得不算紧，逼紧了，对他自己没有好处，这一点，他自己心里有数。可是大家就是害怕，一进去就害怕，好像除了自己以外，谁都变得不可相信了。我对周纯一、高凡两位大哥也怀疑起来了。我怀疑他们是别有用心，是真正反对毛主席的敌人。晚上睡在床上，想起他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真是件件都值得怀疑，而一到白天，我又觉得这些怀疑不对了……

我说不出口，只是看着他。他到底揭发了高凡没有呢？又揭发了什么？

很多人都是又是说又是写的，唯恐被别人占先了，真比抢孝帽子还起劲。舍儿坐了起来，用眼睛瞪着我，我也瞪着他，等着他说出更重要的话。

翠儿姊！舍儿大声叫了我一声。

哎！我应着他。

我向你保证，我没说，也没写。真的，你信不信我q他说，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我。

怎么不信？不过，你不是怀疑吗？我问。

是的，我怀疑他们，更怀疑自己，所以我不写也不说。而且，翠儿姊，我还恨！恨人！恨所有的人，永继，艾书记，我都恨。

永继干了什么？我问。

他写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只听到他在会上骂自己，说自己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他还私下里劝我，要我把自己的事情揭发出来。而且，他把杨大傻子扯了进来！本来学习班没有大傻的事，他是“独立兵团”，谁也不知道他和周纯一有关系。可是他在会上交代说，大傻子在报社被围的时候进过报社。大傻子是他的小舅子呀！他妈的，蓝永继，看我将来治他……

我的头脑一下子乱成一团麻。真不理解永继为了什么。但是我不愿意在舍儿面前说永继不好，舍儿的情绪已经过于激动了，我觉得他有点病态。我担心起高凡，人家到底揭发了他什么，他自己又承认了什么呢？我安慰了舍儿几句，劝他好好休息，就告辞了。玉儿妈拉着我的手送我到门外，小声地对我说：翠儿，舍儿没对你说他的病吧？他病了，从小都不大尿床，现在却天天尿床了，带回来的铺被上净是尿印子……

玉儿妈的声音使我鼻子发酸，我“噢！”了一声就跑回家去了。

不料小群却在我家里等着我，她说永继只在家里呆半天就跑了，天黑也不回来。

原来蓝永继到家就生气。

他妈见他回来，当然满心欢喜，哭一阵，笑一阵的，哭了笑了，就叫媳妇给儿子做好吃的，补补身体。她抓了一只母鸡，叫小群宰。

小群没有露出笑脸，把母鸡又放了，说又不是立了什么功回来，吃什么好的。她像往常一样蒸红芋馍，烧红芋干于稀饭。婆婆说她，她说家里穷得叮当响，还穷烧啥呀！新年快到了，大人小孩没有一个能添件衣裳。米也不够年下吃的。还给他烧干饭宰鸡？

婆媳俩你一句我一句便争吵起来。婆婆一气睡到床上不吃饭，又是哭又是说，那些话，不知说过多少遍了，她还要从头说，如何嫁到蓝家，如何守寡，如何把永继拉扯大，永继和小群又如何结婚……说得小群心里冒火，便在一边嘟囔：诉个啥苦？跟谁诉？你苦，我比你更苦，早知道这样，我情愿守寡……

永继一直忍着，听到这些忍不住了，便大声呵叱小群：去！给妈跪下，向她赔不是，要不然，我就真叫你守寡！

小群哪里肯听，也大声嚷嚷：跪下？长这么大还没有在人面前跪过！你咋不去跪？啥时候了，还来这一套！跪！跪谁？县太爷？一品夫人？县太爷、一品夫人也不敢抖这个威风了！

于是夫妻大战起来。

丈夫说：我哪有你威风呢？镇长的女儿。可惜给枪毙了！

妻子说：是啊！枪毙了！没有你们蓝家好，你们人老数辈，赌的赌，嫖的嫖，要也不会去劳改了！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互相一揭短处，便伤了心了。永继妈止住了哭，

从床上爬起来抡起拐棍儿就往儿子身上打，骂儿子不争气，没给祖宗挣下光荣，倒挣到了骂。又指桑骂槐地说：你敢跟人家比，人家爹有本事讨两个老婆……永继躲着妈的拐棍儿，抓住了小群的头发，一场混战开始了。四个孩子，哭的哭，叫的叫，有的抱住奶奶的腿，有的搂住妈妈的腰……

混战一停，永继就跑了。小群原以为他出去散口气就会回来，所以还在他背后说：你滚！有本事一辈子也别回家！可是到晚上还不见永继的人影，村里村外又找不到他，这就急了，找到了集上来。

我和父母面面相觑，我想埋怨小群几句，但看她那焦急的样子，便把话咽下了。

父亲说：我说找人要紧。别出什么岔子才好。腊月里了，生气吵架别说不吉利的话，什么守寡不守寡的，这不是自己咒自己？

小群温顺地说：是，大叔，我不懂事。

天这么黑，我们这几个老弱妇女，到哪儿去找人啊？在这个集上，可以帮这个忙的，只有舍儿和杨大傻子了。可是永继偏偏又把这两个人都得罪了。没办法，也只好劝小群去求他们了。小群这时非常听话，说：我去求，我去求……

我马上和小群一起到了舍儿家。他们一家人都已经睡了，听到我说有急事，便起来开门，一看见是小群，脸便拉长了，只有顾维舜招呼了一声：小群也来了！

小群不等玉儿妈和舍儿说话，就在他们面前跪下了。玉儿妈连忙伸手拉起了她，说：算了，算了，都过去了！

顾家人听说永继跑不见了，把往日的恩怨全都忘记，连说：找人要紧，找人要紧。顾维舜还安慰小群说：今天天晚了，人们都睡了，又不好一家一家地敲门，明天再去找吧，会不会到哪里亲戚家去了，你把你们的亲戚的名字都排出来，我们一起去，会找到的。

小群这才稍稍安定了情绪，摸着黑回家去了，怕永继妈出事。

十九

杨大傻子照样每天早上在街上叫卖“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只是“独立大队”的红袖章不戴了。有人问过他为什么，他说自己把大队解散了。这天早上我们一听到他的叫卖声就把他叫进门来，把永继的事对他说了，求他一起去找。这个爽直汉子竟然半天不语。

我知道一点底细，便劝他：小群是你的叔伯姊姊，不看僧面看佛面吧！我父亲也劝他说，你们杨家在这集上也就你们姊弟俩了！

大傻子把自己的手指关节捏得啪啪响，说：我真不想走这门亲戚了！我爹死在监狱里，我坐牢的时候，妈又被迫改嫁了，我一个人无依无靠，谁照顾过我？我想请他们帮个忙，给我成个家，可是蓝永继说啥：谁要你？我为啥不跟他一起造反，成立独立兵团？我不想沾他！这一回学习班上，他又把我卖出去了！艾书记找我问过了，我就说去卖油果儿，啥也没干，啥也没说，也没见别人干啥，没听别人说啥。艾书记也没再找我。肯定是没有材料，高凡他们谁也没卖我，亲戚？亲戚还不如朋友呢！

我说：他们也是害怕呀！双方的家庭出身都不好……

杨大傻子不等我说完，把手一拍说：别说了，翠儿姊！我去几家亲戚家找找看！谁叫我也姓杨呢！

像不久前到处寻找疯大爷一样，我们又开始了寻找蓝永继。可是一连找了两天，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他没有到任何亲戚家，也没有去过朋友家，他能去哪里？

想不到第二天早上，小群派大孩子送信来说，昨夜永继半夜回家了，他说他没上哪里去，只在沟沟坎坎里转悠，晚上宿在牛屋里。我们到哪里找去！不管这些了吧，人回来了就好，年三十快到了，我们也该备年了！

宝塔集的春节和全中国一样，非常热闹，规矩也多。热闹叫人欢乐，规矩又增添一点神秘的色彩，神秘的欢乐，正是人们所需要的，所以不论大人小孩，都喜欢过春节。不论有多少不愉快的事情，都要暂时忍下，收拾起来，不把它带到新的一年里去。春节过不好，会招来一年的晦气。

不过现在是革命时期，老规矩老习惯不可更改，革命的原则同样不可动摇，中国人有办法，把一切都贴上革命的标签，换一个时兴的说法。比如，年底要准备很多食物，蒸馍，炸撒子，烹鱼煮肉，原是为了图个丰衣足食的吉利，如今则说，要显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不是中好，更不是小好。说法不同，忙碌却是相同的。我们家

虽然忧虑重重，父母对于备年的工作却一丝不苟，把我支使得没有一点空闲的时候，把永继一家的事也都忘了。

年三十早上，我早早地起床，把门上的旧春联洗掉，准备换上新春联了。今年的新春联是我自己写的，上联是：革命形势大好；下联是：人民群众欢呼。横批是：造反有理。父亲不大满意，说少点文气，我说现在讲什么文气，挑不到毛病就好。

杨大傻子这个时候来了。这时我才想到，他今天没有出来卖油条。便问他：也准备过年了？一个人咋过？到这里来吃年夜饭吧！大傻子只愣愣地听着，不答一句话。他今天神色异常，好像哭过，在我的印象里大傻子是不哭的。

你怎么了？我关切地问他。

蓝永继上吊了！死在生产队的牛屋里……

我丢下手里的事情就和大傻子一起往乡下跑，舍儿和村里的一些人已经在那里了。永继的尸体在堂屋里摆着，身上罩着一块白布。我仿佛看见一个扎着小辫子的小男孩从那白布上站起来向我招手，对我作鬼脸，那是小时候的永继，小时候的永继是非常可爱的。他家里宝贝他，给他留辫子，让他混在我们女孩堆里，他显得比女孩还要妩媚，如今怎么会变成一具尸体？他和我一样大，才三十二岁。

我奇怪，这里只有忙碌，没有哭泣。小群像没事人一样坐在自己床上，几个孩子围着她，傻乎乎地看着她。永继妈是在床上躺着，不停地对着房顶诉说：儿啊！你就这么走了？妈跟你一起去吧！可是几个孩子交给谁呢？不能交给小群，她是个坏女人，是她把你害了，谁都不知道，只有我知道。你当初要是听了妈的话，不娶她……

我插不上手，男人们忙碌就够了，便到了小群房里，让孩子们去守着奶奶。我在小群身边坐下，问她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是不是又吵架了？

小群摇摇头，说没有吵过。回来这几天都很好，还对我说了不少甜言蜜语，昨天晚上说出去走走，就没有回来，不一会儿就有人来说，他上吊了……

我握住小群的手，叫她想开点。她竟然牵动嘴唇笑了笑：总不会为了那……

为了啥！我问。

小群又笑笑：他要跟我亲热，我不肯，我没有心绪，过年了，家里要啥没啥……

我马上小声地制上她：小群，快别这么说，不会是为了这个。

可是小群还要继续说：他妈说是我害了他，就是我害了他！我是怎么害他的？没动刀也没动枪，就这样害了他。这几天，他天天都要和我亲热，说要夫妻和好。我天天不答应。他要把我扔到雪地里冻死，我叫他扔，我说我活够了。他不敢扔，就自己跑出去，就去上吊……

小群，别说了！别胡思乱想！不会是为了这个，不会的！我摇着小群的肩膀，不让她说下去，生怕被别人听见，向她泼污水。可是她挣脱我的手，扑倒在床上放声痛哭起来，说：我的主啊！你罚我吧！我是个女人，但是不想做女人的事，你罚我吧！我害死了男人，可是他比我享福，这一家老小都扔给了我，我的主啊！你罚我吧……

大傻子走了进来，叫小群不要哭，说哭有啥用？哭也晚了！穷吧富吧，两口子有商有量和气就好。哪有像你们这样吵吵闹闹的？不想过日子，就不要成家……

别说了，大傻子，让她哭哭吧！我说。

不劝还好，一劝大傻子反而来了傻劲：不许哭！就不许哭！两口子一对没出息！生就的苦命，就得能受苦，受不了苦，就不要活下去……呜呜！呜！我的爹呀！我的妈呀！我的大爷大娘啊！

大傻子也大放悲声了，我终于也忍不住一阵阵抽噎。舍儿呢，索性和大傻子一样，放开嗓子哭了个痛快。

第二天，永继的尸体便下了地。回教的丧礼简单，又不用棺材，所以没有多少花费。

永继的突然自杀成了宝塔集今年春节期间串亲访友的热门话题。想起蓝二爷家当年在宝塔集上的威风，如今死的死了，散的散了，都无不叹息。老人们还说，蓝二爷一家虽然都不成气候，可是对乡亲街坊倒还是客气的。兔子不吃窝边草嘛。这家人败就败在几个女人手里。首先是蓝二奶奶，没见过她那么会骂人的，骂人像切菜，咋咋嚓嚓听得见声音，一句骂就能切下一个人头来，蓝龙的老婆永继的妈，人倒贤慧，可是生就一副苦相，左眼皮上长了一颗痣，那是滴泪痣，所以嫁过来不到一年，就把丈夫克死了。蓝虎的老婆“短一点儿”，脸儿长得俊，还是一条腿平白无故短一截儿，这就不好，果不然，公公丈夫一去劳改，她就先伸出一条长腿走了，到现在信也没有。下一个要数杨小群了，伪镇长家的娇小姐，小老婆养的，也是报应，小老婆生来就贱，养个女儿却恰

恰相反，不肯尽妇道，活活把永继逼死了。莫不是有人偷了小群的心？要不然一个女人怎么会……看来，蓝虎现在这个女人不错。女人还是丑点好

我从来不参加这样的谈话，我只能在心里为小群叫屈，为蓝家的女人们叫屈。我的可爱的宝塔集，我的可爱的乡亲们啊，什么时候，你们能够对女人宽厚一点呢？

然而，宝塔集没有因为死去一个人而让自己沉浸在愁绪里，街上一阵又一阵的鞭炮声提醒着人们，正是新春喜庆的日子，不该忧愁。孩子们照旧拍着手欢乐地唱着：

新年好，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闺女要花儿要炮，亲戚朋友都来贺。

有线广播里一天三遍地播送着最近发表的最高指示：

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
是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

二十

不知是不是受了永继自杀的刺激，没有过完春节，舍儿就病倒了。一连几天高烧不退，还说胡话，尿床的毛病也越来越厉害了。他一天不知道要哭几回，而且都是嚎啕大哭，一边哭还一边说：我活不长了，我就要死了！有时，还抱着他妈的脖子哭叫：妈！你们白养活我了！我不能给你们养老送终了！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顾维舜两口子想起舍儿生下来时他爷爷给算的命，魂都吓飞了。顾远山老头对自己这个唯一的孙子的命运特别关心，先是自己用八卦推算，后来又请瞎子按八字推算，结果都一样：这孩子命里有灾星。正是为了消灾才给他取名叫“舍儿”，又给他认了十二个干老子充“贵人”，难道说灾星还没有退掉？

宝塔集上所有的医生都请遍了，一个个都说病得厉害，可是谁也说不清是什么病，拿不出治病的良方来。有一个医生提出怀疑，会不会是血里有毒呢？若是，即使病好了，也会落下后遗症，不是变成傻瓜，就是变成瘫子。于是，宝塔集人私下里猜测，顾维舜一定生过梅毒，血里不洁净，所以传在儿子身上了。顾维舜怎么会生梅毒呢？一定和蓝二爷那时开的妓院有关系。倒想不到顾维舜这样老实人也会得这风流病，如今害了儿子了。气得玉儿妈要找那些人挤命，说怪不得艾书记说宝塔集是百宝箱呢，宝塔集上真是没有几个好人，个个人的一张嘴都像没有加盖子的粪坑，一天到晚翻蛆虫、冒臭气。都不得好死！不如一颗炸弹把宝塔集炸平，大家一起死了干净！

顾维舜倒不在乎那些谣传，他说身正不怕影子斜。但是他确实被儿子的病吓坏了。他想自己这一辈子坎坎坷坷，也老老实实，做人不亏心，做生意不短秤，怎么会落一次又一次的报应？四个儿女，没有一个称心如意的。他常常一个人早晚到淮河边溜达来溜达去，不言不语，碰见人也只是点点头，有时连头也不点，眼一顺就过去了。这样，又有人说他想跳河。我父亲也心下怀疑，跟着他在河边溜了几回，没有听到他说什么轻生的话，也放心了。

舍儿的十二个干老子这些年死的死了，走的走了，现在还能经常走动的，就剩下我父亲。我家没有男孩，父亲对舍儿也是特别疼爱的。所以舍儿病了以后，他和母亲每天都轮番着去探望，虽然出不了什么力，却也为顾维舜和玉儿妈分担了一点忧愁。母亲还从箱子底下找出一个银锁片，上面接着“长命百岁”，挂到舍儿的脖子上。

眼看着舍儿骨瘦如柴，病症一日比一日沉重，顾维舜心灰意冷。从来不敢不上班的他，也常常不去上班了。一天，他偷着和玉儿妈商量，是不是把老大维尧夫妇和老三维禹家的都招呼到宝塔集来，万一孩子不行了，一家人都在身边比什么都强。玉儿妈一听就哭起来，她说：你就认定儿子不行了？我就不信。我们没做过坏事，老天爷不该判我们绝后，要是这么判了，我就把天戳个窟窿！我看孩子没大病，是冲了神了。这事都怪你，他干老子送给他的那件道袍上绣的是护身符，你一定说是“四旧”，把它烧了。儿子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找你算账！

一句话提醒了顾维舜，他说：对了！对了！这就好了！你别急，我们再给他做一件道袍，那样子你还记得吗？

玉儿妈说：样子我当然记得，可是那上面还写着十二个干老子的名字呢，都是他们亲笔写的，如今到哪里找他们去？

顾维舜说：这容易，本人还在的就找本人，本人不在的就找他们的儿女代笔，大傻子和小群都可以代表他们的父亲。

要是让人家知道了，不说这是迷信活动？玉儿妈问。

偷偷地，谁知道。为了儿子，知道了也不怕。顾维舜说。

我和德儿反对也没有用，我的父母也认为这是好主意。我父亲还把这件事揽在自己身上，说你们赶紧先将道袍做起来，我去讨那十一个人的笔迹。实在讨不到的，像蓝虎，我就代了吧。

玉儿妈连天加夜地干，不过一天一夜，就把道袍缝好了。我父亲做地下工作似的一家一家地跑，有时要跑到外地去，十二个干老子的名字也写齐了。玉儿妈把它们用丝线绣好。

给舍儿穿道袍的时候，我和父母都去了。顾维舜关紧了门，又是上香又是叩头又是祷告。舍儿显得非常乖，不但老老实实让他妈给他穿道袍，还硬挣扎着起来对着香案叩了三个头。

可是一连等了三天，舍儿的病还是毫无起色。舍儿又哭起来，高声叫道：救救我！救救我！

我和德儿都竭力主张：再请先生看。父亲说，是啊，还是要请先生。可是请谁呢？我们听说县城有个著名的老中医叫蔡抱一，听说他的医术很高，药到病除，本县很多大官的病都是他治好的，所以虽然是地主成分，还没遭多大罪。不过现在是文革期间，不知他的情况怎样了。为此，德儿专门去跑了一次县城，回来说没找到，蔡抱一就是一个孤老头，家里再没了别的人，他的邻居们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老头子就背起个包袱出门去了，说是去给别人看病，打那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们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也不知杨大傻子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居然在我们都已经绝望的时候把蔡抱一领到了舍儿家里。他说这是舍儿的缘分，他是到乡下串着卖油条的时候碰上的。顾家人对大傻子千谢万谢，大傻子说：谢啥？干兄弟也是兄弟啊！

大名鼎鼎的蔡抱一看上去毫无风采。瘦高瘦高的个子，背还有些驼。黑黄的脸膛，高高的颧骨，鼻子肥大，嘴唇宽厚。玉儿妈一见就私下里嘀咕，说他像个大烟鬼，真能看好病？可是舍儿喜欢蔡抱一，一见这老头就高兴起来，一声声地叫爷爷，说：我的病可以好了！玉儿妈见儿子这样，便也欢喜起来。

蔡抱一给舍儿按了脉，看了看眼珠和舌苔，笑眯眯地说：我当是什么大病，不过是着了点风寒，又受了点惊吓和气恼。我只要一帖药，就可以把风寒退了，其余的病，就靠养了。最好到处去走动走动，忘掉了那些恼人的事，病也就好清了。

我们听了都将信将疑，只有舍儿不住地点头，说：对，我要到外地去！随便上哪里都行，就是不想蹲在宝塔集。宝塔集上的人太可怕了，我不想见他们。

说神奇也神奇，舍儿吃了蔡抱一一帖药果然见好，不几天就能下地走路了。为了让他好好休养，他爸爸把他送到了他大伯家里，一去就是几个月。

二十一

艾书记如今是宝塔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宝塔集革命委员会主任了。虽然还不是官复原职，对他这样经历的干部来说，也算是宽大为怀又委以重任了。宝塔公社是全县最大的公社，宝塔集是仅仅次于县城的集镇啊！

为了使宝塔集人相信这位艾书记如今已经完全、彻底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县革命委员会特地派了一位副主任来向群众作介绍，说明艾书记在前一阶段的斗争中为何主动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立下了新功。原来，这位艾书记在宝塔集办学习班的时候是花了大量精力的，注意政策，讲究策略，使敌人营垒很快地分化瓦解，使周纯一的案子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在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周纯一不得不低头认罪，与周纯一有关人员的专案也都到了定案阶段。

听了这样的介绍，宝塔集人心里明白了很多，对这位艾书记自然在佩服之外又加了几分敬畏。参加过艾书记学习班的人更在心里想象着，艾书记是怎么把自己的“战友”分化出去的，蓝永继又是怎么想到自杀的。但是人们嘴里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异常热烈的掌声欢迎了这位老相识、新领导，鼓完掌又用更大的热情高呼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艾书记身上以及在宝塔集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我已不是宝塔集的常住居民，所以没有机会向艾书记鼓掌致敬，但是我真正应该感谢他，他第一个拿高凡开刀，高凡才有可能较早地得以解脱。看来不论是周纯一还是舍

儿和蓝永继他们，都没有揭发出高凡什么致命的问题，所以对高凡的审查结论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并且念其出身好，根子正，是贫下中农一手培养起来的大学生，所以给予从宽处理，保留教职，下放劳动一年，以观后效。这结论真是让我们喜出望外了！高凡说：我要感谢我的代代贫穷的祖先，是他们给了我一顶保护伞。我说，恐怕最后救了你的还是比你出身更红的周纯一，要不是他把一切都包揽在自己身上，你不会得到这样处理的。高凡认为我说得有理。

高凡从学校回到宝塔集来接我回乡下的时候，我不由得哼起了黄梅戏《天仙配》中的两句唱词：从今再不受那奴役苦，夫妇双双把家还。

真的，从此我和高凡得以朝夕相处，过起了男耕女织的生活。真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高凡书写了黄庭坚的两句诗贴在我们的床上：

作云作雨手翻覆，
得马失马心清凉。

我们盼望着，从今以后再也别折腾了，或者只在上边折腾，只在大城市里折腾，别折腾我们这些老百姓，特别是可怜的宝塔集人，张庄生产队了。我们这些人本不该和这一场“大革命”发生什么关系，今后也不敢再发生什么关系了。

然而，广播喇叭里偏偏还要宣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还要到哪里、与谁去进行这种斗争呢？广播里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司令部新的战略部署：城里人到乡里去。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叫机关干部“四个面向”（面向农村、工厂、边疆、基层）、叫城镇居民改行务农。

树根要动，树干要摇，树叶还能不飘吗？

二十二

艾书记向宝塔集作下放农村的动员报告，要求不分男女老少，都要去，自然还是在宝塔倒下去的地方。

人们发现，艾书记白了，胖了，越来越神气和自信了。讲话的声音比以前更高了，笑容也比以前更多、更温和了。仍然是笑必露齿，又整齐、又洁白的牙齿呀！

艾书记告诉没读过马克思原著的宝塔集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劳动创造了一切，也创造了人。虽然宝塔集人把后一句话往生儿育女上想，觉得很好笑，可是谁也没敢笑，因为艾书记的表情是十分严肃的，他们只是在心里对自己说：马克思主义还有这个？这谁不懂啊？

艾书记说，正是因为劳动有这么伟大的意义，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劳动，体力劳动最光荣。×省×县，有一个××镇，那里的居民就很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他们自愿下放劳动，豪迈地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伟大领袖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非常高兴，就号召全国城镇居民都学习他们。

艾书记说：大家想一想，××镇的人走在前面了，我们怎么办？我们有没有两只手？

说着艾书记举起了自己的两只手，像捧着什么东西似的举着，同时眯起眼来欣赏着。又是太阳初升的时候，艾书记又是面朝东站着，那手在太阳光的照耀下愈显得肥厚红润，煞是好看。听讲的人看着这双手，都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手或者缩在背后，或者伸到眼前，或者暗暗地捏成拳头。他们在心里回答着艾书记：谁能没有手呢？宝塔集上只有一个“六指头”和一个断了几个手指的，可是没有一个人只有一只手或者没有手。

当然，我们都有一双手——艾书记代大家所作的回答要简练得多——但是，我们却都是吃闲饭的！解放前，这里是地痞流氓的老窝，解放后虽然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造运动，也还是有几多：右派分子多，反革命分子多，投机倒把分子多，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多。

每讲到一种“分子”，艾书记就用右手把左手的一个指头按倒，最后还剩下一个大拇指头还伸着，不知道那代表什么“分子”。

还有——艾书记把伸着的大拇指也按倒了，集上最多的是商业人员，要那么多商人干什么？商人不从事生产劳动，只进行中间剥削。所以，宝塔集必须改造！怎么改造？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方向，到农村去，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宝塔集的大街，便可以改变为良田了。下放，是消灭城乡差别，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非走不可。

很难描述艾书记的报告在宝塔集人心里引起的震动和不安。对于艾书记对自己集镇的轻侮性的评价，他们并不放在心上，他们对家乡的感情远远不到引以为自豪，受到侮辱就要和人决斗的地步。宝塔集是大家的，不是哪一个人自己的。所以谁要对宝塔集泼屎尿，他们捂捂鼻子也就过去了，溅到自己身上的屎尿，也可以不声不响地洗一洗。可是，一个可怕的事实正在向他们逼近，这个事实是绕不过去的，这就是自己可能被下放到农村种地去。

宝塔集人没有研究过共产主义，将来也不会去进行这种研究。但是共产主义的道路，他们都是领教过了，那就是大跃进的年月。经一事长一智，宝塔集人在奔向共产主义的时候变得谨慎而保守了。所以，不管艾书记多么可敬可爱，对下放的伟大意义说得再多多好，人们还是不相信他的共产主义的许诺。他们不愿意离开宝塔集！但是有一点他们又深信不疑：决定权不在他们自己手里。艾书记说要把宝塔集的大街变成良田，他是有这样的权力的。这一点也不难，只要他命令人们把街上的石条一块一块地揭掉，就没有人敢不揭，就像他叫宝塔倒，宝塔就倒了一样。而且揭石条要比拆塔容易得多，宋明时代铺下的石条已经七撬八裂了，底下也没有埋着高僧的尸骨。

宝塔集人犯难了，是等着街上的石条揭掉之后再走呢？还是踩着尚未揭去的石条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宝塔集人沉默了很久。那些天，连大傻子的“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的叫声都让他们感到烦躁了。他们原来是很喜欢听那声音的。敢情大傻子不怕，在集上是光棍儿一条，下了乡还是光棍儿一条，所以才叫得这么得意。什么热的油果儿？出锅这么久的油果儿还会是热的？这孩子什么时候学会说谎了？

艾书记啊，你有什么办法打破宝塔集人的沉默呢？

二十三

艾书记找到了钱三文。他要钱三文来为宝塔集人现身说法，证明下放农村是绝对美好的。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宝塔集人已经不是第一次被下放农村了，为什么不在以前的下放户中寻找一个榜样呢？

钱三文原是说书艺人，靠一张嘴，一把扇子，一块惊堂木在宝塔集混了半辈子，而且混得很有名气。据说，钱三文原来是世家子弟，读过不少书，但后来一家人都败在鸦片烟枪底下。钱三文年纪轻轻时就成了大烟鬼。为了糊口。他不得不走上说书的路。他说书说得好，我小时候就和玉儿一起听他说过《三国》、《水浒》和《封神演义》，还有《施公案》和《彭公案》。真抓人啊！别看他长得像个痨病鬼，竹竿似的身体没有一处是稳当的，腰、腿、脖子都像松了的弹簧一样撑不起来，一动三摇晃，可是说起书来，他就有了精神，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惊堂木一拍，“各位听客”一叫，长着双眼皮的突出的大眼一瞪，他竟显得十分风采！话像连珠炮一样地喷出来，舌头转得比机器还要快。

可是“大跃进”使钱三文失了业，人们忙着各种各样的跃进去了，没有听他瞎胡吹。正好当时要下放一部分城镇人口“支援农业大跃进”，理所当然地轮上了钱三文。如今钱三文是个“老下放户”了，谁也不曾打听，他下放以后的日子过得怎么样，至多是在他来赶集的时候随便问问：过得不赖吧？他想跟人家讲几句，人家早把头扭过去，忙自己的事了。他这才懂得集上人“半边脸”是什么意思，如今自己是“乡下人”了啊！可是今天他被选来当典型了，要他来教育那些过去几年冷淡了他的集上人了，真比叫他重新说书还叫他激动。而集上人，就只有惊奇的份儿。

钱三文的报告，真是没说的。不用讲稿，口惹悬河，哗哗地直往下流，流出来的都是下放农村以后的幸福和欢乐。他把农村生活描绘得真比天堂还要美，夏天，可以在树荫下乘凉，喝冰凉的井水——比冰淇淋还凉；冬天呢，烤着火，嗑着瓜子，腊肉挂在墙上，想吃哪块吃哪块。最后，他还念了几句落场诗：

众位乡亲，老少爷们！若问我讲的当真？当真。不假？不假。有诗为证：下放劳动真荣光，吃得饱来睡得香，春夏秋冬勤耕作，共产主义万年长。

钱三文念完诗猛咽了两下口水，把大家引笑了，有人还忘情地叫了一声“好！”以为又在听钱三文说书了。可是艾书记的话马上把他们拉回到现实世界里：

如果我艾某人会骗你们，钱三文不会骗你们吧？钱三文你们总该信得过，我们宝塔集的艺术家的嘛！他们老夫老妻，劳动力不算太强，还能过得这么好，你们的劳动力比他强多了，肯定会更好。散会以后，希望大家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开个家庭会商量商量。明天开始报名！希望明天公社革委会门庭若市。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早报名比晚报名好！下放是自愿的，可是为了革命的整体利益，自愿也要和强迫相结合。

说这些话的时候，艾书记的笑容仍然是灿烂的，太阳又照在他脸上了，可是听的人心里却都哆嗦了一下。宝塔集懂得“强迫和自愿相结合”的含意。大跃进时为了叫你吃食堂就扒你的锅灶，为了大炼钢铁就把你家的所有铁器都砸碎扔进炼铁炉里……

钱三文被艾书记带走了，公社要招待这位“典型”吃饭。钱三文迎着太阳满脸喜气，艾书记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了！而需要考虑的人们却一个个愁眉苦脸地走回家去，太阳照着他们的脊梁。

顾维舜待一家人一回到家，就立即主持开了个家庭会，说：艾书记话里有杀气，你们没听出来吗？我们得拿个主意，是去还是不去？

舍儿在他大伯家养了几个月的病，对农村生活是了解的，所以开口就骂钱三文吹牛，老不死的是讨巧卖乖混饭吃！但是舍儿又说，钱三文说的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乡下的日子清静。在乡下可以啥事都不管，只管自己。所以，我愿意下乡！我讨厌宝塔集！

顾维舜看看儿子。他对钱三文的报告根本不感兴趣，他说，说书的人到什么时候都是说书的。把死的说活，再把活的说死，这就是说书人的本事，听他那一套？我怕的是农村不论是好是坏，我们都得去。不自愿就要强迫，我们还能等人家撵吗？艾书记这个人，如今真是觉悟提高了，上面说啥，他就办啥，而且办得又快又好

玉儿妈不赞成儿子和丈夫，他说：强迫也好，自愿也好，为什么一定会轮上我们？我们的老大两口子也算下放的吧？老三不是离开宝塔集以后死的？事不过三嘛！再说，我们祖祖辈辈都没种过地，不会干农活，在乡下怎么养活自己？还有几个孩子的事，一下乡不是更难办了？

玉儿妈说的确有道理，那时候，顾家的几个儿女一个个都面临着难以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舍儿到了订婚的年纪。舍儿在大伯家养病时，自己看中了一个乡下闺女。玉儿妈本来不愿意，嫌乡下闺女没家教，当不好媳妇，但是舍儿大病初愈，她不敢和儿子拗劲儿，后来看到那闺女长得不错，性格也温和，不像集上的闺女疯疯势势的，她也中意了。那闺女一心盼着过集上生活，如今下放到农村去，还愿意不愿意？要是这件事蹬了，舍儿还能不能找到对象呢？

其次是德儿。德儿结婚以后户口并没有迁到夫家去，这是玉儿妈的主意。玉儿妈想给闺女在集上留个根儿，将来有了孩子，户口也可以报在集上。一下放，德儿就没了这个根儿，就要一辈子老死乡下了。

玉儿也遇到麻烦了。她下了“五·七干校”，说得好听，实际上也是下放农村劳动去了。一个人带着孩子下乡不容易，所以她把女儿迎波送到宝塔集来了。今年迎波正好到了上学的年纪，下了乡上学的事怎么办呢？乡下当然也有学校，可是那是啥学校！迎波是上海人啊！

怎么能撂下这些问题不管，一拍屁股就下乡去呢？玉儿妈是无论如何也不肯的。她劝丈夫说：你只管沉得住气，不要那边一敲钟，你这边就下跪。上一回永继贴大家报的时候你听了我的话，不是过来了？你一定说永继他们看到照片了，结果照片还是在自己家里。你要是去交代了呢？不又背上了一口黑锅？哪一回运动都是开始的时候又打雷又下雨，搞着搞着就没劲儿了。他动员他的，咱只管给他两个耳朵，听着就是了！

可是顾维舜害怕，说这是侥幸心理。就算别人能挺过去，我们也挺不过去，我身上有污点啊！他说。

你有污点！你满身污泥！我没有！我干干净净的！要去你一个人自己去！我留在集上领孩子！玉儿妈生起气来。

你吃啥？顾维舜问妻子。

我替人家缝衣服，我有手艺。玉儿妈说。

政府不会让你干的，那是资本主义道路。顾维舜说。

我不管它是啥主义，我要吃饭！我没犯该饿死的罪！玉儿妈说。

顾维舜着急起来，他说好吧！我一个人下去！累死也好，饿死也好，总比叫人家抽着屁股往下撵好！这个宝塔集我也蹲够了！这么多年，哪一年安生过？下了乡，我说不定还能多活十年！

你上哪去？玉儿妈见丈夫往外走，就问。

报名去。顾维舜说。

明天才开始呢，你吓唬谁？玉儿妈说。

玉儿妈哪里想到，顾维舜真的报名去了，而且不是给他一个人报名，是给全家人报了名了。他当然是第一。所以，当天下午艾书记就带着人，敲锣打鼓地给顾家送来了喜报。

当喜报送到门口时，玉儿妈和舍儿都还蒙在鼓里。喜报由“假老婆”拿着，他现在是宝塔集革委会的群众代表，正式的“官儿”了。他今天笑得特别甜蜜，竟然叫起玉儿妈“二先生娘子”了：

二先生娘子！你们一家人真光荣啊！宝塔集第一份儿！艾书记说了，一定给你们安排在最好的生产队！

玉儿妈看着丈夫，他脸上正挂着谦恭的笑，听艾书记说话呢！她真恨不得抓过他来，扇他一巴掌，再吐他一脸！可是她还是忍住了，这一辈子，她从来只在家里耍威风，从不在别人面前让丈夫过不去。现在，她只能拿外孙女煞气。小迎波不知好歹，欢天喜地地去接喜报，还唱什么“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她气哼哼地朝小迎波头上拍了一下：哪有你的事，美得像个花棒槌！将来有你哭的时候！

迎波不知道为什么捱打，只知道哭，她姥爷去哄她，要接过她手里的喜报，她不肯，祖孙俩一扯，把喜报扯成了两半。

这一下顾维舜慌了手脚，他竟敢当众斥责起玉儿妈来了：还不快去找浆糊把喜报贴在门儿！玉儿妈也竟然听了。

可是等送喜报的人一走，玉儿妈把大门一关，就要起威风来了。她往椅子上一坐，又拍桌子又哭叫，还骂起顾维舜来：老砍头的！我在你眼里算不算个人？你为啥代表我？你去，去把我的名字抹掉！我不去，我死也不去！

随便玉儿妈怎么骂，顾维舜就是不言语。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他的心反而安定下来。他了解玉儿妈，她不会去把自己的名字抹掉的。他常常向别人夸奖自己的妻子：厉害是厉害，可是讲理。

二十四

顾维舜报了名之后，艾书记有了“突破口”，便调动了所有的力量，逐家逐户地动员了，他说，古时候打仗讲士气，战士们听鼓声，一而作，再而衰，三而竭。我们要趁热打铁，一鼓作气。他原打算把顾维舜也树成典型，让他说说一家人是怎么想通的。可是顾维舜把自己身上的“污点”一一向他展示以后，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决定采用“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各个突破”。

派到我家来作动员工作的是“假老婆”。虽然细想起来“假老婆”也没做过什么大坏事，可是我的父母就是讨厌他。所以，“假老婆”还没开口，我父亲就说：别白费唾沫了，反正我不去。“假老婆”说：艾书记讲，要把“底牌”亮给大家，宝塔集今后不再是集了。大家都得去。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请着不走打着走。我父亲说：你请我也不走，打我也不走。我们没有儿子，几个闺女都嫁了出去，叫我们老两口下乡喝西北风去？“假老婆”叫父亲为周纯一和高凡想想，不要给他们加罪了。父亲说：一人作事一人当。他们有罪我没罪。他们不能给我们养老，我们为啥要给他们背黑锅？

话虽这么说，父亲到底有些犹豫。这么硬顶着，会不会给两个女婿加罪呢？他偷偷地找我们商量来了。

我和高凡一致认为：不能去！我们叫父亲到宝塔集上宣布，和两个女儿脱离关系。父亲说：哪能那么做！那不把老几辈的人都丢尽了？我不能干这种无情的事儿。高凡说：爸，你别迂。啥是有情啥是无情，躲得过去就好。我们住在乡下多少年了，乡下是啥样还不清楚吗？说得好听，农村需要城里人来支援，实际上农村自己的人都养不活了。就是需要人，也不需要你们这些七老八十的人呀！

父亲说，是啊，真不懂上头为啥要这么干。谁不知道故土难离的道理？我随爷爷从湖北迁到宝塔集来，两辈人剃头，才挣下一点钱，开了个杂货铺，哪是容易的！合作化那阵子，我就不乐意，自己的店怎么成了大家的？可是那些东西还在，我还有一份儿，还能看得见，摸得着，心里还好过一点儿。一下放，不是啥都成了人家的？这不就像地主一样被没收了财产吗？

高凡说：你当然不明白，爸。这叫变相失业。这几年搞运动把国家越搞越穷，城里养活不了那么多人，就把包袱往农村里甩。可惜农民不懂，不知道这是对他们的剥夺。他们已经穷得吃不饱了，还叫他们养活城里人。一碗稀饭两人喝，熬吧！

父亲打我们家里回去就装病不出门了。有人来叫门也不应。不过，艾书记也没有再派人来逼迫我的父母。一天“假老婆”在街上碰到我母亲，煞有介事地把她叫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说：你们别怕了！艾书记说了话了，说他们老两口也确实有难处，毛主席说下放劳动要把“老弱病残”除外嘛！你们算老弱病残了！

二十五

报名的人已经几百户了，可是没有一户动身的。大家都在观望着，推搪着，不肯马上办妥户口迁移手续。艾书记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他把那些已经报了名的人集中起来，限他们在几天之内交出户口簿和供粮证，搬到指定的村庄去，否则的话，就停止口粮供应，吊销户口！

有人问：那还没报名的人呢？可以不去了？

艾书记说：那不是你们的事儿！你们应该和先进分子比，为什么和那些落后的人比呢？

人们突然意识到自己上当了。杨大傻子领头叫起来：上当了，我不去了！许多人跟着叫：不去了！不去了！

艾书记拉下脸来：杨大傻子！你别太得意忘形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吗？你出身反动家庭我们可以不说，可是你自己反动成性，十几岁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文革中又跟着周纯一干了许多坏事。我们对你宽大处理，是要给你一条出路，你不要出路也可以，农村你可以不去，中国这么大，还能没有你去的的地方？

吵闹的人们一下子安静下来。大傻子也低头不语了。艾书记这才有了笑脸，问其余的人：怎么样？回去做着准备吧，哎？党什么时候骗过你们呢？

人们漫声地应着，垂头丧气地走出了会场。

可怜的宝塔集人啊！他们原以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为自己寻找一块立足之地的权利。他们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过去的时代里，他们也有过迁徙，有过逃亡，可那还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像今天这样指定性的迁移，是历史上的第一回。可怜的宝塔集人啊！他们原以为自己在宝塔集上的一切都是自己辛辛苦苦挣下来的，应该永远属于自己，今天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党给的，人民给的，给予者随时都有剥夺的权利。一旦决定了要对你实行剥夺，你是绝对逃脱不掉的。每一个人所有的权利都与两个小本子联系在一起，户口簿，供粮证。没有了这两个小本子，你就成了黑人黑户，你不偷不抢，也成了孬人了。

只能把小本子交出去了。玉儿妈直到这时候才想起去辨认户口本上一个一个亲人的名字，那些她呼唤了几十年、记忆了几十年的名字原来是这样写的，她一笔一划用手指去描画那个“顾”字，好像不描下它，它就永远不存在了。好像自己一家人都在这个小本子里夹着呢，小本子一交，一家人都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他们的影子。她抱着小本子呜呜地哭，哭得丈夫和儿子也忍不住呜咽。丈夫劝她，全当涨了一场大水，把什么都冲跑了，从头开始，创家立业，从头开始，创家立业吧！当初我们从老爷老奶奶那里分出来的时候不也是啥也没有吗？

啊！啊啊啊！玉儿妈大哭起来。她说，当年和老的分家是我自己愿意的，我想独立过日子，如今为了啥呀！我们还不如一粒灰星儿呢，灰星儿也不一定人家一吹就飞跑呀……

说这些有啥用呢？顾维舜说。他把小本子从妻子手里拿过来的时候用了一点力气，使她哭得更欢了。为了不让自己心软，他赶紧走出了家门。在交出户口簿和供粮证的人中，顾维舜又成了第一个。他自然又受到了表扬，但是这样的表扬对他，真比对他抽鞭子还要可怕。他没敢径直回家，怕听玉儿妈的哭声和抱怨。他转到了河边。如今，这条可怕的河流在他眼里也变得亲切难舍了。淮河不通人性，但它有坏的时候也有好的时候，它不是一直掀起惊涛骇浪的，它不是年年都要吞没一切的。与它相比，宝塔集上的生活倒是恶劣得多……

如今快到冬天了，淮河又消瘦了下来，河水缓慢地流淌，不时地停下来喘息——河道淤塞了。年年根治淮河，年年不得根治，治人消耗了太多的精力，这能怨谁呢？

顾维舜在河边一直溜达到天黑才回家，玉儿妈已经和衣而卧，舍儿问声不响地坐在

自己的屋里，迎波坐在他腿边，伏在他腿上睡着了。

顾维舜在儿子的床上坐了下来，问家里吃晚饭了没有，舍儿摇摇头。迎波呢？她不饿？顾维舜心疼地把外孙女搂在怀里。我给她买了两个烧饼。舍儿说。

舍儿，顾维舜叫了一声儿子，慢吞吞地说，有一件事儿对你说，又怕你不愿意……啥事儿？说吧！舍儿没精打采地望着父亲。

我想跟你一起给你奶奶爷爷上一趟坟。顾维舜说。

什么时候？舍儿问。

现在。白天不方便。顾维舜说。他担心地看着儿子，煤油灯下的儿子还像个孩子，可是事实上他已经是大人了。自己像儿子现在这般年纪的时候已经成家立业了。那时的自己真是野心勃勃啊！虽然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商店的帮工，可是他天天梦想着自己开大店，赚大钱，让妻女幸福，让祖宗荣耀。他也相信自己的梦是可以实现的。后来也算是实现了。他不知道现在的儿子是否也作梦，又作的什么梦。唉！儿子又能作什么梦呢？他还不能养活自己。他原来希望儿子能够读大学，恢复被祖辈中断了的书香门第，如今也成泡影了。这几年的高中就算读完了，一天的书也没念，就拿到一张毕业证，这算什么！他感到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儿子，所以要去上坟。

走吧！舍儿爽快地答应了父亲的要求。

顾维舜感到高兴，儿子真的长大了，开始理解长辈了。更叫他高兴的是，玉儿妈原来没有真睡，她听到了他们父子的对话，把迎波从丈夫怀里抱了过去，叫他们爷儿俩上就去。她说：舍儿是该到坟地里去看看了，要不然将来连祖宗睡在哪里都找不到了。她把迎波放到自己床上，就着手给他们准备上坟用的东西：两刀纸，一盒香，还有一把手电。

顾维舜说：不烧纸了吧，夜里太惹眼，风又大。玉儿妈很随和，说：好吧，不过香一定要点。顾维舜答应着便领着儿子动身了。

顾家在宝塔集是外来户，所以没有老坟地。顾远山老两口的几分坟地是顾维舜在老奶奶去世的时候买下的。在淮河下游的某个地方，顾家曾经有房也有地，可是都在洪水和家族斗争中化为乌有了，所以他们才到了宝塔集。顾远山不断地教训自己的儿子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总要有个根，这根就是房子和坟地。人走到哪里，都要把这根扎好。顾远山在宝塔集一辈子，置下过几间房，也让大水冲倒了，现在顾维舜在宝塔集上也只能“溜人家的房檐”，租房子住。但是坟地总算置下了。这块坟地是顾远山亲自选定的，说风水好。那原是离宝塔集不远的一家农民的菜园，在一个向阳的高坡上，非常敞亮。那家农民的住宅就在高坡旁，宅前宅后都种满了栀子花，每到夏季，栀子盛开，香溢数里。“文革”以来，许多家的坟地都给平掉了，唯独顾家这一块小小的坟地还完好地保留着。那家农民好，他认为平人家的祖坟太缺德了。多少年来，坟地成了顾维舜寄托情思、诉说衷肠的唯一场所，一有心事，他就要到爹妈坟前去诉一诉，拜一拜，洒几滴眼泪，留几声叹息。自然都是偷偷摸摸地来，偷偷摸摸地去，对谁也不说。只有那家农民知道，但从不走漏风声，还设茶水招待，好言劝慰。所以，顾维舜把这家人看成了亲戚，对他们感激不尽。

爷俩走得快，不到半个小时就摸到了坟地。顾维舜和地的老主人打了个招呼，就和儿子到坟地去了。

因为在高坡上，风很大，顾维舜划着了几根火柴都让风吹灭了，最后爷俩抱在一起挡住风，才把香点着。很久没敢烧纸钱了，顾维舜估量着爹妈在“那边”已经缺钱花了，他只能求爹妈原谅自己的不孝。

几支香就插在坟前土里，顾维舜先跪下，舍儿也跟着跪下，顾维舜叩了三个头，舍儿也叩了三个头。顾维舜跪着说：老爷、老奶奶，我今天把舍儿也带来了，他长大了，你们也该高兴呀！舍儿虔诚地叫了一声“爷爷”又叫了一声“奶奶”。顾维舜说：老爷、老奶奶，儿子不肖，没能保住宝塔集的家，如今我们三兄弟都离开了宝塔集，儿子们辜负了你们的一片苦心了……

舍儿跪在地上听着爸爸祷告，听到爸爸说到这里声音呜咽了，忍不住又叫了一声“爷爷”和“奶奶”。

起来吧。顾维舜对儿子柔声地说。父子俩又叩了一个头便站起身在背风的一面坐下，而背靠在坟堆上。这是父子俩第一次这样单独地在一起，可是并不叙话。顾维舜一直在咕咕噜噜地自言自语，舍儿也听不出他咕咕噜些什么。背后和头顶的风都带着哨子，舍儿有点怕，不由得朝父亲一边靠靠，父亲感到了，拉了他一把，说回去吧。

父子俩一前一后默默地往回走，风吹着哨子在背后追着，他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到了“大桥洼”了。一座大桥，桥下有一片很大的洼地，野狗和野禽出没的地方，也不断创造出鬼怪传说。一到淮河涨水，就会有“黑鱼精”、“黄鳝精”出没，所以宝塔集人不吃黑鱼和黄鳝。顾维舜怕儿子害怕，便停下了脚步，说：不用怕。精精怪怪的东西，你不去惹它们，它们也不惹你。舍儿说：你朝前走吧，我不怕。但是他把手电筒按亮了，往桥下的洼地里扫着照了一圈，在一片汪水的地方停住了，说：那里是啥？

别按手电！那里没啥。这路我熟，跟着我走。顾维舜拉起了儿子的手，高一脚低一脚地下了桥。舍儿的出气声越来越粗了。

别怨我。顾维舜对儿子说，没头没脑地。

但是儿子懂了，回答说：谁怨了？

下乡以后，要学会走黑路呀！有时候会碰上鬼打墙，碰上的时候不要怕，心要定，走到天亮也就迷瞪过来了。我抗战时候就碰上过一回。顾维舜说。

放心吧，我能学会。舍儿回答着，声音里充满了委屈。

玉儿妈还没睡，她已经点完三根香了。

二十六

在西方世界的中古时期，曾经有过几次举世闻名的十字军东征。参加东征的，大部分是穷人，还有妇女和儿童。当时的教皇乌尔班鼓动那些穷苦的人去参加这些远征，他说：

我还能说什么呢？这边所有的不过是忧愁和贫困，

那一边有的是欢乐和丰足；这边你们是主的仇敌，到那边

你们就成了他的朋友。凡是要去的人都不要再拖延了，

先回去料理自己的事务，筹集些金钱作为路费，冬末春初

的时候，在上帝的引导下，奋勇地踏上征途吧！

成千上万的人在主的感召下，怀着强烈的欲望，变卖了自己的家产，不顾一切地踏上了“主的道路”。路上，每看见一个堡垒或城堡，他们就要问：是不是到了耶路撒冷了？结果他们都死在路上了。主的道路，阿门！

历史学家们对这几次东征的评价十分歧异，有人说这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伟大的交流，又有人说这是西方人对东方的一次可耻的掠夺。现在应该怎么看待这一段历史呢？我不知道。我只不过是心血来潮，偶然地想起它来，而且好像面对着他们——可敬的鼓动家乌尔班教皇和被他鼓动起来的可怜的穷人们。

二十七

宝塔集人开始大迁徙。

序幕又是杨大傻子拉开的。天还蒙蒙亮，他就以不同寻常的声音卖他的最后一次油果儿了——“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快来买吧！最后一次了，明天想吃也没有了，热的——热的哄！”

不论是下放的还是不下放的，都被这喊声打动了，都来买大傻子的油果儿。玉儿妈买了四条，以前只买一条给迎波，今天要一家人都吃，一人一条。大傻子的油果儿很快卖完了。他回到他那间破屋里，卷起铺盖，扛在肩上就走了，他下放到杨小群那个生产队，正好可以照顾他的堂姊。

接着，一家一家地开始行动，离开宝塔集。

无论从哪方面看，宝塔集人的这一次迁徙与历史上的任何形式的大迁徙都不能相比。它的意义是革命的，它的动机是纯正的，它的形式是平和的——绝对地没有刀光和剑影。从这里走到那里，都是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同胞，自己的乡亲，因此一点也没有历史上为战争为逃荒而进行的迁徙的壮观和悲凉。他们对“这边”熟悉，对“那边”也了解；“这边”有的，“那边”也有，“这边”没有的，“那边”也缺乏。“这边”的人和“那边”的人，肤色一样黄，鼻子一样高，但是欢乐一样少，忧愁贫困一样多。所以迁徙者只有对旧有的一切的留恋，而没有对新的生活的渴望和欲求。

迁徙的队伍是这般地破烂和零散。一家一户地，用最原始的交通工具搬运着最简单的家具，锅碗瓢盆和睡觉的床。没有人唱“造反歌”，也没有人跳“忠字舞”，也没有哭叫和咒骂。人们都默默地、木然地搬着，走着。相熟的碰到了，只有简单的问和答：

也去吗？也去。

哪庄呢？×庄。

谁也不需要更多的信息。

顾维舜一家拖到傍晚才搬家。玉儿妈总舍不得，总说，不要急，还想想，还有什么事没办呢？一直拖到小晌午，舍儿在乡下的对象突然来了，说是听到了消息。那闺女进门就哭鼻子抹眼泪，说她不愿意舍儿一家搬到乡下去。我在乡下受够了才找上舍儿的啊，我的命又这么孬？她毫不顾忌地说。顾家人劝的劝，哄的哄，才上住了姑娘的哭，可是顾家人不敢向姑娘保证将来还能回到集上来。顾维舜夫妇让舍儿好好和姑娘叙叙，安慰安慰她，舍儿带姑娘到了集外大路旁。从中午叙到傍晚，舍儿耷拉着脑袋回来了。爸妈问他谈得咋样，他没好气地说：走吧！一个大男人还怕找不到老婆？

一家人的心都吊上了喉咙口。吊上喉咙口又怎么样呢？就是戳在头顶上也得走啊！

现在用上了德儿的女婿。他拉来一架木板车，把岳父家的几样大家具都绑在车上了。他在前面拉，德儿在后边推着。舍儿用扁担挑着锅碗瓢盆在车子后面跟着，他的后边是顾维舜，挎着个大竹筐，筐里装着玉儿妈的鸡零狗碎，玉儿妈一样也舍不得丢。玉儿妈脚小，负不了重，家里人不让她拿东西，她左手抱着卷成一卷的“宝像”，右手牵着小迎波。迎波的右手空着，姥姥叫她提一盏小马灯，给一家人照着路上的坑坑洼洼……

没有三步一回首，五步一徘徊。上了路就不回头。

板车的胶轮在不平坦的路上吱吱嘎嘎地叫，车上的家具在眼眶当当地摇，锅碗瓢盆在舍儿肩上哗哗啦啦地响，鸡零狗碎在顾维舜手里磕磕碰碰地跳。小迎波手里的小马灯点亮了，微弱的光亮被压成碎片，人影在碎片中闪烁闪烁，不成个儿也不成条……

玉儿妈把外孙女的小手攥得很紧很紧，小迎波觉得有点痛。但是她不敢叫。她不懂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但是她不敢问姥姥，这几天，姥姥的脾气太坏了。黑暗和沉闷的气氛使她害怕，她不敢哭也不敢叫，她只是问姥姥：我可以唱支歌吗？姥姥说：唱吧！她唱了：

我家小弟弟，
半夜笑嘻嘻，
问他笑个啥，
梦见毛主席。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梦见毛主席。

因为走路，因为路不平，因为手被姥姥攥痛了，她唱得上气不接下气，那一连串的“哈哈”像唱累了青蛙叫，大人们笑给她几声笑。她不那么害怕了，尽量把马灯举得高点再高点，并且不停地问：姥姥可看见？姥爷可看见？二姨、二姨父可看见？舅舅可看见？都说看见了，可是她的手臂好酸好酸哟！

啊，艾书记呀艾书记！在强迫大部分“下放户”“自愿”搬迁之后，便着手对付那些“钉子户”了。

“拔钉子”自然要用一些力气和工具，不再是绝对和平的了。不过仍然没有刀光剑影，动用的都是劳动工具，铁锹、钉耙之类。民兵出动了，但不是打仗和抓人，只是去扒“钉子户”的房屋，叫他们在宝塔集上无藏身之处。没有人去扒那些“钉子户”的男人女人身上的衣服，至于一些女人和男人为了阻止自己的房子被扒而脱光了自己的衣服爬上房顶，责任全在他们自己。

扒房子的情景难以尽述。我听到了许多扒房子的故事，把它们复述出来无非是一些陈词滥调。诸如大人哭，孩子叫，拉拉扯扯，打打闹闹，叩头泣血，苦苦求告之类。有人打了个比方，叫我想想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土匪进集的情况，说“就像那”！我觉得这比方很不确切。土匪和艾书记岂可以相提并论？土匪目标凶恶，要杀人越货，鱼肉女色；艾书记扒房子，却是为了崇高的目标。是为了执行“最高指示”，而没有个人目的。而且他们连砖瓦都不要，房子扒了，砖瓦依然归还原主，叫他拉到乡下盖房子去了。

没有人统计这一次在宝塔集上共扒掉了多少房子，人们只记得相当于一场洪水。几天后，宝塔集便空旷了许多，成了和农村差不多的“广阔天地”了。不过，完成了这项伟业的艾书记并没有实现变大街为良田的豪言壮语，因为那大话本来也只是说说而已，宝塔集人相信了，能怪艾书记？

艾书记又一次成为全县的风云人物，一时之间足迹遍及全县全地区，传授开展城镇居民下放运动的经验，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宝塔集的伟大胜利。之后，艾书记就升迁了，当上了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官复原职了。县广播站为艾书记的出色成绩发表评论，说这又一次证明我们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即使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感召和教育下，也能幡然悔悟，死不改悔的只是极少数，真正是一小撮。

二十八

顾维舜一家下放到刘庄，也就是“先进典型”钱三文下放的地方。钱三文现在是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因为宣传下放有功，公社让他参加了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什么新的“最高指示”或“战略部署”下来的时候，都少不了要他去“现身说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他那副瘦弱的身子怎么能体现那么多的“法”。

顾家人走到村里的时候，已经很晚很晚，村里人都已经睡了。生产队会计把他们领到一个破草棚里，叫他们先住下再说。第二天一早，女队长来通知，说生产队要为他们一家人的到来开个欢迎会。顾维舜说：不用了吧，以后都是自己人了，还欢迎啥。女队长说：啥话？上头布置下来，有下放户的地方都要开，咱村不开行吗？玉儿妈说，欢迎会我们去，可是先得把家安顿下来呀！

女队长朝玉儿妈看了一眼，说：家不是安顿好了？还有啥要安顿的？

女队长人长得漂漂亮亮的，嘴里还有一颗金色的牙，大概不是金的。她说话声音响亮，神情果断，叫人不舒服。可是顾维舜还是怯生生地问了一句：安顿好了？昨天晚上我们暂时住在牛屋里

就住在牛屋里！谁给你们准备好房子了呢？上头有一点安家费给你们，等割完了麦子给你们盖房。不用急，宅基地都划好了。女队长说。

玉儿妈说：等割了麦？还有几个月呢！

女队长说：那有啥法？我先走了！

女队长走了。顾维舜一想到要在牛屋里住几个月，身上就像被泼了凉水，阴丝丝的。可是他也不敢再说什么，只得和一家人去参加欢迎会。

欢迎会在场地上召开。钱三文神气活现地和女队长坐在一起，其余的人都坐在他们对面，席地而坐。

女队长叫顾家人一个个站起来向大家介绍，然后叫大家热烈鼓掌。

你们来了，我们欢迎。女队长说话的时候仍然坐着，一点也不像致欢迎词的样子。

现在我向你们介绍一下我们刘庄生产队的情况。我们刘庄是一个队，我是队长，姓孙，会计姓刘，是我男人。女队长说。顾维舜听到这里，努力想昨晚那位会计的模样，一点也想不起来。

丑话说在前面，我们刘庄队很穷。我们解放前就穷，全村没有一户地主，也没有一户富农，都是贫农下中农。我们缺的不是劳动力，而是牲口。两队只有两条小毛驴，又要拉犁，又要推磨，推磨了就不能拉犁，拉犁了就不能推磨，所以有时候要拿人当牲口，抱着磨棍去推磨。不是吓唬你们，我怕你们吃不了这样的苦。

顾维舜诚惶诚恐，人家要的是牲口！他一连对女队长说了好几声：不怕苦，不怕苦，就是给大家添麻烦了。

女队长说：客套话也不用说。添麻烦不添麻烦也不是你们自己愿意来的。不是上头叫你们来，你们也不会来，就是来了，我们也要把你们赶回去。这就像毛主席说的，我们为着一个革命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就算我们有缘吧。我说苦，是给你们打打预防针，不要像钱三文……

钱三文马上打断女队长的话：对了，要不怕苦。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要脱胎换骨……

女队长说：行了行了，又没有叫你宣传。我看你的牛皮越吹越神啦！你说不苦，我明天就叫你下地干活，行不行？你一定又要叫爹叫娘啦！说好队长呀，我有病，我吐过血……

钱三文摸了一下脸，说：是吐过血……

那还吹啥！老实告诉你吧！叫你参加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我的主意，可以从公社要一点工分补贴，比我们一个队养活你轻松点儿，你以为自己真的是标兵了。好，欢迎会完了，散会！

女队长好厉害啊！要是别人被她这么一讲，早就羞得帽子也戴不住了，可是钱三文好像没事人一样，散会的时候还嘻嘻哈哈地和别人开玩笑，一个大个子妇女说：集上人真是脸皮厚！钱三文马上接嘴说：对了，脸皮厚，吃块肉；脸皮薄，吃不着。

女队长说：算了，钱三文，别耍嘴皮子了，领着顾维舜他们去看看村庄和给他们的宅基地吧！钱三文唯唯答应，女队长一走，他又活跃起来，俨然“典型”模样了。

宅基地的位置不错，靠近村口，离公路和水井都不远。宅基外面是一条围沟，围沟的水很清，沟边长着芦苇，沟沿上还有十几棵差不多已经成材的树，大部分是苦楝树，还有一棵枣树和一棵香椿树。

顾维舜指着那些树问：这些都是谁家的？

钱三文哈哈大笑：看你问的！到底是顾先生！在谁的宅基地上就是谁的。所以，这些树都姓顾，懂吗？

顾维舜连忙摆手，说：我不要，我不要，人家的东西，怎么可以

钱三文翻着一双大眼，把顾维舜上上下下打量了两遍，好像不认识似的，然后转过头对玉儿妈说：你家这位先生真有意思，怎么可以？怎么不可以？这些树是后头那一家栽的，就是那个说集上人脸皮厚的女人家的，她男人姓刘，她姓顾，你叫他们敢要？政策嘛！

顾维舜摇着头：这是侵占人家东西呀！他们若要，就给他们。玉儿妈喜爱地看着那些树，说：可以打家具了。

钱三文说：还是二嫂子心里亮堂！这位顾先生呀！哎，我说老顾呀老顾！过去在集上只听说你们顾家三兄弟是好人，今天见了面，才知道是名不虚传呀！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刚下放的那阵子也跟你现在一样想法，觉得自己到这里来占了人家的东西。有时睡到半夜起来找我的惊堂木，着呀！我不在集上说书挣钱，跑到这里干什么来了？人家的日子过得好好的，我为什么硬插一腿？我算是窃贼还是盗匪？可是慢慢地，我就想开了，不错，我占了人家的，可是谁又占了我的呢？咱们在集上不也是日子过得好好的？你开你的店，我说我的书，可是到头来，你开不成店了，我也说不成书了。咱们也要吃饭，也要养家活口，不占人家的，咱们吃啥？再说，又不是咱们要占的，是政府送咱们来的。这就叫：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
转来转去为吃饭。
你吃我来我吃你，
吃亏便宜都别算。

舍儿拍手叫道：钱三爷说得有理！

钱三文得意地把手在空中一劈，像甩惊堂木的样子，把舍儿拉到自己身边，拍着舍儿的肩头说：你三爷当然有理。你听过我说的《三国》吧，其实天下事都是三国演义，什么正反、忠奸，无非两个字：争夺。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旗号是维护汉室江山，反对汉贼篡权。请问，那天下是何时姓刘的？又是怎么姓刘的？你听我说！想当年，那刘邦也不过是一个下三流的小吏，和项羽争天下，争得死去活来，还耍了不少赖皮。当初他和项羽相约，先进咸阳为皇上，后进咸阳扶保在朝纲，他先进了咸阳……

钱三文说起书来了，唾沫星子乱溅。玉儿妈听得不耐烦，便说：舍儿！就听你的嘴巴巴地说个不停了，倒夜壶一样！

钱三文笑道：二嫂子指桑骂槐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

玉儿妈也笑了，说：到你家看看吧，看看腊肉挂在哪里。

钱三文冲玉儿妈笑笑，有点尴尬，他说：二嫂子还会说笑话。好好！请光临寒舍。到了！到了！

真正是寒舍。一间草屋，进门都得低着头。房内只有一张破床一口灶，几个盛粮食的巴斗，几捆柴草，其它什么也没有了。

舍儿故意往墙上看：肉呢？

钱三文指着一串秫秫杪子扎的刷锅把子说：那不是？

钱三文的老伴钱三娘怯生生地站在门口，像不敢进门的穷亲戚，不说话，只陪着笑。这老女人和丈夫一样是个细长个儿，只是白净、端正得多。若是稍微利用一点想象力，还可以依稀辨认她年轻时的俊俏模样。并且想象出她虽然不是大家闺秀，却也是一块小

家碧玉。可是如今的她却像一根被打光了叶子的芦苇了。微风也会使她瑟索，她穿得太少了，虽说已不是三九大寒，穿两条单裤也是冷的。她的眼好像也不行了，眼珠子浑得很，还不停地流泪，眼梢也烂着。

玉儿妈拍着自己坐着的床，招呼道：三嫂子进来坐呀！

钱三娘不好意思地摇摇头：顾先生坐吧，舍儿坐吧。茶也没有。老头子挑不动井水，天天都是我一小桶一小桶地往上吊，这两天我身子不舒服，不能吊了，只好吃那围沟的水。不敢用沟水烧茶给你们喝，你看着水怪清，其实沟里啥都洗，去年还有人淹死在里面……

钱三文说：没茶没茶就是了，啰嗦那么多干什么？

玉儿妈朝钱三文撇撇嘴，又对钱三娘说：你老头子把乡下的日子说得像盆儿景一样美，你倒卖起赖了！

钱三娘又不好意思地笑笑：他是为了混饭吃。家里有啥吃的？他东一顿西一顿地混饱了，也可以不管这个家了。

玉儿妈把手一拍，想再说什么，顾维舜怕她又要挖苦钱三文，便向她摆摆手，说：回去吧，既然要在牛棚里住几个月，总得拾掇拾掇。

玉儿妈不耐烦地说：一个破草棚，咋拾掇？

顾维舜说：总要把东西归归拢，啥东西摆在啥地方呀！还要贴“宝像”。

钱三文马上接腔，说：对，对！“宝像”不能忘。还要垒一个“宝书台”呢！咱们县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县，家家有毛主席像，户户有“宝书台”，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玉儿妈说：哎呀！这毛驴真能叫，不知道拉犁子推磨咋样。

顾维舜莫名其妙地到处找，问：驴在哪里？我咋没听见驴叫？

玉儿妈说：你聋啦！

小迎波笑着拉着姥姥的手，说：我知道驴在哪里了！姥姥，是不是钱三爷？顾家和钱家的大人们一起嘿嘿地笑，顾维舜笑着说：童言无忌，童言无忌。

二十九

玉儿妈到底是玉儿妈，一间牛屋在她手下变成一间过得去的住房了。

所有的墙壁都用旧报纸糊过了，缝缝隙隙和肮里肮脏的东西都盖住了，也敞亮了许多。

两铺床对面铺着，舍儿爷俩睡一铺，迎波和姥姥睡一铺。没有办法，三代同堂，只能这样住了。

一张八仙桌放在房子的正中央，隔开了两张床。“宝像”就贴在八仙桌后面的墙上。八仙桌的左侧，用土坯垒了一个“宝书台”，专放毛主席的著作。虽说是家里没有大知识分子，拥有的“宝书”还真不少，几十本。有买的，有发的，还有千方百计向别人讨来的，把个小小的“宝书台”都占满了。不过，这在当时不算稀奇。据统计，本地区在一年之中就发行了各种“宝书”一百多万套，语录和“宝像”一千多万张，加上以前每年发行的，一共该有多少了？全地区大人孩子加在一起才有七百万啊！要知道这其中还有一大半是不识字的文盲，根本看不懂“宝书”，那识字的人还不该“能者多劳”？

村上的人都好奇地来参观这一家新社员的家庭陈设，没有不夸奖的。都说到底是集上人，会拾掇东西。还有那么多的书本！

那位说集上人脸皮厚的大嫂子也来了，她主动向顾家人介绍自己：我也姓顾，叫顾凤莲。当家的姓孙，和女队长是本家。你们来了我高兴，我娘家人都死完了，我把你家当娘家走，好吧？

玉儿妈忙说：好！咋不好呢！

好！那我以后就叫你们爹和娘了！顾凤莲说。

顾维舜连说：不敢，不敢。听说分给我们的宅基地上的树原来是你家的。

顾凤莲说：是啊！本来准备给儿子结婚时用的……

玉儿妈说：我们原来开店用的东西现在都归了别人了！

顾凤莲说：那当然了！都是政府的政策，俺们有啥话说？说罢，她两只手扒着八仙桌摇了几下，然后拍着手叫道：好了！以后咱庄上请客不用到外庄去借八仙桌了！娘，我对你说，俺庄上没有一张木头桌子！

玉儿妈有几分骄傲，她也把八仙桌子摇了摇，说：这算啥桌子哟！腿不一样齐，桌

面也开裂了，又没上过漆。我本来有几张好桌子，有带抽斗的，有雕花的，都漆得红堂堂的，不是涨水的时候劈了，就是困难的时候卖了。这一张是临时凑合的。

顾凤莲说：就这张也不错了。过几天我就来借！

玉儿妈没有回答，她突然觉得这张桌子是宝贝了。可是顾维舜回答了：行！谁要用只管来搬！啥是你的我的，不分了！不分了！

要支起一个临时的锅灶，屋里实在摆不下了，德儿女婿就在外面给他们搭了个草房子。现在，玉儿妈知道乡下女婿的好处了，所以见了女婿眉开眼笑，顺心多了。

刚刚把家安顿好，顾维舜就去找女队长，汇报自己的情况，要求分配农活。

女队长爽快地说：你的情况我知道。我问过艾书记，顾维舜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敌我矛盾，我就把他当敌人，是人民内部呢，我就把他当自己人。艾书记说，就当他人内部吧！那我就把你当自己人了。顾维舜连声感谢，说虽然政府对自己宽大，自己还是要自觉改造，要女队长分配给他重活、脏活。

女队长把顾维舜上下看了几眼，似笑非笑地说：算了吧，不要逞能。你们家没一个能干活的。要不是艾书记说情，我真不愿意要你们。艾书记说，把你们分到别处可能受气，我不会给人气受。顾维舜自然又是一阵感激。结果女队长分配他去看稻田，赶麻雀，舍儿算是“半劳力”，和妇女一起干活。

顾维舜在心里叫着“菩萨保佑”，感谢着艾书记的照顾。回到家跟玉儿妈和舍儿一说，他们也欢喜不尽，只是舍儿和妇女一起干活有点怕，说乡下女人粗鲁。

天不作美，在一家人心绪刚刚安定下来，准备打火作饭的时候，它竟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风雨交加，一派秋雨的气势。刚刚布置好的新家乱了套。屋子漏水，而且不是一处漏，几乎是处处漏。床上漏湿了，只能挪动，歪歪斜斜地摆着，也还是躲不过小雨般的漏水。迎波吓得哇哇叫，玉儿妈忙着堵漏洞，顾不上管她，她哭了。舍儿堵漏洞堵得正心烦，一听见迎波哭，就吵：哭啥？叫你妈把你领回去算了！迎波哭得更欢，真的叫起了妈妈。

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门口，对他们说：光挪动东西不行吧？房顶要盖草。他戴着顶斗笠遮住了半边脸，顾家人谁也不认识他。

那人走进门来，脱去斗笠，对顾维舜作自我介绍：我叫黄山，将来和你们是邻居，钱三文家的东边两间屋是我的。我跟你们一样是下放户，不过比你们早多了。他讲话斯文，慢慢吞吞，像个读书人。顾家人都对他“噢噢”了两声，还是想不起他是谁。

你是哪里人？我怎么觉着有点面善呢？对不起，冒昧冒昧。顾维舜满身淋了雨水，还不忘以斯文对斯文。

我也是宝塔集人。说起来我还该叫你一声叔呢！黄山说。

顾维舜仍然想不起来，只得说：少见，少见，令尊是——？

就是福音堂的传教士，我父亲给玉儿姊开过刀的！黄山说。

噢！顾维舜和玉儿妈都想起来了。他父亲是五〇年以反革命罪被抓的，谁也不知他犯了什么罪，而且从那以后就没有消息，只听说他的妻儿回老家去了，想不到在这里碰上了他的儿子。

令尊——他还好吧？顾维舜试探着问。

不在了。黄山说。见顾家人脸上的同情，他笑笑：他六〇年被释放，没回到宝塔集就饿死了。我也是以后才知道的。好了，叔，这些话以后再叙，补房子要紧，我去搬梯子、叫人，你们准备点麦草。说着他就跑了出去。

顾维舜一边搬麦草一边说：这天下真小，碰来碰去，总是这些人。也算缘分，宝塔集人散不了。

不一会儿，黄山就搬着梯子来了，后面还跟着几个人，头上都顶着塑料布。女队长也来了。顾家人一边说着感激的话，一边把麦草往房顶上送，麦草不够，又找了几个麻袋盖在房顶上。

盖好了房顶，女队长拍着手上的泥说：委屈你们了。再漏的话，找我。说罢就走，黄山等人也跟着走了。

雨还在哗哗地下，房顶不大漏了，还是四处滴嗒。搭起的厨房里灌满了水，进不去了。玉儿妈叫舍儿搬了几块砖头，在床前垒了一个简易灶，煮了一点山芋吃了，算是晚饭。

雨还是不停地下，盖过的房顶也不大顶用了。顾维舜想再去找队长，玉儿妈不许：不能睡就坐着！你不是说多活十年吗？这一回就叫你多活十年吧！说完，她就谁也不理，

把刚才垒灶烧饭的地方收拾干净，又把床朝不大漏雨的地方拉了拉，叫迎波睡下。她自己坐在迎波身边，撑起一把破伞，挡住不时掉下来的雨滴。

顾维舜父子也不再说话，也撑起一把伞背靠背地坐在床上。

顾家人就这样开始了社会主义农村的新生活。

三十

好像，一切都过去了。

周纯一像个锁在笼子里的妖魔，被突然放了出来，兴风作浪，发疯发狂，把我们卷入了一场我们本该冷眼旁观的斗争，萌动了本不该萌动的欲望和幻想，如今都过去了。在那一场混乱的争斗中，周纯一又成了俘虏，重新被关进了笼子里，而我们，则大部分由集上人变成了乡下人。

细想起来，我们也没有失去什么，反而得到了——我和高凡自从结婚以来都不曾这样朝朝暮暮、耳鬓厮磨过。过去他为我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如今轮上我报答他了。我尽最大的努力，使他过得愉快、舒服。

唯一的不足是，日子越过越穷了。虽然报纸上说，淮北地区自从开展农业学大寨以来粮食产量每年递增百分之八点五，我们的口粮供应量却是每年递减百分之二十五。前年每人分到口粮四百多斤，去年只有三百多斤，而今年，便只有二百多斤了。好在我们都有了捱饿的经验，小来小去的饥饿也难不倒我们。我们可以把红芋和红芋干子当主粮，红芋面，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有红芋就好。我学着用红芋做各种各样的饭食，丈夫和儿子都很满意。

我对高凡说，不如再生个女儿。如果你愿意，我们还可以像乡下人一样多生它几个男孩女孩。整天围着孩子转，也是人生的大乐趣。而且，我真的怀孕了。

高凡直摇头，他说：当年把你打成右派真是历史的误会，你只想做贤妻良母，哪里会篡党篡国？我说不见得，女人是天生的创造者，既然不允许她们创造历史，那就只好创造人了。人是最可宝贵的，这是伟大领袖说的。我创造了人，再让人去创造历史，这也是曲线篡国。高凡笑得不行，把我搂得紧紧的，说：我懂，我懂！最有头脑的女人往往也是感情最丰富的女人，所以我死死地盯住你不放，你当了右派也还是要娶你当老婆。总有一天，我将向全世界证明，世界上最好的女人被我娶到了……我被他说得直掉泪。

但是，既然还生活在中国，既然外面还在进行着一场又一场殊死的斗争，我们就不可不闻到一点硝烟味。我们仍然有兴趣收集各种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不时地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知道“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已经开始了火饼，林彪从“接班人”的宝座上摔下来了，摔得粉碎。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当看客，或多或少总要有一点“参与”行动，否则不又成了“死角”？每一次有“最新最高指示”传达的时候，《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有重要文章发表的时候，上头总要布置学习讨论，之后还要汇报，这时我们的书元哥（他是新任队长了）便找到我们，要我们念报给大家听，要我们给上头写汇报。上头要求，传达“最高指示”要做到快、广、深、高，我们的汇报上也就这样写，我们做到了：

快：传达最高指示从来不过夜

广：上到一百三，下到手里搀，都听到了传达。“一百三”是过了百岁的老人，“手里搀”指刚会走路的孩子。

深：深到了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

高：把对伟大领袖的忠诚提到了最高水平。

总之，红太阳已经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冉冉升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我们张庄生产队高高飘扬。

当然都是扯淡！吹牛！事实是，每一次传达都很费劲，别说是老人和孩子，就是年轻力壮的人也不肯应召开会。七请八邀，也只有三五个人来点卯。但是书元要我们这样写，下了台的张队长更给我们出主意，他说：×他娘！又兴吹牛了！像大跃进时那样。那时吹地里的产量高，如今吹人的觉悟高。吹吧，吹！吹死人不抵偿。

我真怕上头人来检查，查出来是假的，罪名就落到我和高凡头上了。书元说：不怕。我摸清上头的脾气了，就是喜欢大家跟着吹。

张队长说：查？咋查？我说我心里升起了红太阳，你查得出来吗？用×光照，还是

用手摸？喝口西北风也能放个屁，说是吃饱了撑的！

慢慢地，我的胆子就大起来了，并且从吹牛说谎中得到了不少乐趣。

我最得意的是那一次批判林彪的汇报。

要公布林彪的罪状，批判林彪，不论书元怎么吆喝，只来了七八个人，不等到宣读报纸，就批起来了。

我的儿！谁的胆子这么大，批起林彪来了？我前几天进城还看见墙上贴着林彪和毛主席在井冈山上一拍的照片呢，两个人都笑眯眯的。

管它弄熊！一天一个样儿，谁知道林彪是谁的爹，谁的儿？

我说，别扯了，林彪已经垮台了。墙上的那张画是假的，上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的是朱德，林彪那时挨不上号。

看到画的那个人不服：我瞎扯还是你瞎扯？不信你进城去看看。两个人都笑眯眯的，还有假？

我说：你是信画，还是信历史？

那人还争：我的天！画得跟真的一样都不能信，还能信啥历史吗？

书元不耐烦地说：李翠！念报，念完回家睡觉，困死了。

书元就知道跟女人睡觉！有人开起玩笑来。

谁不跟女人睡觉？皇帝老子也少不了……

我怕书元说不合时宜的话来，不等他说完就开始念报。可是我刚刚念了五六句，人们就开始打瞌睡了，就数书元睡得快，睡得沉，鼾声像口哨。我照念不误，为了不和鼾声比高，我把声音调到了低度：

“林彪对文化大革命充满仇恨，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说农民现在缺吃少穿，说中国是国富民穷，说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变相劳改，说干部下放是变相失业，说工人的工资实际上冻结，说红卫兵是被利用，先当炮灰，后当替罪羔羊，说所有的人都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只是敢怒不敢言……”

×他妈哟！一直闭着眼养神的张队长突然睁开眼来，大声地叫骂，把大家都吵醒了。他看见大家都看着他，有了劲儿，更大声地说：林彪这人坏归坏，到底还说了几句人话。

林彪说啥了？几个人一齐问，并且叫我再念念。

我不敢再念，还替张队长遮掩，我说：你们都睡糊涂了，没听见张队长说林彪没说一句人话吗？

书元迷迷糊糊地说：咋没听到？听到了！说得对，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林彪当然不会说人话。

哎呀，我早就觉得他是奸臣了。你看那眉毛！脸上还没有四两肉。

不能光看长相。杨贵妃长得好，祸国殃民。

长相也不能不看。忠臣都长得富态，你看周总理。

就讲，毛主席的本事那么大，早先咋看不出他是坏人呢？

林彪会哄呀！我的儿哟，连毛主席都叫他哄住了。这人真算本事大的！……

这就是所谓“讨论”了。自然还扯了一些别的话，都不便在这里记录了。扯了不大一会儿，又有人打起了呵欠。书元便宣布散会。而我便要编汇报了。

我编得很好。好像突然来了灵感似的，编起来毫不吃力。我说，正在“靠边”审查的张队长听了林彪的那些无耻谰言，肺都气炸了！他跳起来说：这东西真是没讲一句人话！大家说：那当然，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嘛！会上有人提出疑问：为啥不早一点把林彪揪出来呢？新队长张书元说：这就像咱地里的庄稼，长熟了才能割。没熟的时候就割，收不到粮食呀！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妈妈说：对，这好比谁长了脓疮，熟了才好开刀。毛主席等林彪的疮熟了才割掉它，真正是英明伟大！林彪说农民缺吃少穿，几位农民一齐驳斥，说：叫他们到咱这里看看！他来的时候，咱人人都穿新衣服，家家都吃白面馍，气死他！张书元队长幽默地说：走不到咱庄他就气死了。他坐了三叉戟逃跑，摔死了。五保户张奶奶高兴地拍手笑，连说：活该！活该！只是，咱喂的鸡咋不关好？让他偷走了三只鸡，可惜了！把鸡给毛主席补补身子多好！原来老人年纪大了耳朵背，把“三叉戟”听成“三只鸡”了。别人对她作了解释，她说好，好！把那鸡杀了煨汤给毛主席喝吧！会场上充满了胜利的欢笑。

高凡看了我的稿子，笑得在床上打滚，然后双手抱着我的头使劲儿地摇：翠儿，翠儿！让我听听这小脑袋瓜里装的是啥？为什么能编出这么好玩的东西？你可以写小说，知道吗？将来你去当作家吧！

我自己也笑得喘不过气来，得意地说：真说不定，我将来若是真的成了作家，我就要写今天这样的日子，叫《荒唐史话》。

不要光写今天，翠儿，还要写昨天和明天。高凡说。

我问是不是都叫《荒唐史话》，他说都叫《荒唐史话》。

我立即拿出笔来，在笔记本上写下：×年×月×日，李翠在她丈夫高凡的鼓动下，立志要当作家，写一部表现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荒唐史话》。恐日后食言，立此存照。

高凡看了，在《荒唐史话》前加了“伟大的”三个字，然后说：不过翠儿，现在你还不是作家，不要滥用创造的权利，把汇报上鸡不鸡的那一段删掉吧，何必把辫子交到人家手里？

我顺从了高凡。其实我也是兴之所至，编了玩玩的。

三十一

我不大情愿回宝塔集了。偶然回去一次，也是三日两日便回，除了帮助父母处理一些事情，很少出去串门儿，对舍儿和小群他们的情况，也就不大了解了。要不是书元弟弟活宝二呆突然出现，我大概会把他们忘记的。

二呆自打那年被抓进监狱，一直没有一点儿消息。书元也去打听过，可是都说那是“特殊案件”，密不透风的。书元说，不去打听他了！他索性死了也干净了。干出这种事来！村里人隔三岔五地问一句：二呆怎么这几年一直不来了？我们也都说不知道。

哪知道这个不争气的二呆偏偏能活。又回到张庄来了。

他越变越丑了。要是黑夜里他突然在你面前一站，再打个闪电往他身上一照，你准以为是鬼来了，不把你吓个半死才怪。腿是早就瘸了的，也不十分厉害，也不是他身上最丑陋的地方。是他的眉眼，他的举上，他的整个的样子，叫人看不下去。他的五官本来是端正的，和书元差不多，现在却完全走了样，像被什么凸凹不平的东西挤压过，弄得肿不像肿，胖不像胖，歪不像歪，斜不像斜。问题大概出在他的神态上，他总是不停地做着鬼脸，不是咧嘴就是挤眼，要不就是用手指往鼻孔里使劲地捅，他的手指很细很细，差不多完全可以戳进鼻孔里去，我担心它会挖出一块脓子来。三十多岁的人自然有了胡子，但他的胡子显然是从来不刮也不剃。头发长得差不多像女人了，是不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

不是，我都出来几年了。我命大，多少像我一样进去的人，不是死了，就是疯了，没有几个像我这样活着出来的！我的命大，真大。他得意地说，唾沫星子乱飞。

他说他这几年在到处流浪，在周游中国，北京、上海、南京、杭州、还有西安和延安，都去过了。是不花钱旅行，他靠讨饭养活自己。

那你还回来干什么？书元气恼地说。

他嘻嘻一笑：想讨个女人。

别睡着地摸着天，想得高了。谁会要你！书元说。

我不讲究，哥。不论是丑的俊的，也不论是二婚、三婚，是女人能生养就行。他仍然嘻嘻地笑着。

书元嫂子被他逗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她说：你说得轻巧！现在乡下就是女人金贵。你不讲丑俊？有头有脸的年轻人也不敢讲丑俊！你去看看俺庄刚娶来的那个新媳妇！新郎信光光堂堂的多漂亮，她呢？一脸的疤拉！连眼皮上都是疤拉！可她还厉害得不行，把老婆子一家折磨得淌尿水儿。你想讨老婆？得像猪八戒那样，变个样子才行……

二果说：别这么说，嫂子！丑人有丑福。我心里有个人，你托人去给我说说。

书元嫂子说：好吧，你说，是盘丝洞里的蜘蛛精呢，还是山窝里的狐狸精？

翠儿妹子知道，是杨小群。二呆说。他说他讨饭曾经讨到杨小群那庄，看见小群了，她过去长得那么俊，如今却丑得像妖怪。她男人死了，一窝孩子，生活很困难，人也不正经，还能想个啥样的人要她呢？

我对二呆的话感到恶心，我说：你胡说，二呆！小群怎么不正经？

二呆赌咒：说瞎话我不是人！小群不正经！这是她庄上人对我说的。我想去找她，可是她不理我，说不认识我。她的老婆子也不让我进门，用拐棍打我。所以我回来找你们，我明媒正娶，总对得起她了吧？翠儿妹子，你去替我说说，好吧？你对她说：我能养活她的全家，我会治病，是医生。

书元一把揪住二呆的耳朵，说：你还吹！还吹！人都叫你丢尽了。

二呆一手护住自己的耳朵，一手拚命摇着：我不是吹，是真的。我讨饭的时候碰到

蔡抱一，他可怜我就教我学医。可惜蔡抱一死了，要不你们去问问他。

书元气得要打，被高凡拦住了。高凡说：让我考考他，就知道他讲的是真是假。

高凡读书杂，对中医中药略微懂得一些。家里人小毛小病的，他也能治了。还会点针灸，我曾送给他两句打油诗：胆大妄为高医生，一针见血鬼神惊。他讲出几样中草药的名字，问二呆能治什么病。二呆翻翻眼，也能讲出来。看样子确实学过一点东西。于是高凡劝书元：可以让他试试，当个乡下的“赤脚医生”，也用不了多大本事，我还可以帮帮他。书元也答应了。

可是二呆还是缠着我，叫我去给他向小群提亲，而且说，一定能成。我被他缠得没法，心想回宝塔集看看也好，便半真半假地答应了。

你回来得正好，我才到家，父亲就对我说，你大姊要回来过春节，明天你去汽车站接她吧！下了车还有几十里路，她一个人走着太孤寂。父亲说，大姊现在很苦。上头有人到她家里去找过她，要给周纯一拿几件衣服。来的人不肯透一点风声，只对大姊说：别抱什么幻想了，周纯一这一辈子也别想回来了。大姊哭了几天也就不哭了，说死了男人还有孩子，日子总得过去。所以父母想接她回来过个年，安慰安慰她。

万万没想到，我在去汽车站的路上碰到了顾维舜和舍儿，他们说，玉儿今年回来过年，他们去车站接她。

玉儿现在怎么样了？我问。

顾维舜叹口气，说：不好。迎波爸被打成“五·一六”了，玉儿又一直在“五·七干校”，一家三口人三下里扯着，玉儿苦呀！

怎么不让二婶带着迎波到上海去呢？我问。

顾维舜说：现在家里哪能离开你二婶？烧饭、洗衣、养鸡、喂猪，有时还下地干活。德儿还病着……

怎么德儿也生病了？我问。

自从生了那个男孩，就一直身体不好，是糖尿病，整天要吃喝，就是不见长肉，瘦成人干子了！顾维舜说。

顾维舜本人也瘦多了。过去他是一个非常精干和干净的人，现在却显得破烂猥琐了。棉袄的大襟上满是油渍，脚下的棉鞋露出了棉花，像是烤火烧破的。记得我们小时候到他家里去玩，他喜欢伸出手来和我比，看谁的手洗得干净，他喜欢洗头、洗澡、修指甲，他洗脸不用肥皂而用碱，他把碱粉倒在手心里，往脸皮上一遍又一遍地擦洗，我们奇怪他的脸皮为什么不会被擦破，反而擦得透亮了。可是现在他伸出来的手却是一点也不干净了，手面上裂着血口子，指甲里嵌满了泥污……舍儿倒是长得粗壮了，面色也好。光着的头顶直冒热气。大冷天他只穿了一条单裤，赤着脚在结了冰的路上走着，球鞋拎在手里。

为什么不穿鞋啊，舍儿？我问。

赤脚省鞋，又跑得快。舍儿回答。

玉儿一下汽车就看到爸爸和弟弟了，她径直朝他们走过去，好像没有看见我。我叫了一声“玉儿！”她有些意外，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接大姊，她只噢了一声就不再理我。玉儿对人冷淡了！

我接了大姊又与他们一起往回走。

玉儿问爸爸：德儿的病怎么样了？现在的胰岛素又贵又不好买，我只带回来一盒。他爸说：还是那样，一天要吃无数顿，医生说吃多了不好，家里人就把可吃的东西放起来，可是她偷着吃，说饿得受不了，家里人不忍心，就由她吃了。

玉儿说：我害怕德儿不行了……

舍儿说：别说不吉利的话，她的儿子长得可好玩！又白又胖，不像爸也不像妈，叫“小霁子”。

玉儿说：不是我说不吉利的话，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梦见德儿穿了一身黑衣服站在我面前，我问她好了没有，她背过身去抹眼泪。要不，我不会这么急朝家里赶……

玉儿哽咽起来。她爸安慰她说：那是你想她了，姊妹的情分深，说不定她一见你就好了。

我的大姊本来不爱说话，现在更不爱说话了。四十岁的人看起来像五十岁。我问她咋不带个孩子来，她说路远天冷，怕累坏了孩子，乡亲们替她照顾着很好。

来拿衣服的人没说他们是哪个部门的？我问大姊。

大姊摇摇头：没说。俺也没问。

没说姊夫到底判了没有？我又问。

大姊又是摇头：没说。俺也没问。

到了和玉儿他们分手的时候，顾维舜说：到乡下来看看吧！过去你们姊妹们常见面，如今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都有了自己的事了。德儿常常念叨你。

我忍不住心里一阵难受，答应他：一定去。

三十二

顾维舜一家现在真正成了乡下人，顾远山老头引以为骄傲的书香气已经荡然无存了。

生产队里给他们盖了三间堂屋，一间厨房。玉儿妈妈领迎波睡东屋，顾维舜父子俩睡西屋。顾维舜和玉儿妈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早已习惯了分居生活。三间屋里都放着盛粮食的泥巴囤，还放着犁耙一类的农具，显得挤挤巴巴的，只是摆得还有点条理。这大概是他们和乡下人唯一不同的地方了。

顾维舜和舍儿每天下地干活，舍儿还和妇女们一样干，不过每天的工分由六分长到八分半。顾维舜看稻田只能挣六分。父子俩虽然力气小，不会干，可是都很卖力。当然难免闹点笑话，出点洋相，可是比起上海来的知识青年，却算不了什么了。上海知青才叫绝，推磨的时候，人家给他一副驴蒙眼，他们却把自己的眼蒙上了，还问看不见怎么推磨。

村上人都说顾家人厚道，女队长便派顾维舜帮助会计记工分，算算帐，分分粮草什么的，虽说不给加工分，可是得到的比几个工分还要多。给他们家分东西的时候，会计把秤防往外移，秤杆子也翘得很高。

在村里的三家下放户中，正儿八经地过日子的，只有顾维舜一家人。

钱三文两口子等于“五保户”，生产队不但供给他们粮草，每到冬夏两季还要补助他们一点钱。村上人都把他们当累赘。钱三娘还算知趣，知道人家不喜欢自己，就像小老鼠似的在村里走动，从不多言多语。她喂着两只羊，每天到地里割些草，拾点柴，其余的时间便只在家前屋后转悠了。常常到玉儿妈这边坐坐，有时也来借盐，舀瓢水，碰上吃饭的时候，玉儿妈也给她点吃的。钱三文可就叫人讨厌了。每一次从外面宣传回来，他都要吹，吃到了啥，见到了谁。他肺里有病，走到哪里痰就吐到哪里。玉儿妈最怕他吐在自己门口，他一吐，她就拿灶底灰去盖，他不但不为此感到难为情，反而说：你这么勤快！我可以天天到这里来吐痰了！玉儿妈也不客气：你自己没有家？我有工夫给你盖痰，不如去扫猪圈！有一回，钱三娘拎水时掉进沟里了，玉儿妈拿了一根竹竿把她救了上来，钱三文还笑，问老伴现在下沟洗澡凉快不凉快。气得玉儿妈对钱三文下了一道最后通牒：从今后再来我家串门子，我朝你身上泼尿水！

黄山一家人也不比钱家好多少。黄山的老婆是集上人，不会干乡下活，又怕苦，三天两头往集上跑，两口子经常打打闹闹。黄山原来也是读书人，读过两年大学中文系，也是反右时犯下错误，给下放到农村来了，心里也憋了许多气，无心干活。所以，他家的灶台差不多天天是凉的。

玉儿妈可不允许自己一家人像他们那样生活，她说到哪山砍哪儿柴，在哪里我都不能比人家短半截儿。她干的活儿一点也不比别的农家妇女少。几十年住在集上，针线茶饭上她是把好手，推磨打碾可从来没干过。可是她照样抱着磨棍推磨。她脚小腿细，脚脖子麻秆儿似的，一步一颤巍。村上人都说，不能让她抱磨棍，毛驴再累也要听她使唤。可是她心疼牲口，一看到毛驴累了就“心肝宝贝”地叫，自己还是抱磨棍，让毛驴歇着。

可是到底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一天到晚忙着，实在是累，累极了，脾气也就更大了。所以吵吵闹闹的事经常发生。有一回，天下雨，玉儿妈把一大盆猪食从厨房往猪圈端的当儿跌倒了，盆也掉破了，人也摔伤了。那天正碰上老大顾维尧来作客，老弟兄俩坐在堂屋里叙话，一个坐在桌这边，一个坐在桌那边，共吸着一个旱烟袋。你吸完一袋交给我，我吸完一袋再交给你，彬彬有礼，长幼有序。玉儿妈摔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老哥儿俩只问摔伤了没有，却不知道该去拉一把。还是小迎波跑出去把姥姥拉起来，给姥姥扶回堂屋里。看玉儿妈吵吧，说“书香门第”的男人都是又聋又哑又瞎又残废，还没心没肺。说跟这样的人过日子有啥意思，不如去跳河。吓得小迎波死死地抱住姥姥的腿，大哭大叫：不要跳河，下回你再跌倒了，还是我拉你。姥姥被感动了，宣布不再跳河，但是她说，从今以后，家里的规矩必须变一变。家里活要大家动手干，什么男人女人，都是人！男人不想干家务，就别吃饭！

打那以后，顾维舜开始光顾厨房了，自己盛饭端饭，有时也会坐下来，往灶洞里填

把柴。

原来，顾维舜和玉儿妈一个打里一个打外，平分天下，现在，不知不觉地，玉儿妈成了这个家庭的“绝对权威”，顾维舜原来的那一半天地完全失去了。但顾维舜也不计较，他觉得反而清静了。

然而，正像一首歌里所唱的：公鸡头，母鸡头，不在这头在那头。灾祸总要降临的，这一辈人都躲不过，玉儿和德儿都轮上了，一个是病，一个是灾。

玉儿丈夫成了“五·一六”。

“五·一六”是什么东西？不但顾维舜玉儿妈说不清楚，连当了“五·一六”的人也说不清楚。江青说，“五·一六”是这么个东西：“一个反革命组织”，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黑材料他都整了，他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

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连周总理都说她是“我党杰出的女同志”，常常举着小红书带头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她讲的话还会有错？所以，全国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都成了“五·一六”或“五·一六”的嫌疑，谁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表示过一丁点儿怀疑或不满，谁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谁让各级新上台的权威人士感到不顺眼，谁就可能是“五·一六”。这些人被叫做“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以示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反革命分子”有所区别，区别在于，他们都在红旗下长大，原来头上没辫子，屁股上没尾巴，后来头皮和屁股一起发痒，辫子和尾巴便长出来了。

玉儿的丈夫没有反对过“无产阶级司令部”，他只是参加了当地的一次不成功的夺权。一九六七年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使很多年轻人头脑发热，以为自己也可以参与权力的分配了。事实却来教育他们，那是作梦。红卫兵也好，造反派也好，无论你们多么可爱，多么响当当，都只能充当打手和炮灰，至多当一个聋子的耳朵。平民夺权谓之“篡”，这种古老的观念不但掌权者有，无权者也有。所以直到今天，有关文革的许多著作中，仍然充斥着这种反“篡”的意味。那些大学者大权威，对当权者的迫害可以不置一词，可以说“当娘的也会打错孩子的”，唯独对他们以为不配与自己平等的人在“当娘的”支配下对他们的批判，不但一点儿不肯原谅，而且要加倍偿还。对于这种状况，即使鲁迅先生活着，除了吐一个“呸！”字，还能做什么？这是走题儿的话，不说也罢。反正，玉儿的丈夫成了“五·一六”了。

丈夫被隔离审查的时候，玉儿早已随单位被“疏散”到农村去了。那时候，林彪还是“副统帅”，他发布了一个“通令”，要准备打仗，城里不可靠的人都要疏散，免得他们在敌人打进来的时候开城门，放吊桥，里应外合。玉儿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自然要疏散了。几个月过去了，并没有敌人打进来，理应可以回城了，可是最高统帅又发布命令，大家都进“五七干校”，于是玉儿成了×连×排×班的“五七战士”了。有人来找她了解她丈夫的情况，叫她揭发丈夫的罪行，她才知道丈夫出事了。

玉儿没有马上把这件事告诉父母，怕他们担心。父母下放时，她是应该回来的，可是她没有回来。女儿读书时，她是应该回来的，可是她也没有回来。现在德儿病重，她预感到生离死别的恐惧，这才回来的。

德儿让丈夫把自己推到娘家，她要见见久别了的妹妹。

玉儿一看见德儿就哭了。美丽的姊姊怎么变成这样了呢？真正只剩下了一层皮。德儿却没哭，她努力对妹妹笑着，温柔地拉着妹妹的手问：你怎么又黑又瘦了？是不是想迎波想的？干校的劳动太累了吗？玉儿抽噎着回答了德儿一连串的“不”字，终于忍不住抱住二姊失声痛哭了……

玉儿姊、舍儿、迎波，都一齐哭。只有顾维舜不停地在一旁劝慰：都见面了，应该高兴才对。玉儿坐了一天一夜的车，该累了，德儿身子弱，也不能过分激动，还是做饭吧！

德儿撑起身子，说：我去。她妈马上按住她，说：用不着你。玉儿跟妈一起到了厨房里。玉儿在灶下烧火，她妈在灶上和面，擀面条。只和了一小块面，是做给德儿吃的，细粮不够，其余的人只能吃红芋面粑粑了。

玉儿妈说：以前你爷爷给你们算命，说你将来多灾多难，活不长，我天天为你提心吊胆，想不到应到了德儿身上。我哪辈子造了孽，老天爷这样罚我……说着，她的眼泪掉进了面条锅里。

吃饭的时候，德儿不肯吃细粮，她把面条推到玉儿面前，说：你累了，又在上海吃惯了细粮。我吃啥都一样，反正是吃了也无用。

玉儿哪里肯，她一定叫德儿吃下去，德儿又把面条递给迎波，迎波也摇头，说二姨是病人，二姨吃了吧！德儿只好把那碗面条吃了下去，可是吃完，她再也不愿盛第二碗，便吃红芋面粑粑，吃完一个，又伸手去拿，她妈把它夺了下来，说：不能再吃了，你不听医生的话，病咋会好！德儿恳求道：妈，我的病是治不好的，穷人生了富贵病，只有死路一条。就让我吃吧！要不然更难受……

玉儿也帮助恳求：妈，给她吃吧！

玉儿妈把一个粑粑递到德儿手里，又心疼又气恼，说：咋得了这种病啊！哪一天才能好啊！要是当初听了我的话，不做这门亲，也许就不会得这个病了。怪谁呢？怪谁呢？

德儿说：我谁也不怪。活得成就活，活不成就死。我也没啥留恋的，只是舍不得孩子……

德儿说得难过，放下刚咬了一口的粑粑。

顾维舜说：都别说丧气话！玉儿不是又带了一盒药来吗？有了药病就能好。

玉儿妈也连忙说：当然能好！年轻人能抗病。好了！不说病了！迎波！把电线拉开，听听王八蛋今天唱不唱戏！

迎波拉开了吊在门旁的一根线，广播喇叭响了起来。迎波对她妈说：你知道王八蛋是谁？就是广播站！她妈说：别胡说！可是说话间，广播喇叭里便响起了刺耳的女高音：宝塔公社广播站！她把“广播站”三个字说得很快，口齿又不大清楚，听起来真像“王八蛋”，玉儿笑了，说：怎么要这样的人当广播员？迎波说：妈，你不懂，她够着人了！全家人都被她说笑了，说这小孩都懂“够着人”的好处！原来广播员是一个干部的妹妹。

广播员说有重要消息报告。顾维舜立即制止了家人的吵嚷，说：听，听，又出了啥事了！

玉儿妈站起来将广播线一拉，说：看把你积极的！就不让你听！出了啥事跟你有啥关系？听了这么多年还没听够吗？天塌了我也不问！

顾维舜只得摇摇头，解嘲地说：谁想问呢？我不过是想听听。过去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也不时兴了！

玉儿妈鼻子里哼哼了两声，拖长了声音说：哟！国家，国家！说得跟盆儿景似的，国家是你的？

三十三

我没有按约定的时间到乡下去看德儿和玉儿，被大姊的事拖住了。大姊实在被周纯一害苦了，一个人领着三个男孩，怎么过？而且因为周纯一不断地出事，几个孩子都不能念书，现在大儿子已经十八九岁了，到了订亲的年纪，她哪有钱娶媳妇？她天天又是哭又是诉，埋怨周纯一，有时候还说他不如死了。我看她这样痛苦，便劝她，真是过不下去的话，就跟周纯一离婚，再朝前走一步，就是周纯一将来出来，也不会怪你，你辛辛苦苦给他领大了三个孩子，也对得起他了。想不到她哭得更凶：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周纯一虽说为人粗鲁，喜欢闹事，可是心是好的。我跟他作了二十多年夫妻，他没动过我一指头。有一回他对我说话带粗字，我气得哭，他向我赔了半天不是……

你不是说，他变过心，有过男女关系问题！我说。

那是人家编排的！他跟一个女人一起出了一趟差，人家就说他跟那女人睡觉了，我才不信！姊姊说。

那你要怎么办呢？我问。

我也不知道啊！姊姊又哭了。

父亲劝她：这么慢慢朝前熬吧！孩子渐渐大了，你也算有了帮手了。孩子们不能念书，就叫他们学手艺，一个人学一样手艺，就不愁吃喝了。

母亲说：现在乡下能用着啥手艺？总不能还学剃头！

父亲说：学剃头就学剃头！不孬也不赖。我爷爷和爹都是剃头的，也没有孬了赖了！

母亲说：别听他的，不学剃头！

像这样的对话，几乎天天都要重复一遍。我都感到厌烦了。我下了个决心，下乡去看看玉儿和德儿，也和她们商量一下把小群说给二呆是否可行。书元原是玉儿大伯的养子，因为不堪奶奶的虐待逃了出去，顾家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书元不让我们把他的消息告诉顾家，他不愿意再见顾家的人。我一直为他保密，书元到过宝塔集，顾家人也认不出他来了。现在我觉得应该对顾家人公布这个秘密了，现在大家都是贫穷的乡下人了，顾维舜夫妇过去又待书元很好，为什么还要互相隔离？

德儿已经回到自己家里去了。玉儿妈他们见到我，亲得不行，一定要留我住一天再去看看德儿，听到书元这些年一直跟我在一个村上住，就更不让我走了，要了解书元的情况。

顾维舜说：老天爷公平，好有好报，恶有恶报。我们过去对书元不好，把人家逼跑了，如今报应就来了，报应到我们孩子头上了。

玉儿妈说：是老奶奶老爷虐待他，我们待他哪点不好？

顾维舜说：不是一样吗？儿女代父母受过，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你忘了，小群奶奶逼死过一个丫头，小群爸爸要替他妈偿命。到头来，不是偿了？

玉儿妈说：扯你的鬼！小群的爸是给政府枪毙的，又不是那死丫头的魂勾去的！

顾维舜说：一样，一样，反正是死了！等德儿的病好了，我要亲自到张庄去找书元赔不是，求他原谅。他要是愿意，我们就还当亲戚走，我们顾家单门独户，也没有几家亲戚。只是他现在是队长了，我的成分不好……

玉儿妈把牙一咬：我一听你说这话就生气！成分不好，成分不好，偷了抢了杀人了放火了？你天天把这话挂在嘴上，舍儿就别想讨媳妇了！

原来舍儿在他大伯那里找的那个对象吹了，人家不愿意嫁到乡下来，找了一个当兵的，已经嫁了。那当兵的也是宝塔集人，结婚的时候吹吹打打地好不热闹。那天合儿疯了似的要上集，还买了炮仗要去闹新房，被他妈死活拖住了，让他喝了许多酒，醉得死人似的，睡了两天两夜。打那以后合儿一烦一闷就喝酒，常常喝醉，醉了就发酒疯，所以他爹妈正四处托人给他提亲。

我没有在玉儿父母家过夜，吃了一顿中饭，就与玉儿一起到了德儿家。德儿家离她父母只有五六里地，我们半个钟头就走到了。

虽说也是泥巴墙，茅草房，但德儿的两间屋还是宽敞的。屋里没什么家具，泥巴桌子泥巴圈，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德儿因为有了玉儿带回来的药，这几天好些了，正在做着针线活，小孬子就在她膝上趴着。这男孩长得实在可爱，虽说只有一周岁，却长得很高，皮肤比他妈还要白皙，他爸爸所有难看的地方到他脸上都经过了修改，变成好看的了。

德儿在给孩子做单衣，布是旧的，是自己的衣服拆成的。可是她还在那旧布上绣花呢！白色的小褂的胸口上绣了一朵粉红色的荷花，像真的一样。

玉儿说：二姊，你身体还没好，现在又穿不着单衣，忙什么呢？

德儿笑笑，说：闲时做了忙时用，不要到时候来不及。

德儿女婿坐在一旁，听了这话突然狠狠地擤了擤鼻子，眼泪汪汪地看着我们。他说：我咋说她都不听，这几天她把自己夏天穿的衣服全拆了，都给孩子改成小衣服了，说她再也穿不着了……

这男人话没说完就呜呜地哭起来，并且把儿子抱在怀里，用自己的流泪的脸在孩子的脸上又是亲又是揉……

德儿停下针线，看着丈夫和儿子，温柔地说：别吓着孩子。你以为我想死吗？我也不想死啊！人啊，平时活得厌烦了，就想着不如死，可是真正到了要死的时候，又觉得活着好了。活着多好啊

德儿用手里的小衣服捂住了脸，好哭的玉儿早就哭得抬不起头来了，她一把夺过姊姊手里的小衣服，往床上一扔，说：不要做！不要做了！我不许你做！你不会死！我要想一切办法给你买药

德儿又拾起那件小衣服，在那朵荷花上摸着，对玉儿说，别傻了，玉儿！你还不够苦的？一个月就有那五六十元钱，又顾老又顾小的，一盒药就要二十多元，你哪能受得了？记得啥书上说过一句话，伤其九指不如断其一指，就让我这个指头断了吧……

我是不好哭的，可是现在我也忍不住哭了。我想起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玩的情景：

我们一起绕着宝塔打转转，唱着“轱辘轱辘圆圆，腰里装着钱钱”；

我和德儿、小群一起拉着玉儿的衣襟，玉儿用小手点着我们几个人的手唱：青布蓝布十八正，大米干饭搅糖稀，有钱的，吃个饱，没钱拔腿就要跑。德儿总是跑不掉，被玉儿抓住了手；

我们一起挖荠菜，比赛着谁挖得快，谁挖得多；

我们让小群扮新娘，把一朵玫瑰花插在小群头上，小群的脸比花儿还美。

我们谁也不会想到，等待我们的竟是这样的命运啊！

德儿女婿放下儿子，问德儿：我去做饭，做啥饭呢？

德儿说：今天不用你做，我来做，你去拔点葱，挖棵菜来，我叠碱馍。

德儿一定要自己上灶，玉儿在灶下烧火，我在一旁看看。我又想起我们小时候在厨房里偷偷地请“麻秸姑娘”的情景了。我们把一把麻秸竖在灶前的地上，对着它磕头，祈求它赐福，让我们将来找个好婆家。玉儿是不是也想起了这件事？她手里抓着一把麻秸忘记往灶里填了，灶洞里的火已经熄灭……

那一晚，我和玉儿都在德儿家里住下了，德儿的丈夫到别人家里借宿去了，我们三个人带着小孬子挤在一张床上，叙了一夜。

想不到，那就是我和德儿的诀别。

三十四

我没有去给二呆提亲，德儿和玉儿都不让我去。她们说小群够可怜的了，何必再去伤害她的心？不论小群如今多么潦倒，二呆都配不上她。我把情况跟书元两口子说，他们都认为我做得对。书元也没怪我把他的消息告诉了顾家，说：其实我对他们也没什么怨恨，有空的时候去看看他们。

二呆虽然对我不高兴，却也拿我没办法。现在，他开始作“医生”了。书元给他买了个药箱，又买了点十滴水、红药水、消炎片什么的，叫他背着四乡里串着。乡下人有病很少看医生，能拖就拖，能抗就抗，拖拖抗抗，也就好了。如今有了个二呆，有了毛病便来问问，二呆卖给他们一两粒药片，居然有效。于是二呆慢慢就有了一点信誉。书元两口子自然欢喜。

可是不到一个月，闲话就传了出来，说二呆专爱给女人看病，藉口检查，往女人身上乱摸。书元两口子几次考问，二呆都笑嘻嘻地矢口否认，说王八蛋才干那种缺德的事儿！可是有一天，被书元嫂子碰上了！二呆把一个年纪不轻的女人领到家里来看病，关起门来，一看就是两个时辰。书元嫂子从田里收工回家做饭的时候门还拴着，她硬敲开了门，那女人一溜烟跑了，二呆嘻嘻地傻笑，说他们两个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捱。书元嫂子吐了二呆一脸唾沫，说：看你哥哥不捶扁你！二呆抹去脸上的唾沫，仍然笑嘻嘻地，说：俺哥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谁叫你们不给我说媳妇的？

书元两口子被缠得没法，便商量着去给二呆买个女人来。说来也奇怪，文化大革命把什么旧风俗都破了，卖女人的事却越来越多，城里差不多常常有女人被卖和自卖，这些女人差不多都是从“天府之国”四川跑出来的。而且价钱也不算贵。

书元两口子东借西磨地凑了五百元钱，便动身到县城去了。不过两天，便领回一个闺女来，四川人，二十多岁，长得也可以。村上人都替二呆高兴，二呆更是喜不自禁了。不过书元对村上人说：丑话先向老少爷们说在头里，这姑娘是俺两口子骗来的，俺跟她说是俺要娶亲，说二呆嫂子是俺姊。所以，拜堂的时候，俺还得代替二呆，入了洞房就没事了。俺请大家帮帮忙，到时候不要闹得俺下不了台。大家都说：这样好！生米一做成熟饭，她赖也赖不了。这种事儿，眼下多得很，怕啥？

看着书元涨红的脸，我不禁想起了他和书元嫂子的奇特的结合了。那时候，领导为了掩盖“大跃进”带来的灾情，叫他们扮作夫妇住在公路边，供中央首长视察，结果假戏真作了。这一回又要作戏，再弄假成真就糟了。没想到老实巴交的书元也能想出这样的花花点子来。这多亏上帝造人时把人分成了男女，只有男女二字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为创造的动力，再愚笨的人都能被它激发出令人吃惊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来。

姑娘领回来第二天就要拜堂。我和书元嫂子在二呆的窗户上贴上了一对红纸剪的喜鹊，就算新房。

乡亲们答应是答应了，不胡闹。可是革命时期好不容易碰上这样一个欢乐的机会，哪能忍得住呢？叫书元和新娘子报告“恋爱经过”，叫书元和新娘子亲嘴，差点儿把书元逼哭了。直到书元嫂和二呆一起出来又吵又骂，才把大家的兴致降了下去。贺喜的人前脚走了，书元后脚就溜了出来，像刚刚逃出牢房的犯人一样，躲在自己房里再也不肯出来了。二呆趁乱溜进了新房。

新房里竟是一夜无话，书元两口子的心算放下来。谁知天一亮就不对劲了，新娘子突然吵闹起来，而且冷不防地跑到书元夫妻的房里来，掀了他们的被窝。两兄弟睡的房间都没有门，只有一张布门帘。新娘子朝书元脸上吐唾沫，说，兄弟和姊姊睡觉，就是你们这里的规矩吗？

书元两口子又惊又羞，作揖打恭，求新娘子别闹，书元说：俺是穷极了，才想出这样的孬点子，都是为了这个兄弟。俺们不会亏待你。

新娘子是个硬茬儿，她对书元说：我是冲着你来的！要么跟你成亲，要么放我走路！

二呆哪里肯依，他软一阵、硬一阵地劝新娘子留下来，说既然进了张家的门就休想出去。可是新娘子软硬不吃他的，她对他说：我没有眼去看你那丑样儿！你们好好放了我，我把你们当亲戚，不放，我就跑！你就是用笼子锁上我，我也能跑掉。前年一个男人买了我，我不肯跟他，他要活埋我，坑都挖好了，他问我要死要活，我一闭眼就往坑里跳，他没办法，还是放了我。你们有啥手段呢？也都使出来好了，我要怕就不是我娘养的……

书元哭丧着脸说：俺有啥手段呢？你问村里人，俺坑过谁了？都是为了这个兄弟。

书元嫂子把书元哥俩的经历对新娘子说了一遍，希望她原谅，新娘子的气消了一点，可是要走的决心毫不动摇。

村里人本来就等着看热闹，一听见动静便都跑来了，都帮着书元说话，说书元是好人，二呆也不错，就是腿短点，别的又不短什么，又会给人看病，过日子不会错。

就算你做件好事吧！女人家到哪里不是过日子呢？从四川跑到这里来，你也不是好容易的……女人们劝。

你去打听打听，周围那么多庄子，哪庄的人有俺庄的人好？你在俺庄没人欺负你，工分也比别处挣得多。男人们劝。

新娘子总算不哭了，但是她说，宁死也不跟二呆，要是这庄上有别的合适的人，她便愿意留下来。大家看看二呆，再看新娘子，都觉得这二人实在不般配。不过嫁了的姑娘砍倒的树，哪有换人的道理？所以都怪这新娘子太离谱，叫人没法帮助。结果下了台的张队长发了话，说：让她走！这样的女人也不中留。书元答应了，说：你要走就走吧，俺在你身上花的钱也不要了，算俺倒霉。

二呆马上睡到地上打起滚来，说：你们放她走我就不活了，我死给你们看！书元气得踢了他一脚，说：要死到一边儿死去！别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

大家都以为二呆是说着玩的，谁知第二天早上新娘子要走的时候他真的吊了颈。新娘子和书元两口子正在堂屋里说话，只听见新房里扑扑腾腾地乱响，书元嫂子掀开门帘一看，二呆已经吊在梁上，脚上的板凳也已经踢翻了。书元嫂子吓得哇哇直叫，书元赶紧进去抱住兄弟，哭着叫二呆，二呆，你要是死了，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爹娘和疯大爷……新娘子也吓哭了，说：你这是干啥子哟！俺不走了，俺嫁给你。

可是等到书元站到板凳上去解那根吊头的绳时，发现二呆结的是死结，根本吊不死的，他便骂开了：你跟谁学的这一套！早知道这样就不救你，吊不死也让你受一会儿罪！新娘子也骂，说：我心都软了，想着你敢为我死，脸长得丑点就算了。哪晓得你入丑心也丑。真是孬种，孬透了！书元嫂子说：你可别骂他的“种”，书元和他是一个“种”，书元一点也不孬。新娘子红了脸，连忙道歉。

新娘子非走不可，书元两口子便把她送到汽车站。临别的时候，新娘子竟有点依依不舍起来，说：你们都是好人，我以后还会来看你们的。

新娘子一走，二呆就长虫似的躺在堂屋的地上愜气，骂也好，劝也好，就是不起来。书元气极了，便说：有劲儿你多闹，没劲儿你少闹，从今以后，没有人再管你的事了。说着，他就拉起书元嫂子，说：走，我们走，把这个家交给他。

书元两口子到了我家里。我和高凡自然是劝他们别和二呆一般见识，我们认为二呆自从在六0年吃了死人肉以后心理上就有了病态，应该把他当做病人看待才对。

谁知我们还没说一会儿话，二呆就在村里闹起来，已经是阳春天气，很暖了，他却把疯大爷留下来的一件破棉袄穿在身上，把疯大爷的呱哒板也找了出来，学着疯大爷的样子在场地上扭唱起来。他唱：

叫乡亲，听我讲，
书元两口子不像样，
二呆是他们亲兄弟，
不管不问为哪桩？

唱了这一段，他摸摸自己的头脸又摸摸自己的瘸腿，再唱：

叫二呆，你别哭，
我看你有晚来福。

又有钱，又有屋，
又有女人赛珍珠。

二呆疯了！疯大爷附到二呆身上了！村里人一边看一边说。书元又急又恼，上去一把抓住二呆，恶狠狠地说：不许你装疯卖傻！我要揍你了！可是二呆挣脱了他，照样扭扭捏捏唱：

说我疯，我从来疯，
我不属民国属大清。
问我年纪有多大，
不多不少一百整。

书元的脸“刺拉”一下变了，变得惨白惨白。他从二呆的身边退回来，退到场边上，两手抱住头蹲了下来。我走上前去问：书元哥是不是病了？他声音发抖地说：翠儿，我该死，今天是疯大爷的生日，我忘了。疯大爷怪我了！

我安慰他说：你信那一套？我看二呆是装。叫他装好了，他把心里的气泄完了，也就好了。

可是书元不信我，他说：二呆不是装，你看，他的眼神多像疯大爷！我去求他……

我拉都拉不住，书元跑到二呆前面，“扑通”一声跪下了，叫着：大爷，大爷，你救救二呆！救救二呆！不是我不管他呀，是他自己不争气。不信你问问村里人，你问问……

二呆怔了怔，看着书元。但是马上，他又从书元身边跑开，又扭又唱起来，并且要向村外跑，被几个年轻人拖住了。有人说他真疯了，应该把他绑起来，找猪血或狗血往他身上一泼就好；又有人说，是疯大爷惜身还魂，给他烧炷香就行了。书元发呆一样地蹲在地上没有了主意。还是下了台的张队长拿了主意，他说：

放了他！放了他！他真疯也罢，假疯也罢，随他去！他爱往哪跑就往哪跑，他活着，还是个人；死了呢，就是个鬼。是死是活，全看他的造化了。

那几个人就把二呆放了。二呆用和疯大爷一样的目光看看大家，就一颠一瘸地跑出了村子。

书元看着跑远了的二呆，当着众人的面捶胸顿足地痛哭起来，说他对不住死去的爹妈。众人劝他：你该做的都做了，对得起他们了！现在的农村里讨不到老婆的男人多着呢，也没见都像他那样疯疯魔魔的。书元这才止住了哭。

三十五

德儿真的没等到穿单衣的时候就去世了。玉儿回到上海以后，是努力买药回来的，但是那一段时间不知为什么，既没信，也没有药。德儿终于像耗尽了油的灯似的，慢慢地熄灭了。才三十五岁。

在她临终的那几天，她妈一直和她在一起。那天半夜，她突然自己起来了。她妈问她干什么，她没说话，却自己穿起衣服来了。她穿上了棉袄，再去穿棉裤，但是她的腿已经抬不起来，手抓了几次，棉裤还是掉到了床下。她妈端着煤油灯照着她，她两眼泪汪汪地看着她妈，还是不说话。她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她丈夫用架子车连夜把她拉到宝塔集公社医院，可是她在路上就断了气。

美丽的德儿，只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个可爱的男孩就走了，甚至连话也没有留下几句。这些年，我已经经历了多少熟人和亲人的死亡，但是德儿的死讯给予我的震动是无法比拟的。我不愿意相信，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在玉儿得信回家的时候，已经过了德儿的“五七”。我和玉儿一起下了德儿的坟地。玉儿妈也要去，大家都不让她去，只有舍儿陪着咱们。

这一堆黄土下就是德儿了，她像往常一样不吭不喘，静悄悄地不引人注意……

玉儿扑倒在坟堆上，两只手深深地插进黄土里，怎么也拉不起来。她不说话，也不叫喊，只是饮泣。舍儿在一旁不停地说：三姊，该回去了，爸妈都不让我们在坟地里呆得太久了。可是玉儿不听，把手里的黄土抓得紧紧的。我说：玉儿，玉儿，你大声地哭吧，大声地哭啊！玉儿的头在坟堆上摇着：不，不，不！但是她终于嚎出来了！我紧紧地抱住了她的肩头……

天渐渐地暗了，舍儿催促道：姊，该回去了！玉儿还是不理，更大声地嚎叫着，舍儿终于忍不住，双膝一起跪倒在坟前，和玉儿一齐痛哭起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他们，因为此刻我也想嚎叫，像狼一样地嚎叫！

玉儿！舍儿！翠儿！

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我们身后咻咻地叫着，我回过头去看，竟是小群！她手里挽着一个竹筐在离我们不远处站着。我吃惊地问：你怎么来了？玉儿和舍儿也止住了嚎，但是并不回头。

昏暗中我看不清小群的脸，只觉得她完全像一个老太婆了。她说她的家就在离这里把路的庄子上，她听庄上人说有人来给德儿上坟，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哭得很伤心，就猜到是玉儿回来了，所以来看看，想接我们到她家去歇歇。

我问玉儿和舍儿要不要去坐一会儿，舍儿说，不行，天已经黑了，家里要不放心的。小群也不强留，只说稍等一会儿，大傻子来送你们回去。果然，说话间，大傻子提着马灯，拉着架车来了，一定要我和玉儿坐在车上让他拉着，说几里路呢，我拉着走得快些。我看玉儿哭得两眼红肿，晚上又有点风，怕她病了，也就动员她和我一起坐上车，让大傻子和舍儿轮流拉着。路上我问大傻子，小群现在过得怎么样，大傻只说了四个字：一言难尽。

大傻子把我们送到玉儿家，茶也没喝，就又拉着车走了。我自然要在玉儿家住一晚了。

玉儿回到家，一直不说话，只呆呆地坐着。她爸她妈怕她伤心过度，都故意不问上坟的事，张罗着要我们吃饭。我们谁也吃不下去。玉儿妈把德儿的儿子小孬子递给玉儿，说：抱一会儿孩子吧。他爸一个男人咋能照顾他？我先帮他领着……玉儿木然地接过孩子，孩子竟然对她笑了。玉儿受不住孩子的笑，又哭了起来。这一日，一家人一起哭了。玉儿妈一边哭一边后悔，说自己以前对德儿疼得不够，德儿小时候把她打得太厉害了。叫她也不说话，问她也不说话，我不知道孩子生成这样的脾气，只知道抓过来就打。我的老实的孩子呀！我的受尽委屈的孩子呀！你妈对不起你呀！

要不是舍儿忍住泪，把牙一咬说：“都不许哭了！她是短命鬼！她是来讨债的，让她去吧！”一家人还不知要哭多久。顾维舜擦了把脸说：认命吧！命中注定我有一个女儿要夭折，如今已经应了，其他的孩子能平平安安就好。玉儿听了父亲的话，站起身说：我先去睡了，翠儿跟我挤挤吧！

我们睡在舍儿父子的房里，他们在堂屋里临时搭了个铺。玉儿脚也不洗就躺下了，把手枕在头下，两眼望着屋顶。我在她身边躺下，劝她说：玉儿，德儿已经死了，还有一个孩子需要你帮助照顾，你可要爱惜自己啊！不劝还好，一劝，她又伏在枕上啜泣起来了。

我觉得玉儿还有别的心事，便问：迎波的爸爸还没有结案吗？

玉儿使劲地摇着头，小声地说：翠儿，我不敢在这个时候给父母添心事了，可是我现在进退两难，简直不知应该怎么办才好……

原来他们夫妻的感情出了问题。

她和他的丈夫本来是可以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的，可是“革命需要”偏偏把他们分居两地。他们结婚多年，又有了迎波，可是他们却没有家。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只能在集体宿舍里凑和着过。他们像客人似的互敬互重，夫妻的情分却比水还淡。这样，生得漂亮的丈夫就不断地受到别的女性的包围，而他的意志是薄弱的……一次，她去探亲，发现有一位女性比她更熟知丈夫有几件衬衫和几双袜子，她的心被刺痛了。回到上海，她立即要求调到丈夫那里去，可是她的领导吃惊地看着她：你还这么年轻，就迷恋小家庭？羞得她无地自容。这样的情况居然发生了三次，每一次她要求调动都落了空。

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虽然两个人都是“造反派”，但是造反派和造反派之间的距离是无法测算的。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情况，这个单位和那个单位也不相同。他们彼此的距离比以前更为遥远了。她不了解他的选择，因而也不能分享他的痛苦和喜悦。终于，他们像陌路人一样了。他甚至连孩子也不大关心了。

他隔离审查的时候，他单位的人来找她，用他的“桃色新闻”来刺激她和他划清界线，她当然没有这样做，但是她的心碎了！

翠儿，我现在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合不能合，离不能离，爱不成也恨不成，我该怎么办啊？她说。

我能拿出什么主意？我只能叫她等待，等待他的问题有个结果的时候，那时可分便

分，能合便合。

可是我害怕！德儿已经丢下了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难道我还能让迎波没有爸爸？这样父母怎么受得了？

迎波这时走了进来，她说姥姥叫她来跟妈妈亲亲，姥姥要领小孬子睡了。我和玉儿便不敢再谈下去。

迎波夹在我和玉儿中间，紧紧地抱住妈妈的头，用手去摸妈妈的脸，摸到了妈的眼泪，劝她妈：别哭了，妈，我长大了，我可以帮姥姥领小孬子，将来跟爸爸说说，把小孬子领到我们家里。她妈说：别胡说，小孬子有爸爸呢！她说：姥姥说了，不能把小孬子给他爸，他爸要给他娶晚娘，晚娘要打他……

睡在堂屋里的顾维舜听到了迎波的话，说：迎波，别跟你妈叙话了，你妈累了，让她睡吧！

迎波大声说：妈妈不困，她还在哭呢！我陪她说说话不好吗？再说，这么早就睡觉，我也睡不着。

顾维舜说，睡不着到姥爷这里来，姥爷跟你数数玩儿。

迎波爬起来去了。

顾维舜说：我们从一数到三十，一个人一次可以说一个数或两个数，一替一次地数，三十这个数轮到谁头上谁就输了。

于是迎波和她姥爷玩起了数数，一连数了两次，“三十”都轮到她了，她叫起来，说：姥爷坏！算得快！我不玩了。她叫得太响，把那屋里刚刚睡着的小孬子吵醒了，她姥姥吵起来：坏！不知道小孬子睡着了？德儿死了，人家哭还来不及呢，你们咋这么高兴呢？顾维舜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唉！看你这脾气！我是觉得玉儿过分伤心了……

舍儿也大声地叹了一口气：唉！

玉儿用力地翻了个身，突然大叫了一声：哎哟！

我吓得连忙爬起来，问玉儿怎么了，玉儿说：只觉得突然间天旋地转，像有人倒提着我的双脚拼命地甩，哎哟，我要呕吐……说着她就趴到床沿上，一个劲地呕吐起来。吐的都是清水。

一家人都惊慌失措，不知道玉儿得了什么病。玉儿呕吐了很久，肚里再也没什么东西好吐了，便又睡了下去。她对家人说：没事儿，只是觉得头晕得厉害，睡一夜就会好的。乡下晚上又没办法去请医生，也只好等第二天再说了。

第二天，玉儿依旧是头晕，头也抬不起，眼也不敢睁。吃也呕吐，喝也呕吐。这可把顾家人吓坏了，不知道这是什么怪病。

玉儿不让去请医生，她说这毛病在上海时已经发过了，医生说叫“美尼尔氏综合症”，没什么药可以治的，睡几天就好。可是他爸说：这样不能吃喝怎么行呢？身子受不住呀！我说最好输点液体进去。

除非送到宝塔集去，乡下哪有输液的设备呢？可是玉儿说什么也不肯到宝塔集去。说去一趟要花很多钱，不值得。没办法，只好到附近的兽医站去想办法。兽医倒很热心，把自己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橡皮管接起来，用一根木头绑了个吊瓶的架子，给玉儿输了一些葡萄糖和盐水。几天之后，玉儿的病也居然好了。

顾维舜说：谢天谢地，从今以后啥都不求，只求一家老少平平安安了！

三十六

乡下的日子，说慢也慢，说快也快。收几次小麦，割几茬水稻，几年就过去了。舍儿成了老大不小的光棍汉了。

革命还在一波一波地向前发展。批判了林彪批孔子，批完了《水浒》评《红楼》。一会儿山穷水尽疑无路，一会儿峰回路转又一村。一会儿莺歌燕舞，一会儿“不须放屁”。伟大领袖的艺术构思越来越进入随心所欲的境界，似乎永远也不会有“江郎才尽”的时候。不过，和“大跃进”时一样，人民群众都没有能够真正进入这个伟大的头脑，在他的伟大而精妙的构思中，人民总是只扮演一个角色：勒紧了肚子跑龙套，而且不停地跑。十亿龙套团团转，主帅自然显得威风，场面自然十分热闹，各种各样充先锋、

扛帅旗的角色自然要陶醉了。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个人称孤道寡，几多乐趣！

但是，舍儿，顾家的唯一的男性后代，可不能称孤道寡啊！所以，在大世界的舞台还在紧锣密鼓地继续攻城陷阵，企图直捣黄龙，清除君侧的最后的威胁的时候，顾家人只能捂起了耳朵，懈怠了脚步，尽心尽力地找起媳妇来了。

邓小平“棉里藏针”，“人才难得”，向伟大领袖作出了“永不翻案”的保证，又重新上了台。可是不到一年，据说他又刮起了“右倾翻案风”，和宋江成了一匠之貉，被推下了台。这件事在宝塔集也有点小热闹，艾书记又一次下到宝塔集，想按邓小平的指示，对宝塔集作一番“整顿”，可是还没等他制订好整顿方案，邓小平又消失了。有人想趁此机会“整顿”一下艾书记，给他个“右倾翻案”的罪名，“下放户”更是积极，想把这位艾书记推下去，可是终于因为抓不住艾书记的具体罪证而宣告败北。艾书记还是县里的一位好领导。他在宝塔集立下的种种功勋是不可磨灭的。

所有这些，顾维舜都从广播喇叭里听到了。可是听到了就听到了，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如今是一个一贫如洗的农民，和其他的农民一样，为找儿媳妇作难呢！

难就难在舍儿想找个识字的姑娘。可是农村里有几个识字的姑娘呢？即使有，也都向往着嫁到城里去，舍儿又不可能重回宝塔集。进大学、参军、当工人，是农村人变为城里人的可靠通道，可是这些都没有他的份儿。舍儿有文化，又长得一表人材；舍儿的父母人缘好；舍儿还有个姊姊在上海，这些都是乡下人少有的优越条件，可是所有这些条件都被他的不光彩的家庭出身抵消了。如今选人只选“色”不选“才”，红的就好。

舍儿只好宣布：我要打一辈子光棍，天仙下凡我也不不要了！可是宣布归宣布，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他的父母不敢问，只觉得这个儿子变得折磨人了。

二十多岁的舍儿好像越来越小，喜怒无常，蛮不讲理。他常常莫名其妙地向父母发火，向所有的亲人发火。最叫他的父母不能忍受的是，他和迎波和小孛子也计较起来了。一次迎波在灶洞里烧了两个红芋，想一个给自己，一个给弟弟，他却把它们扒出来吃了。迎波问他，他横眉竖眼地说：我吃了！你想咋着我吧！迎波说：我打你，坏舅舅！迎波不过是说个“打”字，当舅舅的却真的动手了，他打了迎波一巴掌，还说：看谁打谁！迎波哇哇地哭，叫着“舍儿”的名字骂，说：什么舅舅！舍儿！比四类分子还要坏！口齿不清的小孛子也跟着骂舅舅，说：“舍儿，你咋不死！”“死”字被他说了成了“挤”字。舍儿被两个小辈叫着小名骂，大火了，居然要去打小孛子，还说：你们一个个都给我滚回自己家里去！我们自己都挣不上吃的，还养活你们！眼珠子都没有了，还要眼眶子干什么？

这一下惹恼了玉儿妈。这两个孩子是她的宝贝，谁也动不得一指头的，只是因为体谅儿子，她才忍了很久。现在从屋里跑到院里，站到儿子跟前，说：打吧！打我！两个孩子是我要领的！没吃着你的闲饭。迎波妈寄钱来，孛子爸送粮来，我把你养活了这么大，你中了我啥用？谁欠了你的了？你一天到晚发不完的火？顾维舜也看不下去。说：做长辈要有个长辈的样子，怎么能这样对待小孩子？亏你还念了十来年的书！你这样，非把我们气死不可！

舍儿又羞又愧，又不肯认错。他不敢对他妈发火，便对他爸说：你要气死也活该！没有你我还会到这个地步呢！可是没等他的父母辨出这句话的味儿，他就后悔了，他“扑通”一下跪倒在父亲脚下，声泪俱下，骂自己不是人，求父亲踢他几脚。顾维舜哪里舍得踢他呢？倒是忍不住老泪纵横，说：你说的不错，我还是死了好，死了就不连累你们了。吓得小孛子抱住他的腿，说：“姥爷不挤（死），舅舅挤（死）！”

老两口实在被儿子磨害够了，便决定不顾舍儿怎么说，都要给他娶一个老婆。正好女队长托顾凤莲来提亲，要把她的娘家侄女说给舍儿。玉儿妈一直不喜欢顾凤莲这个“干闺女”，虽然顾凤莲对他们非常好，努力做得像亲闺女一样。玉儿妈嫌顾凤莲不安分。一四十来岁的人了，还喜欢跟男人打打闹闹，有时候背着丈夫偷鸡摸狗的。去年冬天，二呆串到这个庄上来，说是“行医”，三下两下，顾凤莲就跟他搭上了，干姊干兄弟叫得血亲。村上人对此说长道短，玉儿妈觉得自己丢了脸，几次要撵二呆，不许他再到这庄来，可是二呆脸皮厚得尖刀也划不出印子来，依旧是说来就来。

可是现在顾凤莲来给舍儿说媒，玉儿妈却还是高兴的。几年下来，玉儿妈对女队长已经有了了解，觉得这女人不赖。风风火火、直来直去，没有坏心眼儿。女队长的娘家侄女也到这庄上来过，玉儿妈也见了，长得还可以，就是皮肤太黑，搽进炭堆里都不一定还能拣得出来。还有就是眼小，像手指甲划出来的细细的一条缝，看人的时候眼珠子

在两条眼缝里滴溜溜转，像藏着多少心计似的。按说，不大如意。可是一想到儿子的情景，玉儿妈还是勉强作了主，叫顾维舜买了四色果子四色糖，准备下彩礼。

总得让舍儿和那姑娘见见面呀！要不然我们不是包办儿女婚姻了？顾维舜说。

当然要见面！玉儿妈说。她把儿子叫到身边，又是劝又是哄，又是哭又是啼，求儿子为当爹妈的想想。舍儿经不住这样的恳求，便答应去看看再说。于是玉儿妈特地到宝塔集给姑娘买了一套衣服，叫舍儿带着去当“见面礼”，并与顾凤莲说好，第二天吃了早饭就去。姑娘不住在本庄，离这里有十几里。

谁知第二天顾凤莲出了丑了。天还刚刚放亮，就听见她男人敲着瓦盆哇哇地叫：快来看呀！快来看呀！干姊和干兄弟多亲热呀！

顾家人赶到顾凤莲家的时候，她的家已被庄上人团团围住，问出了什么事。

顾凤莲的男人继续敲瓦盆：进去看呀！进去看呀！看看洞房弄得多漂亮！

于是男人女人们一起朝屋里挤，原来顾凤莲和二呆都衣衫不整地在床上坐着，顾凤莲咧着嘴，笑不像笑，哭不像哭，二呆吓得浑身发抖。

顾凤莲的男人跟进屋里，叫大家往墙上看，往帐子里看。

墙上贴了许许多多的画纸，都是俊男娇女胖娃娃，不知是从哪里找来的。本来乡下人有用画贴墙的习惯，既实用又观赏，一举两得。不过这几年只能买到样板戏的画纸了。现在看到这样的画，就不啻以前看到春富图了，所以招来一阵“啧啧”之声。

钱三文挤到前面掀开了帐子，蓝粗布的帐子上也贴满了画儿，还有一幅红纸剪成的鸳鸯戏水。帐沿上也有小玩艺儿，都是纸剪的，双飞的蝴蝶儿，嘴对嘴的燕子，小灯笼啦，小花朵啦，五颜六色。

钱三文咂着嘴，说：啧啧，真个是男欢女爱，其乐无穷啊！噢，不，不！是腐化堕落，腐化堕落！亏他还是个瘸子呢！

男人们哄笑，女人们咂嘴，问顾凤莲的男人：咋回事儿？咋回事儿？

顾凤莲的男人说：这几天我去河北走了一趟亲戚，昨天天黑回来了，她不叫我进屋，叫我到场上去睡，我当她跟我怄气……

男人女人一齐笑了，说：可不是跟你怄气！你没本事啊，连个瘸子也不如……

顾凤莲的男人被激怒了，他冲上前一把抓住二呆，说：看我不打断你的那条腿！

男人们说：打断腿没用，要朝要紧的地方打！打呀！打呀！顾凤莲的男人正要下手，顾凤莲一把把二呆拉了过来，用自己的身体挡住，说：你敢！你敢！你动他一指头我就跟你离婚。她男人不敢再动，自己蹲在地上哭起来！

钱三文说：这还得了！上人家家里搞腐化了，送公社！把二呆送公社会！

一直躲在门外不敢进去看的顾维舜这时候站出来说情了，他向大家又是作揖又是鞠躬，说二呆有病，怪自己没有照顾好这个亲戚。这一回就饶了他吧，下不为例。玉儿妈骂道：要你多管闲事！给他送到公社会！教训教训他！顾维舜说：这又何必，这又何必！

钱三文又出来卖乖，他对几个真要对二呆动手的年轻人说：看在老顾的面子上，就饶了他这一回吧，不过要叫他买挂鞭炮在凤莲家门口放放，再买个公鸡杀了，把鸡血洒在凤莲门口，冲冲晦气。

二呆从床上跳下来，在顾凤莲的男人面前跪下，叩头如捣蒜，说：都依，都依。可是顾凤莲的男人说，不要放炮了，也不要杀鸡了，只要把钱拿出来就行。二呆马上掏空了自己的口袋。

一场风波就这么结束了。舍儿的亲事也给耽误了。本来女队长可以代替顾凤莲的，但是女队长有点架子，说求亲应该找媒人。舍儿也就顺势推托起来，说：我本来就不想去求嘛！拉倒吧！为这事儿，玉儿妈跟顾凤莲断绝了来往。

三十七

高凡的劳动惩罚期早已满了，可是学校迟迟不召他回去，一直到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上台整顿的时候，学校好像才想起还有一个高凡在乡下。把他召了回去。在高凡劳动惩罚期间，每月只发给他二十五元生活费，我们又添了一个女儿，双方的家庭又都要补贴一点，生活是相当清苦的。但是全家平安！高凡回校后没有让他上课，叫他管理学校那个小小的图书阅览室了，这正合他的口味。所以我们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若是和村上的其他人相比，简直算得上富裕户了。几年文化大革命，给农村带来的贫困虽然不能与“大跃进”相比，却也够农民受的了。城里人却忙着“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就落到了农民头上，不但要种地，还要修水利，省里要挖一条新河，每年都要抽大量的

民工到工地上去，而且都是无偿劳动。还有各种各样的非生产人员——宣传员、卫生员、民办教师，要农民养活。所以，农民辛苦一年，分到家里的东西却少得可怜，又到了饥饿的边缘。

书元这个队长是不容易当啊！男人们为了吃饱饭，都愿意去挖河，因为上头有规定，河工的口粮不许克扣。地里活便只好靠女人和老人了。他几次想撂下担子不干，可是下了台的老队长不答应，说没有别人会比他干得更好。

自从知道顾维舜一家不幸遭遇之后，书元一直说，要去看看他们，也认认亲。可是一直抽不出空。还是舍儿先来了，并且带来了二呆的消息。听说二呆在舍儿他们那一带行医，书元两口子也不挂念了。二呆原来与书元同时被父亲卖掉，而且卖给了顾维舜的姨母当养子，这使书元很感到屈辱，他怎么能叫自己弟弟做表叔呢？如今二呆的养母早已去世，这一层障碍也不存在了。书元相信，二呆在顾家人身边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可是冷不了地，二呆又回到张庄来了，而且带来了干姊妹顾凤莲。开头几天，书元夫妇听说顾凤莲是顾维舜的干闺女，便也不见外，以礼相待，还要将自己的房让给她住，自己夫妻睡厨屋。可是顾凤莲说啥也不肯，结果是二呆让出了自己的房，自己住到厨屋去了。可是过不了几天，书元夫妇就看出了蹊跷，原来二呆根本没有住到厨屋里。于是他们对顾凤莲下了逐客令。可是顾凤莲口里答应着，却一日一日地赖着不走。没办法，书元决定亲自把顾凤莲送回去，顺便也看看顾维舜他们。

可是没等到书元动身，顾凤莲的男人就找来了。他先找队长，等到知道队长就是二呆的哥哥时，便苦苦哀求，要书元放他老婆回去。书元觉得脸都没处搁！他对顾凤莲的男人又是赔礼又是安慰，叫他在我家里等着，他马上回家把顾凤莲弄来跟他回去。顾凤莲跟书元来了，可是，见到自己的男人就骂，说那男人没本事，跟着他活受罪，受人欺。她发誓赌咒不跟男人一起回去，宁可一个人去讨饭。那男人竟然被骂得说不出话来，只会苦苦哀求：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书元嫂子恼了，她对那男人说，我看你也就是没出息。女人是你的，不回去你就打。专打她的下半截，叫她站也站不起来，就再也不敢跟野男人跑了！

二呆这时正好也来了，冷不丁地接过嫂子的话，说：嫂子，什么家男人野男人的？忘了你当年在郝庄和郝队长的事了？

书元气得跳起来，抓住二呆的胳膊，抡起了拳头。可是不等书元的拳头落下来，顾凤莲就把二呆从他手里夺过去了。她的男人又忙着去拉她，二呆趁势往地上一倒，像是又要发疯。只见他脚踢手刨，口吐白沫。顾凤莲见他这般行状，竟然不顾自己的丈夫和闻讯赶来看热闹的众人站在眼前，扑倒在二呆身上大哭起来。还“心肝、宝贝”地叫着，弄得我和高凡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只好跑到院子里站着，不知如何是好。由他们闹去。

我和高凡都被这种场面惊呆了。我们头脑里关于男女关系的种种定义都难以解释眼前的现象。倒是站在我们旁边的两个老太婆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只听见她们中的一个对另一个说：没见过这样的，这就是广播里讲的什么爱情吧？另一个摇着头，咂着嘴，一脸的鄙夷，回答说：可不是！这么不要脸，不是爱情是什么！我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了起来，高凡也笑了。别的人看到我们笑，也笑起来。

这么闹下去怎么收场啊？我忍住笑对高凡说。高凡耸耸肩，说：这种事儿，谁管得了？

幸好，这时广播喇叭突然响了起来，不是常规的广播时间，肯定出了什么大事，或者又有什么特大喜讯了。哭的、叫的、笑的、闹的，一齐停了下来，竖起了耳朵。

真想不到！

红太阳陨落了。一颗伟大的心脏不跳了。

我和高凡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说不出心里的情感是滑稽还是崇高。别的人呢，也一阵“哎哟！”说不出更多的话。

叫他们别闹了，让女人跟那男人回去吧，这种时候再闹，要出毛病的，高凡小声地说。

我走过暂时缄默着的人群，进屋对书元说：别闹了。谁知我这个人这么没出息了，不能听哀乐，一听哀乐就要流泪，不论它是为谁而奏的。所以，我一句话没说完，就泪下如雨了。哀乐不停地放，我的眼泪也不停地流。而哭是有传染性的，乡下人更是见不得别人哭。于是，在我的传染下，顿时响起了一片哭声。顾凤莲的哭声最高，还抱着二呆一声一声地叫。书元向她大吼一声：还不快滚回家去！否则把你抓到公社去，说你破坏！顾凤莲终于被吓住了，她放开了二呆，但仍然哀哀地哭着。她男人趁机扯了扯她的

衣袖，说。毛主席都死了，你还不回家吗？回吧！我不打你。她挣了两下，男人不松手，她也就不挣了，一步挨一步地和丈夫走了。

二呆还在地上躺着脚踢手刨，大哭大叫。但是再也没有人管他了，因为听着哀乐看他这番表演，心里一点也不觉得别扭了。我头脑里还闪过了一个罪恶的念头：可惜现在上头对汇报不那么感兴趣了，不然我可以编一期生动的汇报了，全村男女老少一齐恸哭啊！高凡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对我摇了摇头。他这个人，一颗泪珠也没掉！

三十八

一九七六年十月在中国发生的那一场惊天动地的变故，宝塔集人像往常一样轻而易举地接受了。没有人表示意外，也没有人早就料到。没有人欢喜若狂，也没有人痛苦惋惜。更没有人想到要像上海的某些人那样准备动刀动枪去“誓死捍卫”。“假老婆”通知大家上街游行庆祝，大家也都去了，高呼“打倒四人帮！”和“坚决拥护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华国锋有些猜测和议论，但都不得要领。只说他的头发和脸盘和故去的老人家有点像。

一切都不是自己的事，只不过提供了不少谈话的资料，使长期死气沉沉的人们一时又活跃起来了。

在确信“四人帮”已经垮台之后，顾维舜又开始卖弄起自己的学识来了。乡下人不懂为什么“皇后娘娘”也是坏人，他就跟他们谈妲己，说褒姒，还摇头晃脑地背出两句诗经来，什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钱三文更不用说了，肚子里装满了女人祸国的故事，他又摆起了说书摊，在场地上说起《封神演义》来，单说那妲己和比干的故事。妲己长得实在美，如何美，请看：那是头那是脸，那是鼻子那是眼，樱桃小口一点点。等到男人们都被他说得心里痒痒的，痴痴地、哄哄地笑着，钱三文便把手一拍，说道：纣王得了这样的美人儿如何不终日淫乐？那丞相比干见纣王与妲己终日淫乐，不理朝政，谏曰：“不修先王之典法，祸至无日。”纣王不悦，妲己便乘机向纣王吹起了枕边风，她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窍，比干是圣人，何不把他的心剜开来看看呢？纣王听罢，马上就把比干的心剖了。这之后就有了武王代纣和姜子牙钓鱼的故事。钱三文还会讲武则天和西太后，真叫乡下人大饱了耳福。不过，乡下人到底是乡下人，不会举一反三，将古比今，在他们的脑子里，江青和以往那些女人还是大不相同，说她不像妲己，因为没有把丞相的心剜去，她跟总理常常在一起；说她不像武则天，因为她没当皇帝，她只是“亲密的战友和学生”；说她不像西太后，因为她身边的男人都没割过。钱三文只能笑自己的听众太无知了。他说，要害丞相何必去剜心？像曹操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比天子还厉害吗？现在的女人怎么能喜欢割过的男人呢？

顾维舜去听过几次钱三文的故事，但终于不敢再听，也劝钱三文不要再说。他说：三文，现在的事儿不能和过去比呀！过去是封建社会，如今是社会主义社会，要比出毛病来的。十年前批判“三家村”和《海瑞罢官》为了啥？借古讽今！我们还是管管自己的事情吧！说那些闲书干啥呢？

钱三文对顾维舜还是有些佩服的，所以不再说古了。再说，他也该管管自己的事情了。形势一变，上上下下都乱了，他的“毛泽东思想宣传员”也当不成了。吃饭成了问题。他便往公社跑，蹭上一顿饭，讨回几个馍，混着日子。而他的老伴，便只能半饥半饱地活着。

顾维舜家里的事也不妙。舍儿又提了一门亲，差不多要定下来了，可是没有钱下彩礼，更没有钱迎娶。虽然女方一再表示，什么都可以从简，可是床总要买一张，被子也得买两条，两个新人也得做两件新衣服吧？可是看看顾维舜一家人现在吃的和穿的，住的和盖的，和叫花子差了多少？吃的不说了，就那么回事儿，一天两顿，凑合着。穿的更不能说，一家人从下乡到现在没添过一件新衣服，多亏玉儿妈手巧，缝缝补补，一家人才不至于露皮冻肉。床上的铺盖已经不能叫作被褥了，一张床上一条棉被，被面都是破了又补，补了又破的，棉絮硬得像铁疙瘩。垫的，玉儿妈和迎波是一条破絮，顾维舜和舍儿则是一张破狗皮，是从顾远山老头的皮袍上拆下来的。

不娶媳妇，凑合着也能活，可是要娶媳妇呀！到哪里弄钱去？几个闺女都帮不上忙了。大闺女孩子多。二闺女德儿去世了，她的丈夫差不多长年出外河工，省下粮食养活她抛下的儿子，够为难的了。玉儿拿工资，本来可以支持家庭，可是夫妻一直闹着别扭。她的丈夫隔离审查解除之余，她曾把迎波接去和丈夫一起过了一阵子，可是丈夫对她不和自己商量就把第二个胎儿流产这事儿埋怨不已，硬说她是故意气他的。两个人

憋着气，玉儿赌气不要丈夫一个钱，自己养活孩子。最近准备将迎波接走，说孩子的中学不能还在乡下读了。

要是在集上就好了，大家都会借钱给我。顾维舜常常说。每说一次，都要招来玉儿妈一阵唠叨：现在说这话已经晚了！当初我不让下来，你们谁也不听，你说可以多活十年，叫你去多活十年吧！弄得人不像人，家不像家！

每逢听到妻子的抱怨，顾维舜就闭着嘴巴不说话了。他真后悔，当初真不该下来，硬挺，十年也不是过来？现在他只能等待，等到哪一天上头发善心的时候想到他们，把他们重新召回宝塔集去。他觉得自己已经不能再受这样的折磨，他恐怕已经活不长久了。最近他已经不只一次地作梦，梦见他的父亲点着他的额头说：谨防六十四！他认为这是父亲“托梦”提醒他，他的阳寿快尽了。他今年已经六十二岁，还有二年，他希望死在宝塔集。

可是，他什么时候能回到宝塔集啊！

三十九

艾书记又一次垮了台！作为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物，他不但被撤了职，而且又被隔离审查了。对宝塔集人来说，这个消息比“四人帮”垮台要重要得多。宝塔集上的一些人又忙于“站队、划线”了，被艾书记整过的人思谋着翻案，做过艾书记帮手的人，小心谨慎地等待着厄运的降临。

“假老婆”的情况特殊。他整过艾书记又受到过艾书记的提携，现在虽说不是什么大官儿，却也是宝塔集上的一个重要人物。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廖！他脑子灵，转得快，立即想到了“下放户”。他一个人悄悄地在各个有下放户的村庄串起来，告诉“下放户”们艾书记如何如何坏，“当初我为你们说话，不赞成把你们下放的，可是他一定要下放你们！”他对每一家都这样说。

没有多少人再把这个“假老婆”放在眼里，艾书记都倒了，你个“假老婆”算老几？他不来解释倒还罢了，一解释倒让人记起他的许多行径来了，不肯给他一点好颜色。大年三十晚上，杨大傻子串通了几个下放户中的年轻人，扛着一个花圈和两挂鞭炮到了他门口，嚷嚷着：“假委员，我们给你辞岁来了！”“假老婆”满心欢喜地开了门，嘴里说着“不敢当不敢当”。鞭炮响了，吓了他一跳，这一串响完，那一串又响。他更大声地说着：不敢当不敢当。他邀大家进屋去吃花生喝茶，杨大傻子说，不进去了，假委员，弟兄们送你一样礼物，希望你不要见笑。“假老婆”又说：“不敢当，不敢——”第二个“不敢当”没讲完，黑影里走出两个人，把大花圈放到他的大门边了。一色的白纸花扎的花圈，中间写着一个大大的“奠”字。

“假老婆”当时就吓哭了。他说：乡里乡亲的，这是干什么啊！老天爷有眼，不是我要把你们下放的。我要是背地里说过你们一句坏话，天打五雷轰，下到地狱十八层！哪有人听他！送花圈的人呼拉一下就走了，杨大傻子还扯开嗓门叫了一声“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

消息传到顾维舜耳里，顾维舜连说：这何必！这何必！“假老婆”固然不是什么好人，可是到底是土生土长的宝塔集人，自己人打自己人，这事儿不能做！

可是舍儿和爸爸不一样，他说：什么自己人？给他送个花圈算是便宜他了！要是我，给他送个死孩子去！

顾维舜吓得脸色都变了，说：干这事要折阳寿的！你千万不能干啊！

舍儿说：怕熊！折阳寿就折阳寿，我早就活够了！

玉儿妈也害怕起来，她看管着儿子，不许他到集上去给熟人拜年。可是那么大的小伙子哪能管得住，舍儿在年初一下午溜了出去，天黑透了才回来，喝得醉醺醺的，人们都睡了，他却扯起嗓子唱起了“样板戏”：黄浦江呀，黄浦江，你千年流，万年淌，流不尽我们仇满怀来恨满腔！他爸妈问他上哪去了，跟什么人一起喝的酒，他不说，他要睡觉，明天还有要紧的事儿呢！

第二天，舍儿睡到小晌午还没起来，宝塔集上就传来了消息：今天一大早，“假老婆”一开门，一个死孩子头朝里脚朝外地倒在他屋里，他当场吓得昏了过去。现在人醒过来了，可是不敢在家里住了，和老婆一起到老岳家里去了。公社革委会说这是反革命破坏，正要查呢！

顾维舜老两口吓死了，他们断定是儿子和什么人一起干的，便推醒了儿子，进行盘问。

哈哈！是谁和我想到一条道儿上了？舍儿听了哈哈地笑。

不是你干的？爸妈问他。

我？我上哪里去找死孩子啊！他回答。

那你昨天在谁家？

黄山老岳家。

蹲半天吗？

对，商量大事。

啥大事？

串连下放户，找领导算账，活不下去了。

又要闹了啊？顾维舜问。

又要闹了，舍儿肯定地回答，不闹不行，不闹没人理你。我们要凑钱，选代表到省里去，告状，上访。

你可不能参搅！顾维舜说。玉儿妈也说。

儿子反问他们：你想不想回到集上去？我已经跟黄山哥讲了，咱们卖裤子也要出一份钱，人家闹成了，咱有脸跟人家一起回去？

要是闹不成呢？顾维舜问。

舍儿跳起来：闹不成就死！死也比现在这样活着好！你们不要管我，要管也管不了！

玉儿妈说：好吧！不管你。可是话先说明，要是闹出了事儿来，我就把你关在家里。顾维舜见妻子松了口，也就不敢再拦了。

舍儿当天就上集找黄山去了。

四十

这一次“下放户”上访，黄山成了挑头的。他已经一个人暗中作了许多调查和了解，满肚子都是“下放户”的悲惨故事了。这是许多人都没料到的。哑吧蚊子会咬人，不声不响的人才能干大事，人们都这样说。

黄山要在宝塔集上召集“下放户”开会，商量有关上访事宜。这行动半是公开半是秘密，公社的革命委员们也不知道，文革中搞的下放运动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如今许多事儿都在翻个儿，谁知道哪些事儿该翻，哪些事又不该翻呢？

宝塔集人对于黄山的突然出现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惊奇。他们相信，只要是宝塔集人，不管走到哪里最后都会回到宝塔集来的。“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在他们的心里，淮河两岸是中国最好的地方，而在淮河两岸，宝塔集又是最好的地方。宝塔集的日子苦，别的地方一定比宝塔集更苦。

没有人想到要问问黄山，你为啥要挑这个头？有人挑头就好，问什么呢？黄山说，先要凑起一份材料，统计一下宝塔集一共下放了多少人多少户？有多少是老弱病残的？有多少是有固定职业的？还要调查这些年“下放户”在农村的生活，有多少过得还可以的？有多少缺少少穿的？生了多少死了多少？多少是老死病故的，多少人是投河上吊的？黄山说，把这些材料凑齐了，我们就写一份请愿书，让代表送上去。

大家都觉得黄山这人很仔细，靠得住，信得过，所以说，你看着办吧，你叫俺们干啥就干啥。

咱可要齐心啊！黄山说。

那当然。大家回答。

闹成了，大家都有好处；闹不成，大家也别怪我啊！黄山说。

那当然。大家回答。

黄山很高兴，他叫舍儿跟着他一个村一个村地去调查，画表格，写报告。舍儿很起劲，好像当初和高凡一起了解“大跃进”饿死人的时候一样。可是顾维舜害怕，他说这又像造反的时候了，政府没有叫你们干，怎么可以于呢？可是舍儿如今更不相信爸爸了，他说：我豁出去了！

黄山和舍儿熬了几夜的灯油写成了一份厚厚的调查报告和一份请愿书。为了核实材料，又一个村一个村地向“下放户”把材料念了一遍，很多人都觉得写得还不够苦，黄山说：行了，把事儿写清楚，诉苦的话就少说几句吧！

到了大家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时候，谁也不肯把名字写在前头。黄山只好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第一，下面紧跟着杨大傻子和舍儿。叫顾维舜把名字写在舍儿下头，他却不愿意，说：我和大家不一样，我有问题，不要因为我一个人误了大家的事，一颗老鼠屎坏锅汤。

杨大傻子说：这样说，我也该把自己的名字抹掉？他又说：哪里哪里，你没问题。玉儿妈戳穿他说：他是害怕！我不怕，我没问题，把我的名字写上吧！要是有人问我签名，我就说想回集上娶儿媳妇，该不该死罪？

那时我正好在宝塔集，舍儿也来找了我，问我算不算“下放户”。我说我大概不算吧！我是因为当了右派被学校开除、遣送回乡的，到张庄，是我自己为了吃饭找去的。黄山和舍儿都拿不定主意。我说：不要管我吧！我和高凡现在过得还不错，如果高凡将来能甄别平反，我大概也可以调到县城去了。我说这些当然是为了安慰舍儿，其实我和高凡的生活也够苦的，三个孩子了。

我看到了黄山他们写的那些东西，也很自然地想起周纯一来鼓动高凡造反的时候带来的那本印着“绝密”字样的小书。把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把一件件浸透了血泪的故事，都化成了简单的数字。我不知道这些数字能不能打动一些人，给宝塔集人带来新的福音。周纯一还关在监狱里，我的父母都断定这一辈子不会再见到他了。我和高凡却还希望着，并且不停地把希望送给可怜的大姊。

黄山和舍儿动身去省城的那一天，几乎全体下放户都到汽车站去送他们，那情景真够动人。顾维舜原来不同意儿子当代表，现在看到这般光景，也高兴起来了。他大声地嘱咐着儿子：古人云，受人之托必忠人之事。要努力办事，切不可懈怠。钱一定要放好，都是大家的血汗钱，要一分一分地计算着花啊！

钱三文也拖着病歪歪的身子来了。他没有交出他应交的一份钱，但是他对大家说，等卖了老伴的那只羊，他一定补上。他听见顾维舜嘱咐舍儿，便用更大的声音去教导黄山，他说：如今你捧了帅印啊！我钱三文要是年轻十岁，非跟你夺这颗帅印不可。现在只能学徐庶走马荐诸葛了。你能行，这几年我看着你，觉得你藏才不露，将来可成大器。他又把舍儿从顾维舜面前叫过来，说：舍儿，你好比先锋官。要注意遵从帅令。军令如山，不是儿戏。你若是大意失荆州，诸葛亮便要挥泪……

钱三文还要吹下去，被呼叫而来的小群打断了。她披头散发地一把拽住黄山问：为什么不带我？为什么不叫我签名？杨大傻子把她的手从黄山身上拉开，叱责说：不是对你说过了，这一次是“文革”中“下放户”的上访活动，你不属于这一批。回家去！可是小群不听，她在大家面前跪了下来，苦苦哀求：我给你们叩头！我给你们叩头了！我挣不上吃的啊！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我啊！我变成什么样子了？你们也相信，永继是我逼死的？……

小群发疯似的诉说，一张脸一张脸望过去，大家都把头扭开了，大家感到为难啊！

顾维舜小声地对黄山说：能不能有个例外啊？孤儿寡母的。黄山咂咂嘴，说：其实，我也不是“文革”下放的……钱三文也不是

钱三文马上接过话茬，说：这不能比！你是主帅，可以例外。我是老弱病残，也可以例外。可是小群不行。和她们一起下放的还有很多人，是不是都带上？眼下只翻“文革”的案，把你们也带上了，事情办不成，怪谁？

小群大叫：那把黄山的名字也除掉！把钱三文的的名字也除掉！

钱三文害怕了，他可怜巴巴地看着大家，说：小群咋这么厉害啊！

黄山抓着头皮，说：大家说吧，不要我去我就不去。

眼看着一场大事会“黄”了，大家一起对小群发起火来，说：你不要歪死缠好不好！汽车马上就要开了！杨大傻从地上拉起姊姊，柔声柔气地劝：等下一批吧，姊！

小群挣脱了大傻子的手，大叫大喊着跑走了。那呼喊声中包含的愤怒和绝望，真像厉鬼，叫人颤栗。

四十一

黄山和舍儿在省里整整住了一个月，也没能轮上接见的机会。告状的人大多，排不上号。钱却已经花光了。无奈，他只得退而求其次，不求接见了，把请愿书和材料交到接待处就回来了。

那个接请愿书的人职位高不高？都说了些啥？他们一到家，附近的“下放户”就赶着来看他们，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地提出来。实在难以回答。等了一个月，就见到一个不知道名姓和级别的接待员，就得到一句话：这个问题是全国性的，将来会有统一的政策下来，你们急也没用。谁也不愿意相信，他们兴师动众地准备了那么久，费了那么多精神，流了那么多眼泪，又咬着牙交出一笔钱，就得到这么一个结果。不是太冤了吗？

于是埋怨向黄山和舍儿挪过来：

你们为啥不对上头说，我们熬不下去了？你们为什么不把当官的拉下来，叫他们来熬熬？他们当官的捱了一回整，又是哭又是叫，又是官复原职，又是补发工资的，为啥轮到我们就该等了？你们真的去找过他们了？

这是舍儿兴冲冲地当代表的时候所没有想到的。他受不了这样的责难。他对那些人来说：你们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他妈的什么世道！受了冤枉去告状的人简直像孙子！比孙子还不如！你求，你告，你磕头，你把头磕出血，根本没有人理你！人家说，全国都有这样的问题！都是“四人帮”造成的，你们应该回去好好批判“四人帮”啊！账都算在“四人帮”头上才对。我们老百姓认识“四人帮”是谁？我们又不是他们的大舅子、老丈人！我只知道“假老婆”和艾书记！我操他们的祖宗十八代！都是他们坑的！

顾维舜教训儿子：舍儿，这样说不对。大家凑钱要你们去办事，办成办不成，回来都要有个交代，要耐心地向大家汇报。

舍儿不服，跟他父亲吵：他们问我，我问谁去？大家凑了钱，我们贪污了？乱花了？旅馆都不敢住，睡在火车站里，像叫化子，身上都要生蛆了！为了谁？才到家，气也不让喘一口，就像审贼一样审起来了，谁受得了？

钱三文也来教训舍儿，他说：这就叫嘴上没毛，做事不牢。当初我就说，要掂掂自己的分量，没有金刚钻，莫揽破瓷器嘛！

你——！舍儿一个箭步冲到钱三文面前，恨不得一口将他吞下。可是他并没有动钱三文一指头，他只对钱三文跺了一下脚就从堂屋里跑出去了，他冲到自家的厨屋里，捧出一大擦碗来，大家以为他要让大家喝茶，哪知他把碗高高地举到头顶，用力往地上一摔，全摔碎了！大家慌了神，忙着出去看，出去劝，出去把舍儿朝屋里拉，可是舍儿朝前一扑，趴到地上哭起来了，还叫：我的妈呀！我咋想起来我管这个闲事！人是个什么东西！人是个什么东西！

玉儿妈见儿子被逼成这样，受不住了，她说：谁叫你们选他当代表的？记得你们选他的时候说过的话吗？你们说，办成办不成都不怪你。咋哩？吐下的唾沫能舔干，说过的话也能收回？事儿没办成，怨他有啥用？家里就这么多东西，都赔上够不够你们的？她坐在儿子身边，去拉儿子，说：起来！哭啥？记住，从今以后不要多管闲事！你老子就是多管闲事才当上右派的……

抱怨的人群被镇住了。钱三文把脑袋垂得低低的，唉声叹气。他记起了自己还没交钱呢；羊倒是卖掉了，可是钱也花光了。他这一阵子病得不轻，又吐了血……

问了半天的黄山这时才张嘴说话。他说：大家先回家好不好？让我跟舍儿歇歇。事情没办好，要怪就怪我，不要怪舍儿。不过，我劝大家还是等一等再说，请愿书递上去了，总有个回音吧！要是没结果，花了的钱，我慢慢地赔……

你赔？凭什么？黄山的老婆又吵起来了。她自从黄山上访，一直老老实实等在家里。她拉起丈夫的手：走！跟我回家！谁有本事让谁自己去！给大家办事有啥好处？还不如为为自己。

黄山甩掉妻子的手说：我这样做也是为自己。我要不争着当挑头的，还不是像杨小群一样被大家甩掉了？

谁小声嘀咕了一句：这叫不打自招。

招？招了啥啦？偷了抢了？黄山的老婆吵道。

顾维舜见吵吵个没完，说：算了算了，都别吵了，我看大家先回家吧！等他们两个歇过来了，再向大家汇报。两个年轻人做事说话不周到的地方，请各位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大家也只好回去了。

四十二

宝塔集人没有等到“下放户”上访的回音，却等到了周纯一！他像从天而降的飞将军似的来到了宝塔集。那是一九七九年的旧历腊月，人们都在准备过年了。

这两年，每年春节我和高凡都到宝塔集来，陪父母热闹几天，解解他们的寂寞。

周纯一的突然降临，使我们高兴都来不及。我们一家人几乎异口同声地问：你怎么来了？他还是那副蛮不在乎的样子，说：放出来的！我还能自己跑出来吗？怎么，关了十来年，你们还嫌少？上头咋说呢？父亲问。咋说？你回家去吧！以后要老老实实做人啊！就这么说的。他说。

回家了吗？我问。

没有。我一直就关在这个县里呀！先来找你们办件事，办完再回去。他说。

又有啥事啊？父亲担心他又出什么鬼主意。问他。

他向我和高凡(目夹)(目夹)眼睛：过年啊！给你们拜年啊！

这个不安分的周纯一啊！刚出了监狱他就要告状去，翻案去。他叫我和高凡替他写一份翻案材料。他说，我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老子从小参加革命，结果坐了两次共产党的大牢！我一定要弄清楚，到底是谁错了。

高凡说：上头不是说过，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向前看吧，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什么宜粗不宜细？屁！老子坐了两次牢，是粗还是细？向前看？向前看我是什么？他大嚷大叫。

好吧，你去申诉吧，我们给你写，我说。

好！我不叫你们给我脸上贴金，只要实话实说就行了。把我这一辈子都写下来，让大家评，我到底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毛主席说的，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嘛！他说。

他粗中有细。在让我们动手给他写申诉之前先找来这几年的报纸仔细地翻阅和研究。他说要“知己知彼”。几天之后，他说：翠儿，我说，你写。他把房门关起来，不让我的父母和孩子们进来。

我看我这一辈子是功大于过，功和过是九个指头比一个指头。他叫我这样开头。

那一个指头是指大跃进时抢粮和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我故意问。

现在看，那是我的大功劳，我反极左，对不对？他已经掌握了“新精神”了。

那还有什么“过”呢？高凡问。

他对我和高凡看了半天，说：材料是写给党的，怕熊！对你们也不用隐瞒，我搞过一次腐化。

什么？我和高凡都吃了一惊。一九五九年抓他的时候，他的罪状除了反对三面红旗之外，确实还有一条“男女关系问题”，但是除了大姊，我们都不曾把它认真对待。在我看来，全中国的男人都有了外遇，周纯一也不会有有的。

他见我提着笔，奇怪地看着他，便不好意思地笑笑，说：看啥？就是有这么回事儿。我这一辈子干了那么多不讨人喜欢的事儿，都是为革命，只有这一件事儿是为自己。我跟你讲，翠儿，这事儿千万别对你大姊说，不能再叫她伤心了，以后我会对她好的。我点点头。

写呀？咋不写？他急了。

这是小节，不写了吧。把那些大事说清楚就行了。我说。

不，小节也要写。我就是这个意思！我周纯一的大节是好的，只有小节问题。叫他们去调查去！他说。

高凡向我挤挤眼，说：翠儿，先别写，先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他坦白交代清楚了才替他写。我把笔一放，说：对，你先老实交代！

周纯一的脸居然也会红，说话也结巴起来。他说，你们别拿我开心啊，我是认真的。

高凡说：当然是认真的，说出来我们先帮你分析分析。

我正想戳穿高凡的小诡计，周纯一却正儿八经地“交代”起来。

x年x月x日我当县里工业局长的时候，和一位女技术员出差到外地。我很喜欢她，但是因为我已经结了婚，所以头脑里那根男女关系的弦一直绷得紧紧的。小狗骗你们！可是那一次出差……

他脱掉帽子用手往光头上搓，左手搓过换右手，右手搓过换左手，搓了半天，又把帽子戴上了。说下去呀！我催他。他摇摇头，说：翠儿，你就替我编一段吧！反正，那一天我是不得已的。没等我回答，高凡说：我替你编。我早跟李翠学会编故事了。

高凡果然编出下面一段故事来：

我们迷了路，在深山野林里。前不已村，后不已店的。好不容易，才发现了一间破破烂烂的瓜棚。天已经黑了下来……

我看不行，便催着赶路，哪想到没走几步就下起了大

雨，还打雷闪电，我们都没有带伞！

只能到瓜棚躲雨了。我让她躲进瓜棚里，自己在外
面站着，双手抱着头，几分钟就淋成了落汤鸡。而且我冻
得浑身发抖，不由自主地打了两个喷嚏。

她听见了我的喷嚏，喊我也进去躲一会儿，我说不，
不要紧，啊嚏！不，啊嚏！啊——啊嚏！一个、两个、三
个，我又接连打了三个喷嚏……都很响，雷声似的……

她伸出一只手来，说：你不进来，我只好也出去了。
她真的出来了。啊嚏！这个喷嚏是她打的。我怕把她冻
病了完不成出差任务，就钻进了瓜棚。

哎哟，哎哟！我一边记一边笑得岔了气。高凡搞的什么鬼，他哪来的这种想象力？
我放下笔，说高凡，停停，停停，我笑得笔也拿不住了。可是周纯一却听得津津有味，
说：别打岔，高凡，讲下去，后来呢？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呢？高凡扔过一本杂志给
他，说：后来的事嘛，你就自己看吧！这时他才大笑起来。

原来他在念一本杂志上的小说！这个坏蛋！可是周纯一偏偏还真的去看那本小说，
还说那小说写的“有的地方像，有的地方不像。”

闹了半天，周纯一的申诉也没有写成。我们认真地劝他，别闹了。这种事不是闹一
闹就能解决的。他说：我懂，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大不了再坐一次牢吧！没办法，我
们答应他忙过了年再写。

四十三

我原以为，周纯一的到来会引起宝塔集人的轰动，春节前后会宾客盈门的。父亲还
特别关照，见了人别乱说。可是我们多虑了，没有人来，只有“假老婆”来坐了一会儿，
啥也没说。他去年春节被“下放户”搞怕了，现在谨小慎微的。

直到三十的上午，舍儿和大傻子才来了。他们也不是专门来看周纯一的，说是来看
戏。几天前公社广播站就广播了，春节期间，县剧团要到宝塔集来演几天戏，年三十晚
上开锣。艾书记的闺女在这个戏团里，舍儿他们说，是特地来看这位艾小姐的。从舍儿
的语气里，我听出了一点恶意，好像他们要闹点什么花头似的。但是能闹出什么来呢？

我们留舍儿和杨大傻子吃饭，他们不肯，说几个朋友约好了中午喝酒的。父亲叮嘱
舍儿别喝醉了，舍儿说：醉不了。

傍晚时分，我和妈正忙着烧年夜饭，在大街上转悠的喜潮来叫我们，快出去看，大
街上一群人唱唱！还有舍儿舅舅！

我们立即跑了出去，果然见舍儿，杨大傻子和一群年轻人摇摇晃晃地从南边走过来，
一边走一边唱一支古老的儿歌：

年三十晚上，
漆黑的月亮，
瞎子看见，
瘸子撵上，
哑吧吆唤，
聋子听见。

这首儿歌是我们幼小的时候年年春节都要唱的。在没星没月的年三十晚上提着灯笼
唱这首歌，我们感到一种神秘的欢乐，仿佛真有一轮黑色的月亮在冉冉升起，那是一轮
所有人都能得到的月亮。可是，这首儿歌今天在舍儿他们这一批不大年轻的小伙子的嘴
里却完全变了味儿。它是黑暗的、压抑的、烦躁的、荒诞的、绝望的，好像整个世界的
黑暗，整个历史的黑暗，都被压缩在一团黑色的云雾中，笼罩在他们的心头。他们想干
什么？

我叫舍儿，舍儿不理我。我叫杨大傻子，他也不看我。一行人一遍又一遍地唱着
“漆黑的月亮”向北去了。

我们买了晚上的戏票。爸说：别去了吧，说不定要出什么事。“下放户”恨透了艾
书记，他的闺女到这里来唱戏真是不识时务。周纯一说：我多少年都没有看戏了，有好

戏为啥不看呢？艾××这个狗日的，我拼命保他，他却把我卖了，如今不也下台了？我说：你们当时不是也把他抛出去过？他说：那是假的！被人抓住了信，不能不做样子的，他却吓孬了。我和高凡也想去看看个究竟，便让父母和孩子留在家里，和周纯——一起去了。

戏剧在电影院演出。电影院门口的电灯比平时亮得多。看戏的人都是吃了年饭才来的，所以很迟，都带着满脸酒气。现在喝的都是红芋干子酒，容易“上头”，喝上两盅就昏昏沉沉了。昏昏沉沉地嗑着瓜子，叙着闲话，等待着好戏开锣，倒也充满情趣。

直到九点钟，戏才开场。第一个节目，就是艾书记的闺女的清唱：大快人心事。这是郭沫若在“四人帮”跨台的时候写的一首“诗”，常香玉把它谱成了豫剧曲调，宝塔集人最爱听豫剧了。

艾书记的闺女长得不像她爹，很俊，很甜，唱得也好。她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宝塔集演出了，每一次都是“载誉而归”。这一次也是一出场就赢得满堂彩，不过喝彩声中夹杂着一些挤破了的喉咙。

大快人心事儿。

揪出四人帮。

台上刚刚唱了两句，台下的气氛就不对了，十几个一起学唱，把唱词给改了：大快人心事儿，揪出艾××！

台上当然唱不下去了。有人怕闹事，开始退场，剧团的领导出场，恳求大家安静。可是一阵甘蔗皮、花生壳向台上扔去，同时有人叫嚷：送给艾××，我们想念他，叫他想开点，千万别自杀！自杀不要紧，花圈我们扎！

乡下的舞台没有聚光灯，看不清台上人的脸色，只见她一边招架着扔到身上的东西一边朝后退，退到了后台，并立即从后台传出了她的哭声。舍儿一伙乐了，又鼓掌，又狂叫，周纯一也乐得哈哈笑，说又造反了！又造反了！我和高凡硬把他拖出剧场。

观众全走了，议论纷纷，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舍儿他们不管，又是一帮一伙呼叫着离开剧场。那天晚上，他们在街上游荡了半夜，一直不停地唱着“年三十晚上，漆黑的月亮”。

第二天一早，剧团就收拾箱子，坐上卡车回城去了。据说还有人去送他们，向他们扔了许多砖块和黄沙。

顾维舜战战兢兢地等待了很久，等着惩罚到来，可是这一回他没等到，因为艾书记再也“站”不起来了。

四十四

仅仅过了半年，被赶出宝塔集的人又陆陆续续回到了宝塔集。但不是舍儿他们闹的结果。是中央的统一政策下来了。到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在宝塔集也算彻底结束了。那时候，宝塔集以外的世界已经非常热闹，各种各样的人都捋起袖子，甚至袒露胸怀地向世界哭诉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伤害，而宝塔集人却只是惋惜他们心爱的宝塔不在了。

生活又恢复了原来的轨道。大傻子又喊起了“油果儿——热的！热的——油果儿！”他的姊姊杨小群没能作为“下放户”回收，他让她帮助自己做油果儿生意。

顾维舜又回到了商店，为自己的儿子的工作问题忙着。像当了右派之后不提反右的事儿一样，现在他也不提文化大革命。生活对他来说就是过日子，而日子就像那淮河水，不停地从上游流向下流，有时宽了，有时窄了，有时涨了，有时又落了。涨水的时候要拼命地游，以免淹死；落水的时候又得使劲地扒，别早在地上了。至于以往已经过去的日子，已经过去啦！

只有周纯一还死死地揪住过去不放，还在不懈地进行着他的告状旅行。什么时候“大跃进”不再是“红旗”的时候，他才可能获得胜利，而现在，还遥遥无期。但是他坚信，他的过去是光荣的！

一九八九年元月十一日定稿于从化温泉

